

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

李可 郝生章著



为人民服务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中的 人民解放军

李 可 郝生章 著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年·北京

“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

李 可 赫生章 著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市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13.5印张 340千字

198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0 000

ISBN 7-80023-124-0/K·159

定价 6.80元

曲折前進
永志不忘

毛澤東

目 录

上编 特殊的较量

第一章 拉开帷幕	9
第一节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9
第二节 对罗瑞卿的政治陷害	14
第三节 动乱开始	23
第二章 天下大乱与稳定军队	30
第一节 《紧急指示》和两次工人体育场大会	31
第二节 “揪军内一小撮”和中共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37
第三节 怀仁堂会议与“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44
第四节 权力的攫取	52
第三章 疯狂的迫害	63
第一节 黑司令还是红司令——对朱德的诽谤、攻击	65
第二节 庐山会议的阴影——彭德怀遭迫害纪实	69
第三节 囚禁的元帅——贺龙遭迫害纪实	76
第四节 大雪压青松——陈毅遭迫害纪实	82
第五节 出污泥而不染——张学思遭迫害纪实	87
第六节 名医之死——傅连璋遭迫害纪实	93
第七节 横扫一切的“革命”——遭迫害的将领们	98

第四章 流产的政变	107
第一节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	107
第二节 九届二中全会与“批陈整风”	116
第三节 “九·一三事件”	123
第四节 “批林整风”	136
第五章 升起的希望	142
第一节 1975 年军委扩大会议	143
第二节 着手整顿军队	152
第三节 江青反革命集团对会议的破坏	158
第六章 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162
第一节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形成	162
第二节 “批林批孔”与“放火烧荒”	168
第三节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76
第四节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182
第七章 英雄本色	188
第一节 “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坚定的信仰 ...	195
第二节 擒妖捉鬼更要坚——忘我的斗争精神	202
第三节 真红不枯槁——质朴的感情	209

下编 艰难的前进

第八章 “三支两军”	225
第一节 “三支两军”的提起	226
第二节 “支左”	230
第三节 军管和支农、支工、军训	236
第四节 “三支两军”的深刻教训	241
第九章 加强战备，准备打仗	249

第一节	战备工程	250
第二节	野营训练	259
第三节	1972年的练兵热潮	266
第四节	1975年的练兵热潮	274
第十章	武器装备建设	279
第一节	发展情况	279
第二节	陆军装备	284
第三节	空军装备	295
第四节	海军装备	300
第五节	主要保障装备	305
第六节	战略武器研制	309
第十一章	保卫国家安全	312
第一节	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	313
第二节	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	326
第三节	对空防御作战	340
第十二章	组织编制调整	349
第一节	总部机关	350
第二节	军区	354
第三节	军(兵)种建设	357
第四节	部队	362
第五节	军队院校	371
第六节	其他调整	375
第十三章	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378
第一节	支援工农业生产	379
第二节	开展农副业生产	384
第三节	抢险救灾	394
第十四章	援越抗美	405

第一节	中越友谊源远流长	406
第二节	巨大而无私的军事物资支援	407
第三节	派出支援部队协助越南作战	415
结束语	430
后 记	435

1968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问在座的中央委员们：“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没有回答。毛泽东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毛泽东是睿智的，他也许在那时就意识到“文化大革命”不能建立甚至正在摧毁自己的理想，意识到即使在组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核心的几十位老同事、老部下中，感情和理智的隔膜正在蔓延。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为一个美好的愿望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真诚，但是，奇迹没有出现，延宕10年的巨大破坏给中华大地留下满目疮痍。

时隔20年，尽管我们无法洞悉“文革”10年的全部历史，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我们在思想上、理论上提供了“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的基本依据。毋庸讳言，凡是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都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考，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结论，人们以这样那样复杂的感情回忆“史无前例”的那个时代，得出这样那样的也许极不协调的答案。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十年一觉是恶梦，不该发生的发生了，应该得到的失去了，辛酸的回忆中难免带着几分惊悸。

196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说过这样一句话：“这回尖锐的阶级斗争（注：指“文化大革命”），首先就从军队开始的，从反对罗瑞卿开始的”。严格的意义上说，陈伯达的话未免失之偏颇，追

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如果不考虑 50 年代的“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和 60 年代初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的提出及意识形态领域中一系列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以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不断朝着“左”的方向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至少，1965 年 11 月开始的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但是，陈伯达的话起码说明这样的事实——从一开始，人民解放军就没有也不可能游离于“文化大革命”之外，它的身上同样留满那个时代的印记。并且，正是在同一次会议上的同一天，中共中央作出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时，批转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1969 年 4 月 28 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21 名政治局委员中，12 名是军人。如果算上列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军内军外均有职务的 2 人，军人享有政治局 2/3 的席位。1967 年开始，数百万军人几乎一夜之间取代了相当大一部分党政机关、工厂、学校、农村中那些已经被打倒或者将要被打倒的“走资派”，成为维持中国社会，同时维持“文化大革命”继续运转的齿轮。那些年，军装是神圣的标识，是权力的象征。当人们从“十年动乱”的阵痛中解脱，反思这段历史时，尽管并不情愿，却极其自然地在诅咒“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抱怨那个时候的军人和军队。更何况，林彪——这个几乎被神化的副统帅、接班人，还有那几员大将，不是将军人的耻辱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吗？

我们不想为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开脱，我们仅仅试图把“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中，人民解放军所走过的道路，

所经历的磨难，它的失误，它的英勇，尽可能客观地记述下来。相信历史会作出公允的结论。我们相信，任何一个善意的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的存在和它付出的巨大牺牲，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遭受的灾难将更加沉重。

7

上 编
特 殊 的 较 量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长达10年的浩劫中，人民解放军无例外地遭受了建国以后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的长期形成的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建军原则和方针被歪曲、被否定，为世人所瞩目所崇仰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被贬斥、被践踏，一批卓越的军事领导人被无情地打倒、关押，有的被折磨迫害致死。已经走上正轨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陷入了徘徊、停滞、倒退的状态。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因为它是国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而逃脱任何劫难。

“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多数领导者思想上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运动初期，“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尚未充分暴露。包括中共中央军委许多领导人在内的人民解放军大多数指战员怀着真诚的愿望，努力从好的方面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这场运动能够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阴暗面，“反修防修”，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崇拜，他们在茫然无措的情况下接受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张，支持并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某些活动，表现出一定的热情。

但是，这些良好的愿望同“文化大革命”实现“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设想，同运动的实际发展相去甚远。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并不象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他们更多地看到了或者感到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下汹

涌而来的那股暗流；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对“文化大革命”的组织和领导变得“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他们用当时条件下所能允许的种种方式，公开表示自己的深刻感触和忧虑，抵制和反对了“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整体上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由于党的主要领导者坚持错误方针，由于大多数人对“文化大革命”理解和认识上的矛盾造成的严重迷惘，由于其他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这种斗争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趋势。然而，它自始至终贯穿于“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缓解或制止了“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并为最终结束这场灾难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第一章 拉 开 帷 幕

如果说，1966年5月通过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那么，在此之前，林彪、江青等人假手军队，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使用阴谋手段整倒罗瑞卿，可以看作是正剧之前的序幕。假使这些事件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的话，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短暂的序幕中所包含的仇恨、恶毒和残忍决不亚于以后10年的风风雨雨。

第一节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江青是个不甘寂寞、不守本分的人。30年代的演员生涯培植了她的小聪明和躁动不安的性格。到延安之后，这种性格逐渐同政治上的野心交织在一起。建国初期，江青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处长、文化部电影艺术局顾问，后来长期称病，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她在一种“寻常看不见”的位置等待机会，准备“偶尔露峥嵘”，施展政治抱负。

60年代初，毛泽东表示了对文艺界的某些不满，认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许多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成效甚微”，“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江青嗅出了政治气候的微妙变化，认为时机已到，利用毛泽东对文艺领

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打起“戏剧改革”、“文化革命”的旗号，进行政治投机。1965年，江青在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和随之而来的在文艺学术领域中的批判运动，敲响了“文化大革命”的锣鼓。

江青野心很大，她不满足于在上海获得的某些成功，她知道，仅仅一个姚文元的地位和影响还不足以左右全国局势。她企望更大的突破，寻求一条更迅速地将这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推向高潮的捷径。她选中了林彪，选中了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主体，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它拥有数百万英勇善战的军人，还在于它可以作用并带动几千万、几万万其他中国人。林彪和江青都看到了这一点，并因此而勾结起来。

江青找到当时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提出要到军队开文艺座谈会。在军队中一无职务，二未得到中央授权的江青，擅自插手军队事务，理所当然地遭到罗瑞卿的拒绝。江青为此怀恨在心，伺机进行报复。1966年1月21日，江青到苏州找林彪、叶群密谋策划，随即由林彪指令总政治部派了4个人（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到上海参加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2月1日，刘志坚等人出发去上海之前，叶群给刘志坚打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逐字逐句念了林彪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

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刘志坚一字一句记录后，叶群又叫刘志坚复述一遍，逐字逐句作了核对。并交代他们见到江青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转达给江青。2月2日至20日，江青指定刘志坚等人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审看”中外电影50多部，安排观看戏剧3场。江青则利用午睡后精神最好的时候以个别交谈、集体座谈或看电影、戏剧时插话的形式，系统地抛出她蓄谋已久的反党意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

这个座谈会的《纪要》是林彪、江青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重要步骤，是他们实行“全面专政”的信号，也是他们摧残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在文艺领域实行封建文化专制的纲领和宣言书。《纪要》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宣称建国以后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在这个论断下，建国以后的文艺界被扣上三顶大帽子：一是理论黑。他们把“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称之为“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后来又统诬之为“黑八论”。二是作品黑。“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

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三是队伍黑。“全国解放前……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全国解放后……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纪要》认为，“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决不可能例外”。“军队的文艺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纪要》点名攻击罗瑞卿，断言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抓壮丁》是“坏影片”；要求批判电影《兵临城下》。

《纪要》同时抛出一条极左的文艺路线，其要点是：第一，取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在文艺创作上提出搞“样板”；在文艺批评上把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和文艺论著诬为“毒草”，宣布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第二，践踏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原则，推行文化虚无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主张“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宣称要同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

为准备回京后向总政治部党委汇报，刘志坚等人起草了一个记录江青谈话精神的汇报提纲。江青认为这个汇报提纲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同张春桥、陈亚丁重新加工，整理成文，形成座谈会《纪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多处修改，同时

提出要陈伯达参加《纪要》的整理。3月1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在《纲要》的标题和内容中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几个字。毛泽东认为：“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3月19日，江青将经过毛泽东3次修改的《纪要》送给林彪。3月22日，林彪给军委常委写信，吹嘘《纪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了《纪要》。4月18日，林彪、江青以《解放军报》社论的方式公布了《纪要》的内容。《纪要》抛出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更加狂热地吹捧林彪，吹捧《纪要》，尤其吹捧江青，把她誉为“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以后，“黑线专政”论从文艺界扩展、祸及到教育、出版、体育、卫生、公安等部门，造成严重后果。

这次座谈会又是林彪、江青互相利用、互相勾结的重要步骤。林彪要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和权势，利用与江青拉帮结伙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笔杆子”，江青则认为搞“文艺革命”必须利用解放军这个阵地，借助林彪的地位和权力，请林彪这位“尊神”庇护，以实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纪要》把林彪吹捧江青的话载入正式文件，江青则赞扬林彪“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正确的指示”。

根据《纪要》的要求，4月8日到6月11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创作工作会议”。会上，仿照江青在上海的办法，“看电影，找黑线”，对《抓壮丁》、《兵临城下》、《红日》、《逆风千里》、《怒潮》等64部影片进行批判，分别扣上了“美化阶级敌人”、“渲染战争苦难”、“专写错误路线”等帽子。会议期间，林彪下令对怀疑和抵制《纪要》，提出不同意见或疑问的人进行“反击”，在大会上重点批判6人，对其他56人分别在中、小会上进行批判。这次会议，成了林彪、江青在全党、全军、全国推行“文艺黑线专政”论，迫害文艺工作者的突破口。会议以后，军队各大单位均按照这次会议的规定，相继召开了类似的会议，错误地揪斗或批判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使更多的人受到打击迫害，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①。就是参加上海文艺座谈会的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因为对江青“左”的一套思想和做法不满，也很快被林彪、江青利用“文化大革命”打倒。

第二节 对罗瑞卿的政治陷害

文艺领域的突破，使林彪、江青看到了一种可能，一种希望——政治上的贪欲未尝不能用非常的手段获得满足，并且，60年代中期似乎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政治气候。按照林彪、江青的解释，既然即将到来的斗争被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那么当然具备阶级斗争最显著的特征——“你死我活”，斗争的双方誓不两立，就看谁先下手了。文艺虽然从属于政治，却并不等于政治，借用军事上的术语，如果突破口选择在薄弱之处的话，撕开口子

^① 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的建议，决定撤销这个《纪要》。1979年5月28日，总政治部决定对全军创作工作会议中的错案进行平反。

之后，扩大和发展战果才是主要的。林彪、江青没有因为得了小小的甜头而止步，几乎在同时，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在党、政府和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彭真（北京市市长、市委第一书记）、罗瑞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陆定一（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成为第一波打击的目标。

林彪在军队中首先拿罗瑞卿开刀不是偶然的，这一选择既包含了排除异己的个人恩怨，也符合林彪将重要权力归于一身的急切心理。此时的罗瑞卿身兼党、政府和军队的6项重要职务——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办主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罗瑞卿本是林彪的老部下，长征时，林彪任红1军团军团长，罗瑞卿先后担任红1军团和红1方面军保卫局长。延安时期，林彪任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罗瑞卿担任教育长、副校长。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对党在经济工作中的“左”倾指导方针提出批评意见，被免除职务，林彪出任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林彪提议调罗瑞卿回军队，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林彪对罗瑞卿的精力、魄力和才干非常清楚，知道罗瑞卿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他期望罗瑞卿感恩戴德，成为自己可以控制和利用的左膀右臂。为此，林彪以及叶群曾经煞费苦心，对罗瑞卿又打又拉，希望罗瑞卿入伙。没想到，正直的罗瑞卿不为所动，他经常直接向毛泽东请示工作，同其他元帅的关系也很密切。林彪把这些看作倨傲无礼，认为受到了愚弄和冷遇，后悔当初用错了人，担心这样一来，已经到手的权力又会悄悄地滑脱。他不能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终于下定了拉不过来压不住就打下去的决心。

林彪在一段时间中，借口身体不好，要长期养病，而且经常

不在北京，将军委日常工作推给罗瑞卿负责。可是，林彪又不完全撒手，他要经常“过问”，要体现自己的意志。罗瑞卿又是个坚持原则，不看林彪眼色行事的人。这样，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罗瑞卿不赞成林彪搞个人崇拜，对林彪散布一些形而上学的东西骗取毛泽东的信任进行了抵制。1961年12月，在讨论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稿时，叶群主张加上毛泽东“个人天才”的提法，罗瑞卿不赞成，认为这种提法不合适。1965年6月，在讨论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再版写的前言时，罗瑞卿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他还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这句话也不要这样说，对外国人影响不好。”1965年11月，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①，罗瑞卿当面对林彪说：“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

罗瑞卿积极推进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倡导和组织全军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反对林彪制造军政对立，取消军事技术训练的作法。1963年底，毛泽东看了叶剑英关于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后，大为赞许。1964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全军掀起广泛深入的群众性练兵运动。1月下旬，罗瑞卿在南京召开现场会议，进行具体的组织和推广工作，掀起了大规模的练

^① 五项原则指：第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第二，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人抓狠抓活思想；第三，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第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第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兵和比武热潮。1月至10月，罗瑞卿不辞辛劳，先后13次到全国许多部队了解情况，观看表演，对练兵和大比武表现出高度热情。这一年，人民解放军的训练水平、军事素质明显提高。但是，大比武触怒了偏爱“政治”却对军事训练缺乏兴趣的林彪，罗瑞卿在大比武中提高的威望也使林彪忌恨。为了抵制大比武和遏止罗瑞卿等的影响，1964年下半年，林彪派叶群等人以下部队“蹲点”为名，寻找攻讦的“炮弹”。12月29日，林彪借口看了叶群和其他人的几份蹲点报告，攻击大比武，反复强调“突出政治”，这些讲话被整理为《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指示》送到罗瑞卿处，罗瑞卿先后作了8次修改才下发。他坚决不同意将蓬勃兴起的群众性练兵运动一棍子打死，主张在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基础上，恰如其分地指出其缺点和不足。林彪说，1964年“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罗瑞卿则明确肯定“军事训练成绩也是很大的”，“成绩是主要的”。林彪说：“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罗瑞卿加上了“也不能乱冲击一气”一句话。1965年1月15日，罗瑞卿在高等军事学院干部读书班说，对林彪的《指示》，“你们赞成不赞成？可以讨论一下”。他多次表示，大比武的成绩是主要的，气可鼓，不可泄，就是不要泼冷水，针对林彪“军事上再好，政治上如果一塌糊涂，敌人来了向后跑，有什么用”的说法，罗瑞卿说：“军事上没有一点功夫……一打人家扑过来，你说向不向后跑？”“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政治，哪里有这种政治！”对于林彪的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罗瑞卿认为最后一条“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恰恰是最重要的。

罗瑞卿对林彪的一些作法表示不满。他不同意在印发全军的

文件中写上当时在军队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叶群的名字。《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开头有一段话：“林彪同志看了刘志坚同志和叶群同志……写的几份报告，并听取了叶群同志的汇报……”罗瑞卿建议，将张贴到连队的《指示》中的人名改为“总政工作组”。

在林彪看来，罗瑞卿倨傲不恭，越来越不听话了，他开始在工作中寻机刁难罗瑞卿。罗瑞卿按林彪规定的时间去汇报请示工作，林彪经常以有病为借口，拖延不见；若直接去了，他说是搞突然袭击，拿小事折磨病人；若不去汇报请示，又说是封锁他。

1965年夏天，林彪、叶群在一部分人中散布谣言，诬陷罗瑞卿“有野心”，“有事不跟林彪商量，不向林彪请示”，“正在组织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蛊惑人心地煽动“注意罗长子”，“提高警惕”。1965年11月，林彪要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等人写一个“关于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的情况”，并且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要求写明在每个问题上罗瑞卿的表现。李作鹏于是和王宏坤（海军副司令员）、张秀川（海军政治部主任）合作写了一份7000多字的材料，说罗瑞卿对海军“怀有巨大的阴谋”，“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是想占领海军这个阵地。随后，林彪指派叶群带着他的亲笔信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状，挑起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不满。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批判。

应该说明的是，林彪的诬告不可能完全左右毛泽东的判断。毛泽东对罗瑞卿的某些做法有自己的看法。罗瑞卿曾在公安部队的规模、抽调野战军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等问题上同毛泽东产生分歧意见。罗瑞卿不赞成林彪搞的突出政治、个人崇拜恰恰又是毛泽东所赏识的。林彪的诬告无疑起了强化作用，使毛泽东对罗瑞卿工作上的某些不满迅速转化为政治上的怀疑。毛泽东在一个

报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很明显，这里指的是罗瑞卿。

上海会议印发了李作鹏等人写的诬陷罗瑞卿的材料作为会议的重要文件，叶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为了加重“揭发”的份量，叶群指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抛出了所谓罗瑞卿要已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转告叶群的“四条意见”，即：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显然，“四条意见”如果是真的，罗瑞卿公开伸手，逼迫林彪让权的罪名就无法逃脱。问题是刘亚楼已死，死无对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都认为这一说法未可置信。会议开了3天之后，正在西南视察工作的罗瑞卿才被匆忙召到上海，并立即处于被揭发和被攻击的地位。会后，罗瑞卿被调离军队的领导职务，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1965年12月底至1966年1月召开的军队政治工作会议，根据上海会议精神，继续对罗瑞卿进行批判。

上海会议仅仅提了个头，没有根本解决罗瑞卿的问题，没有作出最终的结论和组织上的处理。作为上海会议的继续，1966年3月4日至4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历时13天，参加人员包括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干部，共42人，进行所谓面对面的斗争。罗瑞卿曾要求，等到会同志的发言告一段落后，

即行休会，让各军区来的同志先回去，等他准备好了，再行召集会议，听他的检讨发言。这一要求未获同意。3月12日，罗瑞卿作了第一次检讨发言。3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扩大会议范围，增加53名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负责干部以及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队负责干部到会。3月18日，罗瑞卿为抗议对他的诬陷诽谤，坠楼致伤，不能参加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转为所谓背靠背的斗争。

一个多月的会议中，单独或联合发言的发言稿有86篇。囿于上海会议定下的调子，大部分发言继续重复对罗瑞卿“篡军反党”的指控，罗瑞卿说过的话，工作中发表的意见，作出的批示，甚至转述别人的话，都被提到政治立场的高度重新认识和估价。这些发言中，既有牵强附会和捕风捉影，也不乏人身攻击。随着批判的不断升温，罗瑞卿“错误”的性质越来越严重，对罗瑞卿不称“同志”了，他的检讨被视作“避重就轻”，“似是而非”，“安了许多钉子，进行反扑，准备翻案”。实际上，罗瑞卿完全被剥夺了申辩的机会，他无法一件件澄清铺天盖地而来的所谓“证据”，更无法忍受横加在他头上的“野心家”、“阴谋家”、“要篡军、篡党、篡国”等帽子，他要求核实材料，“凭猜测作结论，我怎能领受得了？”他表示相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会作出公正的结论，同时驳斥了某些曲解事实加给他的罪名。罗瑞卿没有想到的是，他是一个刚刚开始阴谋的牺牲品，他的对手正在调动或者制造一切不利于他的材料证明他的“罪行”。其实，他的对手不过借用这些最能引起人们兴趣和热情的最有蛊惑力的罪名清除他，至于不能够证实这些罪名的成立倒是次要的。因此，这场较量一开始，就注定了罗瑞卿失败的结局，他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他的每一次反击只能招致更残酷的打击。

尽管基于正义感的驱使，或者基于崇拜和信任的盲目，许多

人在不甚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参加了对罗瑞卿的批判，说了违心的话，却仍有人敢于顶着愈益凶猛的潮流仗义执言，为罗瑞卿伸张正义。作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的彭真在讲话中要求发言的人只讲罗的问题，不要牵连别人；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凡是站不住脚的、无把握的材料，都不要讲；决不使人感到讲过头了，有一条是一条，是三分不讲成七分，是七分不讲成十分。针对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彭真指出，现在愤慨的人，将来冷静下来后是会失悔的，人在火头上的时候和冷下来的时候不一样。他甚至尖锐地对工作小组向中央写的报告提出质疑：“这些结论，合乎不合乎事实，事实的根据够不够？”历史证明了彭真的判断和预言，却没有赋予彭真扭转局势的力量，会上，彭真成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罗瑞卿的错误，“企图给罗瑞卿待机翻案作种种准备”的“背后支持者”，被戴上“极端危险分子”、“定时炸弹”的帽子，很快重演了罗瑞卿的悲剧。

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作出《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罗瑞卿的主要错误事实是：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一《报告》，中共中央的按语提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反对林彪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中共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

副总理的职务。

利用中国共产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中，林彪终于整掉了罗瑞卿。通过整罗瑞卿，林彪不仅扫除了篡权道路上一个最直接的障碍，更重要的是由此打开了一个缺口，便于林彪上挂下连，把斗争矛头指向更多的人。罗瑞卿长期担任党政军多项重要职务，与他有工作关系的人很多，林彪整倒一个罗瑞卿，往上可以追“后台”，平级中可以找“同伙”，往下则可以抓“爪牙”。贺龙与罗瑞卿关系密切，邓小平对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对待中央书记处书记不满，这些后来都成了“罪状”。彭真主张对罗瑞卿问题应该实事求是，被视作“包庇”，视作与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组成了“反党集团”。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等一大批同罗瑞卿一起工作过又不肯受林彪拉拢的人，都受到了株连；通过整罗瑞卿，林彪开始网罗队伍。林彪以反对罗瑞卿的态度衡量忠于他的程度，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或者出证明，或者写材料，或者长篇发言，林彪认为他们是有功的。后来，这几个人先后受到冲击，林彪及时出面保护，随之委以重任；通过整罗瑞卿，为林彪上台当接班人造了舆论。对罗瑞卿的攻击是同对林彪的颂扬联系在一起的，否定罗瑞卿的同时肯定了林彪。罗瑞卿是林彪倡议搞掉的，清除了这颗“定时炸弹”，林彪抢了首功。借“彭、罗、陆、杨”问题，林彪大讲政变问题，在党内制造恐怖气氛，既迎合了毛泽东的某些观点，又为进一步扩大打击面提供了论据。对林彪的宣传开始甚嚣尘上。

罗瑞卿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拉开帷幕之际，被林彪一伙采用造谣诬陷手段整倒的人民解放军第一位高级将领。这一事件，不仅助长了林彪已经膨胀起来的反革命政治野心，而且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开创了极其恶劣的先例。从此，林彪、江青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打击、陷害军队系统各级负责干部，朱德、彭德

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罗瑞卿及其家属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残酷的折磨和迫害，罗瑞卿本人被关押近7年，关押期间多次被用箩筐抬着拉去批斗。林彪、叶群借口“政治斗争需要”，利用罗瑞卿的伤腿作为审讯和折磨他的手段，拖延治疗时间。罗瑞卿的爱人郝治平和儿子也被关押。

第三节 动乱开始

借用中国一句古话，“山雨欲来风满楼”。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对罗瑞卿的政治陷害虽然使人们从骤然刮起的腥风中嗅出即将来临的山雨的浓烈气息，然而，当这场急风暴雨真正到来之际，人们仍然因为其远远超出自己的心理准备和承受能力而无所措手足。作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标志的，是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明显脱离中国实际的要求和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5月18日，林彪

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别有用心地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大造中共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制造恐怖气氛。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和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5月2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①。

5月25日，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电话会议，具体部署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后，总政治部多次发出指示或作出口头规定，提出，“总的步骤是先搞正面教育，使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对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物进行充分揭露，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彻底批判”，着重抓好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部门的文化革命。同时规定，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确定要夺权的军以上机关，可以贴大字报，开批判会；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会，声讨会；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此后，“文化大革命”在军队逐步展开。

不过，军队大多数单位此时对“文化大革命”仍持怀疑、观望态度。尽管在形式上，“文化大革命”象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一样，很快就有了轰轰烈烈的样子，但思想上的迷蒙既阻止人们全身心

^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8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革顾问），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以及华北、东北、西北、西南4大区代表各1人。

地投入运动，也阻止人们全身心地反对这场灾难。“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逐渐溶化人们观念中久已形成的那层薄薄的、脆弱的外壳，注入冲动和狂躁的激素。

这种现象同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对运动的部署亦有关系。1966年上半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都出现了不好的苗头，主要产品产量下降，事故增多，基建任务仅完成全年的35%左右。鉴于此，1966年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等建议将运动的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和党政机关。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结合“四清”运动，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分期分批地有领导地有计划地进行，不要一哄而起。7月2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但是，《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已经开始。为了纠正首先在学校中出现的愈演愈烈的混乱局面，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毛泽东同样认可了这一作法。然而在康生、江青一伙挑动下，工作组同起来造反的群众间产生许多矛盾并遭到轰赶。7月下旬，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主张统统驱逐。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随即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使八届十一中全会改变了原定议程，转为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8日，从外地回京参加全会的林彪接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时，表示坚决支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吹“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同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

条”)，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要善于发现左派，发现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要“敢字当头”，“充分利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不要怕出乱子”。10日，已经下决心利用“文化大革命”进行政治投机的林彪召集军队负责干部，就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问题和干部路线问题发表议论，提出“拥护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其他都是中好中坏，小好小坏”。林彪并且解释说，“有的干部，小节不那么好，生活作风、男女关系、工作态度、工作方法有毛病，不大好，但是他拥护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就要提拔。林彪鼓吹“根据运动中检查的结果，升官，罢官，该升的升，该罢的罢，大升一批，大罢一批”。12日，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改组，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补选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1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二降到第八，林彪则上升到第二，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批准了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彭、罗、陆、杨”的决定，改组了中央书记处，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八届十一中全会基本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受阻的局势，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方针，“文化大革命”不仅更加合法化，而且从组织上得到了保证。会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相继遭到诬陷和迫害，“中央文革小组”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中共中央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完全失去了抵制和纠正的能力。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为了贯彻会议精神和“十六条”，中共中央军委连续召开会议。8月16日，林彪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和干部路线等问题。会议规定，“在全军的军、省军区、军区、军种、兵种、院校和总部机关，开展一次轰轰烈烈的深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彻底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根据军队情况，“着重是：一、检查是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不是真诚拥护毛主席；二、检查是不是突出政治，还是单纯军事观点；三、检查是不是有革命干劲（包括作风）”。

会议提出，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大体上从9月份开始，用2、3个月的时间进行，整个运动大致分为鸣放辩论，重点批判，整改建设三个阶段。师团机关和连队按照总政治部规定，进行正面教育。

关于干部路线问题，会议重申了林彪8月10日讲话的内容，提出，“干部有两种。一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拥护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有革命干劲的；一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对突出政治的，没有革命干劲的”，前一种是好干部，即使小节上有毛病，也要大胆提拔到关键性岗位上来。第二种干部小节方面再好，有天大的本事，也要罢他们的官。会议认为林彪提出的三条标准是毛泽东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的具体化，要求据此对干部进行排队和审查，决定提升罢免与否。

8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常务委员会议，听取关于全军“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林彪在会上反复鼓噪“九月、

十月、十一月大闹三个月”，“真金不怕火烧，不是真金烧掉了更好”，煽动在军内搞“四大”；林彪借口群众运动，否定党的领导，提倡无政府主义，他说，“什么叫突出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群众，就是群众路线”，“群众是天然革命者，群众是有智慧的，是不会大错的”，“让他乱一个时期。我们没有经验，要向群众学习”；当汇报到过去发的文件有些已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时，林彪答复：“可以改掉。朝令夕改。”当汇报到有些院校师生要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小组时，林彪表示：“要成立的，可以试一试。”“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去搞一套太具体的规定，可以让他们去搞。”林彪甚至点名提出，“梁必业、肖向荣可以斗争，应该斗争”。林彪的讲话，否定了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军委为稳定军队而采取的许多必要措施，成为将军队推向动乱的重要因素之一。10月4日，这次会议的纪要传达到全军军以上单位，恰恰成为第二天发布的《紧急指示》的注解。

8月24日和27日，总政治部召集驻京各大单位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根据林彪23日讲话的口径评价前一阶段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认为“运动来得快，来得猛，声势大，揭得深，大字报的质量高水平高”，同时要求冲破阻力，彻底搞“四大”。虽然会议提出“加强党委对运动的领导”，但没有说明“党委领导”与“彻底四大”之间孰轻孰重，实践中也就无法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在“彻底四大”的情况下，党委乃至党委成员几乎统统成了攻击的目标，“党委领导”是无从谈起的。

“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大大脱离了当初的设想。已经开始的动乱局面鼓舞了林彪、江青等人的政治野心，他们决心把党的领导者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引向极端。“文化大革命”的内容、规模、时间都远远超过最初的估计，终于演变成持续10年之久的全国性灾难。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由于林彪的直接干

预，人民解放军的院校首先受到猛烈冲击，继而迅速波及到各级领导机关，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

第二章 天下大乱与稳定军队

“文化大革命”使林彪的地位陡然上升，毛泽东的赏识更增添了林彪的政治资本。然而，毕竟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还未有接受或没有完全接受“文化大革命”的主张，尽管他们个人的影响都无法与毛泽东的威望和林彪的权势相抗衡，不足以左右“文化大革命”的局势，但是这种力量在当时仍然是强大的，它使林彪不能为所欲为。

军队“文化大革命”的节奏比地方慢了半个节拍，军队院校虽然同样是“文化大革命”最先搞起来的地方，但军队院校一方面受地方院校的影响，存在着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又受到军队纪律的约束，遏制了某些人的造反欲望。师以下部队进行正面教育，“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这里大大减弱了。

林彪、江青一伙当然不能容忍军队长期处于动乱的局面之外，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缓冲因素。他们寻找机会在人民解放军中制造混乱，在混乱中攫取权力，企图改变这支军队的性质，变成他们可以随心所欲支配的工具。

林彪、江青并不着力掩饰自己的企图，他们一系列行动的倾向性和目的性十分明确，这就自然遭到当时仍是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反常作法持不同态度的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人以及人民解放军大多数领导人的抵制和反对，1966年底到1967年初，双方的矛盾达到高潮，斗争也达到高潮。

第一节 《紧急指示》和两次工人体育场大会

一、《紧急指示》

“文化大革命”提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口号：“踢开党委闹革命”。在这个口号的支持下，党委、党的领导干部统统被视为阻碍运动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很多地方和单位，甚至把党委当作运动必须排除的对象。党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尽可能地抽象，抽象到仅仅剩下一句若有若无的标号，“党的领导”和“党委领导”，一字之差，在当时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极，一个名义上要坚持，一个坚决要踢开；一个是左派的光荣，一个是右派的象征。人们很难理解，一级级党委瘫痪了，垮了，没有了，“党的领导”从何谈起。

严格说来，军队系统的党委并不象地方党政机关、工厂、学校的党组织那样，完完全全被踢到了一边。但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却是从军队中，首先由林彪提出来的。

“十六条”规定，“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军委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和正常秩序，保证统一指挥，防止混乱，规定运动应由各级党委领导，在党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并且把军队的“文化大革命”限定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少数部门，不准院校师生到北京串连。林彪对这种“冷冷清清”的状态极不满意，他指责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领导缩手缩脚，怕字当头，要求改头换面，翻然悔过。1966年10月5日，根据林彪的提议，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

“十六条”的规定办，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紧急指示》取消了军委、总政为稳定军队曾经作出的许多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院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紧急指示》还宣布，由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允许进行串连和调查。《紧急指示》根本否定了在此之前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否定了党委领导运动的必要性，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是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由相对稳定演变为极端混乱的重要转折。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文件，要求县以上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这样，就把“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谬误推向全国。到1966年底，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党员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

《紧急指示》发布后，极左思潮迅速蔓延。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鼓吹：“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合理的。”会后掀起的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打着贯彻群众路线的旗号，给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加上“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横加批判、打倒或关押。

《紧急指示》同《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样，是林彪、江青以军队的名义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纪要》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渲染气氛，提供理论依据，论证其必要性；《紧急指示》则从实践上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作法：“踢开党

委”，把《纪要》提出的设想变为现实。如果这也可以称得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话，那么，这种结合确实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或行动方针，“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都可以感到它的影响。这个口号，几乎否定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

二. 工人体育场大会

《紧急指示》发布和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急转直下，党委对运动的领导被取消，一切规章、制度被视为束缚群众的“条条框框”而统统失去了作用，院校师生纷纷外出串连，参与造反夺权活动，军区、总部机关不断遭受冲击，军队负责干部被揪斗。11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已逾10万人，其中少数人带头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

事态的发展，引起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关注。为了防止年轻学生盲目行动可能酿成的更大祸害，11月13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来京人员大会，周恩来、陶铸、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肖华、杨成武等同时出席。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在会上先后讲话，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错误作法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提醒到会者客观地冷静地估价自己的行动，不要因为盲目的冲动而失去理智。

陈毅在讲话中首先强调人民解放军不能够乱，一定要有秩序，要讲党的政策，有组织、有纪律，他以自己曾经犯过错误的亲身经历，告诫年轻的师生们不要在“文化大革命”中乱搞，不要去闹。同时提醒他们，路线斗争中“可能犯大错误”。陈毅坚决反对冲中南海、冲国防部，要求军队院校师生顾全大局，不要图报

复，不要搞“逐步升级”，要团结同志，讲道理，掌握一定的限度，防止因超越限度而酿成错误。陈毅明确表示要给那些过热的头脑“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他要求年轻学生接受老一辈革命家的指导和帮助，学习政治斗争的正确方法。

徐向前重申人民解放军必须保持战斗状态，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影响军队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徐向前说：“我们也希望你们大家从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要考虑到这些领导机关、这些领导干部的任务和工作情况。”徐向前提醒学生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行动，“究竟是对革命有利呀，还是有害？”他要求军队院校做出好样子，不要损害人民解放军的形象。

叶剑英强调真理是有限度的，跨过一步就是谬误，就会发生质变。特别是领导运动的人要掌握火候，掌握适当的温度，“不懂得这个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领导运动，就会把群众的热情，引导到错误方面去了。”他批评有些人把毛泽东的著作当作耶稣基督教的圣经，只知背诵，不会行动，变成了教条；批评有些人表现不好，方便让给自己，困难留给别人，败坏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批评有些人没有阶级感情，把心脏病发作的干部抓来批斗，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叶剑英告诫人们注意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要受破坏分子的利用。叶剑英在讲话中，再一次阐明了中央军委对“文化大革命”一些具体问题的态度。

叶剑英讲话时，解放军军医大学一名学生向主席台递条子，责问会议经过林彪批准没有，言外之意，会议是否合法。叶剑英见了条子十分气愤，当场宣读，他说：他怀疑我们偷偷开会，大家相信吗？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

11月13日的工人体育场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汇聚

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中引起巨大震动，赞誉者有，毁谤者有。为了进一步巩固这次大会的影响，教育更多的青年学生，总政治部决定11月29日举行第二次接见大会。

29日的工人体育场，气氛比半个月前的13日更为紧张，会场周围贴满了标语，指责陈毅、叶剑英等人13日的讲话违背了“十六条”和10月5日的《紧急指示》，声言必须批判，但是，陈毅、叶剑英还是挺身而出，再次讲了话。

陈毅毫不隐晦地表示，自己11月13日的讲话是有意识得罪一批人的。他认为，光讲好话，不给犯错误的同志以帮助，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陈毅说：“如果光在那里讲恭喜发财，讲天气很好啊，伟大伟大呀，万岁万岁呀，没有帮助。有什么帮助啊？那是扯谎！表示陈老总这个人不老实，心里有话不讲出来。”他对“文化大革命”能否搞好持怀疑态度。他反对把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的同志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因为“文化大革命”影响国民经济生活；反对把打击面搞得太宽太长，从而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同时，他认为军队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采取有别于地方的方法进行“文化大革命”。并且，军队领导机关和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也应有所区别。陈毅相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表示愿意出席对他的批判会，“但是，是你把我批倒，还是我把你批倒，这个话还很难说”。

叶剑英在讲话中阐述了军队院校培养学生的重要意义和特点，指出，不允许军队院校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人民解放军的为全国人民学习的优良传统。他说：“冲我们最高统帅部，冲我们国防部，把国防部当成敌人，当成敌人的堡垒来冲，把解放军战士当成敌人来打，还有哪一种比这更错误

的啊……严格讲起来，这就是反革命。”同时，他希望犯了错误的同志迅速改正，表示要苦口婆心地挽救犯了错误的青年。叶剑英同样没有因为会场中火药味甚浓的反对情绪而掩饰自己的愤激，他说：“你们这里有很多标语，贴尽管贴，讲我们还是要讲。”

连续两次工人体育场大会，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人们所能听到的对“左”倾方针最直接、最系统、最尖锐的公开批评，它打破了对“文化大革命”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肯定，不能怀疑的禁区，对运动的指导方针、步骤和方法提出一系列发人深思的疑问，它否认“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认为“可能犯大错误”；它反对无限上纲，残酷斗争，要求掌握运动的“限度”和“火候”；它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原则，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它反对林彪提出的“大乱”的主张，要求保持军队的稳定、团结和集中统一指挥；它反对全盘否定过去的成绩以论证“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要求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长期形成的卓有成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时，它坚持“文化大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这两次大会又是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庄重的集体声明。尽管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正受到来自“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仍然直言不讳地阐明了对这场运动的态度，表示了自己的深切忧虑和关心，希望矫正运动的错误势头，将其纳入正确的轨道。陈毅、叶剑英等人的讲话，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多数成员的意志，反映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本质逐渐暴露的情况下，人们认识上出现的变化以及对“左”倾错误的觉察和抵制。

林彪、江青对两次工人体育场大会和陈毅、叶剑英等人的讲话极为反感，迫使陈毅、叶剑英就此“检讨”。然而，这两次大会确实给狂热的青年学生泼了冷水，促使他们重新思考。许多学生

接受了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的正确主张，不同程度地对“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和作法产生了怀疑，甚至退出了“造反”的行列。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受到重大遏制。

第二节 “揪军内一小撮”和中共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在全国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自上海开始，各地“造反派”纷纷夺权，动荡的局势猛烈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稳定军队，制止混乱成为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恰恰在这时，林彪等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向着敢于同他们唱反调的军队负责干部猖狂进攻。斗争进入白热化状态。

一、“揪军内一小撮”

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中央军委副主席以及军队许多负责干部的强烈反对，使林彪、江青一伙的乱军阴谋一时难以得逞。林彪、江青越来越感觉到，要想攫取政治上的权益，首先需要进行组织上的清洗，扫除运动的绊脚石。而要拿掉那些与林彪地位不相上下的元帅们和一大批军队高级将领，仅仅一道命令是不够的，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搞臭，不仅使毛泽东，而且使一般老百姓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逻辑接受这些人退出政治舞台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当然被林彪、江青视为至宝。

1967年1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当天晚上，江青将

这个报告送林彪批阅。第二天，林彪批示“完全同意”。1月13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在军队内是十分尖锐的……不要以为军队里边没有两条路线斗争。”1月14日，《解放军报》社论公开了这一口号，“社论”提出，“这种阻力（注：指妨碍“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过去，他们曾经施展过种种卑鄙伎俩，进行捣乱。现在，他们还在耍出各种花招，进行新的反扑”。次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迅速流毒全国全军。

“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使得借造反之机反军乱军的行动终于合法化。在此之前，尽管军内军外的造反派们对军队的权力觊觎已久，但是投鼠忌器，他们唯恐戴上一顶“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钢铁长城”的帽子，不敢放手乱搞。这一口号打消了他们最后的顾虑，他们可以以“一小撮”的名义攻击任何一位军队领导人。“揪军内一小撮”所以为林彪欣赏，还在于它契合了林彪分而治之的策略。林彪有心一夜之间把不买他的账的人扫荡殆尽，苦于心有余力不足，而“一小撮”、“一小撮”地扫除夺权路上的障碍，既不影响目的的最终实现，又冠冕堂皇，谁也无法否认，任何时候，“一小撮”总是存在的。

随后，林彪在军委碰头会议上提出在军队搞大民主的意见，“机关要彻底搞，主要一条是革命，把革命摆在第一位，战备和其他工作要照顾一下”。“对老干部有的要烧，不但烧，有的还要烧焦……有的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的贴大字报，有的一般的开会批评”。康生、陈伯达和刚刚被林彪任命为中央军委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的江青也在会上推波助澜，煽动军队加入“全而内战”。林彪等人的意见，遭到军委其他几位领导人的

坚决反对。

二.《八条命令》

军委碰头会是1967年1月初，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北京召开的，会议集中讨论处理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2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经常性的政治局碰头会，处理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3、4月间，中共中央军委先后召开军级干部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在这些会议上，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同中共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人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围绕着要不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要不要稳定军队，要不要保护老干部等问题，同林彪、江青及其同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肖华、杨成武等任副组长^①，江青攫取了直接干预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由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总政治部。同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他说，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他还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

江青、陈伯达等人不理睬这些正确主张，在军委碰头会上，

^① 担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的还有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郑文、王力加、余立金、司徒涛、唐平铸、胡耀邦、叶群、王峰、和谷里、张涛。3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谢富治为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他们一方面恶毒挖苦和攻击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大肆鼓吹军队不是世外桃源，不能搞特殊，要求军队立即开展“四大”，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则认为军队战备任务很重，必须保持稳定，不应开展“四大”，并对随意揪斗军队领导干部，随意抓人、抄家、戴高帽子等作法表示强烈愤慨。1月19日，叶群在会上点名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当晚，肖华的家被抄。次日，陈伯达、江青、叶群继续纠缠肖华问题，叶剑英盛怒之下，拍了桌子，造成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因为这次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后来被称为“大闹京西宾馆”。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的人员，受到接见的军队领导人情绪激动，纷纷向毛泽东诉说挨斗被整的情况，诉说“文化大革命”给军队建设造成的巨大危害。徐向前汇报说，造反派“要揪谁就揪谁”，“我们军委在开会，有些人到京西宾馆，要抓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几个常委都被围起来了，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被抓去了，还要抓郑维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毛泽东对这些现象表示气愤，他说，“那还得了”，“到处抓人怎么行”，许世友说：“戴高帽子是对地富反坏的，为什么对自己人也戴？我们跟主席这么久，把我们当地主一样斗，我想不通。”毛泽东指出，那些作法是对土豪劣绅的，用来对待共产党的干部，是不好的。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郭鹏等人反映，他们的家被抄了、封了，家属被打了。造反派还扬言，要组织2万人“欢迎”他们回新疆。第二炮兵的李天焕（后任第二炮兵政治委员）向毛泽东报告，吴烈（第二炮兵副司令员）“被包围了”，“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毛泽东说：“要允许工作，不能过头了，不能搞逼供信。”毛泽东意识到军队中潜在的危险，意识到追随自己多年的军队领导人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都受到严重伤害。这些都是他始料不及的。他

同意不能冲击军事机关；批评“一犯错误就不得翻身，一次检讨不行，二次、三次也不行，没有回旋余地”，“是一股风”；批评体罚、侮辱人格等不文明的斗争方式；要求搞好团结，保护一些老干部，“不能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即使犯了严重错误，“不能掌权，也不能一点工作不让他做”。针对林彪散布的攻击朱德的谣言^①，毛泽东明确表示，“这个人不能保不行，我要保他，他在国际国内有影响”。同时，毛泽东要求军队干部在受委屈中取得经验教训，不要吃老本，要支持“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毛泽东说：“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说不介入，其实是假的，西安、重庆、兰州、成都、南京等都介入了，都派了工作组。”毛泽东特别指出：“南京军区派到南大工作组的三个人，揭发得好（详见本书第八章）。”

1月23日，会议就军以上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以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的名义向毛泽东提出建议：一.大军区、省军区的文化大革命要分期分批进行，要同地方文化大革命错开，何时开始，要经中央军委批准；二.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不许抓人，不许动手打人，不许戴高帽子，不许游街，不许抄家；三.军队不许夺权；四.在外地串连的军队人员一律返回本单位；五.运动一定要坚持党委领导的原则；六.不许冲击和占领军队领导机关。“建议”针对军队中出现的不稳定因素，主张维护军队的集中统一，缓解“左”倾思潮对军队的侵蚀。这些建议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日，林彪在讲话中指责军队“革命气氛、革命劲头不足，缩手缩脚，怕字当头”，同时标榜自己“在被动状态中争取了一些主动，如不让院校串连，我来个大串连。他们规定院

^① 林彪曾说：朱德没有什么能力，不会打仗，他当过多年总司令，都是人家给他当的。

校和部队一样搞正面教育，十月五日发了个‘紧急指示’。冲国防部扣不扣学生，我说不扣。机关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大开展，要开展，不怕”。他还说，“有各种各样的对象，有各种各样的程度，必须要有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要求军队干部对戴高帽子、“喷气式”等人身摧残作法予以谅解，不要追究。

作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军事领导人，林彪不希望军队乱到足以否定自己“权威”的地步。同时，林彪又不惜在必要时，以一定范围和程度内的“乱”为代价，遏制反对力量，保证其对军队的控制。

毛泽东此时的心理是矛盾的，他既要已将已经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又担心严重的动乱会失去军队的信任和支持，担心一旦军队失去控制将会导致整个局势难以收拾。他的抉择是数百万人民解放军赖以行动的依据。经过慎重考虑，权衡利弊，并征求了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的意见后，1月28日，毛泽东同意颁布中共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认为“所定八条，很好”。《命令》规定：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二、所有军队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三、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四、一切外出串连的军队人员应迅速返回本地区，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五、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不得索取和抢劫军队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七、军以上机关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

《命令》本来还有坚持党委对运动的领导、不成立文化革命战斗组织的内容，但在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时，这些都被删掉了。

为了贯彻《八条命令》，2月11日到27日，中共中央军委连续发布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以及《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对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方法作出规定：军以上机关（各总部、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区空军、海军舰队）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分期分批进行“四大”，军委决定暂时不开展“四大”的单位，进行正面教育，何时开始，听候军委命令；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的基地以下单位，海、空军的飞行学校，北京卫戍区，上海、天津、旅大警备区，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司、政、后及其他领导部门）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撤销。

2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军委的《八条命令》，要求地方单位普遍张贴宣传，认真贯彻执行（除第七条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中共中央的通知称，这些规定“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的重要措施”。

《八条命令》的颁布，扭转了军事机关为造反派左右的极为反常的现象，人民解放军迅速摆脱几乎瘫痪的状态，开始采取措

施，制止“造反派”以“革命”的名义继续冲击军事机关，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工农业生产。《八条命令》的颁布，再一次说明坚持正义，忠于真理，仍是人民解放军大多数成员的意志，说明“文化大革命”的主张及其作法并没有在人民解放军中得到普遍的响应和接受。相反，人民解放军长期培育而成的信念、意识、传统、习惯以及规章、制度、作风和方法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民解放军作为一部完整的有效的机器，企望按照既定的程序运行，必然与以否定过去的一切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发生深刻的矛盾。只是由于毛泽东的干预，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还在聚集力量并慑于毛泽东的威望而不得不有所让步，才使这种裂痕得到暂时的维持。

第三节 怀仁堂会议与“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怀仁堂会议

同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在1967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又称怀仁堂会议）上达到高峰。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斗争还局限于如何搞好“文化大革命”，局限于在“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如何加强领导，稳定秩序，掌握斗争分寸的话，那么，2月的斗争则发展为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怀疑，发展为揭露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的阴谋活动。斗争的形式也由间接的较量变为面对面的抗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以及余秋里、谷牧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作法表示了强烈不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1.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叶剑英质问张春桥等人：上海

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注：毛泽东也认为此种作法不妥，要求重新考虑，并建议改名为“革命委员会”）？他还嘲弄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当张春桥托词“同群众商量”，拒绝保护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时，谭震林大发雷霆，斥责张春桥借口群众运动，否定党的领导，搞形而上学。并说，“我看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消极面是主要的”。

2.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谭震林对张春桥说：你们的目，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陈毅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能随便打倒呢？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①”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3.要不要稳定军队。叶剑英谴责中央文革：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

^①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其成员多为干部子女。

我们这些人都不行，要蒯大富^①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如果不要解放军，我就不干了。

2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碰头会上，谭震林气愤地表示：“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余秋里拍着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指责会场中唯一为江青和中央文革说好话的谢富治在“和稀泥”。这些老共产党员磊落光明的胸襟和义无反顾的斗争精神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场斗争集中在2月，后来被评为“二月逆流”，又因为斗争的地点主要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因此也被称为“大闹怀仁堂”。

2月16日晚，张春桥等人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指责在会上提意见的人，周恩来也受到责难。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共中央接连召开7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这些人，同时，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江青提出把中央文革小组当作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向文革小组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这也是林彪、江青制造“二月逆流”，进行组织上的清洗的目的所在。

1967年3月召开的军级干部会议，目的在于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中遇到的问题。4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继续罗织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煽动军队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这两次会议上，不同意见之间的冲突依

^① 清华大学学生，清华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

然十分尖锐激烈。

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批判所谓的“二月逆流”，谭震林因在押而被剥夺参加会议的权利，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则分别遭到围攻。康生说：“2月16日大闹怀仁堂，16日前就酝酿了。”“一个地方是京西宾馆，军队干部开会，徐向前在会上叫干部有什么意见尽量讲，表面上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说‘不教而诛^①’，第一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姚文元说：“徐向前的口号，同陈毅、李先念的口号一样，说‘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保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保护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谭震林本身就是叛徒。”江青、康生针对徐向前“还要不要军队”的呼吁，转而攻击这些同志在“乱军”，江青说：“空军也是军，要夺吴法宪的权，我去保吴法宪可难啊！”康生说：“难道邱会作不是老干部？怎么不保呢？”谢富治说：“‘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文化大革命拉下刘、邓后，有几个回合。几个老总1966年10月讲话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煽风点火乱军。”林彪则说：“它（指‘二月逆流’）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要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主席原定在六七年的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个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他们都承认，2

① 据聂荣臻后来回忆，“不教而诛”是他说的，不是叶剑英说的。

月16日是双方斗争的高潮，是一次总爆发。

1968年12月29日，周恩来在一份反映老干部思想动态的简报上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这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说明，毛泽东对这些老干部是采取保护措施的。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对毛泽东阳奉阴违，在同一份简报上，林彪批示：“坚决拥护主席批示，派黄永胜、吴法宪两同志传达主席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以此警告参加这场斗争的老干部。他们规定，对毛泽东、周恩来的上述批示，要严格保密，不准往外泄露。

发生在1967年2月前后的这场斗争，使林彪、江青一伙十分恐慌，他们又一次感到，“文化大革命”并不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领导集团内的大多数人所支持，而由于这些领导人的威望和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的巨大障碍。斗争的影响所至，使更多的人理解了中共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的立场，听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意见，从而影响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态度。但是，这场斗争不为毛泽东接受，相反，却在一些相当敏感的问题上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老干部们的批评无疑助长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气焰。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林彪、江青一伙得以更加放手地整垮对手，夺取权力。

二 “七·二〇事件”和“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7年7月，林彪、江青一伙有预谋地在武汉策划制造了“七·二〇事件”，利用这次事件，再一次掀起了颇有声势的反军

乱军浪潮。

1967年3月以后，林彪多次表示要把军队里一小撮不好的人揪出来烧掉，并说，对武汉军区不放心，“拿他们没有办法”，要打倒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江青也说，要冲一冲武汉军区。1967年的4、5月间，林彪、江青等人提出挖“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接着，武汉地区一些造反组织掀起了“揪军内武老谭^①”、“打倒陈再道”的风潮。在少数坏人挑动下，支持和反对武汉军区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发生了大规模武斗。7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到了武汉，对解决武汉问题作了重要部署，要求由四川赶到武汉的谢富治、王力等人对群众组织不要发表倾向性的意见，要协助武汉军区做好军队和群众组织的工作。要把工作做到那些要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的人，不仅不再打倒他们，还要拥护他们。同时要求军区承认“支左”有错误，要支持“造反派”。然而谢富治、王力和李作鹏等人却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煽动反军乱军，支一派压一派，加剧武斗升级，造成机关瘫痪，工厂停产，交通中断，社会秩序混乱。7月18日，周恩来离开武汉后，谢富治、王力趁机背着毛泽东，从机场直接到水利电力学院，把毛泽东、周恩来有关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给一派造反组织，鼓动其“采取紧急措施”，“不要附加条件，要首先采取行动”，“否则低姿态就要输一着”。叶群同日亲自打电话给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说，“武汉形势在变……有事找王力，听王力的话”。第二天，谢富治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揪武老谭是把矛头对准当权派，是对的。”“你们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转弯，你们自己考虑。”

^① 谭指谭震林，当时认为谭震林是所谓“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

谢富治、王力等人的倒行逆施，引起武汉地区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极大愤慨和强烈不满，7月19日夜，群众纷纷上街游行。20日凌晨，有些解放军指战员和群众把王力拉到军区大院说理辩论。这就是后来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所谓“揪斗、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的“七·二〇事件”。

7月22日，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林彪、江青组织数万人到机场欢迎。当晚，林彪主持会议，听取谢富治的汇报。林彪决定：把“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七·二〇事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的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进京，看他们敢不敢来，如不敢来，证明他们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七·二〇事件”说成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在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七·二〇事件”的宣传口径时，康生和江青、陈伯达坚持要写上“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7月25日晚，在新华社送审《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的新闻稿时，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关锋并当着康生的面向新华社负责人交代说，武汉事件的报道，以后就按这个口径进行。7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新闻和相应的社论。此后的6天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连续刊登煽动反军乱军的社论16篇，新闻报道和专题文章22篇，把“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作为“斗争的大方向”。《人民日报》7月27日的新闻报道中说：“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从黑龙江畔到云贵高原，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广阔土地上，这几天到处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到处都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怒吼声：坚决打倒中

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社论说：“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与此同时，林彪授意当时在北京地区最有影响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韩爱晶^①等人在军队问题上“要大作文章”，王力则向蒯大富暗示，“大作文章”的对象指的是徐向前。蒯大富立即策划和组织实施“打倒徐向前”的反革命宣传煽动活动。此后，全国到处发生揪“陈再道式人物”和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态。徐向前、徐海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曾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王任重（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彭绍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被诬称为“七·二〇事件”的“后台”。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被揪斗监禁，甚至连一些公社和生产大队的人武干部、民兵干部也被打成“陈再道式的人物”，未能幸免。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称为“叛军”，林彪亲自下令取消番号，撤离武汉整训改编。武汉军区主要领导人被打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许多军队人员的家属也被诬蔑为“叛军家属”。甚至连同情独立师和另一派群众组织的人也遭受迫害。

7月24日晚，康生和吴法宪亲自坐阵。在北京京西宾馆批斗陈再道、钟汉华以及牛怀龙（武汉军区独立师师长）、蔡炳臣（武汉军区独立师政治委员）、巴方廷（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等人，并指使便衣人员对他们拳打脚踢、罚跪，进行通宵的残酷斗争。与此同时，许多群众被抄家、被揪斗，被长期关押。

^① 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北京航空学院造反组织“红旗战斗队”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

据统计，湖北全省在“七·二〇事件”后被打死打伤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 18.4 万人，仅武汉市就打伤打残 6.6 万人。

“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揪军内一小撮”异曲同工，都在煽动人们把眼睛盯住军队，寻找“带枪的走资派”。所不同的是，“揪军内一小撮”仅仅要人们去找，似乎仍然缺乏足够的事实为佐证，而“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把王力、谢富治等人虚构的“事件”作为现实的危险以恐吓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并把这一危险的范围推而广之，由武汉地区这一局部引申到全国，使原来带有偶然性和地区特点的“事件”成为普遍的规律和普遍的现象，诱骗人们加入造反乱军的行列，去揪去抓去打倒所谓的“张再道”、“王再道”、“李再道”。一时间，从军委、总部机关到各大军区的领导人，都成了“造反派”怀疑、围攻的对象。

第四节 权力的攫取

林彪嗜权成癖。担任国防部长以后，林彪对已经得到的权力看得很重，不允许任何人染指他的权力范围。对罗瑞卿的不“尊重”，林彪记恨了好几年，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找到机会拔去了这颗眼中钉。然而罗瑞卿仅仅是一个人，搞掉罗瑞卿并不能遏止林彪追求无限权力的奢望，他的终极目的不在于整掉几个不听话、有隔阂的高级干部，他要利用“文化大革命”这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时机，建立以他为标志的大一统天下，造成他可以令行禁止的局面。江青在政治舞台的崛起，恰好为林彪提供了一个搭档，提供了一个既是对手又是可以利用的工具的政治伙伴。在以后的几年中，他们一唱一和，在军队中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事件”。这些事件，是林彪、江青一伙在军队施展反革命政治阴谋的生动

写照。

林彪、江青都把人民解放军的高级领导机关视为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他们要么培植亲信，利用这些亲信掌握权力；要么把那些暂时还无法完全控制的单位搞垮搞乱搞瘫痪，然后取而代之。作为第一种情况，与林彪关系密切，后来成为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文化大革命”之前已担任了空军、海军、总后勤部的重要领导职务。作为第二种情况，林彪、江青提出“砸烂总政阎王殿”，搞垮了总政；制造“杨、余、傅事件”，借机改组军委办事组，夺了总参和军委的权。

一、“砸烂总政阎王殿”

总政治部是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政治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政治部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采取谨慎稳妥的措施指导军队系统的运动，在一个时期中，保持了军队的稳定和正常秩序。林彪和江青对这些很不满意，处心积虑要把总政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垮，工作上搞乱，“彻底砸烂总政”，夺取军队政治工作和“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1965年12月，林彪以“抢班夺权”的罪名，在总政制造了所谓“罗（瑞卿）梁（必业）反党集团”冤案；1966年2月，林彪、江青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然后通过全军创作工作会议，在总政及全军大抓“文艺黑线人物”；1966年9月，林彪一伙在总政制造了所谓的“八·二七”总政保卫部“反党、乱军、夺权”事件，并与他们在总参谋部制造的所谓“八·二五夺权事件”联系在一起，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和贺龙；1967年1月，陈伯达、江青一伙在总政制造了大抓“军内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黑干将”、“黑后台”的事件；1月17日，林彪写信支持解放军报社“造反派”，鼓吹“在报社内部，革命烈

火烧得越旺越好”，“‘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1967年5月，林彪以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制造“五·一三”事件，诬陷总政是“黑后台”。肖华、刘志坚等曾经参与初期军队“文化大革命”领导工作的总政治部领导干部先后被罗织罪名打倒。

1967年7月25日，林彪、江青、叶群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密谋策划，对他们的几个死党、亲信面授机宜说：“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从而进一步制造了砸烂总政的冤案。林彪、江青及其党羽给总政当时所有的领导人戴上了大小“阎王”的帽子，宣布肖华是大阎王，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傅钟、袁子钦等是二、三、四、五、六号阎王，给正副部长戴上“判官”的帽子，给正副处长戴上“牛头马面”的帽子，给一般干部和群众戴上“小鬼”的帽子，总政40多名副部长以上干部被反复批斗，20多名副部长以上干部立了专案，长期进行关押、审查，总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被迫害致死。总政机关完全瘫痪。1968年10月，林彪变本加厉，宣布对总政实行军事管制，导演了一场由军队的一部分对军队的另一部分并且是军队最高政治领导机关进行“管制”的闹剧。“军管”期间，林彪、江青等人以及以吴法宪为首的军管组诬称总政秘书部门是“阎王殿的黑心脏”，保卫部是“保卫蒋介石的”、“专无产阶级的政的”，联络部是“联络敌人的”，干部部是“推行腐败的干部政策”、“配黑班子”的，文化部是“文艺黑线专了政”，宣传部是“造反革命舆论的”，解放军报社是“阎王殿的缩影”，八一电影制片厂“烂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是“封、资、修的大染缸”，等等。他们把总政的干部看成“一锅黑”，说总政“水浅王八多”，“叛徒特务成堆”，是“一筐烂梨”。他们妄加罪名，对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767名干部进行专案审查，其中17人被迫害致死，总政95%以上的机关干部和一大批直属

单位的干部被赶出总政，分散处理到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队单位，使他们长期政治上受歧视，精神上受压抑。

林彪以“突出政治”自诩，却对政治工作机关横加刁难，百般摧残。“文化大革命”中，总政治部遭受的磨难是少见的，几乎没有另一个军队高级领导机关象总政这样名存实亡。当然，林彪的四员大将恰恰没有担任总政领导职务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也说明，林彪所谓“突出政治”不过只是一种手段，是用来打击那些不“突出政治”的人的。一旦需要，林彪同样可以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把政治工作和政治工作机关当作斗争的对象。并且，林彪对总政的攻击从他主持军委工作之时即已开始，1960 年 10 月至 1961 年 1 月总政治部整风期间，林彪给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谭政扣上了“反对毛泽东思想”，“使政治工作方向发生了严重偏差”，“贯彻执行彭（德怀）黄（克诚）路线”，“结成反党宗派集团”等帽子，撤销了其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职务，改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行政级别也低套了两级。

二、“杨、余、傅事件”

1967 年 7 月，林彪、江青利用毛泽东离京视察南方的机会，策划成立了一个由吴法宪任组长，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参加的“四人小组”，妄图以此取代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权。8 月 17 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四人小组改为军委办事组，但是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遏制了林彪独揽军队权力的野心。同时，毛泽东在视察期间多次强调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号召大联合，搞“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等，使全国混乱的局面出现稳定的趋势。林彪、江青不能容忍这一切，他们随时寻找机会发动新的攻击，制造新的混乱。

1968年3月，林彪、江青一伙采用捏造罪名，突然袭击的手段，制造了所谓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即“3·24事件”，诬蔑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捏造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同傅崇碧勾结要夺北京市的权，要打倒谢富治”，“整了江青的黑专案黑材料”，“三次下命令给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还“打了江青”。诬陷余立金是“叛徒”，3月22日，根据毛泽东、林彪的提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撤销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撤销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3月24日，由林彪主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万人大会，林彪突然宣布了这两个命令并作了蛊惑人心的发言，林彪说，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后，开了四次会才决定下来（而其他几位军委副主席却毫无所闻），他把杨成武的问题归纳为三点：一是山头主义，说杨成武排挤晋察冀军区以外的干部，只相信同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别人；二是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好象是反对罗瑞卿，但实际上不是反对罗瑞卿的”，“做了事情不承认”，“表面上拥护毛主席，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情”；三是曲解马克思主义，1967年11月3日发表了“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文^①。江青、陈

^①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总参谋部一个写作班子写的，写成后，杨成武看过并征求过陈伯达的意见。发表时，为了增加“份量”，用了杨成武的名字。

伯达、康生、姚文元也在会上讲话，借机攻击军队。以后，林彪、江青一伙声言叶剑英是杨成武等人的“后台”，又扬言杨成武、傅崇碧长期在晋察冀根据地以及华北地区工作，暗示聂荣臻、徐向前是他们的“后台”。

事实是，1967年夏，杨成武随毛泽东视察南方时，毛泽东曾对他说到林彪“封我四个官”，此事引起了林彪的猜疑。回北京后，杨成武曾到一些老师家中传达毛泽东视察时谈话的内容。杨成武被任命为军委办事组组长后曾宣布：办事组对军委常委负责，重大问题向常委请示汇报。杨成武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对一些军队高级干部采取了保护措施。这些都使林彪非常不满。江青认为杨成武掌握了一些有关她30年代历史的材料，是别有用心，也对杨不满意。他们借吴法宪向林彪告状之机（空军有人提出余立金的秘书与杨成武的女儿关系不正常，该秘书因此被关押，杨成武闻讯后，要吴法宪处理，吴则以杨成武勾结余立金夺权向林彪告状），制造了这一冤案。

吴法宪和余立金，一个是空军司令员，一个是空军政治委员，本应团结合作，共同把空军的工作搞好。但是余立金的存在是吴法宪独揽空军大权的最大障碍，这一矛盾又是靠正常途径难以解决的。于是吴法宪将1967年有人揭发皖南事变突围时，见到国民党兵押着的几个新四军中有一人象余立金的情况转报上去，把余立金打成了“叛徒”。

北京卫戍区担任着维护首都治安，保卫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安全的重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根据周恩来的安排，曾有许多遭受诬陷攻击的各部门负责干部交由卫戍区“监护”，实际上是保护起来，使他们暂时躲避了林彪、江青的进一步迫害。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自然因此为林彪、江青所不容。1968年3月初，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群众写信给江青，报告鲁迅手稿丢

失。江青要傅崇碧过问此事。经多方调查，证明这些手稿先由鲁迅博物馆转到文化部，又被江青于1967年6、7月间派戚本禹取走，还开具了收条。3月7日，傅崇碧与中央文革联系后，带了3个人到钓鱼台向江青汇报调查情况。江青见到傅崇碧后，立即责问他：你身为卫戍司令，不经请示就冲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尽管找到文稿后，江青对自己的斥责作了解释，这件事后来还是被诬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

3月25日，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吴法宪分别任正副组长，成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不久决定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

3月27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公布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3月22日的两个命令。江青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把“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杨、余、傅与在此之前受到批判的“极左思潮”代表王（力）、关（锋）、戚（本禹）联系在一起。江青还莫须有地着意渲染了一番所谓傅崇碧“强行索取材料”的罪行，“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我们一封信，当时我们在开会，我没有收到。我委托谢富治同志再去找这封信来，但是发生了怪事了。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哈斯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什么名单、要后台。这是不正常的。他们这样就剥夺了革命群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权利”。

林彪、江青一伙制造“杨、余、傅事件”的目的在于寻找借口，排斥、打击对他们的“左”倾方针有所抵制，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军队领导干部，把军队领导权转移到他们的亲信手中。同时借机打倒一批他们想要打倒但暂时还没有打倒的其他方面的老干部，为篡党篡军扫平道路。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1974

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的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但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致使中共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平反的决定长期未能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公布，许多受株连和受迫害的人没有得到及时平反昭雪。

三、“二月兵变”

1966年7月前后，北京城内发生了一件闹得满城风雨的所谓“二月兵变”事件。康生无中生有地捏造出骇人听闻的谎言，图谋打倒彭真、贺龙等人。

中共中央军委1966年2月4日指示，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组建一个团，归北京卫戍区领导，平时担负训练民兵，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3月2日，北京军区命令63军188师负责组建该团。

为了解决该团的住房问题，北京卫戍区经与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交涉并得到同意后，派人到大兴、房山、通县、朝阳、丰台、门头沟等县、区找房，均无结果。后来海淀区武装部介绍，有些大学的学生下去“四清”，学校有些空房，可以暂时借用。卫戍区即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处联系，北京大学、人民大学表示同意拨出部分空房借给部队暂住。后来，卫戍区认为部队住在学校内不适宜，决定不住学校，由南苑西营房教导队腾出部分房子供该团使用，不足部分搭帐篷或住南苑靶场的靶壕解决，同时将此决定通知海淀区武装部转告两个学校。3月底，这个团到北京后即住南苑。

这样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却被康生蓄意加工改造成为“二月兵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大学几

个人在一起开串连会，会上提到2月要在北大住部队一事，有人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调动这么多的军队，很明显是要搞军事政变。会后，一个学生把议论的内容整理归纳，将会上提到的“政变”取名为“二月兵变”，贴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很快被转抄。北京师范大学也有学生贴出大字报，质问在学校驻兵是怎么回事。康生抓住这些捕风捉影的材料，如获至宝，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煞有介事地质问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是否知道关于“二月兵变”之事，并出示了一份他亲笔批示的材料说，“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二月兵变”的经过，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资产阶级专政”。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组组长孙友余认为这是谣传，是挑拨群众同解放军的关系，康生立即指控孙友余“替彭真辩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立场”，要罢他的官。

与此同时，康生在中央文革小组放风，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以后，康生继续造谣说：“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贺龙不仅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由贺龙的历史投敌叛变^①，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进一步无中生有地陷害贺龙。

贺龙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

^① 1933年12月，蒋介石派反动政客熊贡卿以贺龙“早年友好”的名义“游说”贺龙，企图“收编”。贺龙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贺龙下令将熊贡卿逮捕后处以枪决，并于1934年3月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共中央。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敌伪报纸上刊载的诬蔑贺龙的一些消息和报道作为证据，诬陷贺龙“通敌”，向国民党反动派“乞和”、“投诚”。

席、国务院副总理。林彪夫妇与贺龙夫妇是老相识，贺龙的夫人薛明了解叶群早年的经历，贺龙在抗日战争时期即与林彪发生过意见分歧。解放后，林彪一直把贺龙视为权力竞争的强劲对手。贺龙对林彪提出的以“四好为纲”，“向空军学习”等口号提出过不同意见，林彪怀恨在心，要整贺龙蓄意已久。康生编造的谎言为反贺狂热之极，却一下子提不出多少确凿证据的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提供了口实，也使满腔热情，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气愤填膺，群起反贺。1966年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的材料。9月，李作鹏写信给林彪，诬陷贺龙。同时，叶群将她捏造的诬陷贺龙的材料口授给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宋治国据此写了4份诬陷材料给林彪，并经林彪批准印发。从1966年到1969年，林彪、江青等人给贺龙扣上了“大土匪”、“大军阀”、“向敌人投降”、“篡军夺权活动的黑手”、“定时炸弹”、“搞反革命政变”、“里通外国”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了非人的折磨。1969年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

“二月兵变”是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疯狂迫害妨碍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党政军领导人的一次联合行动。这次行动的直接目的是清除贺龙，其意义和影响却远远超出整掉一个元帅。既然可以用谎言打倒贺龙，当然可以用同样的办法类推对待与贺龙相似的其他人。谁能怀疑那些身居高位，在“文化大革命”中炙手可热的中央首长讲的全是谎话呢？

“二月兵变”整垮了贺龙，紧接着，林彪、张春桥、吴法宪、邱会作、谢富治等人诽谤朱德是“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野心很大，想当领袖”，甚至通过威逼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一名实习研究员杜撰了一个所谓“中国（马列）共产党”案件，诬陷朱德是“伪中央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他们“里通外国，要搞政变”。1967年8月，中央文革小

组成员王力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煽动对陈毅的攻击升级。1967年4月，叶群授意蒯大富发表诬陷文章《炮轰徐向前，打倒拿枪杆子的刘、邓、徐向前》。邱会作在总后勤部编印传单，称徐向前是“一颗大定时炸弹，是个标准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叫嚣“打倒徐向前”。1967年6月，黄永胜批准广州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报送的《关于揪叛徒调查工作的请示》和这个请示所附的调查叶剑英的“第一号调查方案”，阴谋以叛徒的罪名陷害叶剑英。1968年4月，林彪指令北京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策动批判所谓“华北山头主义”企图打倒聂荣臻。黄永胜诽谤说：“聂荣臻这一辈子也没干什么好事。”1971年1月，江青又诬陷聂荣臻等在华北是“坏人当了道”。朱德、陈毅、彭德怀、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人民解放军其他一些高级将领均被列入康生开具的黑名单，并一一定了“罪名”。

通过迫害人民解放军各级领导人，林彪、江青向着夺取最高权力的目标一步步迈进。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林彪集团的成员已经把持了人民解放军大部分重要领导岗位，黄永胜担任了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担任了副总参谋长并分别兼任空军司令员、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和总后勤部部长。在各省、市和各单位还有一批党羽和积极投靠者，如程世清（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丰（武汉军区政治委员）、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陈励耘（驻杭州空军第5军政治委员）、王维国（驻上海空军第4军政治委员）、丁盛（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等等。林彪认为自己掌握的力量足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要利用手中的军权夺取政权，夺取党权了。

第三章 疯狂的迫害

1980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法庭上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庭起诉书》列举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4大罪状、48条罪行。《起诉书》在第1条罪状“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之下列举了23条罪行，其中第3条这样说：“江青、康生密谋诬陷、迫害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1968年7月21日，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信封上署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在康生亲笔写的这个名单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九十三名，有八十八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名单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七名和‘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二十九名，绝大多数也先后受到康生等的诬陷、迫害。”在这个庞大的名单中，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民解放军中将以高级将领61人，除6人已经去世外，37人被点到。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朱德、彭德怀、贺龙、聂荣臻、林彪、徐向前、叶剑英；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王树声、许光达、肖劲光、罗瑞卿、徐海东、粟裕、谭政；上将王震、乌兰夫、邓华、叶飞、吕正操、

刘震、苏振华、李志民、杨勇、杨成武、肖华、肖克、宋时轮、宋任穷、张爱萍、周桓、洪学智、钟期光；中将万毅、王尚荣、王恩茂、张经武、廖汉生。《起诉书》列举了康生等人诬陷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第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李达、徐立清、唐天际、贺诚、傅连璋等均在其中。《起诉书》列举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骨干诬陷、迫害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还有：王诤、肖望东、阎红彦、傅秋涛、刘少文、梁必业、刘志坚、李聚奎、饶正锡、李耀、彭嘉庆、汤平、赵尔陆、肖向荣、王平、蔡顺礼、刘道生、杜义德、陶勇、方正平、徐深吉、成钧、张廷发、聂凤智、吴富善、吴克华、欧阳毅、程世才、顿星云、崔田民、傅崇碧、庄田、晏福生、陈再道、钟汉华、杨秀山、刘培善、刘转连、黄新廷、郭林祥、甘渭汉、袁升平、秦基伟等。

上述名单可谓骇人听闻，如果其中半数、 $1/3$ 、甚至 $1/4$ 人的罪名确实成立，人民解放军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何况，名单中包括了人民解放军的大多数元帅、大将、上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采取的手段一样，他们把斗争矛头集中于人民解放军各级领导人，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等多种手段，政治上随意诬陷、诽谤，组织上动辄免职、罢官，精神上无情折磨、压制，肉体上残酷迫害、摧残，他们一方面直接或者通过代理人欺骗善良、无知而又极具热情的“造反派”们，造成声势，一方面蒙蔽越来越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毛泽东，利用毛泽东的威望和影响，打倒所有敢于同他们抗争的军队领导人，他们抓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口号，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一浪一浪地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所有部门和绝大多数领导人。

既然许许多多有功勋、有威信、权高位重的高级将领尚且避

免不了被斗挨整的厄运，为数更多的普通干部和群众则更无法抗拒横加给他们的种种罪名。甚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们也承认，“文化大革命”时代通行的原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在于被打倒的人是不是真的有那些“罪行”，而在于林彪、江青之类“左派”是不是横下心要打倒他。于是，那些被选中的对象动则得咎，甚至不动也会得咎，或者早被打倒，或者晚被打倒，或者这样被打倒，或者那样被打倒。总之，他们无论如何要被打倒。并且，林彪、江青等人掀起的一次又一次“横扫一切”的旋风，不分青红皂白，殃及无数无辜。《起诉书》第32条指出：“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制造了大批冤案，使八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一千一百六十九人被迫害致死。”

前文已简要提及朱德、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等人受到的政治上的诬陷，本章拟选择典型事例，较为详细地介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事实。

第一节 黑司令还是红司令 ——对朱德的诽谤、攻击

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朱德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反袁（世凯）战争和护法战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和周恩来等人共同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9军副军长。翌年初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举行湘南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4月率起义部队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任军长。1930年任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总司令。

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4次“围剿”。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18集团军，任总司令），同毛泽东一起指挥对日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曾亲临华北前线指导作战，并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党内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央副主席等职。朱德积极参与制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推进中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作出了不懈努力。

谁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已届80高龄的这位功勋卓著，在党内、军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老英雄，却无端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侮辱和攻击。1966年5月，康生在一部分人中有意散布说，朱德是空头总司令，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是个“党外人士”。他还恶意中伤道：“我劝朱德的诗不要写了，那种诗是在厕所中写的。”幻想无限扩充权力的林彪立即随声附合，对朱德恣意诽谤攻击，咒骂朱德是“假司令”，“实际上一天司令也没有当过”。1966年9月以后，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林彪在军内的亲信口中，又不断传出朱德是“黑司令”、“军阀”、“老机会主义者”、“野心很大，想当领袖”等诽谤性言论。年底，江青对戚本禹说：“过去讲朱毛、朱毛，那是假的，真的是朱反毛，朱德是大野心家。”还要戚本禹动员力量揪斗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在江青指使下，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贴出诬陷朱德的大字报，高呼“打倒朱德”、“炮轰朱德”的口号，扬言要把朱

德及其家属“轰出中南海”。朱德的很多活动受到限制。

在“怀疑一切”思潮的影响下，有关朱德“革命意志衰退”，整日在家中养兔子、养花的流言不断，为进一步诬陷朱德而进行的舆论准备不断升级。

1967年1月，戚本禹策动中国人民大学一批学生起来反对朱德，在北京街头贴出“打倒朱德”的大标语。接着，北京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纷纷成立“批朱联络站”、“揪朱联络站”，四处搜集朱德的所谓“罪行材料”，“打倒朱德”的喧嚣迅速影响到全国各地。2月，“造反派”从北京派出的“揪朱兵团”在四川省仪陇县朱德的家乡召开“声讨”朱德的大会，砸烂朱德旧居陈列室，煽动群众起来反对朱德。“造反派”甚至准备2月10日在北京召开“批斗朱德大会”，并贴出大会海报。由于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周恩来坚决干预，这次大会夭折了。

然而，由此挑动起来的群众情绪未被压灭。3月4日，戚本禹就“批朱问题”在北京政协礼堂接见中国人民大学代表。当有人问到为什么2月10日的“批朱大会”不让开了时，戚本禹居心叵测地说：“我叫你们批朱德，你们就规规矩矩批好了，为什么要说是我叫你们去批的。你看，现在总理办公室不叫批，你们就批不成了吧！”他继续挑动说：“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你们说是我叫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你们以为你们很聪明，其实最傻了，要不要搞，你们自己考虑。”5月，在上海的张春桥对人放风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那些老家伙通通打下去，一个也不留”，朱德、陈毅、贺龙“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你看，朱德是大军阀，陈毅是老机会主义者，一打仗就开小差，靠吹牛起家，贺龙是土匪……就是这些货色，哪个能留下？一个也不能留”。2、3月间，中共中央多次开会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朱德也受到错误批判。

为了打倒朱德，泯灭他的历史贡献，林彪一伙不惜篡改历史，利用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宣传工具公开宣传井冈山根据地是林彪和毛泽东共同创建的。在有关井冈山根据地的宣传中，尽人皆知的代表井冈山光荣传统的“朱德的扁担”不提了，朱德的名字随着这种虚假宣传的升级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林彪。有人甚至创作了毛泽东与林彪在井冈山会师的大幅油画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象征。

196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朱德再次受到张春桥、吴法宪、谢富治等人的攻击和诬蔑。吴法宪在小组会上当面侮辱朱德：“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上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听一听，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指挥打仗的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谢富治在会上说，朱德“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合伙把毛主席赶出军队”，“是老牌机会主义者”，“一贯反对毛主席，没干好事，按他们的办法搞，中国革命就不可想象”，“搞夺权，搞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可恶至极”。十二中全会之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利用传达全会精神之机，继续“揭发批判”朱德，张春桥在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三届十次扩大会议上，都对朱德进行了恶毒攻击。

更有甚者，谢富治把朱德与“中国（马列）共产党”案联系在一起。1967年10月，北京发生一起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同年11月在天津破案，逮捕了沈剑云（煤球厂工人）等15人。这个案子本来与国家领导人毫无关系，陈伯达、谢富治却一口咬定这是个“大现行反革命案件”，要“往上追”，“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1968年12月，在谢富治指使下，公安部某些人通过诱供逼供，制造出“伪党”假案，诬陷朱德等人组织了“中国（马列）共产党”，“里通苏修”，“要搞政变”。诬陷朱德

是“伪党”中央的“书记”。甚至说，还成立了一个“领导叛乱的班子”，名称叫作“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计划“通过陈再道，首先夺取军事要镇武汉”。并且，朱德等人联名签署了给蒋介石的电报，“要求联合起来”，“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这些无中生有的诬陷虽然危言耸听，却很难令人相信。1969年4月，在“伪党”案件中受到诬陷的朱德等许多人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尽管如此，谢富治仍不死心，继续追查。8月，由于形势所迫，谢富治不得不封存“伪党”材料，但他仍对办案人员布置说：“要对他进行坚决斗争，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要防止暂时拿不到证据而把敌人放走。”

1969年10月，朱德被“疏散”到广东从化，直到1970年7月。在此期间，朱德的行动受到多种限制，不许他离开所居之处，也不许到工厂、农村视察，形同软禁。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年龄和身体方面的原因，朱德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机会已经明显减少。即使这样，仍避免不了林彪、江青等人的一次次诬陷和攻击。朱德在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变得更加沉默了。

第二节 庐山会议的阴影

——彭德怀遭迫害纪实

彭德怀是中国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彭德怀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领导湖南平江起义，组成红军第5军（任军长），建立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年底，率部到井冈山与毛泽

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会合。以后，先后任红3军团军团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抗日先锋队司令员、西征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1940年秋在华北敌后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后编为第1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多次进攻，并适时转入战略反攻，解放了西北5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彭德怀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1950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赴朝鲜指挥抗美援朝作战。1952年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六、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作战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彭德怀性情耿直，刚正敢言。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起草了给毛泽东的信，陈述自己对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的错误的意见，希望会议能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纠正党的工作中的“左”的倾向。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讨论后，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赞同信中的提法，也有人认为信中的估计在总体上是错误的。7月23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讲话，指责“意见书”（即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八届八中全会，继续对彭德怀等人进行批判。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称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意见书”和发言、

谈话等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是“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会议决定将彭德怀等人调离原工作岗位。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9月17日，彭德怀被免去国防部部长职务，由林彪接任国防部长职务，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

彭德怀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信，在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符合党的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和党章关于党员权利、义务的规定，所提意见也是正确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它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助长了浮夸风和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错误地把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等同起来，同国际上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导致理论上的严重混乱；打断了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左”倾错误继续发展。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从中南海搬迁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过了6年“挂甲归田”式的生活。

1965年秋，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任命彭德怀为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即战略大后方）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行前，毛泽东约请彭德怀到中南海长谈，并共进午餐。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毛泽东并对在座的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联系到中共中央已对“大跃进”的失误有所认识并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庐山会议以来彭德怀蒙受的冤屈似乎已成过去。

然而，正当彭德怀全身心投入“三线”建设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对他的迫害和摧残随之升级。庐山会议的阴影紧紧笼罩

着彭德怀，直至他离开人世。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不仅对吴晗^①横加责难，而且不点名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年12月，毛泽东在谈到《海瑞罢官》时说：“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随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转向批“要害”，彭德怀再次被卷入斗争的中心。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刚刚揭幕，戚本禹、关锋就写信给江青、康生、陈伯达，攻击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建议“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过渡，是不行的”。12月13日，江青对一些院校学生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回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养神，将来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呀！”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怂恿和支持下，戚本禹指使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头领韩爱晶等将彭德怀由四川成都“揪”到北京。彭德怀预感到形势于自己不利，在1967年写给毛泽东的信（也是最后一次上书毛泽东）中，凄婉地说道：“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1967年7月，对彭德怀的迫害由政治上、精神上的折磨发展为精神上、肉体上的摧残并举。7月12日，戚本禹接见彭德怀专案组，诬陷彭德怀“毒蛇僵了，但没有死”，“不要看他装可怜相”，“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7月19日，以韩爱晶为首的“造反派”把彭德怀押到北京航空学院一间大教室批斗。他们指控彭德怀在抗日战争中指挥的“百团大战”破坏了当时的大好形势，招致了日军的疯狂屠杀，是“假抗战，真助蒋，假功臣，真罪魁”；指控彭德怀翻庐山会议的案。彭德怀坚决不接受横加于他

^① 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副主席、明史专家，京剧《海瑞罢官》的作者。

的诬蔑不实之词，据理力争。“造反派”先后7次把彭德怀打倒在地，抓住彭德怀的衣领将彭德怀的头往桌子角上猛撞，彭德怀遍体鳞伤，几次晕厥。

从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部队第二天向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中看得出，“造反派”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纵容。报告说：“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意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不’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7月22日，卫戍区又反映，彭德怀被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内伤”。《关于彭德怀1967年7月19日至22日监护情况》记载：“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量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我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一个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革命元戎竟落得如此结果，令人不禁潸然泪下。

7月下旬，彭德怀的名字开始见诸报刊上的批判文章。7月25日，北京集会欢迎“七·二〇事件”后从武汉归来的谢富治、王力，彭德怀被无故指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第二天，在北京航空学院举行号称10万人参加的

批斗彭德怀、张闻天^①大会。会上，彭德怀、张闻天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被迫弯腰90度，忍受当时批斗会上流行的一切酷刑。会后，彭德怀、张闻天被押解着在人群中“示众”，接受残无人道的拳打脚踢、唾液和辱骂、嘲弄。二人不堪折磨，瘫倒在地，又被五花大绑，扔上卡车，拉到北京市内游斗。《关于彭德怀1967年1月7日至1968年2月17日在卫戍区监护期间的动态》记载，7月27日至30日，彭德怀“经常在凳子上扒着箱子静坐，一坐就很长时间，问他为什么总是坐着，他说：‘我睡下那腰疼得很，坐着好一点’。”

1967年7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相继发表社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这些社论都把彭德怀、罗瑞卿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军队里的代理人，用大量篇幅罗列了他们的“罪行”，进行正式的、公开的点名批判。文中说：“彭德怀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几十年来，他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在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8月1日，《人民日报》用大量篇幅登载毛泽东《论人民战争》的语录和林彪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写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以及毛泽东与林彪在一起的照片，用以表明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主要伙伴是林彪而不是任何其他人。8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1959年8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登载了《红旗》杂志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庐山会议时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

产》、《人民日报》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解放军报》也发表了大量类似的社论、文章。由此，掀起了一场批判彭德怀的轩然大波。彭德怀自民主革命时期起的一切功绩统统被抹杀，代之以“滔天罪行”。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处心积虑大造舆论的形势下，彭德怀被很多单位轮番批斗，身心倍受折磨。在长期的囚禁生活中，他忍受着与世隔绝的孤寂，终日里除了读书学习，就是写“交待”材料和接受充满敌意的审讯。1970年9月17日，“彭德怀专案组”起草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报告》说：“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11月3日，黄永胜在报告上批示：“同意。”于是，彭德怀的案子算是最后敲定。不过，这些未向彭德怀透露。

1973年4月，彭德怀因患直肠癌住进医院。尽管周恩来、叶剑英嘱咐“尽全力治疗”，但彭德怀仍摆脱不了受监禁、遭迫害的境遇。他的病房门口站有警卫，门窗紧闭，玻璃上糊着报纸。他的裤带被收走，收音机也被弄坏，没有手表，不知道时间，没有笔，无法写字。唯一可以排遣苦闷的，是读书。一生戎马倥偬的彭德怀饱受寂寞的熬煎，不禁叹息：“住在这里比月婆子还难受。”

由于治疗上的延误，也由于恶劣的环境和低落的心绪，彭德怀的病情开始恶化，癌细胞扩散到肺部、脑部，引起剧烈疼痛。但是，没有人给他打止痛针。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含恨去世，终年76岁。彭德怀的遗体被秘密火化，没有通知亲属。王洪文批准专案组将彭德怀

的骨灰改名“王川”运往四川成都，严格保密，了解内情的只有少数几人。甚至，彭德怀在监禁中、在医院中读过的、作过批注的62本书都被付之一炬。他的字迹也令反对他的人心寒。

病危时，彭德怀曾对守候在病榻旁的侄女彭梅魁说过：“你们要记住，我是被国民党特务害死的。”也许，彭德怀并不完全了解这场斗争的真正本质，然而，他象数十年革命生涯中对待人民的敌人一般憎恶利用“文化大革命”倒行逆施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同时，林彪、江青一伙也正象战场上的敌人一样，害怕、仇视彭德怀，必欲置之于死地。

第三节 囚禁的元帅——贺龙遭迫害纪实

贺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者和创始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担任过桑植县讨袁护国军民军总指挥、湘西靖国军团长、四川陆军旅长、建国川军师长等职。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师长、军长，为当时著名的左派将领。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回到湘鄂西地区组织武装，创建根据地。历任工农红军军长、第2军团总指挥、第2方面军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率部深入敌后开创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后任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西北军区司令员，参与指挥绥远、晋北、大同、集宁、晋南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贺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长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

本书第二章论及“二月兵变”时已谈到，贺龙夫妇与林彪夫妇是老相识，他们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抗日战争时期的1937年，中共中央派朱德、刘伯承、贺龙、林彪到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会议，林彪对蒋抱有幻想，公开说，与蒋谈判时要说些好话，为此与贺龙产生了意见分歧。同时，叶群在南京国民党控制的电台当广播员，与国民党人士常有来往，并参加过国民党“CC”派学生演讲比赛，宣传三民主义。贺龙的夫人薛明受地下党组织委托同叶群谈过话，要她考虑今后走什么路。延安整风时，薛明提起此事，要求叶群如实向党组织交代清楚这段历史。贺龙直言不讳地告诉林彪说：“你老婆有问题，是薛明揭发的。”并要林彪“提高警惕”。对此，林彪、叶群耿耿于怀，一直寻机报复。解放后，贺龙担任了副总理，又被授予元帅军衔，与林彪的地位不相上下，林彪把他视作权力竞争的有力对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的地位上升，成了“副统帅”、“接班人”，但他始终忘不了与贺龙之间的芥蒂。并且，如果不封住贺龙夫妇的嘴，那些不光彩的历史一旦扩散出去，与他的身份地位极不相称。在林彪看来，与其被人抓住把柄，受制于人，不如先下手为强，何况，“文化大革命”使实现这一目的并不困难。

1966年8月，空军准备召开一次会议。有些人向贺龙反映空军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等不良倾向，贺龙赞成如实提出意见。林彪得悉后，对有人胆敢否定他亲手树立的空军这个标兵极为恼火，同时觉得有机可乘，于是抓住空军内部的意见分歧制造了以吴法宪为正确的一方，另一方要夺权的“八·二五反革命事件”，诬陷贺龙是“八·二五”事件的后台。以此为借口，林彪把一些与贺龙共过事的干部抓了起来，搞逼、供、信，并散布说，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林彪在召见吴法宪时定调子说：“你们这次会议贺龙插手

了。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还说：“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要“夺你的权”，“你要提高警惕”。同时，林彪召见李作鹏，告诉他：“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

秉承林彪的旨意，吴法宪9月3日将他写给毛泽东的有关贺龙的材料送给林彪，李作鹏也于9月7日给林彪写信，诬陷贺龙。

与此同时，叶群为攻击贺龙四处奔走。她多次向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口授诬陷贺龙的材料，授意宋治国写揭发信，并嘱咐说：“以你主动向我反映情况的口气写，不要以我指示叫你了解的口气写。”9月7日至24日，宋治国连续写了4封诬陷贺龙的信。信中说，“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指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贺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一百二十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过一个窃听器”；等等。当宋治国把写好的信交给叶群时，叶群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当着办公室几位秘书的面问宋治国：“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就送；不是，我们就不送了。”叶群还要这几位秘书写了一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用以证明宋治国写信是自发的行为。

此时，康生无中生有地搞出来的“二月兵变”沸沸扬扬，恰与林彪、叶群的活动不谋而合。尽管毛泽东几次当面向贺龙表示，“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讲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人斗争狠；能联系群众”，“问题解决了，没事了”，林彪、江青还是不放过贺龙。林彪对贺龙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弦外之音要贺龙放弃自己的主张，跟着林彪走。江青在清华大学对贺龙的儿子贺鹏飞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了。”又说：“你妈妈也不是好人！”要其与父母划清“界限”。随后，江青向群众公开宣布：“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很快，社会上掀起反对贺龙的浪潮，“打倒贺龙”的口号传遍全国。贺龙的家被抄，抢走了大量机密文件，围攻的人群挤满了贺龙家的庭院，终日不断。为了避开无休无止的纠缠，贺龙的家不得不多次搬迁。然而，不管搬到哪里，“造反派”总是接踵而至，揪斗声，辱骂声仍然不绝于耳。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一方面要求围攻的人们撤出去，一方面安排贺龙夫妇住在中南海自己的家中。但是，时隔不长，中南海也在林彪、江青的鼓动下闹起来了。江青指使“造反派”把广播车开到中南海墙外，一遍遍高喊“打倒贺龙”。中南海也住不下去了。为了保证贺龙的安全，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安排贺龙夫妇住进京郊的山区，并要护送人员严格保密，不得泄露贺龙的行踪。这样，贺龙较为安静地生活了一段时间。

此时，从上海刮起的“一月风暴”已吹遍全国，许多老干部被点名攻击或打倒，加给贺龙的罪名也在升级，有关贺龙的谣言越来越离奇和不可置信。有人说，“二月兵变”的计划和“班底”都查获了，连“参谋长”是谁也找到了。甚至有人说，贺龙已经乘上飞机投奔了苏联。林彪诬称贺龙是“三反分子”、“大军阀”，“大上

匪”；叶群在总参攻击贺龙“要搞反革命政变”；江青要周恩来表态“把贺龙揪出来”。到1967年夏天，林彪一伙背着毛泽东，逐渐控制了由周恩来秘密安排的贺龙，加紧了对他的迫害。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贺龙，怕被人发现，把窗帘拉上了，不许打开。有几天还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走，贺龙夫妇只得睡在光光的床板上，用手臂当枕头。伙食上，饭里的砂子太多，贺龙夫妇只好从做饭的战士那里把米拿来，一粒一粒拣出砂子。贺龙没有烟了，先是买烟叶卷着抽，以后又把抽过的烟蒂撕开，取出烟叶，重新卷了来抽。更有甚者，在连续45天中，借口水源困难，贺龙夫妇每天只能得到一小壶饮用水。不能洗脸，也不能漱口，以至于每逢下雨，贺龙夫妇都要用水盆、脸盆、水杯接雨水贮用。为了接雨水，贺龙摔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18天中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

1967年9月，贺龙正式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10月，断绝了与周恩来的最后联系，完全被林彪、江青一伙所控制。他们不仅要在政治上把贺龙打倒，而且要从肉体上把他消灭。贺龙的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劣，两人合用的一条毛巾早已破了个大洞，只剩下4个边边。贺龙仅有的两套衣服，也是破了补，补了又破。贺龙身患糖尿病，本来需要饮食上的调理、药物上的控制和精神上的松弛，而这时，这些却成为迫害他的手段。贺龙的伙食很差，主食少，吃不饱，副食常常是清水煮白菜、糠萝卜，或者老得咬不动的豆角。薛明为了使贺龙摆脱饥饿的折磨，曾经闯到厨房里找了一棵白菜，腌成酸菜给贺龙吃。正经蔬菜搞不到了，薛明就从院子里采集野菜，洗洗烫烫后，给贺龙吃。由于营养不良，贺龙的体质一天不如一天，脚气感染长期不愈，反而更趋严重，身体衰弱，步履艰难，连上趟厕所也走不动了。有一次，听见监护的人在杀猪，贺龙不禁对夫人说：“真想吃点猪耳朵。”一个中华人

民共和国元帅的这点点微不足道的要求，那时，竟成了不可实现的奢望。用糖水抑制饥饿感，对于糖尿病人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但却是贺龙可能得到的唯一“治疗”。

医疗上的迫害也在加剧。原来护理贺龙的医生调走了，换上了经过多次政治审查，精心挑选的由护士充任的“医生”。他强行拿走了贺龙身边必需的备用药品，连检验糖尿的试剂也没留下。每天，贺龙必需的极普通的降糖药不能保证了，每次服药，贺龙必须当着医生的面吞下。严寒的冬天，暖气被借口水管破裂而关掉，室内温度经常只有6℃。1968年3月27日，贺龙突然说不出话来，口角歪斜，头痛剧烈，被送进医院。按照邱会作“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指示，诊断书上竟然写的是“诈病”，治疗措施是，由“经治军医主宰”。

1969年6月8日，贺龙的病情突然恶化。早晨，连续呕吐3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出现糖尿病酸中毒现象。薛明马上要求医生救治，但等了许久，才给打了一针“止吐针”，却没有止住呕吐。薛明催促5次，直到晚上8时，才来了2个医生，草草检查一下，就按照药物中毒的处置方法，给贺龙输上了葡萄糖和生理盐水，声称：“病人昏迷了。”贺龙意识到情况或许会发生突然的变化，乘医生不在时，悄声对薛明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身患糖尿病的贺龙，一夜之间输了2000毫升葡萄糖液。这是导致贺龙死亡的重要原因。

6月9日早晨，医院来人接贺龙去住院。贺龙表示：“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是，作为“组织决定”，贺龙服从了。在抬上担架时，手表从贺龙瘦骨嶙嶙的手腕上滑脱。他默默地告别妻子，独自一人被送往医院。

下午3时零9分，贺龙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贺龙逝世前，血糖曾高达1700毫克%，比以往高出十几倍，他死于高渗性非酮

症糖尿病昏迷。虽然，当时的中国医学界对这种病症认识得还远远不够，但多年来病情一直稳定的贺龙，如果不是受到2年半之久的精神上和生活上的折磨，如果不是他最后一次出现糖尿病酸中毒时没有得到及时的慎重的治疗，是不会那样快地离开人世的。

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戎马生涯半个多世纪，竟然如此凄惨地死去，令人不寒而栗。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文化大革命”肆无忌惮地摧残老干部，在贺龙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贺龙去世后，林彪、江青一伙仍不放过贺龙的夫人薛明。叶群要吴法宪把薛明送到离北京远一点的地方，放在空军的监护之下。吴法宪一口应承，将薛明送到贵州的一个空军学校。吴法宪、邱会作向押送人员交代：“薛明去空军干校监督劳动，不许她乱说、乱道、放毒，找几个人监护。不许她写信。”贺龙的子女也受到打击、迫害，长时间流落四方。

第四节 大雪压青松——陈毅遭迫害纪实

陈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陈毅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北京中法大学毕业后，在北京、重庆、武汉等地从事党的工作，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第73团党代表。起义军潮汕失败后，和朱德一起率余部转战至湘南，举行湘南起义。1928年4月率部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任工农红军第4军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1929年12月协助毛泽东主持制定“古田会议决议”。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后，在南方坚持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参与组建新四军，任第1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皖南事

变”后代理新四军军长，领导华中抗日。解放战争开始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华东战场组织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进攻。1948年参与组织指挥淮海战役，次年任第3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上海和东南广大地区，并兼任上海市长。全国解放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团结国内外一切进步力量，促进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

建国以后，陈毅担负着繁重的政府工作，活跃于外交舞台，可他对人民解放军的关注之情丝毫未减，为军队的建设花费了不少心血。陈毅性格爽朗，敢作敢为，毫不掩饰对一些不健康、不正常现象的鄙夷之心，总是不留情面地提出批评意见，又因为他所处的地位非同一般，影响很大，因而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就触怒了林彪、江青。林彪把陈毅视作夺取军权的强劲对手，江青担心陈毅了解其30年代在上海的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毅的直言不讳更为林彪、江青所不容，1966年11月，陈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两次讲话，狠狠触及了林彪、江青一伙的痛处，成了他们向他开火的借口。次年2月，陈毅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慷慨陈词，事后又被诬陷为“联络员”^①。反击“二月逆流”，林彪、江青当然放不过陈毅。

^①陈毅身兼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指为在国务院系统中的老干部和军队系统的老干部之间穿针引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当权派几乎无一例外就是“走资派”的日子里，作为外交部长的陈毅在外交系统自然首当其冲。1966年6月，外交部及其所属单位就贴出不少有关陈毅的大字报，说什么“外交部里有大鬼”。接着，驱赶派驻学校的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毅都是矛头所向。1967年初，“一月风暴”引起的揪斗之风越刮越烈。1月24日，外事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批判陈毅大会，要陈毅作检查。陈毅不卑不亢，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实事求是地做了自我批评，得到大多数群众的谅解和周恩来的肯定。陈伯达参加了这次“批判会”，当时也不得不表示肯定，但事过不久便自食其言，同林彪、江青等暗中怂恿和唆使某些群众组织发难，重新掀起炮打陈毅的高潮。

1967年2月，陈毅等人因“大闹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林彪、江青、陈伯达借机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对所谓“二月逆流”的参加者围攻批斗，并将会上的情况透露给他们操纵的“造反派”组织，编造出所谓“陈毅黑话100例”等材料广为散发，在社会上鼓噪起一片“打倒陈毅”的叫嚣。3月中旬，北京街头出现游行示威，喊出了打倒“二月逆流”参与者的口号。3月18日，政治局生活会结束，陈毅回到家中，感慨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真是巧合。41年前，1926年3月18日这天，在党和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我们组织4000多市民、工人、学生，冲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政府，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这天是中国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41年后的今天，我也受到批判。

3月20日，中央文革审查电影《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江青要求删去陈毅的镜头。4月1日，“造反派”成立了“批判陈毅联络站”，北京街头到处贴出了“炮轰陈毅”、“火烧陈毅”的大标语。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外交学院等单位大量编印《陈毅黑

话集》、《陈毅黑话选》、《批陈专辑》等材料，从历史到现实丑化陈毅。紧接着，陈毅被剥夺领导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权力。4月17日，陈伯达、戚本禹接见造反派时表示，要让陈毅到群众中去听取批判，从而助长了“造反派”攻击陈毅的气焰。从7月15日起，一些“造反派”组织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组织街头集会，拦截车辆，堵塞交通，阻碍正常的外事活动，以此制造事端，向周恩来施加压力，要求交出陈毅。周恩来派谢富治去做群众组织的劝说工作，谢富治当面应承，背后却再三表示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

8月7日，王力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公然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在这个讲话的煽动下，8月11日，“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判陈毅大会。会上，突然打出“打倒陈毅”的标语，甚至要上台揪斗陈毅。周恩来奋力劝阻无效，愤然退出会场，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离开。在以后的20多天里，陈毅先后被大会、小会批斗了七、八次。

尽管毛泽东、周恩来一再要求保护陈毅，但林彪、江青等人始终没有放松对陈毅的迫害。陈毅虽然仍在工作，却随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阻挠和困难，他的心情十分沉闷。

1968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对所谓“二月逆流”作了错误批判，陈毅等人在会上再次受到攻击。会后，张春桥借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材料之机，组织编写《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在一部分代表中散发，诬陷陈毅“投降帝修反”，“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企图把陈毅排除在“九大”之外。

1968年，屡遭批判，处境艰难的陈毅到北京光华木材厂“蹲点劳动”。1969年10月，在林彪“第一个号令”下，陈毅被点名

限时离开北京，下放石家庄，实际上被剥夺了一切权力。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上，陈毅编在华北组，又一次遭到不明真相的人的非难和攻击。会议后期又被莫名其妙地与陈伯达联系在一起，作为陈伯达的“同谋”受到批判。

早在石家庄时，陈毅就时常肚子痛。但工厂医疗条件差，医生只给他吃点止痛片。1970年10月21日，陈毅因腹部疼痛，排便异常，经周恩来批准后，返回北京治病。此时，黄永胜正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不愿见到陈毅，医院便以没有床位为由，待黄永胜出院后3天，才安排陈毅于26日住进医院。入院后，医院仅按一般查体作了一些常规检查，没有组织专家会诊。检查中虽然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却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过去，没有引起重视。12月22日，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陈毅出院了。

出院后，陈毅经常头晕、牙痛、肚子痛、腹泻。1971年1月16日，陈毅再次住进医院，经医生检查，发现腹部右侧有一个很大的硬块，压痛明显，由此诊断为“亚急性阑尾炎”，需立即手术。腹腔打开后，发现真正的病因是靠近肝曲处的结肠癌瘤。癌瘤卡住升结肠，造成肠梗阻，并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上，虽然医生尽了最大努力，但已无法全部清除。

对于癌症病人来说，早一天确诊，早一天治疗，早一天手术，结果可能大不一样，但陈毅第一次住院时，医生、护士接到警告，要他们同陈毅“划清界限”，以至于许多应该早期发现的症状，都轻易地滑了过去，连两年间体重下降20多公斤这个重要症状，也以“生活条件的改变，政治思想的巨大压力”为由，没有认真查找。从陈毅第一次住院到手术，其间经过了2个多月，80余天。如果不是这么长时间的耽误，陈毅的病应该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半年以后，发现癌肿已转移至肺部。陈毅一面接受治疗，一

面关注着政治局势的变化。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陈毅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揭露林彪历史上的问题。年底，陈毅病情恶化，再次住进医院。1972年1月6日，癌症终于夺去了陈毅的生命。

虽然，陈毅坚持着看到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然而，林彪、江青一伙横加于陈毅的诽谤诬陷带来的沉重政治压力，无故拖延治疗以至本来应该尽早发现的癌瘤终于变得不可收拾，仍然是造成陈毅过早死亡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九大”以后，陈毅被剥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政府工作也已不能过问。按照规格，他已不算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的追悼会只能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尽管毛泽东圈去了悼词中“有功有过”4个字，肯定了陈毅一生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但低规格的追悼会无疑不能充分反映陈毅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杰出贡献以及他在国内外的广泛影响。

1972年1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临时决定参加陈毅追悼会，再次肯定“陈毅是个好同志”，周恩来致了悼词。这一举动，立即成了当时的一件大事，它极大地鼓舞了“文化大革命”以来蒙受屈辱的老干部，打击了正在扩充政治势力的江青一伙的气焰。

第五节 出污泥而不染——张学思遭迫害纪实

张学思一生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出身于封建军阀家庭，其父张作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大军阀，其兄张学良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思是这个家庭的叛逆者。1933年，17岁的张学思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接着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学习后，接受党的委

托，到敌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队队长、冀中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冀中军区副参谋长兼第1科科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平西军分区参谋长、第11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全国解放后，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1958年从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校毕业回国后，任海军参谋长，直至去世。张学思是人民海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海军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周恩来称赞他是一个精通业务、有能力、有水平的海军好参谋长。

张学思为人正直厚道，办事认真严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具有共产党员磊落光明的高尚品质。海军前司令员肖劲光称赞他“具有松柏那种‘历尽沧桑而不衰’的气质，有荷花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正因为如此，他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所不容。

早在1962年，林彪即在海军安插党羽，培植亲信，闹得海军很不安宁。张学思对此有所察觉，对人讲过：“他们有后台老子。”在1965年海军党委会议上，林彪的亲信们全盘否定海军的工作，对海军主要领导人进行攻击和污蔑。正在外地搞“四清”的张学思对此愤然不平，拒绝回京参加会议。1966年，海军党委召开会议，讨论所谓肃清罗瑞卿影响问题，林彪在海军的党羽和亲信借机进行夺权活动，张学思在会上对此面对面地予以揭露和斗争，他说：“在我们军队的党委会上，竟然出现此类事件，是十分令人痛心的！这完全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阴谋活动！”“企图用欺骗的办法，作出决议，造成既成事实，去逼中央军委点头，这种企图是个阴谋，这种做法是恶劣的非法行

为。”张学思触怒了那些正炙手可热的权贵，他们私下议论说：“没想到他那么厉害，首先提出要抓我们黑帮。”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到会，批评有人在搞非组织活动，想借会议“黄袍加身”，遏制了这种气焰。

林彪一伙对张学思怀恨在心，1965年时就企图把他排挤出海军，因受到周恩来的批评而未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利用篡夺的权力，加紧了对张学思的迫害。1967年7月，林彪指使叶群给李作鹏打电话说：“张学思在东北是反林彪的，以前他和国民党有勾结。”要李作鹏等人尽快收集、整理张学思的材料。李作鹏秉承林彪的旨意，立即找人座谈，炮制出一个陷害张学思的报告。报告说，张学思在东北时，“与彭真、林枫^①等关系很好”，来海军后，“忠实地执行了苏振华^②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海军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是完全站在苏振华一边的”。报告说，“张学思有特务嫌疑”，“蒋匪特务机关长期以来策反张学思”，“张学思自己写的自传中也交待接触过很多国民党上层人物，蒋匪大特务戴笠还请他吃过饭”。报告别有用心地提到，张学思任海军参谋长是周恩来支持的。报告写好后，李作鹏派他的老婆于7月24日径直送给林彪、江青、关锋。时隔不久，吴法宪以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的名义把海军的同志召到京西宾馆，通知他们说：林彪、江青已决定逮捕张学思。

9月11日凌晨4时，张学思家中的电话铃突然响起，对方说：“要开个紧急会议，你马上到第一招待所来。”一向光明磊落而又毫无戒备的张学思哪里想到，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他急

①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

② 海军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7年6月被免职。

忙穿上衣服，叫醒住在隔壁的司机就走了。

来到第一招待所，天还没亮，周围空寂无人。张学思一走进招待所的大门，几个陌生人立刻恶狠狠地围了上来，他感到有诈，质问他们想干什么。来人宣布，根据上级决定，将其逮捕。随后，张学思被押上汽车带走了。后来，林彪一伙造谣说，张学思是“特务”，“正在发报时被抓住了”。他们还要张学思的司机黄国清说出张学思的电台藏在什么地方，训斥他说：“电台就藏在你车轱辘的轮胎里，你开车，他发报。”

张学思被秘密关押在北京郊区一个营区内，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玻璃窗外安上了铁丝网，窗户紧闭着，下半截糊上了报纸，室内潮湿阴暗，空气沉闷、污浊。

12日，张学思给李作鹏和海军党委写信，询问羁押他的原因，然而没有得到回音。16日，张学思又一次写信提出责问，李作鹏批示说：“张学思的信如何处理有两个方案：一不理他；二告诉他可能问题严重，正在审查中。”结果还是不予回答。27日，张学思第三次写信，仍是石沉大海。

张学思被捕的当天早晨，他的家被抄。张学思的妻子谢雪萍质问为什么抄家、为什么抓走她的丈夫，得到的回答是，“他有重大政治问题，不能告诉你，你也不要打听”。当时，全海军机关，除了李作鹏一伙外，谁也不知道逮捕张学思的真正原因，连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也被蒙在鼓里。

为了掩人耳目，在人已被关押2天后，9月13日，李作鹏等人以海军党委名义向上写了个有关张学思的“立案报告”，谎称国民党长期策反张学思，张可能有重大政治问题，“请示对张学思进行隔离审查，并向海军直属机关各级领导和革命群众公布张的问题”，“报告”辗转送到周恩来手中，为了保护张学思，周恩来批示，“请待成武同志回来考虑”，试图以此拖延抓人时间。其实，

张学思早已被抓了起来。周恩来还批示：“事情没有查清之前，不要向群众公布。”可是，张学思是“特务”的流言已经传遍了海军机关。

10月5日，张学思经过慎重思考，把他受迫害的真相写信向周恩来汇报：“我以党性和生命向党保证，我绝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但是，在林彪一伙的严密封锁下，张学思的这封信以及他的妻子和儿女们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都被截留，对他的打击和迫害更加紧了。

从1967年10月25日起，张学思连续13天被拉到海军大院，轮番进行大会、小会批斗。批斗之后，又由专案组“提审”。李作鹏等人煽动说，要人们对张学思带着“强烈的阶级仇恨，作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对张学思的诬陷，既有“特务”、“国民党的策反对象”，又有“假党员”、“混进党内”、“东北叛党集团成员”等等。捕风捉影的怀疑和蓄意的捏造交织在一起，什么“你和国民党特务勾结，接受策反是有证据的”，“1937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请你吃过饭”，“1938年，你到香港接受特务训练，在那里学开飞机”，“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国民党专门收罗了一批原东北军的上层人物，委以参议名目，主要做以你为主的一些人的策反工作”，“1956年，国民党港澳特务机关派人来北京做你的策反工作，你在参加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同他们有过接触”等等，统统成了张学思的“罪状”。张学思对这些无中生有的“证据”嗤之以鼻，据理力争，又被说成“反攻倒算”，“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

李作鹏要求专案组把张学思“假党员”的问题赶在海军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前定下来，以便在会上宣布。但是张学思的入党介绍人王岳石不为压力所屈服，始终证明“张学思是党员”。加上张学思顽强抗争，使搞垮张学思的阴谋接二连三破产。专案组经过几

年内查外调，一无所获，也泄了气，只得打报告请示排除张学思的“特嫌”问题。但李作鹏等人置张学思于死地的决心不变，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仍然批示：“年长日久了，问题搞不清，也不要轻易否定，可以先挂起来。”当然，李作鹏等人决不甘心就这样把张学思“挂起来”了事，他曾对专案组施加压力说：“你们搞不出问题来，是不是还要把张学思请回来当参谋长！？”由于涉及“特嫌”，看押的措施极端严格，张学思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和控制，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清楚，张学思的家庭背景使他的影响远非一般的海军参谋长可比，不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其很熟悉，在国际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既然戏已经开场了，硬着头皮也要演下去，如不下死力气把他整倒整垮，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寻倒霉。政治上的诬陷迫害没有停止，对张学思生活上的折磨和身体上的摧残随之加剧。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张学思恰恰 50 岁，正当盛年，且身体健壮，长期的囚禁生活、恶劣的饮食和几乎谈不上的医疗条件使他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患了关节炎、失眠症和胃病，病情逐渐转重，1970 年 2 月，张学思终于病倒了。2 月 27 日，专案组“提审”时，张学思已走不动路，上下楼梯都要人搀扶，哮喘加剧，耳朵几乎失聪。后经医院检查，诊断为：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肺原性心脏病；重度营养不良。张学思住进医院后，林彪反革命集团也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和迫害。住院用的是“张肪”的化名，经常有六七名看守人员不停地巡视，以防“自杀”为借口，病房门窗关得紧紧的，窗户上拧着铁丝，灯泡换上了大瓦数的，照得张学思整夜无法安睡。

3 月下旬，张学思病情恶化，持续高烧，连翻身都很困难，整天昏昏沉沉，代谢功能也开始紊乱。经过允许，张学思分散在各地的儿女们赶到医院看望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父亲，张学思

不禁说：“不认识爸爸了吧？他们从爸爸身上扛走了两袋面粉（意指体重减少 90 斤）！”

4 月初，周恩来得悉张学思病情恶化，立即指示组织力量抢救，并以“急件”将这个指示发到医院，医院提出了救治方案。但李作鹏不仅不允许采取任何积极的医治措施，反而加紧迫害。张学思病重期间，想吃点点心，他们不给；想吃点高粱米，也不给；想吃点酸菜，还是不给。张学思含愤地说：“我现在是治病，还是治罪！我也不是要吃什么山珍海味，连吃点普通的东西，你们都说没有。我想吃点土豆，就是马铃薯，这个不会没有吧！我想把土豆剥了皮，用白水煮煮吃就行。”回答还是没有。张学思指着铁丝拧着的窗子说：“你们不给我吃，那让我打开窗户呼吸点新鲜空气总该可以吧！……外面空气那么新鲜，对我这样得肺结核的病人是多么需要啊！难道吸点新鲜空气都不行吗？”然而，窗子依然拧得紧紧的。1970 年 5 月 29 日，张学思在经历了 2 年半之久的监禁生活后，含冤死去，年仅 54 岁。

临终前，张学思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在神智稍微清醒时，他要来纸笔，连续写下“恶魔缠身”4 个字，作为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一伙的最后控诉。

第六节 名医之死——傅连璋遭迫害纪实

傅连璋是人民解放军医疗卫生战线上颇负盛名的长者。1925 年，年仅 31 岁的傅连璋就在福建省汀洲城英国人开办的福音医院当院长。1927 年，南昌起义后，他为起义军伤病员治病，接触到共产党，并从此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1934 年参加长征。到陕北后开始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全国解放后曾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央保健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一直负责中央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傅连璋在中国医疗卫生界享有崇高威望。

林彪对傅连璋的“仇恨”起源于建国之初。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毛泽东最初安排林彪担任志愿军司令员一职。没想到，林彪佯装有病托辞不去。以后，林彪的“病”越来越“重”，自称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稍不注意，就会感冒、拉稀、出汗。他的住室要用厚窗帘严密地挡风遮阳。凡到傅连璋，总要作出一副病态，要傅连璋“救”他。鉴于林彪的健康状况“恶化”，毛泽东指示傅连璋组织专家为林彪作一次全面、细致的身体检查。1953年，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医疗专家给林彪会诊。肖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参加了会诊小组。会诊前，林彪让叶群出面找到傅连璋，暗示他给林彪开具疾病证明，傅连璋没有苟同。经过专家们对林彪身体各系统的全面检查，未发现重要器官的严重器质性病变，现有的许多症状与精神因素有关，也与林彪使用吗啡有联系。会诊后，傅连璋将林彪的身体状况向叶群作了交代，要她注意让林彪多见阳光，多做户外活动，多散步，要吃些水果、蔬菜，并劝林彪戒掉吗啡。事后，傅连璋把会诊结果如实向中央汇报，并委婉地告诉了毛泽东。其实，毛泽东对此早有察觉，借此机会，他特地抄录了一首曹操的诗《龟虽寿》给林彪，要他引以为戒，弃旧图新。林彪因此对傅连璋恨之入骨，寻机报复陷害。1960年，林彪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以后，曾试图把傅连璋赶回汀洲老家“休养”，未能如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以“革命”的名义报复仇人的计划付诸实现，整掉曾经对“副统帅”大不敬的傅连璋自然是其中的内容之一。掌握总后勤部大权，身为傅连璋顶头上司的邱会作担当

了林彪迫害傅连璋的打手。

1966年8月下旬，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常委会上说：“傅连璋是条大毒蛇。”“卫生部不烧傅连璋就是没有党性。”煽动打击傅连璋。邱会作亲自布置一名常委委员，“卫生部一定要烧透傅连璋，对傅连璋烧不透，由你负责”。由于傅连璋一直负责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一般群众与其接触不多，知之甚少。因此在邱会作等人的煽动下，一哄而起。8月26日下午，卫生部率先贴出傅连璋是“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说傅连璋“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林副统帅病危时，不给药吃，陷害林副统帅”。当晚，傅连璋的家被抄，接着被连续批判、游斗，还举办了“傅连璋罪行展览”。

一连数日，72岁高龄的傅连璋被整得路都走不动了。他弄不明白，到底什么原因使得灾难骤然降临到他的头上。他写信给毛泽东，报告自己的境况：“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来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有人跟我谈过，现在突如其来地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在弄不清楚。就算我样样事都做错了，那么一九三四年你在鄂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生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1966年9月3日，毛泽东在傅连璋的信上批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林彪等人对毛泽东的批示，既不让傅连璋本人知道，又对群众封锁，对傅连璋的批斗丝毫没有减弱。9月5日，中华医学学会的“造反派”将傅连璋抓去批斗，傅连璋的肋骨被打断，头也打破了。

傅连璋不堪折磨，生命垂危。林彪一伙怕傅连璋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不好向毛泽东交代，不得已将傅一家迁到北京郊区香山居住。表面上，傅连璋避开了情绪激昂的群众，可以暂时免受批

斗之苦，暗地里，林彪一伙加紧搜集、整理傅连璋的材料，罗织罪名，以求将傅连璋置于死地。

1967年6月，社会上掀起“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浪潮，卫生系统各派组织间的斗争日趋激烈。11月，邱会作凭借权力，在总后勤部秘密成立“傅连璋专案组”，与地方上的造反组织联合进行诬陷傅连璋的活动。按照邱会作的意图，“专案组”起草了《关于批判傅连璋三反言行的请示报告》和“罪行材料”，给傅连璋捏造了许多罪名。在此基础上，总后勤部党委报送军委《关于彻底批判傅连璋三反言行的报告》。12月18日，邱会作以军委办事组成员的身份在报告上批示：“军委办事组同意批斗傅连璋，望组织这一工作。”“以我看主要抓他三点，（1）三反言行，（2）黑线关系，（3）斗志衰退。”

在“文化大革命”的造神运动中，对“副统帅”、“接班人”林彪的宣传也在不断升级。为了证实林彪的“永远健康”，林彪一伙大肆吹嘘：经过全面检查，除神经稍有毛病外，林彪身体各器官都很健康。这一宣传材料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被不明真相的群众所轻信。于是，林彪的身体状况已成定论，傅连璋没有可能把真实情况透露出去了，他的作用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1968年初，康生直接操纵搞了个安子文“特务电台”问题，把傅连璋也牵扯了进去，说傅连璋将毛泽东、林彪等领导人的健康情况送给安子文，由安子文通过电台发给香港的特务组织。傅连璋因此成了“特务”嫌疑。江青对加害傅连璋也不甘落后，3月13日，她在听取专案组汇报时说：“傅连璋是个坏家伙，他竟敢把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向外扩散，把他抓起来！”3月14日晨，邱会作坐阵指挥，再次抄了傅连璋的家，并将傅逮捕。傅连璋家里普通的电子管收音机被说成发报机，成了“特务”的铁证。傅连璋被戴上手铐，投入监狱。

年事已高的傅连璋患有严重的胃病，平时只能吃稀饭、软饭，连水果都要蒸熟后吃。监狱里的粗糙饭菜，他的胃实在受不了。他要求给一点稀饭吃，医生也开了证明，但狱方就是不允，还说：“叫他隔一个时期饿饿看，吃点苦头是应该的。”傅连璋身体本来就很弱，加上入狱后很少进食，很快就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可审讯仍在进行，接连不断的训斥、恫吓、辱骂、推搡、踢打、手铐、饥饿……一生遵奉人道主义、正直勤勉行医的傅连璋再也无法忍受这样无休止的强烈刺激，他的精神崩溃了。“看守所日记”中这样记载，（傅连璋）“夜间也不脱衣服，也不盖被子”，“疯疯癫癫那个样子，发日用品给他不要，晚上不睡觉，到一二点钟说八道闹一阵子”，“一夜没有睡觉，在地上翻来覆去到处钻”……

1968年3月29日凌晨，傅连璋入狱的第15天，看守见他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3时多打开牢门，傅连璋全身冰凉，已死去多时。仅仅因为知道林彪借口有病拒不到抗美援朝前线和他的身体并不象有人吹嘘的那样健康，更不可能“永远健康”，竟使傅连璋这样德高望重的名医惨死在狱中。

毛泽东得知傅连璋屈死的消息后，对失去这样一位老朋友非常惋惜。1975年5月17日，他在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上批示：“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①这个批示，成为解放一大批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打击、迫害的老干部的契机之一，推动了1975年各条战线的整顿工作。

^① 参见本章第7节。

第七节 横扫一切的“革命”

——遭迫害的将领们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打击、迫害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绝非以上几人。不过，上述身居高位，经历和身份特殊的人当然不能幸免，其他人的遭遇和命运更是可想而知了。

一 “医疗为政治服务”

随着“文化大革命”刮起的批斗风越演越烈，1966年12月24日，在林彪“靠红卫兵而诛之”的方针指导下，解放军各军事院校在京学生和首都红卫兵万余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以罗瑞卿为首的篡军反党集团”大会。会前，林彪对大会作了具体的指示：“干部不要上台，由红卫兵自己搞。……执行红卫兵的指挥。……叶群同志提到上次斗争大会无严慰冰（陆定一的夫人），群众意见很大，这次加上郝治平更好。”在林彪的支持和鼓动下，腿伤未愈的罗瑞卿被“造反派”们用大箩筐抬到会场接受批斗，饱受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摧残。在做第二次跟骨病灶清除术时，按照常规，术后7天拆线，可是，“为了斗争需要”，提前拆了线，并被拉去批斗。罗瑞卿得不到应有的休息，伤口难以愈合，精神上痛苦不堪。

1967年夏天，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时，罗瑞卿作为仅次于彭德怀的“军内最大的走资派”一再被报刊点名批判。以后，又被冠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军内的代理人”成了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大批判的对象。随之而来的是几乎一天24小时不停的“车轮战”，罗瑞卿的

身体日渐衰弱，腿疾日益严重，经常高烧不退，处于精力和体力衰竭的状态中。9月14日夜，因高烧而昏昏沉沉的罗瑞卿拄着拐棍，扶着墙壁去上厕所，不慎摔倒在水泥地上，造成伤腿股骨颈骨折。骨折后的第3天，罗瑞卿被强行接出医院，11月中旬才再次入院作骨折牵引复位术。在“医疗为政治服务”的原则下，罗瑞卿的病房成了审讯室，只要罗瑞卿稍有怠慢或回答得不中意，牵引就会停止，“治疗”成了折磨罗瑞卿的手段。专案人员明确表示：“你不承认自己有罪，就别想舒服。”2个月后，罗瑞卿又被赶出医院。

1968年6月1日，罗瑞卿的伤腿几经“治疗”，非但不见效果，反而恶化，他写了一个报告：“……左腿动了几次手术，伤口仍然不好，经常流脓水，又跌断了左腿的骨头，请求再治一治，伤口如治不好，则把左腿截掉……”7月13日，罗瑞卿被送进医院。7月25日，医院作出手术方案和手术报告。8月3日，专案组将治疗方案报送叶群、江青、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等人。8月4日，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罗瑞卿动手术问题，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林彪说，罗瑞卿现在没有挖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如果手术后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7日，专案组报告：“目前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将对罗的手术治疗推迟至秋凉之后进行。”于是，手术一拖再拖，直到1969年1月25日，在没有进行认真的术前讨论，临时又更换了医生、护士的情况下，截去了罗瑞卿左小腿下部的1/3。5周后，又做了高位截肢术，摘除了原已接好的股骨，使残腿失去了安装假肢的可能。

在“关于手术，一定要突出政治，服从政治斗争需要”的幌子下，实现了林彪残害罗瑞卿的愿望。罗瑞卿虽然活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但那条残腿，终于成了他致死的根本原因。

二、虎将之死

陶勇，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苏皖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3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有名的“虎将”。全国解放后，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是建设人民海军的“干才”之一。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的1962年，陶勇就因为看不惯林彪一伙在海军争权夺利的活动，拒绝了他们的拉拢，同他们进行了斗争。1965年，在海军党委会议上，陶勇批驳林彪的党羽否定海军工作成绩的企图，愤然离会去了福建。1966年5月，陶勇再次拒绝到会，反对林彪在海军的党羽“黄袍加身”的阴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陶勇坚持原则，保护受打击受迫害的老干部，成为林彪、江青一伙亟欲除掉的一大障碍。

1967年1月21日，陶勇象往日一样到舰队司令部上班。上午，他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一起会见了两名“中央文革”派驻上海的记者。吃过午饭，在招待所略事休息后，陶勇在楼旁的花园中散步，与花工聊天，并要招待所所长去找理发员为自己理发。当招待所所长找到理发员一起来到花园时，却找不到陶勇了。最后，发现陶勇落在一口又小又浅的浇花的水井中，军帽漂在水面上。闻讯赶来的医生、秘书等人立即抢救，然而为时已晚，陶勇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陶勇被从井中捞起后，内衣还是干的，衣袋里的文件也没有完全润湿，他同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分手只有十来分钟。

陶勇死后不到4小时，林彪一伙即以海军党委名义作出“叛徒”的结论。陶勇的遗体被拖在冰冷的地上，倒上了墨汁、戴上了高帽，脸上打了“×”，甚至准备挟尸游街。慑于陶勇的威望和影响，林彪一伙在火化陶勇的遗体时规定，“家属不看，骨灰不

要”。据当时在场的火葬场工人回忆：“遗体运来时，由于耽搁时间太久，已经变形，两腿布满了霉斑。周身上下连一块盖的布都没有”。

陶勇死了，林彪、江青一伙并不到此为止，他们通过秘密逮捕，私刑审讯，事先定性，后整材料的手段，先后整理了 30 多个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材料，制造了一个株连几百人的陶勇冤案。

陶勇的夫人朱岚坚信陶勇是被害而死，她四处奔走，将陶勇死亡的种种疑点写成材料，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为陶勇申诉。然而，招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残酷的迫害。1967 年 8 月，朱岚突然被带走，秘密关押起来。林彪一伙诬指朱岚是“日本特务”，要她交代陶勇的所谓罪行，交代陶勇和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关系。朱岚对此严词拒绝，遭到夜以继日的轮番围斗，严刑拷打。她被打得遍体鳞伤，肋骨也被打断，仍然坚贞不屈，直至被折磨死去。朱岚死后，张春桥说：“人死了，灭了口，线断了。”

对于陶勇的死，任何一个了解其品质和性格的人都不会相信“自杀”的说法，周恩来说：“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坚决，说他是‘日本特务’，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嘛！”陈毅说：“陶勇同志不是‘自杀’，他的死大有问题，总有一天我要面陈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许世友对陶勇的子女们说：“什么叛徒，特务，都是胡说八道！你爸爸我最了解，他是好样的！”粟裕曾表示要在有生之年调查了解清楚陶勇死亡的真正原因。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死亡现场又被破坏，这一愿望终究未能实现。

三、“奇文共欣赏”

1975 年 5 月 17 日，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

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这里的“奇文”，指的是曾任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和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贺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在军内外享有崇高威望和声誉。1953年，因为一个不尽属实的报告，毛泽东批评军队和政府卫生部门犯有“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贺诚先是被免去军委卫生部的职务，以后又被解除政府卫生部的职务，改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1963年春，贺诚离职休养。对中央有关他的决定，贺诚一直不服，熟悉内情的人也认为处理过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邱会作等人以贺诚为过去的错误“翻案”为借口，私立专案，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揪斗贺诚。1968年又以“里通外国”（指贺诚1936年奉中共中央之命陪送王稼祥到苏联治病）的罪名抄了他的家，随即停发了工资，降为战士待遇，赶出了军事医学科学院。1969年10月，根据林彪的“第一个号令”，贺诚戴着“反党翻案”、“里通外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顶帽子被强行遣送到山西太原东北郊土堂村监督劳动，吃了不少苦头。

“九·一三事件”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主持下，对一些重大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但贺诚一案却杳无音信。1972年6月26日，贺诚写给毛泽东一封长信，信中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后的经历，表示了对中国卫生事业的迫切关注，也谈到对强加于自己的处分决定的保留态度。贺诚明确表示，“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求工作”，对被迫长期“赋闲”，无所事事，感慨万分，“自己的处境不如战争年代的俘虏医生。那时，他们要走，主席要我们留；今天，我要留，却有人硬要我走”。

6月28日，毛泽东作出批示：“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

理，我意应予工作。”随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也就贺诚的工作安排作了批示。按理说，贺诚的问题本不应再有大的波折。然而，在当时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尽管贺诚由山西回到了北京，他的工作问题却没有下文。

1973年，根据周恩来的安排，贺诚到湖南调查了解“三废”治理情况。1974年，周恩来建议贺诚出任卫生部部长，由于江青一伙从中作梗，只得作罢。1975年初，贺诚的女儿贺礼荣给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写信，要求为贺诚安排工作。邓小平接到信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贺诚的问题1972年已经批了，为何现在还要议？他找到当时的批件，将贺诚的信又看了一遍，情绪激动，于是写下了上面的批语。不久，贺诚的错案得到平反，被任命为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

贺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也许并不象其他人那样凄惨，他更多的是被排斥、被疏远。但从贺诚的经历中不难看出，虽然林彪、江青等人表面上对毛泽东“无限忠诚”，执行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一丝一毫不走样。实际上，毛泽东既不能完全左右“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也不能左右一个人的命运。他被林彪、江青一伙包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趋势了解甚少，很难避免指导上的错误。同时，他的某些出于良好动机的主张，也由于林彪、江青等人的篡改、曲解或者扣压、拖延，而不可能真正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在自己酿成的错误面前无能为力，因为自己的失误，他的良心经受着严厉的惩罚。这是演成“文化大革命”悲剧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那样多系负盛名的老干部横遭迫害的原因之一。

四、受难匿迹的杨 金、傅

1968年3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突然宣布了罪

状，很快就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们几乎同时被逮捕、监押，直到1974年毛泽东亲自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才先后被释放。

3月23日凌晨，吴法宪打电话给余立金，称刚从林彪处回来，有重要事情商量。余立金与吴法宪的住房相距不远，他顾不上考虑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匆忙间披上一件大衣，独自一人向吴法宪家走去。快到屋门口时，黑暗中突然有人出来查问他的身份，他刚回答，几个人立即扭住他的胳膊，给他戴上了手铐。后来，为了证实余立金的“叛变”行为，林彪、吴法宪一伙找到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处长，⁷由他证明“亲眼”看到了被捕的余立金。其实，这个军需处长当时不在皖南，而在四川，他之所以出具假证明，只是为了换取解除自己的劳改。

余立金被逮捕的时候，杨成武正因病在家休息。凌晨2时许，驻在杨成武家附近的警卫部队接到命令，离开了驻地。随之，新来的部队包围了杨成武的住宅。杨成武的家人被统统赶进客厅，由武装人员看管着。李作鹏和邱会作亲自来到杨成武的卧室，借口林彪召集会议，要杨成武马上跟着他们走。杨成武意识到情况不好，想安慰一下年迈的母亲，却被粗暴地拒绝。

在人民大会堂，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人轮番对杨成武栽赃、诬蔑。随后，杨成武被押到飞机场，送往外地。以后的6年中，杨成武一家先后换了几处关押的地方。在洛阳，一家人被分成几个“学习班”，由专案人员进行审讯逼供。杨家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孩子，谁也没有逃脱受迫害的厄运，3口人被整死。

3月23日凌晨，傅崇碧正在人民大会堂安排一次接见。林彪在不作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突然向他宣布，任命其为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并要其立即赴任。傅崇碧连家都没有回，只给家

人留下一张字条，就匆匆赶往西郊机场，登上去沈阳的飞机。

到沈阳后，傅崇碧马上被软禁起来。他住的房门有一道岗，楼下还有一道岗。警卫战士接到命令，不准他走出房门，他要求把窗户打开一点，战士不敢打开大窗户，只能打开一个小的。傅崇碧知道自己被关押了，却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他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我希望你们派人来同我谈一谈，如果是我有错误，我自然接受处分，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事情，我可以向中央说清楚。……”信送走后，始终没有消息，等来的却是要他交代问题的讯问。傅崇碧饱尝了长时间单独监禁的滋味，白天上厕所所有人跟着，晚上睡觉大灯泡照着，精神上非常痛苦。

虽然在毛泽东的关照下，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释放，但是在江青一伙的干预下，压在他们身上的包袱并没有完全解除。直到1979年3月，历经11个年头之后，“杨、余、傅事件”才得到公开的、彻底的平反。

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作出终审判决。《判决书》不仅列举了前文已经提到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包括朱德、贺龙、彭德怀、罗瑞卿等人的诬陷、迫害，而且有如下的记载：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批干部，企图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受他们的控制。1967年7月25日，林彪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空军、海军诬陷迫害了大批干部。”

“1967年10月至1968年3月，黄永胜提出审查中共‘广东地下党’，决定对广州部队副司令员文年生等人进行‘审查’，制造了‘广东地下党’和广州部队‘反革命集团’两个冤案，致使大批

干部和群众遭到诬陷迫害，副省长林鏘云和文年生被迫害致死。”

“吴法宪在空军诬陷一些领导干部要‘夺权’，批准关押、迫害空军干部和群众一百七十四人，致使南京部队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前和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刘善本被迫害致死。”

“李作鹏在海军点名诬陷迫害一百二十名干部。”

“1967年至1971年，邱会作在总后勤部私设监狱，刑讯逼供，直接诬陷迫害了干部和群众四百六十二人，致使汤平（总后勤部副部长）、周长庚（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八人被迫害致死。”

“黄永胜诬蔑总政治部‘招降纳叛’，积极参与林彪‘砸烂总政’的犯罪活动。”“邱会作指使人窃取总政治部的档案材料，诬陷总政治部的干部，在林彪‘砸烂总政’的犯罪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左传·僖公十年》记载，晋大夫里克因弑君罪被杀，临刑前，他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后人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比喻滥杀无辜。“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这一荒谬的原则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他们可以指鹿为马，把正确说成错误；或者无中生有，杜撰出耸人听闻的“事件”；甚至干脆随便捡起一个什么“罪名”，把人打倒之后，再去编织“证据”。整整10年中，上至开国元戎，下至普通干部战士，面对这种恐怖的“革命气氛”，无不嗟叹、愤慨，却又无可奈何。这一段历史，理所当然地留下耻辱的回忆，成为中国人民永志不忘的鉴戒。

第四章 流产的政变

林彪的政治野心随着他在党内、军内职务的擢升，权力的增大而逐步发展。他以虚伪地顺从和颂扬毛泽东为基本策略，标榜“高举”、“紧跟”，狂热地鼓吹个人崇拜，一度骗取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内许多人的信任，被视为毛泽东最好的学生，忠于毛泽东的典范。在这个基础上，利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条件，林彪施展反革命阴谋手段，组织反革命集团，直至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第一节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直到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几年。追溯这个集团的产生和发展，可以找到许多深刻而复杂的社会的原因、历史的原因、政治的原因。首先，林彪巧妙地利用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利用了毛泽东日益严重的骄傲情绪和个人专断作风。林彪在不同场合竭力表白自己对毛泽东的绝对信仰和绝对忠诚，他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鼓吹现代迷信，大搞造神运动。林彪说：“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思

想的顶峰。”提倡“背警句”、“活学活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进而提出“四个伟大^①”，鼓吹“三忠于^②”、“四无限^③”等口号，力图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一种唯有他真正忠于毛泽东的假象，捞取政治资本，欺世盗名。

其次是毛泽东的赏识。战争时期，林彪长期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工作，很得毛泽东器重。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林彪推行的一整套“突出政治”的作法，博得毛泽东的赞赏，多次受到表扬。林彪窥准毛泽东的弱点，阿谀奉迎，投其所好，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称赞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④、三八作风^⑤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还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实行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在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许多领导人因为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理解而产生日益深刻的矛盾之时，这些评语无疑进一步扩大了林彪的影响，提高了林彪的政治地位。

再次，中国长期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思想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根深蒂固，宗派主义、山头主义、门阀畛域观念仍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

① 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是林彪对毛泽东的谀词。

② 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③ 即“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

④ 即林彪1960年9月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提出的“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⑤ 即林彪1960年2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

用。林彪经常指责别人搞宗派、拉山头，其实不过为了削平别的山头，突出自己的大山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几个主要成员都与林彪长期共事，过从甚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黄永胜、吴法宪即在林彪手下任团长和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都在八路军 115 师工作过，分别任团长、团政治委员和科长。解放战争时期，林彪任第 4 野战军司令员，黄永胜任 4 野 14 兵团副司令员、13 兵团司令员，吴法宪任 4 野 39 军政治委员、14 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作鹏任 4 野 43 军军长，邱会作任 4 野 45 军政治委员。中国革命从分散的农村根据地发生，经过长期奋斗，最终夺取中心城市特殊环境和特殊道路，客观上决定了“山头”是不可避免的。林彪抓住这一点，竭力维护他的那个山头，排斥其他山头的人。

一、“四大金刚”

林彪以及林彪集团的许多成员，在历史上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真正形成一个反革命集团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初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受过不同程度的冲击，林彪利用其已经取得的权势和地位庇护他的老部下，黄、吴、李、邱则效忠林彪，在个人野心和宗派主义的基础上结成反革命的政治团伙。

“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之前，吴法宪、李作鹏就在林彪授意之下，编造诬陷罗瑞卿的材料。林彪则在他们表示死心塌地追随自己之后，任命吴法宪为空军司令员（原任空军政治委员），任命李作鹏为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原任海军副司令员），使他们分别掌握了空军和海军的领导权。1966 年 8 月，林彪提出以高举红旗、突出政治、有干劲作为衡量干部好坏的标准，同时作为军队机关“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内容，实质上是公开为他的追随者李

作鹏等人撑腰，封他们为好干部、“左派”。不仅如此，1967年1月，当邱会作被群众组织抓起来后，林彪和陈伯达联名签署手令，派叶群亲自到总后勤部把邱会作“救”了出来。邱会作感激涕零，跪在地上，表示效忠林彪，毫不动摇。1个多月后，叶群又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保邱会作，说他是全国解放以后4个后勤部长中“最好的一个”。1967年5月，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利用在北京的军事院校和文艺单位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借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演出之机，制造了“五·一三”武斗事件。林彪立即表示支持吴、李、邱等人，使他们成了所谓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此后，“五·一三事件”成为划分军队中“革命派”和“保守派”的重要标志。1970年5月13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联名写信给叶群，表示“永远牢记您对我们的教育深恩”，把三年前的“五·一三事件”称为“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是“砸烂总政阎王殿的斗争的序幕”。次日，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相约游览长城，互相题词赠诗，合影留念，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友谊”和欢悦。通过“五·一三事件”，林彪集团的几个主要成员心心相印，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林彪反革命集团逐渐形成了。

1967年8月9日，林彪利用接见武汉军区负责人的机会，作了一次重要的“八·九”讲话。林彪说：“乱有四种情况，……只有第三种情况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总后当权派中的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海军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也是被整。吴法宪同志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尝了甜头。”林彪为他的党羽们打气，“如果是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多就是邱会作、李、王、张、吴法宪那样，要顶住，要沉住气，……就是乱翻了天，也能够捋过来”。10月17日，中共中央将林彪的这个讲话批转各省市和各军区，吴法宪、

李作鹏、邱会作的腰杆子一下子硬了许多。同时，林彪利用其帮派成员组成军委看守小组、军委办事组，取代总政治部，插手军委日常工作，掌握了军委的大部分权力。1968年3月，黄永胜由广州军区调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之后，成为林彪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

林彪反革命集团直接掌握了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空军、海军的重要权力，搞垮了总政，架空了军委常委对军队工作的领导。凭借着这些既得权力，利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反革命集团为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再一次大搞阴谋活动。1969年1月底，林彪对其死党说，“你们这条线是信任的，另外一条线是不相信的”，“应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敌人”。“九大”期间，林彪、江青策划对一部分候选人投全票，对另一部分人投半票，或者不投票，使许多功勋卓著、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落选，林彪、江青帮派体系的人大量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第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45%，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许多成员进入中央领导机构。相反，原八届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当选。

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为政治局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林彪、陈伯达、康生占据了政治局常委5席中的3席，政治局21名委员中，林彪、江青一伙有12人。

同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共

中央军委和军委办事组名单。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委员 42 人^①。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军委办事组中占了大多数。

经过“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林彪集团权势极盛。但林彪不满足于“接班人”待以时日的地位，又担心羽翼已经丰满起来的江青集团的势力有超过自己的可能。毕竟，经过几年的经营，江青、张春桥等人由过去的默默无闻一变而为中国政治舞台上显赫的“明星”，他们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几乎左右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夺取权力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了各自的利益，双方可以在一定时期中互相配合和利用。同时正因为其一致，在权力的分配上双方各不相让，矛盾难以调合。林彪集团掌握的主要是“军权”，政治上远不如江青集团活跃，其影响还没有深入军队以外的其他领域。江青集团则正好相反，“文”的方面很有市场，能量颇大，“武”的方面却苦于基础太弱，形不成独立的力量。他们首先相互依靠，在依靠中相互成为对方可以借用的力量。当着可供分配的权力空间日趋缩小，双方的势力范围有了较多的重叠时，他们同时感到对方的威胁，感到过去的盟友可能成为最危险的敌人。林彪集团在不放弃以和平的方式谋取最高权力的同时，加紧建立以反革命武装政变为主要任务的另一套

^① 第九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42 人是：丁盛、王秉璋、王树声、王效禹、王辉球、韦国清、叶群、皮定均、刘丰、刘兴元、刘贤权、许世友、陈士榘、陈先瑞、陈锡联、李天佑、李作鹏、李雪峰、李德生、吴法宪、张达志、张池明、张国华、张春桥、邱会作、杨得志、杜平、肖劲光、郑维山、冼恒汉、袁升平、梁兴初、黄永胜、曾绍山、曾思玉、彭绍辉、韩先楚、粟裕、温玉成、谢富治、谭甫仁、潘复生。

组织。

二、林立果和他的“联合舰队”

林彪把黄、吴、李、邱“四大金刚”依为左膀右臂，利用他们参与“文化大革命”的权力角逐。但是，林彪不愿意轻易地把赌注全部押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上，对按部就班地获取最高权力，他没有充分的把握。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越来越明显，多次在公开场合对林彪提出批评。林彪预感到夺取权力的道路上充满了阴影，自己随时可能被毛泽东象对待刘少奇一样“废黜”，或者被江青集团取而代之。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结果就不仅仅是名单上排列次序的变化，很可能，这一天就标志着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标志着自己政治上甚至肉体上的被消灭。为了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林彪需要一支可供非正常情况下使用的特殊组织。这个组织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的首脑必须是林彪绝对信任，绝对放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林立果可谓最佳人选。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林立果才 21 岁，正在大学读书。1967 年 3 月，林立果被安排到空军党委办公室任秘书，4 个月后入了党。1969 年 2 月 16 日，林彪亲自给空军司令部内负责“帮助”林立果的周宇驰（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写信：“这两年老虎（林立果的小名）在你们帮助下能力上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林彪纡尊降贵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他提到的“单独行动”、“独立工作”也是意味深长的。1969 年 10 月，林彪授意吴法宪将林立果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后来还宣布，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

切。1970年7月31日，空军召开干部会议，林立果作了整整一天的“讲用报告”，吴法宪等人趁机吹捧林立果“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宣扬林立果是“天才”、“全才”、“奇才”、“帅才”，是“第三代接班人”。于是，只有20多岁的林立果既有高贵的“血统”，又有“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的权力，更增添了一笔丰厚的政治资本，为他从事反革命阴谋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965年5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逝世，林彪任命从来没有搞过军事的吴法宪接任空军司令员一职。通过吴法宪，林彪在空军网罗亲信，培植起自己的势力。1965年秋，叶群带着女儿以及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空军的“四清”工作队，到江苏太仓搞四清。吴法宪亲自率领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军党委办公室副处长）等跟随叶群到太仓，帮助叶群制造了一个没有文化，靠画图画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并以空军党委文件的形式吹捧叶群的“讲话”，为叶群捞政治资本。以后，吴法宪多次为林彪、叶群完成各种各样微妙的“特殊使命”，通过这些活动，林彪在空军的班底逐渐扩大。

林立果到空军以后，这些人便聚集到他的周围，形成一个极其特殊的小圈子。为了行动方便，经吴法宪批准，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组成了一个所谓的“调研小组”。“调研小组”名义上为空军党委出点子，提建议，实际上是搜集情报，进行秘密联系等阴谋活动的工具。1970年5月2日，林彪在住所接见了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的几个亲信和他们的家属，藉此联络感情，进一步巩固林立果的地位，把本来松散的、不那么严密的小圈子，组织成一个比较固定的以林立果为“头”的“战斗集体”。这次接见的第二天晚上，王飞、周宇驰等人召集会议，向林彪表忠心，周宇驰说：“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

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哪个人能够和他比得上。他对我们的关心爱护也是没人能比得上的。”

1970年秋，林立果把由“调研小组”发展起来的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①，并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分舰队”，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等处设立了秘密据点。“联合舰队”及其“分舰队”以林立果为“头”和“核心”^②，一方面培养忠于林彪、忠于林彪一家的感情，一方面收集情报，训练骨干，私藏武器装备，制订秘密行动计划，进行武装政变的准备。

“联合舰队”以秘密活动为主要特征，以武装政变为基本目的。它的成员职务不高，目标不大，不象黄、吴、李、邱那样频繁地活动于政治舞台。如果我们把林立果的这支舰队称作“小舰队”，那么，可以把黄、吴、李、邱等人称作“大舰队”，大有大的威势，小有小的狠辣。一大一小，林彪掌握了两套人马，能够运用两种方法参加权力角逐，他的信心似乎更足了。

“武装政变”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相当陌生的政治词汇，数千万中国共产党员自上面下形成的强而有力的统治秩序，应该杜绝一切违背党的意志的活动。然而，最不可能的事情毕竟发生了。林彪集团正是利用人们的盲目崇拜和毫无警惕，不仅建立起“联合舰队”这样的阴谋组织，而且着手实施了武装政变计划。

当然，如果形势按照林彪最乐观的估计顺利发展，林彪可以

① 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和《啊，海军》之后，非常崇拜电影中的“联合舰队”和所谓“江田岛精神”，幻想建立一个类似的组织。

② 林立果在上海建立的秘密组织“上海小组”《入组须知》中规定：每个成员必须做到，“坚决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命令，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

自然而然地从毛泽东手中继承最高领导权，林立果和他那个“联合舰队”的真面目也许永远不会为人所知。只是由于林彪的阴谋败露得太快，黄、吴、李、邱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上溃不成军，林彪才不得不启用林立果的“小舰队”进行最后的挣扎，演出了一场灭亡前的闹剧。

“联合舰队”的出现，反映了林彪一方面寄希望于正常接班，一方面对政治前途失去信心；一方面韬光养晦，给人以假象，一方面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的矛盾心理。

第二节 九届二中全会与“批陈整风”

1970年8月23日到9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庐山召开。会议原定的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审定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战备问题。8月23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会议上抢先发言，以歌颂毛泽东为名，大讲“天才”问题，再一次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①。林彪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几十年前写的东西，我们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的水平高。”“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其实，关于“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喧嚣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始之前已经开始了。8月13日，吴法宪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若有所指地声称，“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

^①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拥护毛泽东的建议。4月11日，林彪提出仍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12日，毛泽东就此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思想”，林彪立即夸奖吴法宪“放炮放得好”。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布置他们准备关于“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在14日晚政治局讨论宪法草案时支持吴法宪。8月21日，叶群邀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游庐山仙人洞，对他们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8月22日，林彪、陈伯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一次提出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第二天，陈伯达竟然组织人拟写了关于国家主席产生和国家主席职权的宪法条文稿。

林彪发言的当晚，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全会学习林彪的讲话。次日，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分别在全会的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同时发言，鼓吹“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林彪给叶群定了发言口径，叫叶讲“天才、领袖、指针”、“天才从理论角度讲，领袖从历史角度讲，指针从现实角度讲”。叶群在发言中表示：关于“天才”的观点，“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说，“我们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当晚，林彪把他的发言稿送给陈伯达，陈伯达做了多处修改，使林彪讲话中许多露骨的言论变得隐晦了，例如，“个人的这种天赋”被改为“天才”，“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被删去，“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一句中，“最高”被陈伯达改为“上层一些同志”。几天后的8月29日晚，陈伯达打电话提醒林彪，讲话中“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我记不清楚了，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林彪电话答复：“谢谢伯达同志的关心。”

林彪、陈伯达、吴、叶、李、邱的讲话，概括起来有五个方

面的内容：一是指责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二是说有人反对提毛泽东是天才，要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三是把新宪法说成他们长期斗争的结果；四是宣扬有人利用毛泽东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五是散布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刊登陈伯达发言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全会第六号简报）^①搅乱了会议，许多中央委员上当受骗。

当然，宣扬“天才论”和坚持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并不是林彪的目的。正如叶群所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林彪正是吃透了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把自己置于摆脱一般琐碎事务的超然地位的心理，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如果这一主张通过，那么，适宜任国家主席的人选，除了林彪，别无第二人。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等人一切活动的核心是坚持设国家主席，林彪急于利用即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在权力的阶梯上再迈进一步，当上国家主席，抢班夺权。至于“天才论”的观点，无非是林彪一伙巧妙地借助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心理，用以对付政敌的理论武器。林彪非常清楚，他的对手，既有中共中央内不赞成不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许多老干部，又有江青、张春桥一伙“新贵”。借颂扬毛泽东的“天才”，既可以抓住人们不敢对毛泽东有所不恭，只好自缄其口的弱点，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又可以表现出维护毛泽

^① 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中有如下一段话：大家听了伯达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东威望的“坚定”和“热烈”，博得他人的好感。

毛泽东及时察觉了林彪的阴谋。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刊有陈伯达发言的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提醒人们“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这时，林彪竭力为他的几员大将开脱，他说，“我和陈伯达过去没有接触”，“军队的几个同志过去同陈伯达也没共过事”，“他们是炮筒子，说话走火”。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或者销毁早已准备好的讲话稿，或者坚持从中央会议记录中剪掉他们的发言记录，或者作假检讨，企图掩盖他们的活动。与此同时，他们复制讲话录音，抄存发言记录和第六号简报，互相安抚、鼓气，准备新的进攻。叶群让吴法宪等人不要紧张，检讨时“只讲自己，互不涉及”，不要牵扯林彪、黄永胜，“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9月7日，林彪与黄、吴、李、邱在九江机场合影留念，再一次表现了他们之间的“团结”。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转发了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并附了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指出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号召全党检举和揭发陈伯达，同时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防止上当受骗。以后，中共中央公布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12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军区所属第38军的一个报告^①上批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党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要求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华北会议，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1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②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12月22日，华北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军区所属师以上单位的负责干部449人。1971年1月9日起，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的143人参加了华北会议。1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华北会议上讲话，系统地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指出陈伯达不仅历史上存在严重问题，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搞独立王国，反党乱军，阴谋夺权。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改组了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治委员，纪登奎为第二政治委员。会后，全军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毛泽东希望教育挽救林彪等人，多次发出警告。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批评吴法宪：“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

① 38军的报告揭发陈伯达千方百计突出自己，反对毛泽东，对抗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在处理保定问题时，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

② 毛泽东认为某些军队干部因为历史上有“战功”，“文化大革命”中立了“新功”而吃老本，背上了“包袱”。

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第二天，毛泽东又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批评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当叶群虚伪地说她犯了“路线性”错误时，毛泽东批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当叶群说到搞天才语录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毛泽东驳斥叶群与陈伯达“斗争不够有力”的说法：“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毛泽东说：“……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1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批评了“四个伟大”的提法，间接地批评了林彪。1971年2月，毛泽东批评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批评军委办事组“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

鉴于林彪集团的飞扬跋扈和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毛泽东提出：“军队要谨慎”。1971年1月5日，济南军区政治部向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作出《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8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济南军区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人民解放军开展了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运动侧重于学习济南军区报告的“三破三立”^①，放下“战功”与“新功”两个

^① 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

包袱，反对居功自恃，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以及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一运动，借助全党和全军的力量，重新确立党的纪律的权威，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同时，使庐山会议所表现出来的宗派活动、非组织活动有所收敛。

1971年4月，中共中央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对黄永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①。

然而，在林彪支持下，黄、吴、叶、李、邱继续捂盖子，拒不批陈，也不作检讨，把庐山会议表现出来的重大原则立场问题以及军委办事组成立三年以来的错误仅仅解释为“抓日常工作多”，“思想水平不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对毛泽东强调进行路线教育“没有真正理解”，作风上“蹲机关多、下部队少”，“工作中忙忙碌碌，陷于事务”。利用军委座谈会的简报，他们继续吹嘘自己对毛泽东“跟得最紧”，“突出政治，狠抓根本”，“谦虚谨慎”，“办事认真”。在他们所把持的部门，他们拒不传达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

1971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4月2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总结讲话，指出黄、吴、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希望他们按照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批陈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不可能脱离“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以及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路线，不可能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引向正确的轨道，它在坚持正确主张的前提下，也带来

^① 毛泽东把《我的一点意见》和在38军、济南军区报告以及叶群、吴法宪书面检讨等文件上的批示称作“甩石头”；把改组北京军区称作“挖墙角”；把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称作“掺沙子”。

一些消极的后果。但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分裂活动以及政治上、理论上的错误进行了一些揭发和批判，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使林彪反革命集团受到进一步的打击，并使相当多的人对已经开始的斗争有所警惕。

发生在庐山会议前后的这场斗争，是林彪利用陈伯达和黄、吴、李、邱夺取最高权力的一次尝试，也是林彪公然站在与中共中央、毛泽东对立的立场上，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猖狂进攻。毛泽东形容林彪一伙“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是一次政治冒险。林彪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道路，要么功成名就，既击败政敌，又赢得权力，要么彻底失败，为毛泽东所唾弃。

这场斗争，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失败而告结束。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以及会议结束之后，尽管林彪一伙竭力掩饰他们与陈伯达的关系，但他们在会议上的表演已经充分说明他们与陈伯达的一致。林彪自觉已经暴露了企图，于是改变斗争策略，转而倚重林立果的“小舰队”，加快实施武装政变的计划。

第三节 “九·一三事件”

庐山会议上的失败，使林彪认定“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批陈整风”的深入，又进一步刺激了林彪，促使其加快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部署。如果不是毛泽东、周恩来对林彪的活动有所察觉，并且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使这一阴谋未能得逞，林彪将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他在1966年5月18日讲话中口口声声要人们警惕的反革命政变。谁也无法预言，假使那一天成为现实，中国历史的车轮将滑向哪一方。但有一点可以肯

定，即使历史依然发展到今天，也难免绕一个大大的圈子。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幕酝酿已久的悲剧刚刚开演就草草收场，留给中国人民的是长久的震颠。

一、“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

说到“九·一三事件”，有必要前溯至1969年10月17日。这一天，对林彪集团来说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上面已经提及的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另一件是林彪擅自发布了所谓“第一个号令”。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中共中央、毛泽东，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向11个大军区，海、空军，北京卫戍区发布“紧急指示”，调动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示”根据美苏两国的一些活动，要求全军必须提高警惕。要求各军区，特别是地处“三北”的军区立即疏散重型装备；沿海各军区也要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指示”还要求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10月18日，这个“指示”由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正式下达。同日下午下达的还有林彪给第二炮兵的“指示”（第二个号令），给总参二部、三部的“指示”（第三个号令）和给各总部、各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的“指示”（第四个号令）。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采取“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泽东报告，企图以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同意。毛泽东看后指示：烧掉。为了掩饰这次行动的企图，林彪、黄永胜一方面篡改毛泽东的“批示”，声称毛泽东说的是“很好，烧掉”，一方面扣发和删改某些军区关于执行这个“号令”的报告，对毛泽东封锁消息。

根据林彪的“号令”，海军、空军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地

区的部队和重型装备、物资，都进行了紧急疏散。全军共疏散 95 个师，94 万余人，4100 余架飞机和 600 余艘舰艇。1969 年 10 月至 1970 年 9 月的一年中，人民解放军经铁路运输人员和物资达 60 万车，比上一年增加 34%，比抗美援朝时期运量最大的 1951 年多 17 万车。运输团以上部队有 8 个整军、48 个整师另 179 个团，新老兵 157 万人。经水路运输的人员有 20 万名，物资 55 万吨，物资运输比上一年增加 46%。经全军后勤汽车部队运输的物资约 3000 万吨。这一时期运输的特点是：运量大，人员多，时限紧，要求高。特别是 1969 年 10 月以后的三四个月，大批部队调动，新兵补充和老兵复员以及战备物资疏散等运输交织在一起，最紧张时，仅铁路运输一项，一天内在途中运行的人员列车就有 270 多个。

“紧急指示”的发布，既反映了 1969 年 3 月以后中苏边境的紧张对峙，又成为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林彪藉此检验其命令在全军是否起作用，同时把许多老干部“疏散”到外地，远离了领导岗位。朱德到广州，刘伯承到武汉，陈毅到石家庄，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开封，叶剑英到长沙。彭德怀在押，贺龙、罗荣桓已去世。军队的 10 名元帅中，只有林彪一人在京。林彪以阴谋手段排斥了除他以外的绝大多数军委领导人。

这次预演前的 9 月 30 日夜，林彪突然“视察”北京西郊机场，命令该机场的飞机当晚全部转移出去，用砖头把跑道堵起来并配备足够的武器，搞了一次较小规模的演习。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指示”，当夜命令“所有空军部队进入一等战备；所有指挥所进入一等战备；所有指挥员坚守指挥岗位，不准离开”。9 月 30 日至 10 月 3 日，空军所有部队、学校、机关和民航进入一等战备，共有 1683 架飞机在机场担负战斗值班，3900 多架飞机进入洞库或野外疏散，“三北”地区的机场都用机械和车辆设置了防“机

降”的障碍。吴法宪以空军党委的名义向林彪报告，称“这一战备行动是空军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

必须承认，人民解放军贯彻“紧急指示”的行动是积极的，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战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习惯于用打仗的观点检验一切工作的价值和必要性。通过“号令”造成的巨大反响，使林彪看到了他发动武装政变的“力量”和“条件”，他的信心似乎更足了。

二. 《“571”工程纪要》

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不久，林立果同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进行了一次密谈。林立果亲笔写下了这次密谈的要点（文中“歼7”是江腾蛟的代号，“W”是王维国的代号，“C”是陈励耘的代号）：

“与歼7、W、C讲

“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

“双方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

“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行。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这个谈话要点，反映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对庐山会议这场斗争的估量，同时透露出，以林立果为头子的“联合舰队”将要走上第一线，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进行阴谋活动的主力。

1971年2月下旬，林立果从苏州到上海，又从上海到杭州，找他们的同伙研究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3月18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回到上海。当晚，林立果交代于新野和已在上海的李伟信（空4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说：根据目前形势，

要设想一个计划，并要周宇驰立即从北京赶来商量。3月20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开会，称：“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3月22日至24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林立果按“武装起义”一词的谐音，将这个政变纲领的代号定为《“571工程”纪要》。

《“571工程”纪要》共分9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纪要》认为，“9·2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并且，毛泽东“对我们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以便“夺取全国政权”，或者造成“割据局面”。《纪要》认为，“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和国外同类组织相比，“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因此，“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关于政变时机，《纪要》认为，一种是“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一种是“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纪要》确定了多种战术上的时机和手段，如“B—52（指毛泽东）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中共中央领导人）均在我手心之中”；“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造成既成事实，“迫B—52就范”；“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一种武器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纪要》提出在策略上要“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借苏力量箝制

国内外各种力量”。《纪要》还认为，“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因此，“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从这里不难看出，林彪苦心经营空军，把他的儿子、女儿都送到空军的真正意图。《纪要》详细规定了实施政变计划的三个阶段（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巩固阵地，扩大战果阶段）以及指挥班子、使用力量、物质准备、情报保障，规定了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行动方针。《纪要》强调，“此工程属特级绝密”，要求其成员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①，不成功便成仁^②”。

为了实施《“571工程”纪要》，1971年3月底，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开了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③，落实《纪要》中“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一条。会上，他们分析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形势”，决定“加速我们的准备”，确定上海以王维国为“头”，南京以周建平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197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立果“小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开会讨论中央会议的形势，认为中共中央摆出了“算旧账姿态”，江青集团在上海咄咄逼人，“除攻打军委办事组外，把王维国、陈励耘点名了”。因此，“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工程”纪要》。

按照《“571工程”纪要》，林彪、林立果一伙从多方面进行了

① 江田岛是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这个学校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训练学生，所谓“江田岛”精神，就是法西斯武士道精神。

② 蒋介石对其部属进行法西斯教育的训词。

③ 所谓“三国”，是指上海、南京、杭州；所谓“四方”，是指王维国、周建平、陈励耘和江腾蛟。

政变的准备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建立政变的组织和据点，制造政变舆论，拉拢一些部门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建立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专案”材料，秘密组织武装力量和特务组织，收集航行资料，建立情报网和通信网等等。

应该承认，林彪反革命集团贯彻《“571工程”纪要》的效率是相当高的，从《“571工程”纪要》3月底炮制完成，到9月份林彪出逃，不到半年的时间中，《纪要》的许多设想已经付诸实现，林彪反革命集团基本具备了实行政变的多种手段。并且，《纪要》利用大多数群众的不满情绪，提出许多蛊惑人心的口号，如：“军队受压”、“农民缺吃少穿”、“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同时又提出，“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用民富国强代替他（指毛泽东）‘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这些口号的煽动力是很强的，它把林彪反革命集团参与制造的一切灾难统统推诿于他人，把自己打扮成代表群众意愿，能够消灭所有落后、贫穷、愚昧和黑暗的“救星”，似乎真的“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蓬勃”，象征着中国的未来和全部希望。

《“571工程”纪要》终于未能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林彪一伙的阴谋得逞。他们不是没有看到这些问题，《“571工程”纪要》承认，“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毛泽东在群众中具有极高的威望，军队“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毛泽东的戒备“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但是，《纪要》还是推动着林彪的全部政变机器运转起来，或者因为林彪一伙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或者因为野心和权势引诱得他们不顾一切地铤而走险。

三. 毛泽东的南巡

正在林彪一伙加紧政变的准备之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离开北京，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相当神秘的巡视。

1971年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干部先后进行了5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说他们的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①，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斗争的起因在于“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毛泽东点名批评林彪，“林彪同志那个讲话^②，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象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毛泽东认为，“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但是，“庐山这一次斗争，同前几次^③不同。前几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这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最后摒弃林彪，他表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是要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不过，毛泽东也考虑，“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关于庐山会议以后的问题，毛泽东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

① 指瞒着毛泽东、周恩来、康生。

② 指林彪1970年8月23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③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十次大的路线斗争，前九次的代表人物分别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刘少奇，第十次是林彪。

是不会开口的”，因此，“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毛泽东似乎对林彪一伙武装夺权的活动略有所闻，他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毛泽东不指名地点了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同时再次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毛泽东这些谈话，是对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严厉警告，是对党内军内高级干部进行的思想、组织、纪律教育，对防止某些人盲目追随林彪，起了重要作用。被排斥在接见之外的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由于不明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十分焦急，他们想方设法了解毛泽东的动向和言行，研究对策。8月26日，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召开会议，把当时的形势估计为可能“由明争转入暗斗”，暂时出现“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等几种情况，不过，“‘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必须在“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

毛泽东在武汉停留了10天。8月27日至9月2日，毛泽东在长沙、南昌分别接见了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同他们进行了谈话。毛泽东在长沙曾当着许多人的面责问广州军区负责人：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

9月3日，毛泽东由南昌到达杭州，接见了当地有关人员。毛泽东对前来看望的滕励耘表示非常反感，质问他同吴法宪的关

系，让他回答同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都干了些什么。

9月5日夜，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通过周宇驰将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秘密报告叶群和林立果，随后又整理出文字稿，让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以治病为名，乘飞机送到北京。9月6日凌晨，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将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报告了陪外宾到武汉的李作鹏，李作鹏立即回北京，转报黄永胜、邱会作。当晚，黄永胜电话报告了正在北戴河的叶群。

林彪、叶群接到广州、武汉两个地区的情报后，认为毛泽东此次南巡非同小可。庐山会议后，批判的矛头名义上对着陈伯达，但黄、吴、叶、李、邱陷在里面，检讨来检讨去，总是下不了台，成了实际上的斗争对象。林彪脱不了干系，弄得也很被动。毛泽东此次南巡，把庐山会议的斗争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不仅点名批评了黄、吴、李、邱，而且追到了林彪头上，连叶群、林立果也被点名或者不点名地牵连了进去。尽管毛泽东表示还要保林彪，但林彪不能肯定这种状况还能维持多久，何况，林彪无论如何不肯居于这种被“保”的地位，他追求的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绝对权力。考虑到这些，林彪觉得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了。

四、“九·一三事件”

“文化大革命”造就了许许多多的“事件”，这一“事件”，那一“事件”，每一“事件”都代表了一场灾难或者一次动荡。但是，所有这些“事件”甚至所有这些“事件”之和都无法与发生在1971年9月的“九·一三事件”相提并论。虽然“事件”的发生有它的必然性，但在“事件”发生之前，任何人包括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在内，都不可能预言“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及其结局。因此，耸人听闻、触目惊心只能是“事件”发生后人们最初的心理状

态，这时的人们无暇探索“事件”发生的深刻原因，无暇了解林彪反革命集团形成、发展直至消亡的全过程，他们还要在震惊中徘徊许久。

1971年9月7日，被毛泽东的南巡搞得焦躁不安的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决心杀害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9月8日，林彪用红铅笔写下了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当晚，林立果、周宇驰等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在北京西郊机场向江腾蛟出示了林彪的手令，林立果对江腾蛟说：“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地区动手（指谋害毛泽东）。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第一线指挥员。北京由王飞负责指挥攻打钓鱼台。你到上海去，办法有三条：一、用火焰喷射器、40火箭筒打火车；二、调几门100高射炮打火车，并要空4军教导队以抢救主席为名往上冲；三、实在不行，就要王维国乘主席接见时动手。”“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江腾蛟、周宇驰还提出，仿照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把机场的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同日晚，林立果在空军学院向王飞、刘沛丰、刘世英、李伟信等人出示了林彪的手令，林立果说，现在情况紧张，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火药味已经很浓了，要坚决把反对林副主席的人除掉，机不可失，一定抢在他们动手之前。王飞等人表示：林副主席叫干就一定干。这一天，于新野在杭州同陈励耘密商了用伊尔—10强击机谋害毛泽东的计划。改装后的伊尔—10飞机可以超低空飞行，具有较强的攻击力。

9月10日，刘沛丰将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从北戴河带回北京，次日，林立果把这封信交给王飞，要王飞必要时给黄永胜送去，充当林立果、黄永胜之间的联系人。林彪的信中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

飞同志面洽。”林彪要黄永胜的“大舰队”和林立果的“小舰队”沟通联系，共同实施武装政变计划。

9月11日，林立果和江腾蛟找到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给他看了林彪的手令，让他参与谋害毛泽东。林立果说：“现在情况很紧张……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江腾蛟你这个歼7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伊尔—10轰炸。”鲁珉不敢南下，第二天借口眼睛有病，住进了医院。

与此同时，在北戴河的叶群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频繁联系，仅9月6日到12日通过军委总机接转的电话就有51次，其中叶群与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通话31次948分钟，最长的一次竟打了135分钟。

不过，事情并没有按照林彪预想的进程发展。9月8日，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命令停在笕桥机场附近的专列立即转移。10日又突然决定离开杭州去上海，在上海仅仅停了一天，毛泽东迅速北上，沿途再不停留。12日下午，毛泽东回到北京。由于毛泽东及时改变行动路线，林立果暗害毛泽东的计划全部落空。

9月11日夜，得悉毛泽东离开上海返京消息的林彪、叶群不得不放弃谋杀计划，转而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12日，王飞、于新野召集刘世英、鲁珉、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朱铁铮（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郑兴和（空军司令部处长）共同拟定了随从林彪和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12日晚，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林彪、叶群等人的异常举动，周恩来立即追查林彪私调到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三叉戟飞机的情况，要该机马上返京。为了掩盖南逃企图，叶群故意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林彪想“动一动”，并谎

称没有飞机。周恩来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命令山海关机场和李作鹏：必须有周恩来以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联名指示，256号飞机才能起飞。

林彪、叶群眼见阴谋败露，于13日凌晨乘飞机强行外逃。飞机没有打开滑行灯，也未关上机舱门，连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也没带，就仓促起动。滑行时，机翼撞坏了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撞碎了机翼上的航行灯罩。

得悉这一情况，周恩来立即下达全国禁航命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13日凌晨3时，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接到林立果的电话通知后，以执行紧急任务为借口，带着大量机密文件和外币在北京沙河机场乘3685号直-5型直升飞机企图飞往乌兰巴托。直升飞机驾驶员、飞行中队长陈修文发现周宇驰等人的叛逃阴谋后，机智地向地面发出信号，并将飞机飞回北京，降落在怀柔县境内。陈修文赤手空拳与周宇驰搏斗，被周宇驰开枪打死。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商定一起自杀，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毙，李伟信放了空枪，与另一名飞行员陈士印被俘。

林彪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于9月13日凌晨2时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以及飞机驾驶员潘景寅、林彪的汽车司机杨振纲、机组人员李平、邵起良、张延奎全部摔死。根据事后分析，由于机上没有领航员，也没有地面导航，又是夜间飞行，且燃料将尽，驾驶员企图选择平坦场地迫降。但飞机以较大速度尾部先着地，又因地形起伏，造成跳跃，机翼折断，机身解体，油箱破裂，形成大面积燃烧。当时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许文益曾赴现场处理善后事宜，他回忆说：“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躯干都完整，大多是皮肉挫裂，骨骼折

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系飞机坠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中国共产党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第四节 “批林整风”

林彪出逃后，中共中央迅速采取紧急措施，逮捕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隔离审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9月18日，中共中央向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以及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通报了林彪叛逃事件。中共中央的《通知》指出：“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通知》要求，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控制传达范围，注意严格保密。9月28日，传达范围扩大到地、师以上党委。9月29日，中共中央宣布：“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担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等10人组成的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日，中共中央成立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等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10月6

日，中共中央通报了林彪企图谋害毛泽东和另立中央两项阴谋，同时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正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和空军的空地勤人员。从9月26日到10月15日，由李富春主持，中共中央召集部分老同志开了9次座谈会，揭发批判林彪。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出席。同时，朱德、刘伯承分别写信或谈话，表示对林彪叛党活动的强烈愤慨，揭发林彪历史上的问题。10月24日，中共中央将林彪叛逃事件向全国公布，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署，有步骤地开展了“批林整风”。

对林彪的批判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林彪勾结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组成以林彪为头子的反革命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突然袭击，‘抢班夺权’；炮制《“571工程”纪要》，秘密进行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阴谋杀害毛泽东，另立中央。中共中央专案组先后整理编印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材料之一》主要介绍林彪、陈伯达等人在庐山会议前后的活动和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材料之二》主要披露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制订经过和林彪集团根据这个纲领进行的准备活动。《材料之三》是中共中央专案组选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

2.林彪在领导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培植亲信，打击陷害干部，先后提出“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等口号，进行乱军篡军活动，严重地破坏了人民解放军的建设。

3.在历史上，林彪曾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追随“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向党闹独立性，对抗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

署。林彪并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最好学生”。朱德、陈毅、聂荣臻等9位老干部写出书面意见，对林彪进行揭发。以后，中共中央转发了军事科学院编写的《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之一、之二和《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等材料。

197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5月21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会议上讲话，要求在前一阶段“批陈整风”的基础上把批判的主要矛头转向林彪。会议特别印发毛泽东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作为会议文件之五。毛泽东在信中对林彪1966年5月18日的讲话表示了忧虑，他说：“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但是，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了不给刚刚发动起来的群众“泼冷水”，毛泽东终于同意转发林彪的讲话，“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毛泽东还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毛泽东这封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对运动和对林彪的看法，反映了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矛盾。

1972年7月17日，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进行批林整风，揭批了林彪及其在海军的死党李作鹏等人的罪行，同时批判

了其他人的错误。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海军“四五”会议的总结报告^①。以后，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后勤部党委以及各兵种、各大军区党委先后召开类似的会议，揭发、批判了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林彪集团骨干分子的反革命罪行。

林彪事件的公开化，摧毁了一个偶像，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声誉鹊起的“副统帅”、“接班人”、“亲密战友”，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领。人们不得不努力改变自己的观念。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发和批判使人们开始认清林彪等人的面目，同时阐释了“文化大革命”的某些现象和某些错误。

然而，对林彪的批判仍然袭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这种批判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也不能揭示林彪反革命集团形成和发展的本质原因。批判偏重于就事论事，把很多不属于林彪的或者不应当批判的东西一起批判了，这就难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那一时期军队工作的无所适从和混乱。另一方面，江青集团对“批林整风”进行干扰破坏，坚持批林彪的所谓“极右”，反对批判“极左”思潮^②，并由“批林”转而“批孔”，直至“批周（指周恩来）”，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运动的正确方向，以至于为江青等人

① “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推翻这个总结，指责会议“颠倒主次”、“否定文化大革命”，扭转会议方向，使会议后期主要批判海军司令员肖劲光。1973年2月20日，会议历时7个多月才告结束。

② 1972年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外事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一些单位和地方还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和肃清，中央的方针政策在一些环节上还没有得到认真贯彻落实。”30日，周恩来表示同意这一报告。12月1日，张春桥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2日，江青更提出：“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判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在中共中央内部结成“四人帮”提供了某种条件。毛泽东没有由林彪事件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而结束这场灾难，反而使江青集团继续在党和国家事务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和严峻的考验。

与揭发和批判同时进行的清查工作主要在空军、海军、总后勤部等有关单位进行。这一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基本上查清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以及与他们的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职务。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区别情况，分别处理。

“九·一三事件”震醒了许多人，林彪的自我暴露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提供了条件。1971年11月，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为“二月逆流”平反，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给予“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以巨大支持。6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批判了林彪等所谓的“左派”，他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8月1日，国防部举行庆祝建军45周年招待会，一批遭受长时间批斗、羁押的人民解放军将领出席。1973年3月，中共中央恢复了邓小平的

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1月，罗瑞卿被解放。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的建议，毛泽东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待十届二中全会召开时追认，“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毛泽东亲自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强调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12月21日，在接见军委会议成员时，毛泽东再次称朱德是“红司令”，承认“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毛泽东表示，“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1974年9月，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恢复名誉。这些措施使一大批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的军队领导人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人民解放军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第五章 升起的希望

“九·一三事件”之后，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主持军委办公会议，领导人民解放军肃清林彪集团的影响，度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1971年10月4日，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军委各直属单位、各军（兵）种和各院校传达中共中央57号文件（即关于林彪叛国事件的通知）的情况和军委下一步工作的打算。叶剑英在信中表示：“我这个人脑子空，水平低，能力弱，有时也产生‘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的自卑感，这不对，当努力克服，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叶剑英请求同志们经常提示工作意见，他认为，如“能虚心地经常地请教各同志”，“能够得到主席指示”，“能够得到总理和各同志的指示”，“工作上的错误可能比较少些”。当天，毛泽东召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谈话，要求“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

1972年后，叶剑英除参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外，还同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们一起调查了三总部、军事院校、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北京卫戍区以及国防工办、6个国防工业部、全国人防领导小组等单位的情况，重点研究领导班子建设、军事训练、战备工作、军工生产、军事学术和战略方针、部队作战部署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调查中，叶剑英强调军队各级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可靠人手中，必须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大力整顿军队，加强战备，恢复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他强调把军事训练作为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来抓，倡导办教导队轮训

干部和开展打坦克训练，组织掀起了 1972 年的练兵热潮。他提出，“体制要看连队，觉悟要看连队，士气要看连队，装备要看连队，编制要看连队”，要求深入地集中地研究连队状况。他主张在统筹全局，兼顾军队和地方的前提下，搞好军工生产。他提醒人们密切注视世界局势的发展，要求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组织力量，深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的发展和美、苏两国的战略动向。这些工作为 1975 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了必要的准备。

第一节 1975 年军委扩大会议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之后，毛泽东批示：“要开好一次军委扩大会议。”“军委扩大会议三月份召开，问题不要多，解决一、两个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72 年 1 月 11 日，叶剑英召集在北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和北京卫戍区领导干部开了座谈会，征求对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意见。12 日，参加会议的人员分别电话征求了所在单位对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意见，并报军委办公会议。各总部、海军、空军和各兵种也分别报送了各自单位对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意见。“意见”涉及的问题很多，如战略思想、任务区分、作战指挥、兵力部署、训练方针、训练内容、民兵建设、编制体制、装备计划、军工生产、政治思想工作、后勤供应体制、“三支两军”等等。有些单位提出，会议应就主要问题形成决议，以便有所遵循。1 月 29 日，叶剑英在军委办公会议上提出将各单位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研究、分析，综合成为一、两个问题，以符合毛泽东的要求。

徐向前、聂荣臻支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徐向前认为，会议

应着重解决路线问题，肃清林彪在军队工作中的流毒和影响；很好地研究战略方针问题，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和军队的具体情况，研究如何打仗，并以此推动其他工作的开展。徐向前强调，军队训练问题要引起重视，“军队要有政治，但不能搞空头政治”，“平时不抓紧训练，战时军队怎样完成打仗任务”。聂荣臻赞同通过抓路线问题，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人民战争思想的主张，聂荣臻说，“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整顿军队的主要内容之一”，“军事训练要大大加强”，“为了适应将来作战的需要，部队的现行装备要进行不断改进和更新”。

为了开好军委扩大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组织人员广泛调查了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等大单位的情况。调查说明，军队的状况颇堪忧虑，与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期待人民解放军担负的任务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1.政治思想方面，林彪反革命集团否定了人民解放军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一系列建军方针、原则，造成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混乱；同时，推行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的学习方法，理论脱离实际。军队中党的领导被削弱，派性严重，纪律涣散。

2.教育训练方面，军事与政治的关系长时间揪扯不清，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大量挤占军事训练时间，训练制度废弛，教材散失，训练水平低，人员素质连年大幅度下降。遇有意外情况，难以保证有足够的部队拉得出去。

3.编制装备方面，人员比例不合理，编制不精干，作战部队数量少，人员缺编多，机关和保障单位机构庞杂、臃肿，头重脚轻。武器装备陈旧，性能落后，不配套，数量少，质量差，且失修严重。

鉴于这种状况，召开一次扩大的军委会议很有必要，中共中

央军委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召开类似的会议研究军队建设问题了。

但是，毛泽东又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出现及覆亡，给中国的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模式提出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真正接受这一事件带来的教训，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还需待以时日。虽然，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积累下不少急需解决的严重问题，然而解决这些问题，又必须具备充分的政治上的、思想上的和组织上的条件。因此，在听取了会议准备情况的报告后，毛泽东提出，现在不忙开，现在要搞上层建筑。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虽然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对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作出组织处理，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总结发生这一系列灾难的经验教训。并且，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分子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1974年初，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国鼓噪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加剧了本来已经十分严重的混乱。这些事件推迟了拟议中的军委扩大会议，同时使召开这次会议更加必要。

1973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提出组成新军委的63人名单。原军委成员保留28人：毛泽东、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丁盛、王树声、韦国清、皮定钧、刘兴元、刘贤权、许世友、陈士榘、陈先瑞、陈锡联、李德生、张达志、张池明、张春桥、杨得志、杜平、肖劲光、冼恒汉、曾绍山、曾思玉、彭绍辉、韩先楚、粟裕。增补35人：王洪文、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张才干、张宗逊、詹海英、苏振华、孔照年、马宁、傅传作、张廷发、毛远新、孙玉国、迟浩田、白如冰、杨育才、胡修道、李志民、王昭、孔石泉、王必成、周兴、张贵武、秦基伟、张英才、王六生、陈代富、郝忠云、杨勇、赛福

鼎、高焕昌、陶鲁笏、肖克、宋时轮。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和叶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毛泽东提出，“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毛泽东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13日至21日，毛泽东连续同中央政治局有关人员和各大军区领导干部谈话，毛泽东说，军委“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领导干部“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大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毛泽东称赞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12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8个军区的司令员相互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命令要求各司令员10日内到职视事。

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紧接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随后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名次在其他副总理之前），任命叶剑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1975年1月25日，刚刚就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在总参谋部

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表明了自己对军队现状的深切忧虑，他说：“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这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会削弱。”“再一个问题就是军队的纪律很差。”“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提出了即将开始的整顿军队的基本任务。

1975年1月26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说，鉴于1971年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情况有变化，为了加强对军队和战备工作的具体领导，建设将西沙作战后成立的军委6人小组扩大组成军委常委会，并增补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粟裕为常务委员。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为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成员还有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军委常委会的成立使人民解放军一批卓越将领重新走上最高军事领导岗位，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叶剑英、邓小平担负起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责任，军委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在第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上即被提上议事日程。

“文化大革命”历经9年，中国社会的巨大震动和随之带来的灾难性破坏，对人民解放军的影响广泛而深远。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决心改变军队的状况，迅速恢复军队的战斗能力，改善军队

在中国人民中的形象。1975年初的中国政治形势，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叶剑英把蕴育已久的整顿军队的愿望付诸实现。这次整顿的最重要的标志，是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70多人，主要是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高级军事院校的领导干部，其中许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林彪事件以后才陆续恢复工作的。会议分为4个小组讨论。到会人员心情舒畅，很少顾虑，会议气氛很好。邓小平、叶剑英有时深入各小组听取意见，有时逐个找人谈话，打招呼，宣传整顿军队的必要性。7月14日、15日，邓小平、叶剑英先后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述整顿军队的主张，提出整顿军队的任务。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

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国际形势的根本问题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同时第三世界人民的斗争取得了新的进展，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因此，一.战争不可避免，帝国主义是战争策源地的状况没有改变；二.战争不是三五年内一定打得起来的，有可能推迟；三.有必要也有可能争取时间，搞好工作，准备打仗。这个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军事领导者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观念，使人民解放军得以摆脱长期临战状态的束缚，可以集中精力考虑较长时期中自身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会议还认为，要加紧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国防建设只有随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相应地发展起来。

会议分析了军队的状况。邓小平把军队存在的问题概括为“肿、散、骄、奢、惰”5个字。他解释说，“肿”，指军队人员膨胀，不精干；“散”，主要表现在有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两个方面，政治纪律也差；“骄”，军队支左，大权在握，加上其他一些

原因，在军队一部分人中，滋长了骄气，有的甚至不只是骄气，而是骄横；“省”，有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闹享受，闹待遇，公私不分，请客送礼，修建楼堂馆所；“惰”，有些干部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军队各级领导班子中，存在着不少怕字当头的“软”班子，干劲不足的“懒”班子，闹不团结的“散”班子。

会议提出，军委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两件事，第一件是，“军队要整顿”；第二件是，“要准备打仗”。

会议提出了整顿军队的主要任务。首先，抓编制，克服“肿”的问题。严格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压缩军队定额，调整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以此带动和影响军队其他问题的解决；第二，抓装备，把定额压下来以后节省的军费用于加强军工生产，加强装备发展的统一领导，整顿和提高产品质量，改善军队的装备技术状况；第三，抓战略，研究战场建设、作战、训练等问题，尤其要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指挥水平，增加他们的知识。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抓编制、抓装备、抓战略，要按照次序来。为保证上述任务的完成，要整顿军队的思想作风，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要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搞好连队政治工作建设，研究军队内部的团结问题，军队和地方的团结问题，军民关系问题。

会议集中研究讨论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根据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国性质和人民战争的战略设想，会议认为，中国兵源雄厚，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压缩定额，可以给国家的工农业建设增加力量，有利于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平时把民兵建设搞好，储备好干

部，储备好兵员，储备好装备，作好战时动员扩编计划，把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民兵都挂好钩，一旦战争打起来，就可以就地出干部，就地出兵员，就地出装备，迅速把部队扩编起来。会议再次申明，“编制就是法律”、“兵贵精不贵多”仍是今后的建军原则。会议确定，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的原则，主要是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保留政治工作骨干和技术骨干，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通过精简整编，把部队搞得比较精干，提高部队质量，提高作战能力。各单位对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方案》提出一些意见，经过充分酝酿研究，凡是合理的，在不突破总定额和不违背精简整编原则的前提下，予以采纳。有些涉及改变体制和制度的意见，留待会后进一步调查研究，专题解决。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央军委提出3年内将军队总定额从610万人压缩到450万人的计划。其中陆军压缩31.8%，主要是减少步兵和工程、铁道部队^①；海军减少工程部队和勤务保障部队，淘汰陈旧舰船，充实发展舰艇和岸舰导弹部队，编制人数略有增加；空军撤销机构重叠的指挥机构和装备落后的高炮师，淘汰陈旧飞机，减少工程部队和其他勤务保障部队，充实发展航空兵和地空导弹部队，压缩员额13.4%；总部、各级军区（含人民武装部）机关和所属学校、医院、仓库、汽车部队等直属单位，以及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共精减32.2%。主要是精简机关和勤务保障分队，裁并重叠机构。为便于工作，三总部机关的体制作适当调整，大军区、省军区机关部门体制也作

^① 野战步兵压缩28.6%，守备部队压缩18.8%，边防部队增编13.6%，地方部队压缩34.5%，炮兵压缩10%，装甲兵增编0.05%，第二炮兵压缩27.2%，工程兵压缩61.5%，铁道兵压缩65.3%，通信兵增编0.06%，防化兵保持原有规模不变。

相应调整。

会议提出，按照既要精干现有领导班子，又使超编干部各得其所；既有利于部队平时建设，又适应战时部队发展的需要；既能发挥老干部的作用，又有利于中、青干部成长的精神，妥善安排超编干部。

会议认为，搞好精简整编和军队的建设，关键是调整和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并且决定，1975年下半年，首先配好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班子和军以上单位的军、政一把手，然后配好师以下的领导班子。

7月15日，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了会议情况。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仍然猖獗的情况下，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破坏军队罪行的一次坚决清算，对于肃清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恶劣影响，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会议决定整顿军队，恢复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使遭受重大挫折的人民解放军重新建立起实现现代化、正规化的希望和信心。会议确定的一些方针、原则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人民解放军以后的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会议提出的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正确处理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的主张，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措施等等，在80年代中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中都被重新肯定，并进一步地发展了。这次会议，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党乱军阴谋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会议期间，叶剑英有针对性地向部分到会人员指出，“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要求人们谨慎从事，少说话，不授人以柄（指不让江青反革命集团抓住辫子），要注意形势，掌握动向，坚定立场，充分发挥骨干作用。并传达了毛泽东对“上海帮”（即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多次批评，增强了到会人员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警惕，也为一年后彻底粉碎

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了准备。

第二节 着手整顿军队

1975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以及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人民解放军根据会议的决定，开始精简整编，着手整顿军队的工作。

8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转发了总政治部《关于安排超编干部的方案》。《方案》分析了人民解放军干部超编情况：根据1974年底的统计，人民解放军共有干部152.6万人，超编46.7万人，压缩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后，还要多出干部10余万人，预计超编数可达60余万。同时，各级领导班子普遍较大，大军区平均36人，最多的44人；省军区平均38人，最多的58人；陆军军、师、团亦达20至40人。而且，各级干部平均年龄较大，陆军师师长、政治委员平均49岁；步兵团团长、政治委员平均45岁。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对人民解放军组织建设的干扰破坏以外，还有：（1）干部转业地方的工作，自1966年以后基本上停止，一大批不适合部队工作的干部没有退出现役；（2）大量干部派出参加“三支两军”后，为了保持部队有适当数量的干部在位工作，又提拔了一批干部。《方案》提出了安排超编干部的意见，对各级各类干部的安排原则、方法以及工作和生活待遇等问题作出规定。在军内采用以下方法安排大部分师以上干部和部分团以下干部：（1）增编副职。团以上各级领导班子，在新的编制中，多编几名副职，大军区3至5名，军、师、团2至3名；（2）设顾问。总部、军（兵）种、各级军区、海军舰队、军区空军、院校等单位，可以根据情况设顾问若

千名。顾问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对部队建设各项问题，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并完成党委委托的任务。各级顾问配同级和高一级干部担任；（3）做研究工作。各军区、军（兵）种和院校可以组建军事科学研究机构。抽调有一定政治思想水平，并有作战和部队工作经验，身体能坚持工作的现职师以上干部，从事军事学术、政治工作和后勤业务等研究；（4）送学校培养。把一些年龄不大，身体较好，有作战和实际工作经验的营职以上干部，有计划地送各大单位所属军政干校、“五·七”干校等学校培养、储备；（5）离职休养。安排年大体弱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 1953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入伍的师职和相当师职以上干部，194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入伍的团职和相当团职干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伍的干部，暂留军队离职休养，以后再办理退出现役手续。离休干部的安置原则是大分散、小集中，安置地点一般在中小城市，其余干部退出现役由地方安排，方法有：（1）转业。退出现役的军队干部，一般办理转业手续，由地方各部门、各地区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的具体条件，并参照他们原来在军队中担任的职务，分配适当工作，享受地方同等级别工资待遇；（2）复员。退出现役后需要复员以及本人自愿复员的连、排职干部和个别营、团职干部，经组织批准，办理复员。干部复员，一般回本人原籍省、市、自治区；（3）退休。年满 55 周岁以上的，或因公致残、积劳成疾，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干部，按照国务院关于军队干部退休处理的规定办理退休。退休后，一般到干部或爱人原籍省、市、自治区安置。

经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从 8 月开始，由叶剑英、聂荣臻、粟裕、陈锡联等组成领导小组，对全军 20 多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并对北京市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进行整顿或调换。8 月 30 日，中共中央军委通知，经中共中央、

毛泽东批准，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主官调整配备如下：

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副主任梁必业、徐立清、傅钟、黄玉昆、田维新；

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副部长张震、贺诚、张令彬、张元培、李元、封永顺、张汝光（兼卫生部部长）、孙洪珍，副政治委员曹思明、李真、白相国（兼政治部主任）；

空军司令员马宁，政治委员傅传作，第二政治委员余立金（兼民航总局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张廷发、成钧、邹炎、张积慧、曹里怀，副政治委员高厚良（兼政治部主任）、黄立清、杜玉福，司令部参谋长王定烈，后勤部部长刘忍；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第一政治委员苏振华，第二政治委员王宏坤，副司令员刘道生、周仁杰、周希汉、马忠全、梅嘉生、王万林、孔照年、高振家，副政治委员杜义德、卢仁灿、王昕（兼政治部主任），司令部参谋长杨国宇，后勤部部长王晓；

炮兵司令员张达志，政治委员张池明，副司令员宋承志、高存信、孔从洲、苏进、吴信泉，副政治委员欧阳毅、钟辉、谢良，司令部参谋长李元明，政治部主任廖鼎祥，后勤部部长孙成才；

第二炮兵司令员向守志，政治委员陈鹤桥，副司令员廖成美、符先辉、严家安、李懋之，副政治委员刘友光、于敬山、王宗槐，司令部参谋长贺进恒，政治部主任刘立封，后勤部部长刘大礼；

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政治委员莫文骅，副司令员贺晋年、程世才、宋庆生、林彬、赵杰，副政治委员姚国民、杨昆山、于丁，司令部参谋长严振衡，政治部主任邱相田；

工程兵司令员谭善和，政治委员王六生，副司令员武宏、崔

萍、徐国贤、唐凯、廖述云，副政治委员刘月生、严庆堤，司令部参谋长李恩宝，政治部主任江民风，后勤部部长陈信善；

铁道兵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吕正操，副司令员兰庭辉、郭维城、何辉燕、别祖后、亓谦斋，副政治委员警修林、郭延林、李际祥，司令部参谋长龙桂林，政治部主任徐诚之，后勤部部长尚志功；

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政治委员陶鲁笏，副主任陈彬、钟赤兵、钱学森、朱光亚、李光军（兼参谋长）、张震寰、马捷、胥光义（兼后勤部长），副政治委员肖向荣、栗在山；

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第一政治委员粟裕，第二政治委员肖华，副院长张翼翔、高锐、郭化若、贺光华、高体乾，副政治委员韩双亭（兼政治部主任）；

军政大学校长肖克，政治委员唐亮，副校长段苏权、陶汉章（兼教育长）、李夫克（兼理论研究部部长）、阳震、陈中民、孙泊，副政治委员谢明、聂济峰、何德庆、林谦，政治部主任鲍奇辰；

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第一政治委员张春桥（兼），第二政治委员彭冲（兼），政治委员廖汉生，副司令员李水清、聂凤智、詹大南、段焕竞、张希钦、周纯麟，副政治委员刘西元、王展，司令部参谋长邓家泰，政治部主任孙克驷，后勤部部长严光；

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治委员曾绍山、毛远新（兼），副司令员江拥辉、肖全夫、邓岳、刘震、孙玉国、刘德才（兼旅大警备区司令员），副政治委员邹衍、张午、甘渭汉（兼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李伯秋、王淮湘、刘光涛，司令部参谋长杨迪，政治部主任裴光，后勤部部长翟仲禹；

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第一政治委员韦国清（兼），政治

委员赵紫阳（兼）、张平化（兼）、孔石泉，副司令员江燮元、黄荣海、欧致富、叶建民、吴纯仁，副政治委员姜林东、杨树根、单印章，司令部参谋长孙干卿，政治部主任于厚德，后勤部部长靳兆西；

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王平、刘建勋（兼）、赵辛初（兼），副司令员李化民、孔庆德、林维先、周世忠、吴瑞山、张树芝（兼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吴烈、张玉华、陈代富、王猛，司令部参谋长郑志士，政治部主任谢镗忠，后勤部部长张书坤；

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第一政治委员刘兴元（兼），第二政治委员李大章（兼），政治委员严政，副司令员韦杰、王诚汉、肖永银、王东保、梁中玉、陈明义（兼司令部参谋长）、胡继成（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谢正荣、茹夫一，副政治委员魏伯亭、段思英、罗应怀、任荣（兼西藏军区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王焕如，后勤部部长杨以山；

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周兴（兼）、刘志坚，副司令员查玉升、刘春山、徐其孝、张铨秀、罗坤山、鲁瑞林、张荣森，副政治委员王砚泉、李克忠、陈发洪，司令部参谋长朱英，政治部主任史景班；

济南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第一政治委员白如冰（兼），政治委员肖望东，副司令员范朝利、熊作芳、刘贤权、吴效闵、张峰，副政治委员任思忠、方正、左齐，司令部参谋长王金泉，政治部主任阴法唐，后勤部部长周水朵；

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李志民、廖志高（兼）、江渭清（兼），副司令员朱绍清、龙飞虎、朱耀华、张显扬、石一宸，副政治委员廖海光、宋维斌、王直，司令部参谋长何家产，政治部主任曹普南，后勤部部长周桂生；

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政治委员冼恒汉（兼）、李瑞山（兼），副司令员李书茂、刘静海、吴华夺、杜绍三、黎原、徐国珍、康健民，副政治委员高维嵩、孔俊彪、卜占亚，司令部参谋长马友里，政治部主任孙殿甲，后勤部部长余致泉；

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第一政治委员赛福鼎（兼），政治委员郭林祥、司马义·艾买提（兼），副司令员郑三生、谭友林、张竭诚、赖光勋、李长林、艾则佐夫·哈斯木、幸元林（兼北疆军区司令员），副政治委员颜金生、曹达诺夫、何林兆，司令部参谋长马森，政治部主任魏佑铸，后勤部部长杜海林；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通知，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罗瑞卿、谭政、陈士榘、陈再道、王建安为军委顾问。

10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通知，北京军区领导班子调整配备如下：司令员陈锡联，第一政治委员纪登奎，第二政治委员秦基伟，副司令员傅崇碧、马卫华、康林、刘海清、肖选进、尤太忠（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副政治委员黄振棠、吴岱（兼政治部主任）、万海峰、迟浩田、吴涛（兼内蒙古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参谋长徐信。另外，陈先瑞调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滕海清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徐光友调任工程兵副政治委员。同日，中共中央军委通知，刘兴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赵紫阳兼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廷发任空军政治委员，吴富善、何廷一任空军副司令员，旷伏兆任空军副政治委员。

此时，邓小平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成武、张才干、向仲华、彭绍辉、李达、王尚荣、胡炜、何正文、伍修权任副总参谋长。

9月，中共中央军委批转了总参谋部《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方案》，《方案》决定撤销的单位主要有：野战步兵6个生产师（保留的步兵师半数以上实行简编编制）；守备部队1个

师部、2个守备区和11个团；工程兵7个工区、27个建筑团；铁道兵3个师部、37个团；海军1个基地和6个高炮营；空军4个军部、6个高炮师；总后勤部4个办事处、10个基地兵站、1个兵站；国防科委1个基地机关。按此《方案》精简整编后，全军机关、保障部队比例将减小，战斗部队、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比例将增大；陆军所占比例将减小，海、空军比例将增大。人民解放军的编组状况将有较大改善，基本上可以做到：小打，使用现有部队就可以；中打，稍加充实扩编就能应付；大打，由于保留了技术骨干和领导骨干，储备了一定数量的干部，做好了民兵工作和扩编计划，也能迅速扩编，保证战争的需要。从1975年第四季度开始到1976年，各军区、各军（兵）种按新编制进行整编，裁减部队，调整机构。1976年，全军总人数在上一年基础上减少了13.6%。

军队的整顿与党的整顿、工业的整顿、农业的整顿、文艺的整顿、教育科研的整顿等一系列整顿成为1975年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整顿对遏制“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促进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经中共中央转发后，对全国各条战线正在进行的整顿发生了重要影响。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信任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面否定了各行各业的整顿及其取得的成绩，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决定的各项改革和整顿措施未能很好地贯彻落实。

第三节 江青反革命集团对会议的破坏

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触动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敏感的神经。他们对会议的召开、会议的内容和会议产生的各项文件极端反

感。但是，会议是在毛泽东“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下召开的，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这种反感最初只能压抑为消极的对抗。以后，随着政治风向的转变，则发展为赤裸裸的攻击。

1975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上，叶剑英提出军委扩大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一次会议解决不了，中心是解决人的问题，也就是编制问题、压缩军队定额问题、干部问题”。叶剑英还提出，军委常委大体上分一下工，有所侧重，便于集中地考虑一些问题。王洪文当即表示异议，不赞成常委具体分工，并提出军委扩大会议第一项议题是政治思想工作。邓小平强调军委扩大会议应集中解决军队的编制问题，以此达到整顿军队、加强战备、实现安定团结的目的。张春桥则大谈理论问题，大谈商品、货币的关系问题。

身为军委常委会成员、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本应对多年以来首次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表现必要的热情。但是，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插向军队的一只手，尽管张春桥苦心孤诣抓军权，却不得不承认收效甚微。张春桥既为自己的“能量”在军队中不能尽情施展而恼怒，又不能容忍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将军队建设纳入正确轨道的努力。唯恐军队不乱的张春桥毫不掩饰对会议的冷淡。会议中，要他参加小组会，他推说“有病”拒不参加；要他在会上发言，他说“我发烧了”，也不讲。会议召开之前，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张春桥攻击军队干部安置方案是搞“资产阶级法权”。会议结束后，总政治部机关为张春桥准备了传达讲稿，他以“工作忙”、“没时间”为托辞，根本不到总政治部去传达。

对于全军如何宣传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作为全军政治工作首脑的张春桥不仅一字不提，就连机关拟定的宣传提示、意见

等等，也要节外生枝，百般刁难推诿。1975年8月，《解放军报》社起草了《关于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宣传意见》，张春桥在上面批道：“我感到此件不集中，说的事很多，不易落实。”对文中提出“努力奋斗把部队各项工作搞上去，争取时间把部队建设好”的口号，又批道：这些口号“值得研究”，“见诸报纸值得考虑”。同年9月，总政治部起草《关于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宣传报道提示的请示》，总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后送到张春桥处，张批道：“我压了几天，觉得有些问题的界限不易说清楚，可否再看一看。”用这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意见”，张春桥极力拖延、阻挠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

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军委扩大会议既恨且怕，会前会后采用两面派手法极力进行破坏。7月11日，军委会议讨论会议总结讲话稿时，张春桥表示，总结讲话讲得好，讲得很全面。对邓小平的讲话，张春桥也说，讲得好，要放开讲。7月17日下午，军委讨论将会议的讲话和文件呈送毛泽东、中共中央审批时，王洪文、张春桥没有提出异议。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军委扩大会议文件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也都表示同意。然而，会议结束不久，他们就来了个全盘否定。他们攻击军委扩大会议落实党的政策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搞“还乡团”，“举逸民”；攻击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是“打掉无产阶级的新生事物，为‘举逸民’开路”；攻击调整、整顿领导班子是邓小平“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聚集复辟势力”，诬称“军队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王洪文提出要重新“解决”。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成员甚至说，刮上去的要刮下来，刮下去的要刮上来，刮进去的要刮出去，刮出去的要刮进来；攻击整顿军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翻案风的产物”。1976年2月，王洪文在他起草的在军委常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说，“以三项指示为纲”，“这里有三

种讲法，实质一样就是不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上就是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我们党二十多年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混淆了纲与目、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在军委常委会议上，张春桥说：“现在有的单位已经批了（指军委扩大会议文件）。有个战士对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作了具体分析，我看分析得不错。现在是领导落后于群众，上级落后于下级。”王洪文说：“对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评价，不搞清楚，下一步军队工作不好作。”“问题出现在哪里？就出现在两个‘讲话’（指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上。”王洪文、张春桥攻击军委扩大会议说，“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还有别的问题”，“问题多着呢”，“要批判的不只是这两个讲话”。王洪文还调阅会议文件、记录和一些大单位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的有关文件，整理一些军队领导人的讲话，准备日后“算账”。1976年2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的报告，错误地指出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有错误，要求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全军已经展开的整顿工作被迫停止，解决“文化大革命”沉痾固疾的希望又一次破灭。

第六章 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恢复和落实了一些有效的政策，解放了一批老干部，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以江青为首，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为主要成员的反革命集团对周恩来的正确主张和作法十分不满，他们反对批判林彪煽起的极“左”思潮，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继续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思想。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成为新形势下“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形成

关于江青的情况，前文已约略提及。她 30 年代在上海从事影剧活动，50 年代蛰伏未出，60 年代初借“戏剧改革”、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进行政治投机。“文化大革命”期间，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张春桥 30 年代也在上海从事文化活动，“文化大革命”前任上海市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姚文元“文化大革命”前在上海《解放日报》和上海市委政策

研究室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王洪文“文化大革命”以前是上海国棉17厂的保卫干事。“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

江青60年代初在上海的活动得到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柯让张春桥给江青当助手并组织人写出批判文章，张春桥受到江青的青睐和信任，关系密切起来。1965年，在北京碰了壁的江青在上海组织批判京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又看中了善于舞文弄墨的姚文元，姚文元投江青之所好，很得其赏识。“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张春桥、姚文元在江青的支持下当上了权力极大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成员。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扶持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篡夺上海市委的领导权，网罗了王洪文。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也就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达到极盛。

从“四人帮”形成的过程不难看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虽然职务有高有低，但既不是中央一级的高级领导干部，也不是某一方面的权威，影响极其有限。“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适宜他们的野心成长的气候和土壤，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左”倾思潮，鼓吹个人迷信，一跃成为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的显赫人物，兴风作浪10年，“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畸形产物。另外，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几个主要成员均出自上海。仅仅把这看作一种巧合远远不够，起码，它一方面反映了江青在这个集团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另

一方面也说明，除了个人品质、野心、思想体系、政治目的等等的沆瀣一气而外，它的形成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门阀地域因素，因此“四人帮”又被称为“上海帮”。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军队中的势力比较薄弱，特别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之前，江青反革命集团很难涉足军队重要领导岗位。“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担任过军队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以后，张春桥、王洪文分别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成员。仅有张春桥1975年以后短时间担任过握有实权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军队中造成的破坏，远非他们窃取的军权使然，不能因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掌握的军权有限而低估他们在军队系统释放的反革命能量。

同林彪反革命集团一样，江青反革命集团努力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帮派体系，并且在中央和地方许多单位网罗了一批党羽，如文化部的于会泳，卫生部的刘湘屏，公安部的祝家耀，教育部的周宏宝，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朱永嘉、陈阿大，辽宁的毛远新、杨春甫，福建的陈佳忠、李庆霖，浙江的赖可可、翁森鹤，江西的涂烈，安徽的郭宏杰，河南的唐岐山，湖北的夏帮银，江苏的华林森，四川的黄廉等等。另外，还有迟群^①、谢静宜^②控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大批判组作为联络枢纽和宣传喉舌。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前，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与其相互勾结，干了不少坏事。但是，最能反映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特色，其反革命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还是“九·一三事件”之后，

^① 原为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后任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

^②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正式结成之后。

“九·一三事件”以后，江青等人编造谎言，掩盖他们和林彪勾结的真相，同时迫不及待地填补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留下的权力空白。他们利用特殊的身份或者利用已经取得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职务，颐指气使，更加直接地干预军队事务。张春桥直言不讳地承认，“我尽是唱反调”。他利用参加军委办公会议的机会，吹毛求疵，阻挠军队工作的顺利进行。1973年1月24日，叶剑英在总参谋部《关于调整测绘、气象、邮电部门体制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这问题酝酿已久，似可同意。”同日，张春桥玩弄文字游戏，诡称“这问题虽然酝酿过，但未充分讨论”，借此拖延时间，阻挠问题的迅速解决。时隔不久，2月24日，叶剑英将有关部门代中央军委起草的《一九七三年工作纲要》转给张春桥，提出：“军委一九七三年工作纲要，压得太久了，下面在催问，拟于二月二十七日，开一次军委办公会议，再一次修改后，呈请主席、中央审批。”张春桥一方面赞成讨论，一方面责备“文件写得思想不突出，具体工作罗列的多”。文件按照张春桥的意见修改后，叶剑英请张春桥最后定稿。张春桥却说：“文件写得比较平，也看不出哪些地方需要改。我不知道这样的全年工作纲要是否需要下发。”时间拖至3月中旬，这一年的工作纲要终于未能颁发全军执行。

1972年7月17日至1973年2月20日，海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进行批林整风。会议由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主持，开始一段时间揭批了林彪及其在海军的重要成员李作鹏、张秀川的阴谋活动及反革命罪行，也批判了王宏坤等人的错误。1972年11月16日，叶剑

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海军“四五”会议的总结报告。周恩来要求，会议不要开得时间太长，适时结束。就在这时候，“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出来干扰破坏会议，他们推翻军委基本通过的会议总结，给会议扣上了“颠倒主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帽子，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叶剑英；同时采取“批肖（劲光）”的策略，扭转会议批林的方向，说“批肖就是批林”，重点是批肖，对其他与林彪反革命集团关系密切的人则未深入揭发批判。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时，肖劲光认为江青、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等人不论哪一方面都不够当政治局委员的条件，所以没有选他们。这本来是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但“四人帮”查了选票，得知肖劲光没有选他们，恣意将此同李作鹏在“九大”期间布置选谁不选谁的阴谋活动联系起来，给肖劲光加上了不选“忠于毛主席的中央领导同志”的罪名。“九·一三事件”以后，肖劲光直接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并经批准，积极解放了一批干部，张春桥怀恨在心，妄加指责，肖劲光就此进行了申辩。而这，成了肖劲光顶撞“中央首长”的口实。此外，肖劲光被说成是林彪线上的人，肖劲光的某些错误、主持或参与的某些工作被无限上纲，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联系到一起。1973年2月23日，经张春桥亲自修改定稿上报的海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领导小组的《报告》，给肖劲光强加了不少罪名，中共中央就此发了1973年10号文件。

在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上，“四人帮”翻手云，覆手雨，做了不少文章。1968年3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制造“杨、余、傅事件”时，捏造了“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的罪名，攻击北京军区一部分领导人，并把矛头指向在华北地区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的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杨成武等人。“杨、余、傅事件”之后，林彪指令北京军区党委“揭山头主义

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义的流毒”，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多次讲话，诬蔑北京军区“排挤外来部队”，“排挤外来干部”，对外来部队采取了“搞臭、撵走、摧垮”的六字方针，把干部的正常调动都和“山头主义”联系起来，并说这种“山头主义已发展到不跟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跟别的司令部的危险地步”。陈伯达问题公开揭露之后，他们又把“华北山头”同陈伯达扭在一起。江青在华北会议上编造了一整套谎言，她说：“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政治头头’。”北京军区领导人奉命陪陈伯达到内蒙视察，是“背着中央”，“为庐山反党作准备”，“可能是和勃列日涅夫到阿拉木图遥相策应”。江青说，“陈伯达在庐山那样有恃无恐”，是因为“有北京军区给他做后盾”。江青甚至诬称北京军区有一套“打烂三十八军，乱保定，攻北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计划”，成了“一块反革命根据地”。她攻击“华北山头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是坏人当道”。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之后，“四人帮”又掀起反“华北山头”的高潮。他们原来把“华北山头”说成是反对林彪的，现在又说成是跟林彪的；北京军区成了“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北京军区由陈伯达篡党夺权的“后盾”变成林彪在首都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墙角”；北京军区领导人由“勾结”陈伯达反对林彪的“武将”成了林彪的“大将”。在北京军区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中，多次开展“捣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

以上仅仅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反军乱军的几例。如果这些还只是局部的破坏的话，那么，对人民解放军的全局性的进攻也已经酝酿成熟了。

面对这些近乎寻衅滋事的破坏，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者和广大指战员一方面表现出高度的克制，一方面用当时条件下可能的方

式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第二节 “批林批孔”与“放火烧荒”

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人提出在全国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1月12日，江青、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信中说：“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1月18日，中共中央通知，印发《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批林批孔”时的参考。《通知》说，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通知》继续强调“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

为了把“批林批孔”之火烧遍全国，江青背着中共中央，擅自以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党政机关、军队、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写信、送材料，炫耀自己是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同时在这些单位制造混乱。1月13日，江青看了《解放军报内部参考》刊登的关于南京军区陆军第20军防化连在批孔问题上的反映后，亲自给该连写信，并越过中共中央军委、南京军区，派她的亲信迟群、谢静宜直接到防化连，送去《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煽风点火，提出要解决南京军区的问题，策动军区一些单位“揭发上级领导机关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大是大非问题”，并指使他们的亲信到南京军区送大字报。

1月24日，为进一步鼓吹在军队开展“批林批孔”，江青给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写信，信中称：“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

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简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她（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毛主席说要能文能武，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①。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全才，方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同日，张春桥批转叶剑英，“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江青在军队本无职务，却以居高临下的口吻向军委发号施令，并直接派她的亲信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共中央通知，俨然凌驾于军委之上，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江青同时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不仅对军队工作指手划脚，横加指责，而且大言不惭地声称要对全军“有所帮助”，代表中央“解答”军队提出的问题。江青甚至以“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提示人民解放军：如不跟着她“批林批孔”，就不能成为“文武全才”，就无法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江青之所以有恃无恐，之所以踌躇满志，不仅仅凭借她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还因为在军委领导层中有她的同伙王洪文、张春桥。从张春桥的“批语”可以看出，本来充其量只能作为一种“建议”或“意见”的信，成了需要“落实”的指示。

1月24日，江青等人未经批准，擅自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

^① 随，指随何；陆，指陆贾。二人均为西汉初期的文臣。绛，指绛侯周勃；灌，指灌婴。二人均为西汉初期的武将。

孔”动员大会。25日，又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这两次大会上，江青、迟群、谢静宜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江青首先召开军队系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选定军队作为突破口，不是偶然的，江青希望实现既能搞乱军队，又可夺取军权的双重目的。

批判同气相求的林彪和 2000 多年前的孔丘并不是江青的目的，凭借这股风，江青企图树立自己和她那个帮派集团的威信，打倒许多重新恢复工作的老干部，篡夺这些单位的领导权。江青等人用孔丘的某些言语解释当时的社会现象，大批所谓“克己复礼”，说“复礼”就是“复辟”，“复辟”的具体表现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借此影射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以来，解放一批老干部，注重经济工作，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复辟”。

2、3 月份，王洪文、张春桥在相继召开的军队各大单位“批林批孔”汇报会上，肆意指责军队领导机关“批林批孔”消极，应付了事，煽动对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提意见，写大字报。王洪文说，“总参几位领导右得很”，“总参党委不抓大事”，“很不得力”，“真的打起仗来……总参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都齐全”；对总政“该夺权还是要夺”；张春桥说，“总后已经瘫痪了，我看瘫痪得越彻底越好”，“打内战也可以，有些问题要靠打内战才能解决”；王洪文对空军某些人说，“实际上组织新班子，就是派你们去夺权，但你们没有夺过来”。王洪文甚至说：对总参“这次我们要下个决心，一定要揭开，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张春桥当面埋怨总参领导人，“你们的大事，光我知道的，没有哪一件是有结果的。如总参作战部有些人到青岛、烟台骂浩亮同志这个问题，你们解决了吗？对这件事我

花的劲都比你们多，在你们的报告上逐段逐段的批了，可是过了几天，你的几页报告又上来了，我都不愿意管了，就是推不动”。

2月10日，工程兵、铁道兵、炮兵、第二炮兵等单位向军委办公会议汇报“批林批孔”情况，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借机指责这些单位的领导人，指责大字报贴少了，运动开展不起来。王洪文断言工程兵一名干部对江青等人在运动中的表现所提出的批评“相当反动”，“是分裂中央”^①。断言工程兵一位副司令员的言论“完全是对抗这次运动”。

会上，张春桥与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之间有一段对话，相当生动地反映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的专横，不妨照录如下：

张：你就以这种态度说明你是拥护中央的方针，拥护主席的路线吗？

陈：我有错误，没有抓紧。

张：没有抓紧，我也不承认。没抓紧，还是抓了嘛，只是抓得不紧嘛，是这样吗？

陈：我们回去认真进行批判一下。

张：批判谁呀？

陈：批判这种错误思想。

张：首先应该批你。我问了几次要批判谁，你就不敢说这个话。

当第二炮兵汇报，有人不同意说二炮4个领导人都有错误时，王洪文武断地说：“当然4个人都有错误，谁能否定这一条？”

^① 工程兵某师一位副科长说，江青写信“是指示信”，“江青同志和王洪文、叶副主席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指示两位副主席？代表谁讲话？是不是代表毛主席讲话？谢静宜、迟群在军队有什么职务，为什么那么敢讲话？”

与此同时，江青等人抓住南京大学学生钟志民抵制父母安排，要求退学、退伍一事，大批“走后门”^①，搞“三箭齐发”。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借某些领导干部子女当兵问题，点名批评叶剑英。

“走后门”是一种不正之风，应该反对。但是用“走后门”把老干部同性质根本不同的“孔孟之道”，再同“林彪路线”强拉在一起，江青是另有用心的。

然而，事与愿违，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遭到人民解放军大多数成员的反对和抵制，他们的鼓噪没有得到认真的响应。尽管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一再指责军队领导机关的“批林批孔”运动“很不得力”、“不坚决”、“不深入”，到2月份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召集各大单位汇报运动情况时，总参谋部只贴了57张大字报，工程兵仅贴了7张。人们看不惯江青、迟群、谢静宜等人的飞扬跋扈，独断专行，对这些反常举动提出意见；人们不同意不分青红皂白地断言军队领导人都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关，都有错误，都要批判；人们同情甚至支持敢于公开提出批评的人。许多单位提出，“工作要研究，运动牵扯精力”，“搞大字报恐怕泄密”，尽力回避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对江青等人交办的事情能顶则顶，能拖则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人民解放军也没有歧视那些通过非正式渠道加入自己队伍的人，人们普遍谅解了“后门兵”入伍参军的愿望和热情，认为“走后门”参军不是反革命，也是要革命，没什么批头。1月30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表明自己对“批林批孔”和批“走后门”的态度。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信上批示：“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

^① 指有些干部利用各种关系，安排子女参军或进入高等院校学习。

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指谢静宜）、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1975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指王海容、唐闻生）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这些人不是坏人。”毛泽东在支持“批林批孔”的前提下，遏制了江青一伙借批“走后门”整老干部，整军队的企图。

也许是为了区别于地方的“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独出心裁地提出一个“放火烧荒”的口号，作为借“运动”整军队的旗帜。3月5日，江青、张春桥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会上，江青点名攻击中共中央领导人，声称“要整一整军队”。江青说：“今天我斗胆，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把陈亚丁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江青指使陈亚丁在军队“放火烧荒”，夺军队文化工作的领导权，“今天把你找来，把他们两位找来，准备他们骂娘，他们骂，我也可以骂，动员起群众来，同他们作斗争，说这个那个是林的黑手，其实是他们自己”，“放火烧荒，你们去三个人，去放火嘛”。3月17日，陈亚丁秉承江青的旨意，召集驻京部队文艺单位一些负责人开会，传达布置了江青的意图，煽动他们回去放火。陈亚丁说：“江青同志指示叫我‘点火’，‘夺权’，‘管全军文化工作’……我不敢找组织，不敢找部长们，因为阵线还不清，找错了门不好办，再说也不了解情况。我今天请同志们来就为一个目的：点火。”“江青同志要我回到总政就是要放火烧荒，今天叫你们来就是叫你们回去放火。”

江青标榜自己“爱放炮、是个炮手，又造炮，又造炮弹，又

有炮队”。她背着毛泽东、中共中央，私自处理军队重大问题，到处点火放炮。1974年2月，江青将一封写给叶剑英和她的信不送给主管军队工作的叶剑英，却批给了王洪文，“洪文同志：后勤问题看来得点火，如何作法待议后再定”。另一封要江青转给毛泽东的信，江青既不送毛泽东，又不送叶剑英，也批给王洪文，“洪文同志：海军问题得研究一下，空军也冷下来了，捂盖子、反案，不解决不行了”。江青将一封反映总参谋部问题的来信批给王洪文、张春桥，“洪文、春桥同志：总参是有一些死官僚？还是林彪余孽在作祟？我每日用四分之一，有时是三分之一的时看群众来信。如果真像来信者所说那样，总参问题就太大了，要放火烧荒才好。我看了这封信很气愤！意见可能偏激。不过只供参考。”“信存洪文同志处。又及。”张春桥随后在这封信上批示：“两种都有。是要烧一烧。”

江青在南京军区找了一个防化连作为她的“点”，在北京卫戍区也找了一个连搞起了“试点”。1974年1月18日，江青派人到卫戍区某部6连进行所谓“批林批孔”试点，在1年零8个月的时间中，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向6连发“指示”，搞接见，先后10次给连队送材料、文件和书籍70多种，9069件（册）。“试点”一开始，江青就派人给6连送材料。这些材料，一部分是吹捧江青的信件和简报，相当多一部分是搞“三箭齐发”，批“走后门”的。在毛泽东严厉批评之后，1975年4月，6连仍收到江青送来的有关“走后门”的材料。1974年6月，江青提出要研究儒法军事斗争史，要6连马上拿出“经验”推广。6月到8月，江青连续给6连送去《三字经》、《女儿经》、《名贤集》、《弟子规》、《神童诗》等材料，要6连研究批判。1975年初，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江青却布置6连批判经验主义。江青在“试点”中借“点”打人，放火烧荒，把“试点”连队当作打《解放军报》，整军

队的棍子。试点刚刚开始，江青派驻6连的联络员就组织几个战士按照他们给定的内容给《解放军报》写了一封“批评信”，由《人民日报》通过《情况汇编》送到江青等人手中。江青等人纷纷就此信“批示”，江青称，要把这封信“变成一把更加锋利的匕首”。姚文元说：“告军报加一个有自我批评的按语在《解放军报》发表。”并要求“把文字改得更加锋利些”。王洪文也表示，“要揭开解放军报社的阶级斗争盖子”。江青组织另一个“试点”单位少数人专程到北京给《解放军报》贴大字报，随后（3月7日），派人向6连传达说，“军报的斗争比较复杂”，“在关键时刻和中央唱对台戏”。要6连去《解放军报》社看大字报，连夜写出大字报，第二天一早贴到《解放军报》社的办公楼内。10日，江青又派人向6连说，“给你们一个任务，要经常看军报，就是要找它的毛病”，“军报内部路线不明，可能有坏人，以后继续看，如不行再攻他们”。3月11日，江青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强令《解放军报》停止编发自己的稿件。使《解放军报》变相停刊178天。

同年6月，江青一伙又刮起一股“评法批儒”之风，把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归结为儒家要复辟，法家反复辟的儒法斗争史。并以颂扬吕后、武则天等历史上的女政治家为名，标榜江青的功绩，标榜只有他们那样的法家集团才能担负起中共中央的领导重任。

从“批林批孔”到“评法批儒”，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影射史学”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内不赞同他们观点的领导干部，在地方和军队中制造了混乱，使刚刚趋于稳定的政治局势又重新动荡起来，同时严重地干扰了军队正常的工作秩序。应该指出，人民解放军的大多数指战员并不真正明了这场斗争的真实含义和复杂背景，但他们或者感到了某种不正常的因素在作祟，或者不愿

意在不知所以然的情况下投入自己的热情和努力。此时的军人，经过“文化大革命”几年风雨的磨砺，已不象运动初期那样容易上当受骗，为人驱遣，而更多地是冷眼观望，或者，宁愿作为一种不得已的任务而为之。

第三节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当作走资派打倒。后来，毛泽东对邓小平重新表示信任，197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8月，邓小平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74年12月，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1975年1月，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由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从1975年起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在此期间，邓小平努力排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6月24日至7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提出发扬优良传统，解决军队存在的“肿、散、骄、奢、惰”问题，同时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使军队工作有了明显起色，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军乱军阴谋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在支持邓小平工作的同时，对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多次批评。1974年3月，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并告诫江青：“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郑重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同时当面对江青等人提出：“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1月12日，毛泽

东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人贵有自知之明。”同日，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12月23日，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并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材难得”。毛泽东对身边人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1975年2月，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防止修正主义。3月1日，张春桥在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强调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随后，姚文元、张春桥先后发表文章，以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为名，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列主义，要光明正大，批评江青等人的宗派活动和对经验主义的片面批判。5月21日，周恩来就毛泽东5月3日的讲话写信给政治局其他委员，指出张春桥3月1日在军队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提出“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造成了很大影响。22日，张春桥提出：“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27日，周恩来抱病复信张春桥：“你在三月一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并说：“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

导的。”5月27日和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江青等人把周恩来、叶剑英说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代表，“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提出“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进行了批评。

毛泽东一方面批评江青等人，一方面又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尽管他本人也已经认识到并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某些消极后果，但仍然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的思想陷入难以排解的矛盾之中。1975年9月底至11月，担任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之间联络员的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对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的形势进行攻击和诬蔑，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的错误判断。毛泽东改变初衷，由“政治思想强”、“人材难得”，转而认为邓小平“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但毛泽东此时仍认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进行了批评，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由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

1975年10月，毛泽东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写信反映迟群、谢静宜生活作风和思想作风一事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11月3日，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反击右倾翻案风”由此开始。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传达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指出出现了“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军队各大单位

党委第一书记通报了打招呼会议情况，并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1976年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把“打招呼”的精神插到社会，在全国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江青反革命集团把1975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作为军队“右倾翻案风”的主要标志，竭力攻击会议制定的整顿军队的方针，攻击人民解放军依据会议精神进行的一系列整顿工作，阻遏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步伐。

江青反革命集团采用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手段，任意罗织罪名，攻击他们选定的对象。他们制造了军事博物馆《历史综合馆》事件，诬陷邓小平、叶剑英等一大批军队领导干部。《历史综合馆》开始筹备于1971年7月，1975年10月开始内部预展。1976年2月，军事博物馆一名工作人员诬告《历史综合馆》“紧密配合右倾翻案风”，“树了邓小平”，“不适当地突出了叶帅”等等。姚文元对反映这一情况的《情况汇编清样》中公开攻击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的地方作了删改，把《清样》中一处“老干部”改为“不想搞社会主义的人”。张春桥将该《情况汇编》批发给总政治部，命令：第一，立即闭馆；第二，原封不动；第三，尽快查明。负责调查《历史综合馆》事件的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张秋桥（张春桥的弟弟）把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11位领导人审查该馆时谈的意见和原始记录以及参加审查的一些领导人的签到名单一并报告张春桥，扬言，“将来运动深入以后还会弄这个问题”。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①”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各地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搜捕“天安门事件”和其他类似事件的积极参加者和“幕后策划者”，人民解放军许多干部战士受到牵连，一些人被拘捕或判刑。张春桥对总政治部党委成员谈话时，指责总政领导“没有转弯子”，“思想感情没有变化”，“你们这一套，没有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就开不成这个会，出不了这个文件，不信把文件拿到清华去，让他们评论。好像总政是桃花源，右倾翻案风就刮不进来，就是刮进来也刮不到你保卫部？！”他指责总政“不传、不信、不追”所谓“政治谣言”的作法就是相信了这个谣言。王洪文断言：“解放军报班子里就是传谣言的窝子。”张春桥甚至说：“总政如果不转弯，影响全军，有一天中央要用总政，用不上。”

江青一伙还提出“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口号，胡说党内有资产阶级，军内有资产阶级，要求在军队开展讨论。1976年6月，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指使他们的亲信在上海警备区某部3连强行布置讨论“军内资产阶级”问题，他们先后6次给3连送去攻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的材料38份，并指派专人带领“蹲点组”到3连作“辅导”，念“材料”，以班、排为单位搞不起来，他们就组织全连范围的大型讨论会。会后，他们连夜炮制了《三连理论讨论会情况报告》，上报下发。

①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各地群众以各种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清明节前，北京群众自发集合到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以抒发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痛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采取紧急措施，阻止群众的活动。4月5日，群众与封锁天安门广场的民兵、警察、警卫部队发生冲突，许多群众被殴打或逮捕。同时，全国其他许多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3 连指战员对违背他们意志的“讨论”极为不满，纷纷提出疑问。马天水等人连忙向“四人帮”送报告，请示机宜。姚文元一方面对上海的作法表示“很好”，一方面担心这些在军队没有职务的人明日张胆地干这种反军乱军勾当难免露出马脚，于是又叮咛他们在上海的同伙：“这些情况不要发了，免得人家又说要揪军内走资派了。”

8 月 13 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和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 3 连讲话，继续鼓吹“军内资产阶级”谬论。徐景贤说：“军队三有^① 怎么办？怎么办，斗嘛！”丁盛说：“邓小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阶级，是一条路线，要批深批透是要费力气的。资产阶级在哪里？走资派还在走。这个我们是一样的适用。为什么军队没有资产阶级？”丁盛的讲话增添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同党的勇气，他们觉得终于有了穿军装的“知音”。马天水称，听了丁盛的讲话，“很受教育”，“很有启发”，“很敬佩”……一连讲了 7 个“很”字。徐景贤吹嘘说：“丁司令讲话旗帜鲜明，带头讲路线斗争。”王秀珍则称丁盛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江青反革命集团树立起来的“反潮流英雄”张铁生在沈阳军区某部危言耸听地说：“党内资产阶级，军内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当今世界上、社会上最腐朽的一个阶级，最堕落的一个阶级，最反动的一个阶级。”“党内的资产阶级呀，在部队尤其厉害。”陈亚丁则大肆鼓吹“写好同走资派的斗争，这当然是文艺创作上的新的课题”，“确实有几个走资派在那摆着，都是大家伙”。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使人民解放军各方面的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然而，1975 年，人民解放军整顿的成绩昭然。人们从正反

^① 即军队有阶级斗争，有资产阶级，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两方面的对比中接受了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主张和作法，越来越认真地思考、判断、抉择，不再满足于冲动和盲从，因而从感情上和理智上无法接受“批邓、反击右倾翻风”。江青等人的煽动不能激起“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狂热，军队的运动被动、消极、乏力。江青等人到军队找走资派，找军内资产阶级的作法，尤其遭到普遍的抵制。

第四节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者之一，周恩来享有崇高的威望。周恩来逝世后，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不顾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吊唁活动的种种禁令，自发地佩戴黑纱，举行追悼仪式，寄托自己的哀思。他们中的许多人直接参加了1976年清明节前后，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反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群众运动，与地方群众一起，送花圈，念祭文，贴诗词，散传单。后来，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强力追索，其中一些人曾经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们的顽强行动代表了人民解放军绝大多数成员的愿望和意志。

天安门事件之后，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方面增高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热度，一方面加紧追查所谓“政治谣言”和事件的参加者。这些作法在人民解放军中遇到了阻力，从总政治部开始，即对所谓“政治谣言”采取不传、不信、不追的态度，关键是“不追”。许多天安门事件和其他类似事件的参加者在军队中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9月9日，毛泽东逝世。在这一系列意外事件的刺激下，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极为忧虑。聂荣臻曾将自己的担心告诉杨成武，并让他转告叶剑英：“对江青等人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叶剑英表示自己亦有同感。

在与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许多领导人的大量接触中，叶剑英坚定了剪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决心，并得到当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的支持。10月6日晚，叶剑英与华国锋在中南海怀仁堂亲自指挥，以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形式，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由于部署周密，指挥果断，执行任务的部队动作迅速、坚决，这次行动没有打一枪，没有流一滴血。叶剑英在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攫取党的最高领导权的紧急时刻，挺身而出，对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0月6日之后，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作好必要的准备，防止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各地的余党可能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①。

^① 张春桥、王洪文1967年夏天开始筹建上海民兵，到1973年已组成一支有数十万人的民兵队伍。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一直把人民解放军看作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障碍，企图把上海民兵搞成“第二武装”，作为他们阴谋活动的工具。1976年8月，上海给民兵突击分发武器弹药，几天内共发枪7.3万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上海又发出各种子弹600多万发，炮弹1.5万发。10月6日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决定孤注一掷，发动武装暴乱。9日，他们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命令兵力集中，人枪配套，枪弹配套，调集车辆、物资等等。会后，他们调集民兵3.3万人，动用各种武器2.7万件，调集车辆225辆和大量食品、物资，并架设了电台。12日，得知“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策划发动停产罢工，用钢锭封锁机场跑道，用沉船封锁吴淞江口，切断电网，破坏铁路桥梁，控制要害部门，把全市搞瘫痪。由于中共中央及时采取措施，打乱了他们的暴乱部署，同时由于人民解放军严阵以待，这一阴谋很快瓦解。

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14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宣布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中央政治局对江青等人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从12月起，中共中央相继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的3批材料，部署了全国规模的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人民解放军结合军队建设的实际，揭发批判“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反军乱军的罪行，同时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纠正被“四人帮”搞颠倒的路线是非，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或称三个战役。第一个战役，结合宣讲《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集中揭露和批判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罪行；第二个战役，结合宣讲《罪证（材料之二）》，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和历史上的问题；第三个战役，结合宣讲《罪证（材料之三）》，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理论及其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表现。

1977年3月24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发表题为《坚决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把揭批“四人帮”运动引向深入》的讲话，将军队中需要澄清的被“四人帮”搞颠倒的路线是非归纳为十个方面：（一）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二）应该不应该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三）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四）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五）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六）应该不应该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搞好老中青三结合；（七）应该不应该强调军队要稳定；（八）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

严格要求；（九）应该不应该坚持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十）应该不应该准备打仗。《解放军报》连续发表社论，以“十个应该不应该”为题，系统地揭发批判“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的罪行和散布的种种谬论。

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揭批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1977年8月底，全军共查出同“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干部数千人，其中军事干部占32%，政治干部占52%，后勤干部占14%，还有少量技术干部。按照罪行轻重和错误事实，这些人又可分为“四人帮”的死党；“四人帮”的骨干分子；犯政治错误的人；说错话、做错事的人。清查工作政策性极强，一方面要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同党组成的帮派体系，发动群众查清同这个集团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另一方面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四人帮”及其一小撮罪行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死党。

1977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和《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

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批判了“两个

凡是”^①的错误方针。从而打碎了长期以来束缚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突破了许多理论上的禁区，促进了思想上的解放，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为以后的迅速发展作了思想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到1978年底，全军范围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基本结束。11月28日，中央军委同意并转发总政治部《关于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意见》，提出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标准：（一）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查清了。从政治上、思想上澄清了林彪、“四人帮”在重大问题上所造成的混乱；（二）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特别是重要单位和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基本上改变了软懒散的状况；（三）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传统作风初步恢复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错案大部分得到了平反昭雪；（四）军队和地方、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人民群众又逐渐把军队看成和当年的老八路、老红军一样了；（五）部队纪律严格了。其中重点是（一）、（二）两条，其余几条如做得不够，可在经常工作中结合整顿，继续解决。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决定把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

^①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方针，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给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设置了障碍。

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进一步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初步总结了建国以后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 1976 年 10 月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人民解放军认真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军队的实际，把军队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上来。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第七章 英雄本色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肆虐 10 年，搅得中华大地一片昏暗。但是，不论林彪，还是江青，都没有做到为所欲为，不是他们悲天悯人，不想把坏事做绝，而是在他们面前横亘着几条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是毛泽东的意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只能歪曲或者篡改毛泽东的某些指示和观点，远没有达到可以完全左右毛泽东意志的程度；二是广大群众的抉择。林彪、江青都以阴谋起家，他们既要通过群众运动实现反革命的政治目的，又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掩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行径。他们还没有胆量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帜，一旦他们的真正意图暴露，必然在群众运动的浪涛中彻底毁灭；三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大批领导干部的态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这些领导干部普遍赢得群众的信赖和崇敬，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们的态度，既可以影响和带动大多数群众，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毛泽东的决策。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毛泽东采取了封锁、架空的手段，竭力助长毛泽东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以期造成一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态势，同时欺骗、愚弄、“运动”群众，把群众的热情和善良愿望导引为巨大的社会破坏力。那么，对大多数党、政府、军队中的老干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横扫一切”的办法，把他们“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

当然，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老干部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17 年紧密联系在一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要否定这 17 年的成就，当然要否定作为这些成就的设计者和组织者的各级领导干部；另外，老干部们凭借多年革命的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极易觉察出林彪、江青一伙对社会主义的背叛，觉察出“文化大革命”的宣言同它的实际之间巨大的反差；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要利用“文化大革命”夺取权力，改朝换代，使历史的潮流倒转，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唆使他们的党羽、亲信、追随者们夺取掌握在这些领导干部手中的党权、政权、军权、财权、文权。于是，老干部们既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又是发动和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他们始终是“文化大革命”斗争的焦点，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当然，众多的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并非随波逐流，无所作为，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凭着对党和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凭着对人民的事业的忠诚，以不同的方式，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斗争。这样一种特殊的斗争，不能不受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复杂的社会、政治、思想的、经济的、文化的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具有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悠久历史和文化形成的传统观念和传统心理使中国共产党党员自觉接受党的纲领和党的决议的约束，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和严格的纪律使中国共产党极具战斗力。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取得了社会主义的初步胜利。虽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时期封建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难以肃清，种种历史原因又使中国共产党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

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许多党员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习惯于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决定，缺乏辨认正确与谬误的能力和自觉意识，或者根本否认党、党的一级组织犯错误的可能性，这种状况使得“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尽管许多人并不理解运动的性质，甚至本能地产生反感，却仍然投入了自己的热情和努力，不少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不“违心”地做错事。

毛泽东的权威和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是联系在一起的。本世纪30年代起，毛泽东就作为一面旗帜，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意志和中国革命的主导方向。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就使毛泽东的威望逐渐达到高峰。一方面，毛泽东的权威是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无法比拟的，出于对党的领袖的信赖，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党员发自内心地崇拜毛泽东，无条件地追随毛泽东所设计的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听不得不同意见，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和国家难于纠正毛泽东的错误，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怂恿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为一种手段，不断加剧这一错误，毛泽东的许多意向经过林彪、江青等人篡改或者杜撰后，才能得到扭曲的反映。毛泽东所期待的“文化大革命”同实际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之间存在着许多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现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对国内政治思想状况和阶级关系的错误估计，频繁的“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中国共产党内，以致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路线斗争的表现，党内关系日渐紧张。这样，中国共产党很难抵制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这些原因使“文化大革命”中代表中国共产党内健康力量的老干部们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这种斗争是分散的，难以形成有组织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严格的组织和严密的纪律，恶劣而艰苦的斗争环境要求全党思想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党员对党的决议只有接受和服从的义务，没有抵制和反对的权利，任何违背党的决议的行为都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任何有组织地或者状似有组织地对党的决议表示异议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视作“反党集团”而遭到打击和取缔。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老干部们不可能对“文化大革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但是他们更多地是以个人“意见”的形式向党的组织，向党的最高领导者陈述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或者对运动中的某些作法以及某些人的表现提出批评。自始至终，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力量没有企图建立相对稳定的“集团”或者“派别”，更没有去“组织”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即使在犯错误之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完整的、统一的，这曾经是它的光荣，此时却使它缺乏抗御自身病患的机能。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飞扬跋扈相比，这种个人的抗争显得微弱得多，它无法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相

反，斗争的参加者常常很快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压制或者打倒。

第二，这种斗争没有脱离“文化大革命”的窠套。长期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被当作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过分频繁的政治运动使人们习惯于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对待政治、思想、文化、艺术领域中的矛盾和分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的口号下发动的，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者原则上接受了“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时”的观点。既然过去可以通过政治运动的方法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那么，作为这一形式的继续和发展，“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应该接受的。因此，“文化大革命”中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很少表现为对“文化大革命”本质和总体的否定，一般只是把矛头对向运动中的某些作法、某种观点，或者领导运动的某些人，斗争的目的或者动机很大程度上停留于如何搞好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疑，这样的结果大大削弱了斗争的锋芒，难以动摇“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也就难以从根本上制止“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何况，“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相当多地套用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袭用了“文化大革命”的手段和方法。“左”倾指导思想在这种形式上被批判了，很快又会以另一种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总体的肯定与局部的否定，抽象的接受与具体的排斥，理论上的认同与实践中的反对，构成了围绕“文化大革命”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

第三，毛泽东个人的意向对斗争的结果影响甚大。对于毛泽东来说，一方面，他要贯彻“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实现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这就必须排除一部分与他观点相背而又握有重权的高级领导干部；另一方面，他珍惜长期共同奋斗中建立起来

的友情、信任和理解，不忍心与同舟共济几十年的老同事、老部下分道扬镳，希望他们接受自己的思想体系，支持自己发起的“革命”，再立“新功”。尽管林彪、江青等人政治上得到毛泽东的宠信，但是可以说，在感情的天平上，毛泽东始终没有完全地偏向他们。对于大多数老干部来说，一方面，他们崇拜毛泽东，信仰毛泽东，尊重毛泽东的权威，立志无条件地毕生追随毛泽东。他们不相信并且难以接受毛泽东犯错误的事实，在他们心目中，毛泽东也被神化了；另一方面，他们对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尤其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迷惑不解。他们努力使自己适应“文化大革命”，但是徒劳无功，他们企图从好的方面解释运动中出现的种种现象，但现实一次次击破他们的幻想。他们希望毛泽东注意他们的意见，希望毛泽东解释他们的困惑。毛泽东对许多老干部既“爱”且“怨”，爱他们的忠诚和才干，怨他们思想落伍，有意无意地忤逆自己的意志，林彪、江青等人则以谗言力图使这种“怨”升格为“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态度往往是决定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每一次斗争成败的关键，当毛泽东对老干部表示信任，对他们的斗争表示理解或谅解时，林彪、江青等人就不得不有所收敛；反之，当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成老干部们的某些作法时，则预示着这些人政治上的失利，预示着林彪、江青等人更加猛烈的迫害活动即将来临。

第四，老干部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一般经历了从支持到怀疑，到抵制和斗争的发展过程。运动之初，出于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和对党的决议的拥护，他们赞同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张，希望借此“反修防修”，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他们按照过去政治运动的经验，努力从积极的方面理解“文化大革命”，组织和领导了本地区、本部门的运动。当着运动逐步向深入发展，运动的实际进程表现出与其宣言严重脱节之时，沉重的

迷惘代替了最初的热情。他们感到自己所信奉的，正是运动要打倒的，自己所反对的，又是运动所推崇的，他们既怀疑党和国家政权机制的运行发生了严重障碍，又担心这种不适应源于自己的思想跟不上社会主义变革的急骤步伐。他们需要冷静地观察、思考、判断，对领导运动力不从心了。另一方面，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老干部当作斗争对象，也需要把他们从领导运动的岗位上驱逐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既要实现反革命目的，就不可能永远不暴露他们的真实意图，当老干部们终于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掩盖着汹涌而来的暗流，意识到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正是践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标榜社会主义的正是啃蚀社会主义的蛀虫时，他们放弃了沉默和游移，选择了斗争的道路。尽管这些斗争的方式或者直接或者间接，斗争的程度或者猛烈或者委婉，斗争的结果由于种种原因有所不同，然而这些斗争代表了中国大多数群众和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根本意志和信念。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许多阴谋因此未能得逞。

诚然，老干部中的一些人面对“文化大革命”的邪恶消沉了，一些人慑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淫威退缩了，更有一些人甘心为人驱使，跟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干了不少坏事。但是，老干部中的大多数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支持和鼓舞党、政府、军队中的老干部同“左”倾

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既有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的追求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也有嫉恶如仇舍生忘我的斗争精神，又有对人民对国家朴素的感情和耿耿忠诚。

第一节 “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

——坚定的信仰

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是鼓舞老干部们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强大精神支柱。在乾坤颠倒之时，甚至在身遭不测之际，他们仍然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仍然坚信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犯错误痛心疾首，同时相信，一切违背人民意志和历史潮流的恶行终究不能持久，中国共产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从失误中解脱。

30年代脱离封建军阀家庭，毅然投奔革命阵营的张学思面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逼供信，愤然写道：“命反省都成抗拒态度顽固，说真情毫无印象谁来明察，为了案徇情编造又与实违，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表现出不向淫威妥协，不寻求个人苟安，立志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所谓“假党员”、“混入共产党内”的诬陷，张学思理直气壮地反驳：“我如果是为个人私利的话，还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找共产党参加革命吗？当大帅府的公子，个人私利、物质享受，就够高的了。要谋取高官厚禄的话，到国民党那边去找，那不是很容易吗？”“你们说我是混到党里来的，就算是‘混’吧，象我这样的人，不愿到国民党反动派那里去‘混’，却偏偏要在共产党里边来‘混’，对这，我也觉得光荣！”

仅仅把这些话当作张学思的表白是不够的，他在回顾自己坎坷不平的经历时，再一次抒发了胸中对党的热爱、对革命事业的

忠诚，抒发了对30年前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的自豪。他甘愿舍弃豪门贵公子的优越生活，舍弃地位和金钱，把自己交给为中国人民争自由、争解放的伟大事业。“文化大革命”中，他横遭诬陷，蒙受不白之冤，身陷囹圄，然而，他不后悔，仍然一如既往，对自己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表示了坦荡荡的赤诚之心。

1970年5月下旬，张学思病情危重，完全靠输液输氧维持生命。26日，专案组不得不告诉他：“中央首长对你很关心，直接向医院下达指示，要医院设法治好你的病。”并问他有什么话要对组织讲。张学思表示“非常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时对林彪反革命集团诬陷他的几个主要问题再一次作了明确的否认，他说：“关于我的问题，一个是党籍问题，我是自觉自愿参加共产党的，不是混进共产党的。”“另一个是东北问题，我不知道彭真在东北做了什么错事，我也没有跟彭真做过什么错事！”“说我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有联系，这完全是政治诬陷！”张学思在临终前最后一次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和对真理的信念：“我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问题迟早总会弄清楚！决不能罚不当罪，罪不当罚！”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称赞张学思“忠心耿耿，铁骨铮铮，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保持着共产党员那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高风亮节；无论受多么大的折磨和委屈，都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张学思与人民解放军大多数高级将领不同，他不是因为压迫深反抗烈而“逼上梁山”的，正如他所说，他是自觉自愿同剥削阶级家庭彻底决裂，自觉自愿从一个阵营投向另一个阵营，从一个世界跨入另一个世界的。难能可贵的是，一旦他选定了正确的生活道路，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不为任何险阻所屈服。

张学思如此，人民解放军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也是如此。彭德怀在狱中坚持学习和思考，他在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上

作了眉批：“也只有实践才能证明自己思想的正确性。”他珍惜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荣誉，甚于自己的生命，他说：“我从来不怕死，现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见毛主席。”“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将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逐步升级的迫害，彭德怀顽强地忍受着心理上的打击，忍受着肉体上的摧残，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内心深处，他仍然寄希望于党，相信只有党才能洗净泼在他身上的污秽。当有人问他是否因为害怕而拒绝动手术时，他答道：“我从来没有怕过死。我只怕，我的话再也找不到地方说了。我知道，上了手术台，我可能就下不来了。”“不把我的话说出来，我是不做什么手术的。今天让我见毛主席，明天我上手术台。我留着这条命，就是要尽到我这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讲清楚，也算尽到了我最后的一份责任！”

1974年秋，彭德怀病情恶化，半身瘫痪，小便失禁。他流着泪对身边的侄女说：“这怎么办，怎么办呢？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啊！”在最后的日子里，彭德怀安慰他人说：“对于这条命，我曾经有几十次都准备不要了。我能活到今天，算是长寿了，已经可以了。我能做的都做了，只是做得不够好。我仔细地想过了，我这一生是值得的，对革命对人民，我做了一点工作，尽到了我的责任。虽然我个人的下场不怎么好，可是我不埋怨，更不后悔。”

从1959年庐山会议被罢官，到1974年去世，彭德怀蒙冤受屈15年，他的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痛苦的煎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驰骋疆场，令敌人胆战心惊的勇士，死，并不可怕。最难受的莫过于被自己的同志所误解，为自己所献身的事业所排斥。彭德怀直言忠谏，反遭厄运，他没有怨天尤人，从此消沉下去，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充满乐观精神，总想为党为人民多

做一些事情，原因就在于他相信“我们这个党，不会总这个样的”。

1967年初，上海刮起的“一月风暴”把许多老干部从领导岗位上刮了下去。已经多次被“造反派”骚扰，处境十分艰苦的贺龙决心向党中央汇报自己的担忧。他沉痛地回忆了1931年至1934年间，洪湖地区在王明路线影响下，大搞肃反扩大化，在革命队伍内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革命力量遭受极大损失的教训，进而联系到“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优秀干部遭打击、受迫害的现实，充满忧虑地说：“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要不得呀，要讲清楚，一定要把历史的教训讲清楚！现在我真担心有人再搞那一套！”经过一个月的回忆和思索，3月7日，贺龙写出一份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问题的报告，交周恩来转呈毛泽东，期望引为鉴戒。

1927年8月，贺龙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在最艰难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他的亲姐姐贺民英、贺五妹在同敌人生死搏斗中壮烈牺牲，妹妹贺满姑被残酷地杀害，尸骨都不能收。战争年代，贺家宗族上百口人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敌人抄了他的家，烧了他的屋，挖了他家的祖坟。参加革命以后，贺龙一心跟着共产党，跟着毛泽东，从没有三心二意，也没有丝毫懈怠。他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包括自己的生命。对于蒙受的冤屈，贺龙说：“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時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他担心的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1966年9月，林彪对贺龙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当即回答：“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知道。”既拒绝了林彪的拉拢，又表达了自己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强意志。失去自由后，贺龙在给孩子们

的信中勉励他们：好好地经受革命风雨的锻炼，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对于谢富治等人制造的“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朱德听到后一笑置之，对家人说：由他们造谣去吧，毛主席、恩来最了解我，只要他们在，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朱德相信毛泽东，相信中国共产党。“九大”期间，他在发言时说：我和毛主席在一起 40 多年，几乎天天在一起。把我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是不符合实际的。

林彪事件后，朱德由衷地感到高兴，1972 年 5 月，他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发言说：我们党是有经验、有力量的党，他（指林彪）是决不会成功的。他还说：我好几年没有和军队同志在一起开会了，现在我还能看到大家，看到我们的军队还是好军队，心情很愉快，很高兴。这以后，他用很大的精力视察工厂、农村、部队，为发展工农业生产，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竭尽心力。

对于江青反革命集团骤然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妄图打倒邓小平和一大批老干部，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朱德十分气愤，他说：要抢班夺权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了吗？他们要打倒我，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我并不想“当官”。我是党树起来的，要打倒我，就得先打倒共产党，此外没有别的办法。

朱德始终把自己与中国共产党、与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从中汲取精神上的力量。这使他身处逆境而不气馁，敢于冷眼相对“文化大革命”，反其道而行之，表达自己的忧国忧民之情，不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妥协。

出于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罗瑞卿决心以死抗争，为了终身信奉的信念被践踏被亵渎。在遗书中，他嘱咐妻

子：“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好好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罗瑞卿是“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之一，运动开始不久即被投入监狱，这使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去品味籍然而来的劫难。尽管如此，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仍然支持着他顽强的生命力。狱中，他一再要求，终于获得学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权利。他在《自传》中写道：“不问情况怎样；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总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作一个党外的，甚至是排除在人民群众以外的拥护者，作一个思想上的拥护者！……因为我坚信这些一定要在全世界获得胜利！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一定会实现。”出狱后，在一首《答友人》诗中，他尽情抒发自己的情怀：“愿君知我心，何畏遮天云。太阳终归出，一样照人行。”在《叙怀》中，他写道：“少小叛逃封建家，磨难虽多心无瑕。”另一首《送别》，更直抒了永远忠于革命，虽死而不渝的胸臆：“革命识知己，马列共遵循，永走革命路，一切可牺牲。”

1972年夏天，罗瑞卿在医院中见到分别多年的孩子们，感慨地说：“一个共产党员，这么多年不能为党工作，还要受人无端的打击和诬陷，内心是太痛苦了。”1974年初，罗瑞卿安慰久别的妻子：“只要心脏还在跳动，我们还能对党工作。”表现出历尽磨难依然不改初衷的刚烈品格。这种品格激励着罗瑞卿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以旺盛的斗志投入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素以“直声满天下”为人敬重的陈毅，一方面不隐晦“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意见”，一方面毫不含糊地表示，“我决定跟毛主席走”。“文化大革命”中，陈毅既要协助周恩来参与繁重的外交活动，又要拿出大量精力同“造反派”的纠缠周

旋。他在许多场合公开批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同意把社会主义的中国说得一团漆黑，“这样的想法，我们请所有的同志们想一想，你把毛主席放到什么地方？……你把共产党放到什么地方？你否认了毛主席的领导，……否认了我们党是一个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否认了我们人民解放军它的强大的力量，它的光荣传统”。在接见归国留学生时，陈毅批驳“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谬论，他说：“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是干净的，承蒙宽大，加上我们五个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十一个干净的，我不愿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揪出来示众好了！我不愿当这个干净！”他不能容忍对自己付出了毕生心血的中国共产党的诽谤，不能容忍对广大党员和干部的诬蔑，他要竭尽全部力量捍卫党的威信和纯洁。

陈毅曾经告诫自己的子女：“你们学我，就学我的坚定性，无论革命遭受到什么样的困难，曲折甚至惨痛失败，我都没有动摇过。”当得知身患绝症之后，他还勉励为自己治病的饱受“文化大革命”屈辱的医生“一定要有信心”，“我们党的政策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不是要排挤知识分子，不是要排挤华侨的！……你能留下来，我应该代表人民群众，代表象我这样需要你治病救命的病人给你三鞠躬！”他的坦率达观感动了医生，医生决心象他那样不埋怨，不泄气，树立起信心。

陈毅相信，“搞阴谋诡计的人，爬得高，跌得重，最终不会有好下场，我们党一定能获得最后胜利的”。他以红叶比喻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和崇高品质，在诗中写道：“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红叶落尘埃，莫谓红绝矣。明春花再发，万红与千紫。”这种精神使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人物之

一。诗人赵朴初在挽诗中称赞陈毅：“殊勋盖世间，直声满天下，刚肠忌鬼域，迅雷发叱咤。”朱德在诗中写道：“一生为革命，盖棺方论定。重道又亲师，路线根端正。”既肯定了陈毅至死不移的革命精神，又批驳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陈毅的种种诬蔑。

第二节 擒妖捉鬼更要坚 ——忘我的斗争精神

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特殊性之一，在于林彪、江青等人在中国共产党内身居要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他们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用马克思主义和旗号装扮和掩饰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以及对权力的崇拜使人们很难怀疑同时很难触动这些红极一时的大人物。同民主革命时期阶级壁垒分明的那种斗争不一样，这里首先需要的是敏锐的辨识能力，勇气尚在其次。这种辨识能力既来源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也来源于长期革命实践形成的丰富经验，勇气只有服从并且服务于这种辨识能力才能称其为真正的力量。陈毅、叶剑英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几次讲话，集中体现了这种可贵的能力，切中要害，因此引起林彪、江青等人的极度恐慌。

这种辨识能力又能极大地增强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勇气。“文化大革命”中，种种神圣而虚幻的光环使人们茫然无措，他们也许感到身边有一股浊流，但是看不清，抓不住，主观上想反抗，然而无从下手，有劲使不上，甚至担心可能打偏了方向。一旦他们理清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恶活动的脉络，抓住了本质的东西，就会勇气倍增，义无反顾地投入斗争。

彭德怀在批斗会上义正词严地驳斥“造反派”对抗战时期“百团大战”的歪曲，坚持实事求是地评说“百团大战”的功过，认

为这次战役对于振奋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对于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是有功的，“功在我们党，在万千八路军战士，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反对把“百团大战”说成“假抗战，真助蒋”，从而抹杀它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抹杀抗日军人的流血牺牲。“造反派”攻击他“翻庐山会议的案”、“反对毛主席”，他解释说：我在那封信上只是讲比例失调问题，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只是无话不谈。恼羞成怒的“造反派”将彭德怀打昏在地，企图强使彭德怀在事先准备好的“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投降认罪书”上签字画押结束批斗会。彭德怀毫不屈服，怒斥道：“我有罪！我的罪在消灭了几万日本兵！”

“造反派”要彭德怀看了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后写读后感，彭德怀说：“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他在以后给姚文元的信中说：“读三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如果照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更实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给一些材料。”辛辣地讽刺了姚文元之流的颠倒黑白。

彭德怀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比作“国民党特务”。癌瘤引起的疼痛使他经常在床上拼命挣扎，疼得厉害了，他就大骂“国民党特务”，用牙咬着被单，用手乱撕乱扯。专案组来人阻止，他骂得更凶。他说：“我骂的是国民党特务，撕的是国民党特务的被子。一个人快要死了，案子还没有搞清楚，你说我怎么不着急。”

抗日战争期间，彭德怀在一首诗中写道：“有了你这样英勇的战士，中华民族决不会亡！”“文化大革命”中，他以自己的英勇再一次实践了30年前的誓言，表现出“一生戎马无假日”的斗争精神。他承认自己有缺点、有错误，但决不为了躲避斗争而接受林彪、江青之流的诬陷。他坚信：“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将会审判

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

叶剑英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位置，他始终受冲击，但始终未被打倒。自然，这首先得力于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认为他“老实人一个”，“大事不糊涂”，委他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的重任。除了林彪以外，军队的几位元帅中，只有他还能勉强支撑着作一些工作。

林彪、江青一伙在标榜自己最“革命”的时候，指责叶剑英“老机（会主义者）”、“老右（倾）”、“右得不可再右”。叶剑英当然不能接受这些无端的指责，相反，从这些指责中，他看出了“左派幼稚病”的症候。他反复阅读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觉得“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与列宁批判的“左派幼稚病”如出一辙。他要求工作人员摘编列宁的有关论述，联系实际学习，更好地抵制错误倾向。

在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狂涛中，叶剑英一再蒙受屈辱，但并没有灰心气馁。他填写了一首《虞美人》词赠给陈毅：“串连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他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无私无畏，敢于斗争，胜利总有一天会到来。

叶剑英十分珍惜手中的权力，运动初期，他多方呼吁稳定军队，严肃地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反对林彪、江青之流在军队中搞“四大”的主张。他尽其所能，保护军内外许多领导干部免遭不测。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之后，叶剑英先后主持了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常委会，他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努力排解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种种干扰破坏，领导人民解放军在艰难复杂的条件下顽强前进。他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顿，同邓小平一起主

持召开了 1975 年的军委扩大会议，领导了军队的整顿。在邓小平即将再次被“打倒”的困难时刻，叶剑英不顾风险，到邓小平住地去看望他，表现了自己的原则立场。

叶剑英不象彭德怀、陈毅那样始终刚烈如火，他既有“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品格，忍得辱，负得重，又能够看准时机，在关键之时挺身而出，冲锋陷阵。在所谓“大闹京西宾馆”时，叶剑英刚直不阿，拍案痛斥，使江青、陈伯达之流胆寒。1976 年 10 月，又是他在最危急的时刻，同其他人一道，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使中国从危难中解脱。从形式上看，叶剑英采取的是与其他人不尽相同的斗争策略，这使他有可能较长时间地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而很少被人抓住把柄。因此，许多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压制的老干部把叶剑英视为砥柱中坚，在困难之时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他的周围。

陈毅的快人快语同彭德怀有许多相似之处。“文化大革命”没有磨去他的棱角，相反，他的直言不讳常常使对手无言以答。运动初期，陈毅奔波于外交部系统各机关、学校，多次发表讲话，阐明自己对运动的想法。他表示，自己情愿犯错误，不怕犯错误，但决不会吞吞吐吐，模棱两可，只求明哲保身。

1966 年 6、7 月间，在中央文革暗中支持下，派往大中学校的工作组普遍遭到轰赶，外交部所属院校也不例外。陈毅在外办系统各工作组汇报情况的例会上，要求各工作组坚信党中央的领导，不要因为“造反派”贴几张大字报，某个人说几句话，就跟着怀疑起来，动摇起来。他强调，“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的，我是投的赞成票”，表示对工作组的支持。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工作组成了学校中批斗的对象。陈毅既痛心年轻学生因为无知和轻信而上当受骗，又痛心工作组成员努力工作反遭批判，他坚持参加批斗会，表态说，“我是支持工作组的”，主张可以批评工作

组的错误，但不能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当有人指责陈毅“调稀泥”、“包庇工作组”时，陈毅回答说：“我硬是要调稀泥，人民内部不调稀泥怎么行。”

在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陈毅旗帜鲜明地说过：“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掉我外交部长的职务，我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他谢绝人们要他少讲话，少惹麻烦的劝告，只要有机会，总要想方设法出席各种各样的集会，并且，几乎每次总会按捺不住发泄内心情感的冲动，一讲就是很多。

陈毅的举动，与“文化大革命”宣传的宗旨往往背道而驰，他的讲话，经常刺中林彪、江青之流的痛处。陈毅的存在，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障碍，要整他的人当然加剧了对他的攻击和围剿，他的工作越来越困难了。可是，要陈毅低头服软是办不到的，他既可以当众承认“我讲话就是好得罪人”，又敢于怒斥那些靠“造反”起家的人，严词拒绝给他戴高帽子的企图。他对革命40年后反而受到“造反派”的凌辱异常气愤，发火说：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我也要造他们的反。我个人可能惨遭不幸，但是，如果我因此不敢讲自己的意见，我这个共产党员就一钱不值。

1966年11月的两次工人体育场大会，1967年2月的怀仁堂抗争，陈毅勇敢地冲上最前线。怀仁堂会议后不久，陈毅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在长达7个小时的讲话中，又一次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尖锐批评。他指出，有些人作风不正派，拿别人的鲜血去染自己的顶子；现在胡说八道的东西太多，给我们党抹黑；很多人头脑发热，自己以为了不起。他提醒学生们用脑子想问题，避免犯错误，告诉他们，“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陈毅的这次讲话，是改变一些人对“文化大革命”看法的转折点，也使他因为

所谓“二月逆流”受到的冲击更加剧烈。

陈毅坚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要彻底地报销。”“大闹怀仁堂”后的政治局生活会，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届二中全会，接连不断的诽谤攻击没有削弱陈毅的斗志。他没有自减其口，任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他以特有的乐观、幽默、率直，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留待历史就自己究竟是右派还是左派，作出最终的结论。

罗瑞卿的遭遇也许应验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古谚。他的努力、勤勉，他对党、对人民、对人民解放军的无私奉献竟被林彪、江青之流视作“突出”自己，视作抗上。罗瑞卿的被打倒，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之前，突如其来的变故和半封闭的党内斗争方式，使他把个人的遭遇看作孤立的事件，他曾经痛不欲生，希望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使他领悟到自己的问题仅仅是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灾难的一部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同人民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他相信，真和假，是和非，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他坚强起来，以勇敢无畏的态度面对现实。

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回忆，1967年3月，“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大会，“一些人跑上来照像、拍电影时，我低着头，就是不让照。我真恨不得地上裂开一道缝让我钻进去。……这时候，我忽然听到瑞卿在我的身边说：‘抬起头来，让他们照！’听到这个话，我觉得很受鼓舞，心想，我也没有罪，怕什么？我就抬起头来了。”

从1966年底到1973年11月，罗瑞卿在监禁中度过了7个春秋，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审讯。他曾受到警告，“如不采取主动，后果自负”。然而他始终坚持，“我只能说真的，不管怎样，

我也不能乱说”。他在《自传》中说：“这三年多来（指1966年12月到自传完成的1970年8月）我的经历就是：挨斗、受审、坐班房、写材料。在这些方面我当然是很痛苦的，有许多冤屈！一切人世间的侮辱我都受过了，受够了！当然在我的事情未了结前，或者在我的生命未结束之前我还要准备受，我也还正受着。”罗瑞卿决心，只要斗争没有结束，就一定要坚持下去，直至生命的终结。

解除监禁后，罗瑞卿写过不少诗词抒发当时的心情，在《忆往事书赠治平》中，罗瑞卿写道：“多年经历诚可贵，八载磨炼更同心。我等虽然遭陷害，历史终能辨假真。”在一首《和友人》的诗中，罗瑞卿揭露了自己始终如一的奋斗精神：同拿枪的敌人斗争，“胸怀对敌深刻恨，谁顾生死不向前”，而今，在另一种战场上，“兴无灭资应继续，擒妖捉鬼更要坚”。当时，江青反革命集团正企图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后尘，篡权“组阁”，罗瑞卿的日子不好过，只能“赋闲”在远离北京的福州治疗腿伤。可是，在他心灵深处，却充满着渴望重返战场，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的激情，他在诗中写道：“为党吃苦谁谓苦，贵在身残心不残。”“革命一生未虚度，戎马廿年耻矜夸。吾今即令身残老，志在千里岂嗟呀！”

1967年初，身为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竟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他当面对陈伯达争论，指责陈伯达信口雌黄，将刘志坚诬为“叛徒”。同时，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谁要你保，我有什么要你保的？”特别是，他提出了“要不要军队”的问题，使林彪、江青一伙非常反感。4月，他的家连续被抄，门窗被砸碎，保存多年的资料、信件、日记被抢走。7月，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他又被打成“幕后操纵者”。

1967年3月底，全军文革的工作已改由他人主持，但徐向前的组长职务没有免除。9月16日，经过长时间思考，同时与

其他人反复商量后，徐向前终于向毛泽东正式写出辞职报告。报告说，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又不能象林彪说的那样“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此“已不适于作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工作”，请求中央免除该职，“另选贤能”。10月12日，毛泽东批示：“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徐向前只得继续挂名。

在中国共产党内，“辞职”已属罕见，“文化大革命”中，敢于辞去领导全军运动的要职，更是没有先例的。即使挂名其职，徐向前尚且免不了受冲击遭诬陷的命运，设想一下，假如真的辞了职，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样的境况？他当然看到了这一点，然而不愿在这种既是运动的“领导者”，又是运动的“对象”的矛盾中继续忍受精神上的折磨，与其受人摆布不得施展，不如卸掉包袱反而不必“违心”地这样那样。这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在当时那种局势和处境中，尤其如此。

第三节 真红不枯槁——质朴的感情

老干部们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动力还来源于深深植根于他们心中的对社会主义中国、对人民、对人民解放军的热爱，以及由此产生的质朴的情感：他们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浴血奋战，为社会主义的成就、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倾注大量的心血。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糟蹋人民奋斗的果实，这也是他们所以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发生深刻矛盾的原因之一。“文化大革命”中，不公正的政治迫害，沉重的精神压力，长期的牢狱生活，并没有彻底泯灭他们的忧国忧民之心，他们仍然一如既往，热切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在最困难的时刻顽强地表达出希望国家繁荣，国防强大，人

民幸福的心声。

1969年3月，中苏两国军队在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已不再负责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根据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共同研究的意见，起草了一份题为《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树》的报告上呈毛泽东。《报告》从剖析国际形势入手，分析了苏联突然入侵的原因、目的及其可能的发展，就平原作战、民兵建设、军队训练、军工生产、战场准备、武器装备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1969年10月，在林彪的“第一个号令”下，叶剑英被疏散到了长沙。此时，他的处境相当困难，儿子下放劳动，工伤致残，女儿身陷囹圄，自己年老多病。尽管如此，他仍然惦记着北部边境的局势，他在诗中写道：“敌军压境魔侵肺，心在边疆身在床。”值此内忧外患之际，叶剑英日夜思念的不是个人的荣辱得失，也不是家庭的不幸，而是祖国的安危。

1969年初，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搞调查研究。他非常关心工厂的技术革新，亲自参加座谈会，详细了解用新方法研制的合成橡胶的科研、设计、生产、使用等方面的情况。他说，我是穿军装的，是军人，考虑这项革新创造能不能应用于国防建设。他建议在航空工业、医药卫生方面考虑应用这项科研成果。同年8月，叶剑英向周恩来报告工厂改革规章制度的情况和自己向工人学习的体会，他热情地赞扬工人们公而忘私的精神，赞扬厂里出现的新风尚、新气象，对自己有机会接近工人群众，亲身参加劳动，经受锻炼，感到欣慰。他表示：“‘落后了，赶上去吧！’这就是我在学习班给自己的鉴定。”

1967年4月18日，《人民日报》一篇关于国际市场上镁的销售情况的报道引起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彭德怀的注意，20日，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前日阅《人民日报》……因而记起

去年四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 20 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好，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中含大量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矿渣（矿余）占 95%，年可产四、五十万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在林彪、江青一伙醉心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彭德怀却想到了农业生产，想到了化肥，尽管他的建议很难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其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身患绝症，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彭德怀还想着抓紧最后机会尽一点义务。他打了腹稿，准备总结军事思想，把自己经历的军事生涯加以提炼，概括，留给后人。他关心国防科研，一再惦念，“我们的国防科研不搞上去，要挨帝国主义打”。他对亲属说：“我这个病，治不好，可以作为医学解剖，研究癌症，最后为人民尽一点力。”

彭德怀热爱生活，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想着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他曾对侄女说：“我要给党写个报告，回我们湖南老家去，回太行山去也行，去种地，交给我一个公社，或者一个生产队。我敢立下一个军令状，只要三年，搞不好我自己把右倾的帽子戴起来。”1974 年 10 月，彭德怀病情越来越严重，说话已很困难，但仍然嘱咐亲人们说：“我不能再工作了。……想到工作，我觉得再活 70 年才好哩。你们年轻，要努力工作，要学一门本事，为人民添砖加瓦。不要去追名求利，搞那些吹牛拍马、投机取巧的事。”他念念不忘家乡的土地和家乡的人民，在最后时刻发出自己的希望和寄托：“我死以后，你们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去埋起来，在上面种上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文化大革命”初期，张学思被排斥在运动的领导之外。为了保持海军部队的稳定，不使指挥中断，他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战备值班，处理海军部队一些日常工作中去。他曾亲自出面组织海军司令部的干部、战士，日夜守卫海军的作战指挥、机要、通讯等部门，阻止“造反派”的冲击。局势最严重的一段时间中，他吃住都在作战值班室，一步也不离开。他对周围的人说：“部队乱了，还怎么打仗？我们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国家的重要机密，要是受到一点损失，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张学思是冒着“镇压左派”的罪名，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

贺龙失去自由后，多次回忆自己投身革命的经历，怀念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的战斗历程。建军40周年那一天，他与妻子在一起，从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谈到井冈山毛泽东与朱德的会师，从抗日战争谈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谈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感慨地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常常谈起国家的建设、军队的建设，谈起十几年来走过的山山水水，到过的海防哨所、营房阵地，对过去的忙碌和辛劳寄予深情，“要是再能看看这些地方，看看这些地方的人，该多好啊！”

贺龙明白，要整他的只是林彪、江青一伙人，这笔账无论如何不能记在人民解放军身上，人民解放军的人多数干部、战士是好的，是可爱的。甚至，对执行监护任务的战士，他也同样关心和爱护。一天夜里，听到了雨声，贺龙象往常一样对妻子说：“叫哨兵到走廊里来，别淋着了。”当知道哨兵已经在走廊上了，他连声说：“好，过来了就好。”另一个夜晚，窗外的哨兵忽然唱起了“洪湖水，浪打浪”，贺龙非常激动，感到自己被整成这个样子，人民却还记着他。得知哨兵是湖北人后，贺龙把话接过去，谈起了洪湖，谈起了家乡的人民，他说，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

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

尽管处境险恶，贺龙想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党的事业。国家处于危难，人民正在遭受痛苦，使他坐卧不安。他想把自己的遭遇、自己的忧虑告诉党组织，特别在和周恩来断了联系之后，这种愿望更加迫切。他要妻子为他准备一个布挎包，装上钱、粮票和必备的药品，挂在墙上，准备随时到群众中去。他也曾想和孩子们联系上，通过他们把情况和意见报告党组织。但是，这些都未能实现。

“文化大革命”前夕，朱德写过一首诗：“老松不怕秋风劲，叶细如针枝干硬。历经摇荡已多年，庇护红林葆其正。”“文化大革命”中，朱德正如诗中赞颂的老松一样，用自己的枝干，竭尽全力保护人民的利益。

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考虑的问题很具体，很实际，他总感到，几亿人要吃饭，要穿衣，照“文化大革命”这样乱下去，生产没人搞，人们吃什么？穿什么？于是，1966年10月17日，他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注意“抓革命，促生产”；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应该使工农业生产有大幅度的增长。12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群众已经起来了，我有点怕出乱子，特别是怕生产上出乱子。实事求是地说，朱德当时的忠告是中肯的，也是及时的，可是，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他的一番苦心得不到几个人的理睬。

1967年1月，夺权之风遍及全国，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贴出了攻击和诬陷朱德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朱德对大规模的武斗蔓延全国非常痛心，1月1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

革命，促生产”。这是新出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又说：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在搞武斗，甚至还有砸烂机器，烧毁房屋的，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注意。

尽管当时形势很乱，朱德每周总要到工厂、农村看看，他最担心“文化大革命”影响生产的发展。他说：“我外出活动，只是为了关心生产，看到庄稼在长，看到树木在长，看到群众，我心里就会得到一种安慰。”

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朱德的处境好了一些。1973年12月，毛泽东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否定了扣在朱德头上的帽子。

可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仍然使朱德感到压抑。他不赞成江青等人鼓噪的“批林批孔”运动。他对邓小平主持各方面的整顿很满意，当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攻击邓小平时，他仍认为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很好。1976年1月，针对江青等人把抓生产说成“唯生产力论”的观点，朱德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好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这一年的春节，朱德对人大常委会的几位负责人说：“总理去世了。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威望只能上，不能下。”“我们的生产只能上，不能下。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

1976年7月初，病情已很严重的朱德对到医院看望他的李先念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临终前，他断断续续地对周围的人员说：“革命到底。”

在那个“革命”最时髦的年代，朱德念念不忘生产，念念不忘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尽管他无力扭转局势，但他的一言一行，无愧于“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赞语。

老干部们的斗争精神深深感染着周围的普通群众。从老干部们的身上，他们体会到一种执着的追求，一种献身的自豪。他们很难理解为中国革命终生奋斗的人会反对自己的事业，很难理解曾经引为骄傲的社会主义成就竟然一无是处。他们不再盲从甚嚣尘上的现代迷信和狂躁，而是通过自己的感受、体会、直觉和判断，自觉地将自己与运动隔离，甚至勇敢地做出在当时很冒风险的事情。一位叫赵保群的战士奉命“监护”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成疾的张爱萍，他却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精心护理病人，与张爱萍在患难中结下深厚情谊。张爱萍后来为他题字：“破世俗一尘不染，立高洁两袖清风。”

人民解放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共同斗争的一部分。这种斗争支撑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希望，并最终引导中国摆脱“史无前例”的痛苦，迎来振兴的有时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暗淡的时期，人民解放军，包括它的数百万干部、战士，它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同中国人民一道，经历了长达 10 年的痛苦。“文化大革命”带给人民解放军的破坏是严重的、广泛的、长时期的。

“文化大革命”在一系列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从而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大量的正确方针和成就，许多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东西批判。在人民军队建设的许多重大理论原则问题上，“文化大革命”同样造成了严重混乱。林彪曾说：“军事工作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 年 11 月 3 日），“军事应该占百分之六十、七十以至百分之八十”（《在

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10月20日）。然而，1964年的群众性练兵运动掀起之后，林彪转而提出“突出政治”的口号，鼓吹“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1964年12月29日），“政治工作做好了……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对政治工作的指示》，1967年12月8日），“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的时间比例，现在是三七开，可考虑改为四六开、对半开、甚至倒三七开”（《关于改革军政教育时间比例的指示》，1966年2月），推行军事上的取消主义。这一错误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逐步走到极端，很长一个时期中，“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使许多人以为“抓政治保险，抓军事危险”，因而训练不讲指标，战士不讲进度，生产不讲效益，军队的主要精力被迫集中于徒具形式的政治学习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突出政治”不仅削弱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和业务建设，对政治工作本身也造成严重损害。林彪以“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名义宣传实用主义的学习方法，提倡背警句、走捷径，反对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原则。他把学习理论著作形容为玩积木，从这块换那块，就是那么几块板子。林彪甚至说，“什么唯物论，什么辩证法，什么历史唯物论，什么自然科学，不学也行，但无论如何，这个问题要学、要学懂一条，站在那个立场。这是超过一切，高于一切的问题”（《在接见出席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1967年1月23日），以庸俗的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相对抗。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捏造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军内资产阶级”等口号，制造了“二月兵变”、“二月逆流”、“七·二〇事件”、“砸烂总政阎王殿”、“杨余

傅事件”等重大冤案，把人民解放军及其领导干部当作“继续革命”的对象。他们在所谓“全面专政”的口号下，肆意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摧残和迫害不赞成、不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党内外进步力量以及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和各方面人士，严重挫伤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中坚。他们用反革命的政治标准区分所谓“左派”和“右派”，网罗一批野心分子、投机分子，作为依靠的骨干。林彪、叶群以接见、照相、请客送礼等手段拉拢空军某军政委王维国，王维国表示忠于林彪，“海枯石烂不变心”，在林彪集团覆亡前夕还派其儿子到北京密报毛泽东的行动和谈话内容。江青对 8341 部队副科长迟群封官许愿，拉拢重用。迟群多次写信表示效忠，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直接操纵“梁效”^①，炮制反革命舆论。

“文化大革命”使人民解放军的干部队伍建设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编造谎言，制造冤假错案，以莫须有的罪名给一大批军队干部扣上种种“反动”帽子，在精神和肉体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民解放军许多卓越领导人先后遭到诬陷迫害，长期不能正常工作，身心严重受创，甚至被关押，被迫害致残、致死。这些损失是无法用数字估量的。

据统计，仅在总后勤部，林彪、邱会作就制造了 100 多个集团假案，关押了 1700 多人，刑讯逼供致死 140 多人，致伤致残 350 人。10 年中，空军的冤假错案达到 5300 多起。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严重败坏了人民解放军长期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党内正常生活被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取代，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遭到

^①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舆论工具。“梁效”是“两校”的谐音。

粗暴践踏，派性留下的沉痾很长时间难以彻底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竭力鼓吹无政府主义，煽动造反夺权、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废除规章制度，造成部队组织纪律涣散，歪风邪气盛行。全军行政责任事故，1969年为17033起，伤16907人，亡3436人；1970年，据不完全统计为14757起，伤13908人，亡3352人。两年事故伤亡37603人，相当于1个军的兵力。报废飞机85架，相当于1个航空兵师的飞机。其他装备物资损失也很严重。“文化大革命”培植了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的恶习，许多人藉此起家，获取了政治上的殊荣。兰州军区某部战士刘学保“支左”时残酷地杀害了林场职工李世白，却把自己打扮成舍身护桥的英雄，一时名噪全国，成了“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很快入党提干，由排长升为指导员、副教导员、军区党委委员，并当上了中共“九大”代表。“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军政、军民团结，损害了人民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形象。军队以教育者的身分，不适当地干预地方事务，直接间接地指挥“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陷入地方的派性纷争和造反夺权。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使群众中长期形成的对人民军队的诚挚感情受到伤害。军队一些成员疏远和脱离了群众，对人民群众不那么谦虚了，对群众利益不那么关心了，变得盛气凌人，背离了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令人欣慰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浪虽然使人民解放军的肌体饱受创伤，却无法摧毁这支军队数十年垒筑于中国革命沃土之中的坚实基础。尽管政治运动造成的思想理论迷乱一度使一些本来绝无疑问的是非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指挥枪”的原则，仍然是人民解放军各项工作最基本的出发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可以曲解革命的口号，可以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用“左”的货色冒充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然而，慑于力量对比尚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还没有胆量公开抛弃中国共产党遵奉多年的全部理论基础和方针原则。人民解放军在茫然无措中身不由己地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漩涡，在良好的愿望和自觉的奉献精神驱使下，不幸成为许多错误的牺牲品。不过，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表现为这支军队的主流的，仍然是它始终遵循不移并且引为自豪的“人民军队”的光荣。它永远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己任。不如此，不能解释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部作用，不能解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方面梦寐以求抓军权，一方面却毫不留情地打击、摧残军队的卑劣行径。人民解放军从不怀疑自己的全部努力正在履行它的根本宗旨，即使在犯错误之时，以动机和效果统一的观点分析这一时期的人民解放军，批评它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绝不过分。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武装的“集团”，它的忠诚是无可指摘的。人们不应该怀疑它的“好心”，只是，“好心”有时也会办错事。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进行了艰难的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使得人民解放军的许多将领既是军队的统帅，又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者。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活动不仅代表着军队，而且代表了党，代表了政府，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他们在黑暗和混沌中树起光明的旗帜，用自己的力量甚至自己的生命实践共产主义的信仰，维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勤勉、努力和斗争使中国社会这架庞大的机器在沉重中维持着艰难的运行。“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

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建设还在进行，中国在国际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人民解放军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仍然英勇地保卫着国家的安全。这些得力于全党和各界群众的共同斗争，其中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人民解放军众多的领导者以及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斗争，以及最终粉碎两个反革命集团，人民解放军功不可没。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军队，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下 编
艰 难 的 前 进

“文化大革命”在 1966 年到 1976 年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等等无不明显地打上时代的印记，国防建设自然也不例外。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次政治事件象“文化大革命”这般“横扫一切”、“深入人心”，成为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或者从来没有直接感受过那个时代的中国老百姓久久谈论的话题。说到那些岁月，人们不免感慨万千，痛心疾首，难以抹平心灵深处的创伤。“文化大革命”留给中国人民无数痛苦，无数梦魇般的回忆。

然而，“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那些年中国社会生活的全部。中国社会象一部巨大而沉重的机器，依靠它 17 年中积蓄的力量，仍然缓慢而艰难地运转着。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掣肘，它的运转，益发缓慢，益发艰难。我们有必要将“文化大革命”同“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予以区别，以分清在这 10 年中，在中华大地上出现的所有社会现象，哪些是随“文化大革命”的浊浪裹挟而来的泥沙，哪些是伴随着“文化大革命”同时存在，却与“文化大革命”在本质上根本不同的属于中国社会固有的东西，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何以在如此“翻天覆地”的破坏中，“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文化大革命”确曾无情地侵蚀着人民解放军的肌体，骤然打乱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步伐。几百万满怀信心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努力实现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军人，迷惘、痛苦、愤懑，却没有消沉、懈怠，放弃自己肩上的责任。他们努力

维护着自身的团结、统一和完整，同时努力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团结、统一和完整。他们热爱这支军队，仍然牢记着人民军队自建立之初即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记着军队担负的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任务。他们以自己的热情和努力，竭力倾注心血汗水于军队建设，使人民解放军尽管伤痕累累，遭受了建国以后最严酷的考验，却始终没有停止前进的努力。甚至，在许多方面，它所取得的成绩，令所有关心它的人感到欣慰和鼓舞——特别是，在那样的背景之下。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人民解放军既遭受严重的破坏，又取得明显的进步。讲破坏否定不了进步，讲进步忽视不得破坏，亦进亦退，大进大退，时进时退，进中有退，退中有进，形成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显著特点。

第八章 “三支两军”

最能将人民解放军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最能说明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莫过于“三支两军”（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工业生产、支援农业生产、军事管制、军事训练）。

“三支两军”为长期生活于军营中的数百万军人展现出陌生而广阔的新天地，也使工业、农业、教育、文艺、科技等等领域无不带上军营的味道。“三支两军”使许多未曾较多地接触军官和士兵的老百姓开始了解军队，了解军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注入一种新的因素，他们由知之不多或一无所知，变得可以对军队评头论足了。然而，带着“文化大革命”的明显局限性，猛力抓住“三支两军”的失误，批评军队，责备“三支两军”人员，似乎不把“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失归咎于人民解放军就不能解释那个时代的所有苦难，虽然代表了为数不少的人难以名状但却可以理解的复杂心态，却未尝不是囿于局部，失于偏颇。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一问题作出权威性的结论：“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既是“积极的作用”，又是“消极的后果”，看起来似乎折衷，却极其简约地用两句话概括出“三支两军”的功过是非，只讲任何一句

话，不讲另一句话，都不可能恰如其分地说明“三支两军”造成的所有现象。

第一节 “三支两军”的提起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的“夺权”阶段。1月初，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被“造反派”夺权。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勒令陈丕显交代所谓“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从而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权力，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毛泽东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了上海市“造反派”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贺电，肯定了上海的夺权行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表示坚定地支持上海夺权。此后，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各省市，全国陷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相继瘫痪或者半瘫痪，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失去或基本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武斗成风，交通严重堵塞，社会秩序混乱，局势难以控制。

为了制止上述混乱局面，为了使“文化大革命”按照预定方针继续进行下去，毛泽东决定人民解放军正式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三支两军”的核心是“支左”。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军委采取一系列措施，有效地减缓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军队的蔓延。同地方绝大多数单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组织系统和指挥系统仍然广

整，师以下作战部队保持了基本稳定。毛泽东希望借助人民解放军的组织系统代替党和政府部门的各级机构，形成自上而下的领导体系，希望借助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威信重建权威，贯彻继续“文化大革命”的意志和决心。同时，毛泽东认为，新的权力机构中，必须排除那些已经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应该打倒或者坚决批判的过去的领导人。

1967年1月21日，安徽省“造反派”计划召开大会，批斗省委主要负责人李葆华，要求军队支持，保护会场、防止对立派的冲击。同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电报上批示：“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同时指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当日，周恩来向军委碰头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批示。第二天，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议人员，要求他们“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象唱戏一样，要亮相”。他指责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讲得一片黑暗，好象一点光明也没有。要求军队“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

毛泽东的批示打破了军队与已经兴起并且愈演愈烈的“文化大革命”之间的隔膜，消除了军队加入“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障碍。林彪、江青一伙早就对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置身事外强烈不满，借此机会，他们正好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和政治影响。康生立即表示：“全面内战，你人民解放军能站在外面吗？决没有这个道理。如果军队不在左派方面，左派就无权了，或者说是无军之权。”陈伯达则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全面的阶级斗争中，人民解放军没有中立的余地，没有不介入的可能。……现在的问题，决定一切的问题，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站在左派一边来，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来，打退资产阶级及其代

表人物的反扑。”林彪说的更为直截了当：“所有右派掌权的地方，统统要夺过来。政权必须掌握在左派手里。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左派不夺右派的权，右派就要夺左派的权，就要颠覆左派的政权。”军队“现在进入了介入的时期。不介入事实上也介入了，现在正式介入，公开介入。过去不介入，是时机不成熟，哪个左派哪个右派看不准，现在看清楚了。”他们的讲话，有一点是对的，人民解放军不可能长期置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之外，“文化大革命”的浊浪总要冲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对人民解放军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趋势，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不过或迟，或早，或以这种形式，或以那种形式介入罢了。但是，问题的另一面，军队究竟站在哪一边，支持谁，抵制谁，却是可以选择的。在这一点上，主观的因素起着决定的作用。林彪、江青等人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引导军队去支持由他们选中或圈中的所谓“左派”。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重申了毛泽东的意见，指出：“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决定》就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作出规定：（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

示；（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2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不能折中，不能调和，不能中立”，“应该鲜明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对于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必须进行坚决镇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正式拉开了“支左”的帷幕。

3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一、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暂告一段落。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这些单位究能抽调多少人员，何时开始，由各总部、军兵种党委讨论决定；二、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包括各军区所属的这些单位），可在整风告一段落后，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作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样做，既可以增加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力量，又可以使这些单位的人员，更好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向工农群众学习，促进思想革命化。这些单位的整风何时结束，能抽调多少人员，何时开始，由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党委讨论决定；三、各总部、军兵种（包括在北京的所属院校）抽调的人员由总政治部统一分配，使用。驻各军区所在地区的院校抽调的人员，统一由各大军区、省军区领导、调配和使用。”按照这一“指示”，人民解放军大批人员投入“三支两军”。

第二节 “支左”

派人民解放军“支左”，是“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非常措施。脱离军队建设的正常工作，集中力量参与地方事务，其时间之久，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决定了“支左”的根本目的是利用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支持“造反派”从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取权力，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并且把这场“革命”纳入它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企望的“正轨”。林彪直言不讳地说：“进行斗争的力量，主要依靠左派。左派稳定了天下，立了大功，打倒了党和人民的很多敌人。很多难办的事他们办到了。几十年没有打倒的敌人，他们打倒了。”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尽管身不由己，然而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悲剧的主角，并且深受其害。

“支左”是人民解放军正式地、公开地、大规模地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却不是这种“介入”的开始。在此之前的1966年7月，中共中央即同意了总政治部的请示报告，决定采取抽调干部组织工作队，选调转业干部到文教战线工作，个别抽调领导骨干的办法支援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各地进驻大专院校的工作队中，部队干部为数不少。南京军区派驻南京大学的几名工作队成员，公开抵制和反对江苏省委“对内分歧，对外统一；对上言明，对下不谈；服从组织，保留意见”的要求，支持“造反派”批判学校党委，并进而揭发所谓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在工作队内部造了反，造成极坏的影响。毛泽东在军委碰头会上对这一行动予以肯定，《解放军报》刊登了这几个人的“经验”介绍。在毛泽东“批示”之前的1月14日，山西省驻军已介入了当

地的夺权活动。《决定》发布的当晚，哈尔滨驻军即参与取缔所谓“荣复军”的行动。此后，驻贵州、黑龙江等地的军队很快介入了当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

人民解放军“支左”，面临的首要困难是在众多的群众和群众组织中区分出“左派”和“右派”，将各级领导干部划分为“革命领导干部”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里，过去的原则用不上了，理智和感情同样不能成为标准，一切取决于站的什么队，跟的什么人。1967年6月27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群众》，提出“识别左派，要看大节”，什么是“大节”呢？“是不是坚决地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对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还是保，这是大节，是政治方向问题”。并且，“方向对了，就是大好”。“社论”要求人民解放军“在革命左派和保守派之间，我们要‘一边倒’，要坚决倒向左派一边”。贵州省军区政治部介绍的夺权体会称：左派的主要特点是……斗争矛头始终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主要领导成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敢想、敢说、敢冲、敢闯、敢于批判旧世界，有强烈的革命造反精神。而保守派组织，表面上守规矩，老实听话，但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开始时认为“省、市委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后来仍坚持“省、市委是革命的，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对“炮轰”、“火烧”等口号不感兴趣。1月25日，贵阳市“造反派”夺权，贵州省军区派部队予以支持。26日晨，部队配合“造反派”，包围了另一派群众组织所在地，逮捕了其领导人。2月2日，省军区组织大规模的游行集会，表示对“造反派”的支持。省军区主要领导人连续5次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排斥另一派群众组织。

有些部队与当地“造反派”组织之间有矛盾，在不介入地方

“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尚可避免直接接触，求得表面上的相安无事。但是，“支左”命令一下，曾经引起厌恶和反感的“造反派”突然成为必须公开支持的“左派”，这不能不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引起支左部队和“造反派”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冲突。1967年2月，青海省西宁市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中，认定与驻军严重对立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是反动组织，宣布取缔，并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2月23日，青海省军区调动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双方发生冲突，导致部队采取错误行动，开枪打死群众169人，打伤178人。“二·二三事件”后来被宣布为“反革命政变”，曾经支持开枪的林彪见风头不好，企图把责任推给叶剑英，并利用这一“事件”鼓吹“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煽动“造反派”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揪斗军队领导人，搞乱军队。“二·二三事件”的主要责任者，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被认为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被隔离审查10年。

为了排除“支左”遇到的阻力，同时进一步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中共中央军委1967年3月间在北京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会上，林彪再一次强调，军队“支左”“特别要警惕犯右的错误”，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这一边，站稳阶级立场，不要以为自己的想法当然是对的。林彪说，“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比起世界各国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小得不能比拟，也比不上我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比不上一次小的战役，一场不大的流行病”，因此，“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林彪极力赞扬“造反派”，论证“支左”的必要性，他说：“这次革命是最好，是采取打倒他们的最好的办法：搞红卫兵，大鸣、大放、大字报等等。红卫兵就是捉拿牛鬼蛇神，捉

拿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头子的天兵天将，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会议无法就“三支两军”遇到的各种问题和错综复杂的情况取得一致意见，更不能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会议提出“三支两军”中需要解决的 20 项问题，如：分不清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怎么办？左派夺了权却没有实行大联合怎么办？夺权排斥“长”怎么办？不同建制单位看法不一致怎么办？领导干部站不出来怎么办？军管后，各派组织斗争激烈怎么办？军训时，各派意见不一，要军队表态时怎么办？支农、支工时，干部摆挑子，生产无计划，群众无热情怎么办？军队本身任务和支左等任务矛盾时怎么办？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将无所适从，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又是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解决的。唯一的办法，只能硬性规定，用林彪的话说，就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1967 年 4 月 1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安徽“支左”问题的 5 条决定，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第三，在取缔证据确凿的反动组织时，要把为首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一般群众严格区别开来；第四，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群众组织或群众，应采取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第五，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群众组织。很明显，这个“决定”是针对军队的，要求军队在“支左”中，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姑息“造反派”的挑衅和破坏，容忍他们的胡作非为。这个“决定”是对前两个月“三支两军”工作的否定。

4 月 6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由林彪起草，毛泽东作了多处修改的“十条命令”，其要点是：（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

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九）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4月20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讲话，对1月28日的“八条命令”和4月6日的“十条命令”的关系进行解释，她说：“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人民解放军，是讲拥军的。”“十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群众，是讲爱民的。”江青的讲话回避了问题的关键，她没有说明“对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与“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也没有说明1月份提出的“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与4月份提出的“概不追究”“过去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群众”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其实，倒是借江青之口说出的群众的感觉更能说明事实的真相：“八条命令”是支持军队，压“造反派”的；“十条命令”是压军队，支持“造反派”的。两次“命令”，时隔两个来月，内容上发生如此根本性的变化，反映了1967年初中国政治形势的重大动荡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变化。

此后，许多地区的“支左”工作被迫检讨、转向。内蒙古军区在“支左”初期不赞成将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统统打倒，与“造反派”观点冲突，“造反派”即组织冲击和包围军区。军区宣布呼和浩特市“造反派”组织“三司”是反动组织，逮捕了其中一些人。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宣布内蒙古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决定改组内蒙古军区，调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未到职），军区原副政治委员吴涛任政治委员。然而，组织上的决定没有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军区内部甚至也分裂为两派，并把争论带到了北京。5月26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对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参谋长王良太实行隔离审查；对军区副政治委员刘昌、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军区其他在京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调1个师的兵力移驻呼和浩特市，将军区警卫营、通信营部分人员和高炮营、测绘大队调离呼和浩特市，分驻北京军区指定地区；将内蒙古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改组后的内蒙古军区命令，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支持呼和浩特市“三司”等“左派”群众组织。内蒙古地区的“支左”工作完全转移了方向。

人民解放军驻山东省的部队认为王效禹为首的“造反派”在执行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存在许多问题，因而支持了另一派群众组织。但王效禹通过康生的儿子张子石得到了康生的明确支持，并经康生批准，主持青岛市和山东省的夺权。2月3日，山东省

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效禹任主任。5月18日，经康生提议，王效禹被任命为济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山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表态，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的“支左”工作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被迫公开检查，表示支持王效禹、支持王效禹为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支持山东省三大“左派”组织。6月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转发了山东省军区《关于向革命群众公开检查支左工作中的错误的情况报告》，将其中“公开检查比不公开检查好，高姿态检查比低姿态检查好（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早检查比晚检查好”三条体会作为范例，推广全军仿行。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分别对福建、四川、甘肃、广东、湖南、江西、河南、吉林等地的“支左”工作作出决定或发表意见，否定了这些地区前一阶段的“支左”。各地区“支左”部队被迫先后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作出报告或公开声明，违心地检讨“错误”，做思想“转弯”和“调屁股”的工作，公开支持“造反派”夺权、掌权，解散或压制曾经支持、依靠过并且已经建立起感情的所谓“保守组织”，军队“支左”工作完全陷于被动、混乱状态。

第三节 军管和支农、支工、军训

一、军事管制

“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严重危及到一些核心、要害部门和机要单位的安全，为使运动顺利进行，又不致因此影响这些部门和单

① 毛泽东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所谓“三结合”，即：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

位必需的正常秩序，1966年下半年以后，中共中央先后决定：凡是对运动领导发生困难的地区，各种档案和机密资料一律交军区代为保管；派人民解放军维护国际旅客联运列车秩序；一切重要的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都要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以维护必要的秩序。以后又规定，对于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或者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或边防、沿海，或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或专政机构，或机密要害部门，或国防企业事业单位，国防工厂、仓库等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中共中央决定，由军队接管民用航空系统；对长江航运局实行军事管制；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对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对邮电、电台、消防等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等等。军事管制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种是派出军代表，必要时派出军队保护。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由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统一管理该地区的社会、治安、工农业生产和“文化大革命”。在军事管制委员会下，一般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负责全面领导所在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一个班子负责生产指挥。各级军管会受上级党委和军管会的领导，同时领导下级党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军管会，军管会本身亦受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党委的领导。到1967年2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已有6900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3100多个，约占全部军管单位的一半，银行1400多个，以上军管单位共用兵32个团。从地区上看，已经实行军事管制或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省、自治区有10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尚未确定是否实行军事管制的

省、自治区有7个（内蒙古、河北、甘肃、宁夏、四川、江西、湖北）。以后，军事管制的范围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一部分军队对另一部分军队实行军事管制的奇怪现象。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院校，甚至总政治部都曾被军事管制过。

建国初期，作为一种临时性的过渡性的权力机构，人民解放军曾短时间执行过军事管制任务。但那是在许多大中城市刚刚解放，残余反动势力聚集，地方政权尚未建立或尚未巩固的情况下采取的非常措施。一旦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走上正轨，军事管制的必要性随之消失。时隔十几年，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已发生深刻变化，采用军事管制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全面地长期地接管地方工作，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它无法解决由此产生的众多矛盾，反而使军队工作和地方工作同时受到伤害。

二、支农和支工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不久，为了阻止工农业生产不断下降的趋势，中共中央曾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1966年12月9日）、《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966年12月15日），要求工厂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农村生产队积极开展“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然而“文化大革命”没有也不可能解放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力，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丝毫掩盖不了工农业生产面临的严重危机，不仅在那些派性严重，武斗成风的地区，即使形势不那么紧张的地区，停工、停产也已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1967年初，鉴于“文化大革命”可能影响即将开始的春耕生产，中共中央2月20日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要求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并且建议人民解放军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大力支

持、帮助春耕生产。23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号召全体干部战士立即动员起来，积极协助驻地农村人民公社和各级领导干部，抓好春耕生产。《指示》要求各地驻军大力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的意义，不违农时，迅速掀起春耕生产高潮。要求省军区、军分区和市、县武装部，把抓好春耕生产作为目前工作的重点，协助当地领导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安排春耕工作的落实。在某些原来干部已经不能工作的单位，军分区、市、县武装部以及驻军团以上领导机关还应当同当地贫下中农组织协商，搞好领导生产的班子。人民解放军派出大批宣传队，宣传中共中央《公开信》的精神，说服动员农村基层干部承担起组织领导春耕生产的责任。空军在20多天中，出动飞机170多架次，空投散发公开信1339万份。各部队以大量的劳力和技术力量迅速投入支援春耕生产，及时完成春播，扭转了这一年的春耕生产的疲软局面。此后，人民解放军采取定点挂钩支援和普遍支援，定期支援与临时性突击支援相结合的形式，支援农业生产。

1967年的农业生产形势不容乐观，相比之下，工业生产更令人焦虑^①。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的决定。此前，毛泽东曾提出，军队“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使遭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工业生产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一些因武斗而瘫痪的重点工

① 据统计，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其中工业总产值下降13.5%，同上年相比，钢产量减少32.8%，煤产量减少38.3%，发电量减少6.2%，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减少35.3%，铁路货运量减少22%，农业方面，除粮食、棉花比上年略有增长外，其他各项农产品大都减产。

程得以继续进行。人民解放军参加了这一时期许多重点工程的建设；参加铁路、公路新线的修筑；派出人员、机械到车站、码头突击装卸、运输，解决压车、压船、压港问题；以至顶班采煤采矿。自1966年起，根据国家经济建设需要，人民解放军先后组建了冶金、煤炭、黄金、铀矿等专业部队，担负国家急需的矿产资源的勘探、开采任务（参见本书第十三章）。

不失时机地支援工农业生产，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支援的意义和作用显得更为重要。许多地区的经济生活没有陷于崩溃，中国的国民经济虽然遭受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人民解放军作出了自己积极的贡献。

三. 军事训练

196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作为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新内容。毛泽东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毛泽东认为，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按照中共中央的《通知》，政治训练内容主要是学习毛泽东的一些文章以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和文件，有些学生也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军事训练的内容主要是必要的队列训练。训练地点在本校，每期15—20天。以后，毛泽东提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20天，上课后的军训时间，每天不超过4小时。1967年3月7日，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

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这个“批示”后来被称作“三·七指示”。

“军训”将人民解放军的组织性、纪律性灌注于学校工作，灌注于青年学生，对稳定学校秩序，防止更大的混乱起到了一定作用。人民解放军的积极参与，使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的教学工作开始恢复。但是，另一方面，“军训”又不可避免地将“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贯彻到学校工作中去。同时，缺乏学校管理经验和教学经验的军队干部将军队工作经验生硬地移植于学校，用带兵教兵的方法对待青年学生，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

第四节 “三支两军”的深刻教训

到1970年底，人民解放军共有干部战士279万余人次参加过“三支两军”，当时仍在“支左”的有40余万人，其中担任县和相当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有4.9万余人（内干部4.8万余人）。仅此一个数字，足可想见“三支两军”的规模和作用。

1971年8月，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要求对这个文件“认真研究”，引起重视。广州军区的《纪要》反映，“三支两军”人员中存在着一些错误的思想作风，如骄横跋扈、好大喜功、任人唯亲、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等等；有些“三支两军”人员不尊重不支持已经成立的地方党委，存在着特权思想。毛泽东指出：“地方党

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么？”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并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三支两军”工作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在一个地区，应当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三级军事机构，除了保持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和隶属关系外，同时是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驻各地的野战军，除了接受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外，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中，也必须接受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余调回部队。少数有某种特殊需要的地方和单位，对外可保留军管名义，对内不再行使职权；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即行撤销。以后属于部队支援地方的各项工作，由部队政治机关负责；调整地方党委成员，更多地挑选一些熟悉全面工作的比较有经验的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继续留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除主管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工作的军政主要负责干部外，原则上不再兼任军职。此后，“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三支两军”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它的必要性最突出地表现在“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参加“三支两军”的绝大多数干部战士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他们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努力发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忍辱负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贯宗旨，做了大量的工作，缓和了紧张混乱的局面，维护了必要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保护了一批老干部，减少了工农业

生产的损失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支两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有人可能说，“三支两军”中，许多地方干部因此受到伤害，但也有人认为，如果不是军队的保护，许多地方干部根本活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有人或者说，“支左”干部搞“瞎指挥”，使生产下降，但更多的人认为，即使是“瞎指挥”，也比没有指挥强，至少，工厂的机器仍在转动，生产仍在进行。历时5年余，纵横全中国的“三支两军”，要想条条理清它的功过是非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但有一条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中国人民将会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蒙受更大的灾难。

如果以上指的是关于“三支两军”的第一句话，指的是“积极的作用”，那么，作为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尤其值得重视的倒是第二句话——“消极的后果”。“三支两军”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项非常措施，作为贯彻“文化大革命”指导方针的重要步骤，在总体上不可能不执行“左”的一套东西。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战士思想上缺乏必要的准备，对汹涌而来的所谓阶级斗争浪潮没有也不可能及时辨识清楚。同时，军队工作与地方工作毕竟是性质，特点极不相同的两个领域，军队干部战士既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又不了解这些地区和单位的历史情况。再加上“三支两军”人员本身素质的缺陷，这些“消极的后果”在所难免。

(1)“支左”就是支派，“支左”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具体观点有所区别，但不论哪一派，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打着“造反有理”旗号，矛头指向所谓“走资派”的，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军队支持哪一派都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只有选择犯什么错误的自由，却不可能不犯错误。人民解放军的参加，被视为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最可靠保证。军队支持一派，必然压

制另一派，从而加剧了群众之间的对立，也使部分群众与军队之间因此产生严重隔阂。

(2) 执行了“左”的错误政策，损害了军政军民关系。“支左”人员担任了许多地区和部门的领导职务，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其中由军队干部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有20个，其余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地方干部则大都兼任了军队职务（参见表8）。据统计，军队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山西省占95%，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全国军队干部担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一、二把手的，有5193人。各级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中也有大批军队干部参加，有的地区甚至连一般办事员、保密员、打字员也由军队人员担任。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各地区领导“文化大革命”，组织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权力，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方针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在阶级斗争迷雾的影响下，参与、主持和领导了许多地方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伤害了一些干部和群众，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有的地区甚至动用武力，造成流血事件。1967年8月，康生宣布宁夏回族自治区群众组织“筹备处”为“保守派”，指责准备进驻吴忠地区的部队“太软了”、“原则性不强”，要求支持另一派群众组织“总指挥部”，“必要时可发枪自卫”，继而宣布，对“筹备处”“不能搞重庆谈判”，“性质变了，武装镇压”。8月28日，部队执行错误命令，开枪打死打伤群众各100余人，演成了“八·二八青铜峡流血事件”。该地区军政、军民关系长期紧张，直至1983年开始整党后，才逐步得到缓解。其他地区也发生过类似事件，造成严重后果。

(3) 有些“支左”人员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尊重地方干部和

表 8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成立时间	地 区	主 任	军 内 职 务
1967.1.31	黑龙江	潘复生	沈阳军区政治委员，黑龙江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67.2.3	山 东	王效禹	济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山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67.2.13	贵 州	李再含	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67.2.23	上 海	张存桥	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
1967.3.18	山 西	刘格平	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山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67.4.20	北 京	谢富治	上将，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
1967.8.12	青 海	刘贤权	少将，青海省军区司令员
1967.11.1	内蒙古	滕海清	中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
1967.12.6	天 津	解学恭	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天津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
1968.1.5	江 西	程世清	少将，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
1968.1.24	甘 肃	沈恒汉	中将，兰州军区政治委员
1968.1.27	河 南	刘建勋	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68.2.3	河 北	李雪峰	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1968.2.5	湖 北	曾思玉	中将，武汉军区司令员
1968.2.21	广 东	黄永胜	上将，广州军区司令员
1968.3.6	吉 林	王淮湘	少将，陆军第 16 军政治委员（后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
1968.3.23	江 苏	许世友	上将，南京军区司令员
1968.3.24	浙 江	南 萍	少将，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
1968.4.8	湖 南	黎 原	少将，陆军第 47 军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1968.4.10	宁 夏	康健民	少将，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1968.4.18	安 徽	李德生	少将，陆军第 12 军军长（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68.5.1	陕 西	李瑞山	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兼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68.5.10	辽 宁	陈锡联	上将，沈阳军区司令员
1968.5.31	四 川	张国华	中将，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1968.8.13	云 南	谭甫仁	中将，昆明军区政治委员
1968.8.19	福 建	韩先楚	上将，福州军区司令员
1968.8.26	广 西	韦国清	上将，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68.9.5	西 藏	曾雍雅	少将，西藏军区司令员
1968.9.5	新 疆	龙书金	少将，新疆军区司令员

科技人员，搞“瞎指挥”，给工农业生产造成损失。“支左”人员掌握着生产调度和人员指挥的权力，却无法短时间内使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达到相应的高度，错用权力、滥用权力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有些部队不适当地侵犯地方单位和群众利益，占用地方大量土地、房屋和其他设施，长期没有归还，影响了地方的生产、教学、科研和群众生活，群众意见很大。“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占用地方房屋约 1800 万平方米，仅北京军区即占用地方房屋 1357 处，311 万平方米（其中学校 326 所，医院 30 所，私人住宅 21 处，其他房屋 980 处）。尽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多次要求归还这些房屋，但到 1973 年底，仍有近一半的房屋没有归还地方。

(4) 地方的派性影响到军队，造成军队内部的不团结，削弱和破坏了军队的思想、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有些地区，不同建制的部队对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不一致，支持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因有部队的支持各执一是，部队因受群众的影响坚持分歧的意见，派性难以消除。如前文所述，保定地区即是一例。另外，大批人员参加“三支两军”，军队的许多必要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有的人武部 40—50% 人员在外“支左”，8 名党委成员中，6 人参加地方党委，人武部本身反而长时间开不成党委会。

(5) 军队一部分干部被搞坏了，有些“三支两军”人员大权在握，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滋长了骄气，甚至骄横，唯我独尊，听不进批评意见，在自己分管的地区或部门称王称霸。有的“支左”干部硬要把组成县委的名单提交武装部讨论，重大问题“支左”干部讨论后才交地方党委通过，极少数“支左”人员滥用职权，违法乱纪，败坏了军队声誉。个别人员与林彪、汪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联系密切，在“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下干了不少坏事。

不少军队干部参加了地方的专案工作，参与了对地方干部的打击迫害。仅参加原中共中央一、二、三办工作的军队干部即有 789 人，其中担任专案组正、副组长的有 126 人。这些干部自觉不自觉地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有的堕落为他们的帮凶。

第九章 加强战备，准备打仗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解——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仍然高度关注人民解放军的建设。

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同时提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和强化国家机器的任务。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虽然局部的边境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但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已经基本停止。尽管军队的根本任务仍然是战斗队，然而其基本的表现形式已由作战转变为利用和平时期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事变作好精神上 and 物质上的准备。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提出，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内敌人，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的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外敌人的颠覆和侵略，担负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矛盾的任务。进入6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出现的许多重大变化，促使中国不断提高对战争的戒备程度。一方面，在南方，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造成的两国间的紧张状态尚未消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使东南亚成为新的战争“热点”；另一方面，在北方，随着中苏两党分歧的加深，两国关系开始恶化，两国之间不断发生边境摩擦。同美国相比，中国越来越认为，与自己接壤的并且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苏联是最现实的最危险的敌人，战略重点由南向北转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内“斗争”的日趋尖锐并没有减弱反而愈加强化了对战争日益临近的警惕性。国内阶级斗争被认为具有复杂的国际背景，国内外阶级敌人又总是遥相呼应的，“反修防修”不仅具有国内意义，而且具有国际意义。因此，“文化大革命”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或者搞乱了经过十几年艰辛努力完成的战争准备，但在总体上，在原则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始终没有低估。1966年，毛泽东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作了解释。他指出，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然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国家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宋时轮：《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毛泽东认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1972年，毛泽东进而提出“深挖洞（指防空洞），广积粮，不称霸”^①，赋予“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口号更加具体的内容。

第一节 战备工程

1956年3月，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彭德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以“积极防御”作为人

^① 《明史·朱升传》记载，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该怎么办，朱升回答：“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建议，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借用这个历史故事阐明自己的主张。

民解放军基本的战略方针。此后，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尽管在作战对象、防御方向以及作战形式等问题上有所调整，但“积极防御”作为一个完整的战略方针，则始终没有改变。“积极防御”方针要求在战争爆发之前，加强战争准备，采取积极措施，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战争一旦到来，就以持久的人民战争，打破敌人的速决企图，以积极的作战行动，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尽早转入战略反攻，并发展为战略进攻，彻底打败敌人。

60年代中期以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表现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打人民战争，打歼灭战”，核心是“诱敌深入”，防御的重点在“三北（华北、东北、西北）”。确定这一方针的基本考虑是：未来战争初期，敌我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敌进攻我防御，敌主动我被动，如果排开一条线，分兵把口，处处设防，战线拉得过长，敌人到处可以突破，突破了就会告急。只有大胆地、主动地、彻底地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打，才有理有利，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使敌人拉长战线，兵力分散，后方空虚，背上包袱，便于我们审时度势，有把握地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和地点歼灭敌人。

为要诱敌深入，有计划有准备地把敌人放进来打，又不使敌人长驱直入，必须选择一些要点，依托预设阵地，坚决守住。在长期的反复争夺中大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挫其锐气，为以后的歼灭战创造条件。当时设想，在敌人最可能进攻的方向上按三线部署：第一线边防部队主要起警戒和通风报信作用，敌人进关后则留在敌后打游击；第二线组织守备部队坚守；第三线用一定数量的野战部队坚守，非到万不得已，不能放弃。根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中国动员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防御工程建设。

一. 人防工程建设

越南战争和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几次局部战争，一个显著特点表现为空袭和反空袭的斗争。基于这一认识以及中国尚不具备与美、苏空军相抗衡的实力这个事实，中国领导人把城市 and 要地防空作为未来战争中必须采取的主要手段之一，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人民解放军积极参与了这一工程的组织和实施。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月里，这项工程从未间断。

1965 年，毛泽东谈到人民防空问题时说，“还是房子底下挖洞”，主张大城市都要挖防空洞。毛泽东估计，有三年半左右的时间，大体上可以初具规模，但是，战争可能等不到那时就蔓延到中国。因此，既要抓紧时间，加快速度，又不要搞过了头，把人吓得要死。毛泽东提出，今天挖一点，明天挖一点，有些到临战时再搞。总参谋部确定北京（含天津）、沈阳（含鞍山）、上海、武汉、西安、兰州、成都等 38 个城市为防空保卫的重点地区（配有防空部队）。

1969 年，人防工作再次作为加强战备的重点任务之一提上议事日程。8 月 27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决定成立各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次日，经毛泽东批准，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组成，周恩来任组长，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阎仲川（副总参谋长）任副组长^①。办事机构设在总参作战部。

大规模的人防工程建设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69 年到 1971 年属于第一阶段，即自发构筑阶段。这一时期，为了应

^① 1972 年 4 月，全国人防领导小组副组长改由叶剑英、李先念、张才千担任。1975 年 5 月，邓小平任组长，李先念、杨成武任副组长。

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在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的同时，号召厂矿企业职工、城市居民自力更生，家家挖防空洞，或者各家挖各家的，或者几家合挖，相互贯通，达到每人有一个掩蔽位置。各城市工事构筑的步骤一般是：第一步，解决所有人员和主要物资的防护隐蔽；第二步，把工事搞活，使所有人员能通过地下向郊区疏散转移；第三步，解决主要生产设备进山、进洞和转入地下继续生产的问题。据 1970 年底的统计，全国 75 个大、中城市已挖防空工事 1625 万平方米，平均可掩蔽市区人口的 60%，许多城市的工事已连片成网。在此基础上，大部分城市已开始规划建设通往郊区的疏散干道，其中 52 个大、中城市已完成 45 万纵长米。“三北”地区一些靠近边境的城市中，许多工厂、学校已经可以转入地下。这些单位的工事，已经初步达到能躲藏、能生活、能生产、能工作、能防御、能进攻的要求。1971 年 4 月，总参谋部在辽宁省旅大市召开“三防（即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武器）”现场经验交流会。旅大市集体防护工事的进展很快，基本建成了使全市居民转入地下的“能藏、能走、能打、能生产、能生活”的地道网，并采用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划片分段，片段结合的方法，逐步完善“三防”设施，使工事达到“能堵、能排、能滤、能消”的要求。但是，这时的工事主要为了应急之需，仓促上马，基本上是简易的，缺乏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和长远打算，普遍存在着质量不高，被覆跟不上的问题。在密集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如何建设防空工事以及工事的防水、排水和通风防潮等问题也缺乏有效措施妥善解决。经过一两个雨季，这些工事大量报废。另外，由于施工条件简陋，伤亡事故较多。

1972 年到 1978 年是有计划地构筑的第二阶段。由于对战争问题特别是战争爆发的时机问题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也由于总结了前一阶段人防工程建设的经验教训，国家正式将人防工程建

设纳入国民经济建设的总体规划，确定了人防工作的重点城镇，使人防工程所需经费和材料有了保证，工程建设大部分达到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标准。根据不同地形、不同战略位置城市的特点，山城和近山城市重点将市区地道与山区坑道连成一体，把山洞作为坚持生产和工作的基地，使山区成为城市的依托；平原城市继续坚持“房子底下挖洞”，根据地下水位的高低，能深挖就深挖，不能深挖就浅挖；前沿城市不仅要防，还要准备打，按打防结合的方针建设防护工程；纵深城市主要解决防的问题，保证战时能够保存有生力量，并坚持生产，支援前线。据统计，东北地区 1978 年人防工程总数已达 800 万平方米，其中绝大部分是永久性的，平均可隐蔽市区人口的 1/3。

第三个阶段是调整改造阶段。1979 年以后，包括战争准备在内的各方面工作中的“左”的指导思想得到摒弃，人防工程建设开始克服以前重速度、轻质量，重建设、轻管理和工事不配套等问题，基本上停止新建工程，重点对已有工程进行加固改造，提高工事的完好率。同时，注意抓好人防工事的综合利用，促进城市兴办第三产业，扭转了“守摊”、“看洞”、“吃补贴”的局面。

现在看来，经营多年的人防工程建设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渲染了已经相当紧张的战争气氛，况且，大量的人防工程成为和平时期“养不起”又“丢不得”的沉重包袱，既占用大量建筑资金，又需要投入相当数量的维护费用。天长日久，工事坍塌、废弃，或者移作他用，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但是，人防工程建设确实从一个方面反映了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中国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战略指导思想，这就是战争随时可能发生，而战争一旦发生，伴随着大规模地面部队的入侵，敌人必然对重点城市和主要工业区实施空中袭击，为要保存战争潜力，准备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必须广泛动员群众，认真做好对空防御。因

此，人防工程建设就不仅是一般的工程建设，它所具有的更深一层的意义还在于提高广大群众对战争的警惕性，动员和组织群众投入战争准备，从而体现了人民战争思想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方针。

二、设防工程建设

50年代初，为防止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开始在东南沿海的战略要点和重要作战方向上开始阵地工程建设，主要构筑营防御地域的观察、指挥、机枪、火炮等掘开式工事。以后发展为以坑道为主，结合掘开式工事的构筑原则。1958年7月，中央军委《关于国防筑城的决议》对前几年的设防工程建设予以肯定，认为工程基本上达到了坚固、隐蔽、经济、适用的要求，同时提出注意对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的防护。

60年代中期，根据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分析，人民解放军将设防重点由沿海转移到北方，在主要作战方向上按照重点设防的原则，选择最关键的地方修建防御阵地工程，北京、沈阳、兰州等军区开始阵地工程建设。阵地一般依托山势，根据作战任务和部队的编制装备筑有可以囤兵，可以储藏粮、弹、水，可以自行组织后勤保障和通信联络的坑道和工事。担负坚守防御作战任务的部队在战争第一阶段凭借这些阵地，必须顶住敌人的反复冲击，长期坚守，独立作战，掩护国家转入战争状态。至少要迟滞敌人行动，大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为其他部队创造打歼灭战的机会。1969年，毛泽东批准了《全国设防工程调整规划》。按照这一《规划》，要继续完成设防的剩余工程和其他配套收尾项目，除个别调整部署需要外，不再增加新的设防工程。重点加强特种工程、海、空军基地、国防工业等重点工程建设。海、空军抓好以舰艇、飞机洞库为主和相应配套的战备工程建设，第二炮

兵抓紧对永久和机动阵地的勘察，工程建设主要是进行试点，取得经验，暂不更多铺开。

60年代中期以后，人民解放军以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设防工程建设。仅1971年的一年内，即投入施工部队31.4万人，全年完成坑道掘进12万米，出石方298.4万立方米，被覆作业11.4万米，浇灌混凝土68.6万立方米。

经过多年努力，设防工程建设初具规模，已经建成的工事基本达到了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要求。但是，与主体工程相比，配套工程差距较大，观察、指挥、通信和生活保障等设施欠账较多，难以达到长期坚守，独立作战的要求。另外，由于作战指导思想不明确，作战意图、作战决心和设防部署频繁变化，工事越修越多，有岛就守，有山就挖，盲目性很大。按照规划，全国要修330多个师规模的防御工事，已经修成但不适用的坑道达40万米，工事2000多个，相当于30多个师的防御工事，造成很大浪费。施工中，强调拼命、苦干，忽视科学管理和新技术、新方法的使用，塌方、伤亡事故较多。再者，由于缺乏统筹规划和合理安排，不论海防工事还是陆地边防工事，大都存在着“大正面，小纵深”的问题，是一种“镶边”工程，战争真的打起来，这些工事难以起到预期的作用。

设防工程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堆山。1964年12月，为解决平原地区的设防问题，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堆筑人造山。1965年1月，军委办公会议决定成立5个修建人造山小组，先在天津、苏北地区进行试点。4月，毛泽东听取有关堆山问题的汇报时说：“有山的要打点洞子，没有山的要堆山，做点工事。”工程兵为此设计了人造山的模型、图表和方案。1967年5月，工程兵在北京主持召开堆山工程会议，研究制定《人造山工程战术技术要求（草案）》，第二年2月，经毛泽东和林彪批准，总参谋

部转发了这个《要求》。按照这一《要求》，人造山是保卫沿海无山区，保卫平原交通枢纽和战略要点，保卫大城市的骨干工事，主要供远射程火炮使用，每一座山要能管 40 至 50 公里。因此，两座人造山之间距离不能过近，以利炮火交叉。山与山之间建设连接工事，配置中、小型火炮，人造山与连接工事互为依托，以连接工事掩护人造山。人造山还要担负炮兵观察所和指挥所的作用，一旦敌人越过，又要作为炮兵要塞留在敌后。

一座人造山一般配置 1 个守备营，其中 1 个远射程炮兵连（4 至 6 门炮）；1 至 2 个守备连（配备轻便的反坦克武器、高射武器以及其他步兵武器）；战时进入一个炮兵群指挥机构。总兵力约 300 至 500 人。

人造山山形为单峰菱形或双峰椭圆形，高度 20 至 40 米，正面宽 250 至 400 米，纵深 120 至 220 米，坑道轴线总长 600 至 1000 米，坑道口 6 至 10 个，工事要求能够抗御 500 至 1000 磅爆破弹的直接命中，内部要求达到自然通风、供电、供水。

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希冀凭借几座孤立的人造山阻止敌人在平原地区大纵深、宽正面的进攻，是不切实际的。时间不长，这种作法就在实际上被废止。

三、战备交通和战备通信工程建设

战备交通建设和战备通信工程建设是战争准备的重要内容。由于技术手段、施工力量和材料经费等方面的原因，这两项工作长期以来是比较薄弱的环节，成为制约部队机动和通信联络，特别是战争状态下机动和通信联络的重要因素。1969 年以后，为了适应战争需要，特别是为了适应预设战场的急需，人民解放军配合国家有关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备交通建设和战备通信建设。

随着战略重心的北移，按照平战结合、军民结合、本地区与大协作区相结合和铁路、公路、水路综合利用的方针，战备交通重点解决“三北”和武汉地区战时机动道路，保障大三线与后方基地的交通运输。1968年底，周恩来批准《一九六九年国防公路建设计划》，该计划共安排63个国防公路建设项目，其中续建项目37个，新建项目26个，预计投资2亿元。1969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交通战备建设指示》，批准在“三北”地区修建战备国防公路33条，6095公里，要求从1970年开始，在3年内建成。1970年，战备交通建设出现空前的多项目、大规模、高速度的局面，新建铁路2400余公里，新建和改建国防公路6300余公里，疏浚和整治航道2500余公里，各地还新建了许多地方交通线路。焦枝、成昆、襄渝、湘黔、枝柳等铁路线已经通车或正在加紧建设，大三线的铁路网迅速形成。“三北”地区新建和改建国防公路4600余公里，主要战役方向的公路干线已基本成网，通往战略、战役后方基地的道路也得到进一步加强。长江上建成6座军用重件活动码头，黄河新建了5座公路大桥，为部队南北机动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1971年，人民解放军承担了协同有关部门新建、续建铁路2000公里和战备公路6000公里的任务。

战备通信工程建设，主要是集中力量抓好国防通信网的建设，重点是地下电缆和地下通信枢纽。周恩来要求，从1969年开始的5年内，要建成一个连通29个省、市、自治区，国防、民用相结合，以保证作战指挥为主的地下电缆通信网。首先建设平衡电缆和小网轴电缆，然后建设大通路电缆，5年共建53000条公里。国防通信网的建设在1970年取得重大成绩，共建成地下通信枢纽18个，连同以往的已建成68个；完成长途地下电缆4500沟公里，超过以往的总和，连同原有的共有8200沟

公里；微波通信按计划完成了 4500 公里；敷设海底电缆 812 公里，连同以前的共有 5000 多公里，设防岛屿已全部沟通有线电，主要岛屿还有迂回线路；新建架空明线 5000 余公里，全军共有干线 10 万对公里，已基本成网，“三北”的要点防御地域和边防埋设塑料线 2200 公里。这些设施的相继竣工，基本形成了以地下指挥所为中心的平战结合的通信网，增强了通信的可靠性。1971 年，战备通信工程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埋设地下电缆 5700 公里，在已建成的长途地下电缆上，争取一部分开通 12 路、60 路和 300 路载波；以海南地区（包括西沙群岛）为重点，敷设海底电缆 1500 公里；新建微波电路干线 5700 公里，使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可通电视；架空明线干线 8000 公里、支线 3 万公里，要点防御地域、设防岛屿和接敌边防地区埋设塑料线 1 万公里；建立全国党政系统的无线电通信网。

第二节 野营训练

60 年代中期以后，越南战争进一步扩大，中共中央 1965 年 4 月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把备战工作做得充分一些，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有所准备。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随后发出《关于加强战备训练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援越抗美的决心，要求全军以临战的姿态加强战备训练。《指示》提出要进一步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普及先进经验，搞好战备急需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加强新干部和新战士的训练。《指示》要求负有援越抗美任务的部队随时准备打仗，在练好基本功的基础上，着重解决在热带山岳丛林地带能走、能打、能生活的问题。同时部署了其他部队的训练内容和要求。

尽管如此，1969年之前，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965年10月，林彪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制造军政对立，把“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技术”仅列为1966年全军工作方针的最后一项。总参谋部颁发的《一九六六年军事训练工作指示》把毛泽东的军事著作规定为战役、战术训练的基本教材，技术和专业训练的指导思想，并以此衡量军事训练成绩。即使近战夜战训练，也被认为首先是个政治觉悟问题，而不单纯是技术问题。于是，政治和军事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军事训练“四落实（训练时间落实、内容指标落实、参训人员落实、训练质量落实）”被取消。“突出政治”成为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考核制度被认为只能看到技术，看不到政治；只能看到结果，看不到原因；只能反映片面现象，不能反映全面情况而废除。负责军事训练的部门被精减、削弱，总参谋部军训部仅剩下一个30余人的训练业务小组，以后的几年内未向全军下达过年度训练计划和指示。1966年8月，林彪提出“几个军兵种军政教育的时间比例都要来个全面的大改变”，规定战备值班和全训部队中，飞行、舰艇和坦克部队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生产劳动和做群众工作的时间比例为5：4：1；步兵、炮兵、工程兵等部队为5：3：2。半训练和半生产部队为5：2：3。生产部队为5：1：4。从而改变了一年前“经常性的政治教育，按百分之三十时间的比例进行”，“业余生产要量力而行”的规定（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克服连队忙乱现象搞好连队工作和生活秩序的规定》，1965年6月17日），军事训练时间压缩了40—60%以上。林彪还规定，如果军事训练、生产劳动等和政治教育发生了矛盾，就要给政治教育让路。这样，军事训练被置于政治教育和生产劳动之后的无关紧要的地位，训练时间一压再压。有人甚至提出，一年中用1—2个月搞基础技术训练，3—4个月搞政治训练，4—5个月

搞地方“四清”、生产、民兵训练和其他社会政治活动，1—2个月用于休整。部队普遍反映，“政治教育要多少给多少，生产占多少有多少，训练剩多少算多少”。

在军事训练的指导思想、训练的组织体制、训练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林彪提出一系列与以往的作法背道而驰的主张。林彪反对系统的正规的训练，以破除“洋教条”为名，强令焚烧军事书籍，部队总结多年经验编写的条令、条例、教材几乎销毁、散失殆尽。1969年，林彪又下令大幅度裁减军队院校，全军125所学校仅保留43所。林彪鼓吹“少而精”的训练方针，使部队训练内容简单，标准降低，方法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实用主义倾向。步兵只搞单兵和小分队训练，极少进行营、团以上规模的合练。航空兵削减了攻击、实弹、空战、复杂气象条件下作战等主要作战科目的训练。海军的海上训练也大幅度压缩。

军事上的取消主义造成了严重恶果，人民解放军的训练水平和作战能力大幅度下降。空军航空兵的高空科目越飞越低，低空科目越飞越高，复杂科目越飞越简单，全空军没有一个甲类团。遇有作战任务，只能组织大队长以上干部的“军官团”上阵；有的省军区52个连队进行第一练习射击，不及格的占72%；有的军区37高炮实际发射有效弹迹1962年为80%，1968年为43%，1969年降为26%；有的高炮打靶，17000多发炮弹仅命中5个空中拖靶；通信分队收发报速度下降，差错率大幅度上升；有的工兵排没有人会敷雷、排雷；有的机关80%的参谋不会识图、用图，不懂战术，不懂训练。

珍宝岛事件之后，毛泽东要求全国“准备打仗”，并提出“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人民解放军的职能、作用和任务得到重新肯定。人们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以及“三支两军”严重损害了军队的教育训练，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

战术技术水平普遍降低，远远不能适应战争的要求。军事训练作为一个既新又老的课题再次被提出来并在相当艰难的条件下以野营训练的形式开始逐渐恢复。自此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随着政治运动的涨落而起伏，并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和1975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前后掀起两次练兵热潮。

野营训练是人民解放军采用已久的训练方法之一。1963年4月12日，毛泽东路过南京时，听取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关于部队进行野营训练的汇报。毛泽东称赞说：“这种方法很好，应该在全军用这种方法，应该推广这种方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军事训练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野营训练当然也被弃之不用。

恢复野营训练，始于1969年。1970年2月3日，总参谋部转发的沈阳军区某师《“千里野营”总结报告》提出野营训练为促进战备思想落实提供了一条好途径；为落实四好，全面建设连队提供了一条好路子；为培养部队优良战斗作风提供了一个好方法；为部队适应战时生活管理提供了一个好措施。他们认为，“部队多动一动有好处，‘动中才能更多地发现问题，更好地解决问题’”。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以及新疆、济南军区关于野营训练的另外两个文件后，充分肯定这一作法，批示：“这样训练好。”同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能生产不致减少）进行野营训

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在报告的最后一页，毛泽东批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1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迅速掀起冬季长途野营训练的热潮。从当年12月到次年3月，普遍拉练两个月。按照这一部署，拉练的第一阶段侧重进行阶级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演练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生活管理、做群众工作等等；第二阶段可搞一些急行军、夜行军，侧重练指挥、练通信联络、练战术技术、练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后勤保障。《通知》要求担任机动作战任务的部队，担任守备任务的部队，担负施工、基建和生产任务的部队以及海、空军地面部队，军队院校和大军区以上机关都要根据各自情况组织拉练。

野营部队着重进行行军训练，在江河、山林、高原、戈壁沙漠等野战环境，练习行军、做饭、宿营、警戒。同时，采取走训与驻训相结合的作法进行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演练突破、迂回、包围、追击、遭遇战、防御、反冲击等攻防作战战术，演练打坦克、反空降、反空袭。海军组织了海上拉练，锻炼海上作战和生活能力。空军组织了转场训练，锻炼部队机动能力。许多野营部队到韶山、井冈山、古田、遵义、延安等革命圣地、著名战场以及其他先进典型地区参观访问，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人民解放军成长发展的历史以及本部队在战争年代的光荣历史，搞忆苦思甜，提高思想觉悟。

野营训练培养了部队的吃苦耐劳精神，检验了部队走、打、吃、住、藏的能力，使部队学到许多在营房中学不到或难以学到的东西。野营训练密切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军政团结、军民团结。许多部队在野营途中坚持做到：水缸不满不走，院不扫净不走，借物不还不走，损坏东西不赔不走，群众纪律不检查不走。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在1970年的野营训练中，培训民兵近400

万人，助民劳动 500 多万人次，医伤治病 280 多万人次。

野营训练同时暴露出部队存在的许多问题。部队不会行军、做饭、宿营、警戒的问题相当普遍。行军中经常出现前面休息后面跑，野炊时两个小时做不熟饭，宿营时两个小时进不了房，出发时提前三、四个小时起床集合等现象，部队搞得又乱又疲劳；有些装具不适应行军、作战的要求，许多装备物资和战备物资带不走。普遍反映战士负荷太重，步枪手 27 公斤，机枪手 30 公斤，火箭筒手 30—35 公斤。新疆军区反映，大头鞋太笨重，行军不能穿，穿解放鞋走路，上午湿，下午冻，零下 25 度也不适用；通信器材数量少，质量差，不能保证通信联络；机关组织指挥能力普遍较弱，营以下干部多数不懂本级战术。有的师、团两级司令部搞演习，直到演习结束，还没有画出一份决心图。有的团写宿营报告，从拟稿到发出用了 12 个小时，还 3 次发电报更正；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军、兵种知识，对现代战争的特点研究不够，合成意识差，野营训练偏重于单一兵种练走练打。

除了部队长期不搞军事训练造成的上述结果外，野营训练同时暴露出部队思想和作风方面的其他许多问题。有的部队把野营训练当作走过场，追求形式主义，部队拉出去了，炮却留在了营房，或者带炮不带弹，车辆不伪装，宿营不放哨；有些部队利用野营训练安排参观访问，造成部分地区野营部队过于拥挤，特别是一些革命圣地、著名战场、先进典型地区，部队去的多，地方机关、工厂、学校去的也多，使当地群众负担过重。如当时的全国农业先进典型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原计划 1970 年去两批拉练部队，结果去了 12 批；有些部队偏重于走，单纯追求里程，追求数字，本应在野营训练中安排的许多其他活动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有的部队管理教育不严格，发生了一些诸如翻车撞车、爆炸走火、煤气中毒、冻伤等事故，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在

1970年的野营训练中发生64起严重事故，死伤各数十人。有个团野营训练，一次冻伤近50%。有个部队打靶后，靶场没有严格检查处理，造成群众亡13人，伤5人的重大事故。

毛泽东“11·24”批示后到1971年的9月，人民解放军540个师以上机关，43所院校，90%以上的野战部队进行了野营训练。1971年11月18日，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印发《关于一九七〇年全军冬季长途野营训练回顾》，总结了主要的经验：1.要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2.要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发扬我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光荣传统；3.要着眼于培养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4.要严格按照实战要求练走练打，努力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野营训练是一种基础的训练方法，在部队装备技术水平已经大大提高，机械化机动已有可能的条件下，每天几十公里的步行能力对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水平并无决定性影响。即使未来战争中，徒步机动，特别是高级领导机关、院校、特种兵部队的徒步机动也不可能成为主要形式。因此，没有必要过高地估计野营训练的作用和价值。但是，在大规模的军事训练沉寂多年之后，作为新的训练高潮的前奏，野营训练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首先，它为军事训练正了名，过去几年中几乎无人敢提的军事训练以这一形式得到了承认和恢复，尽管不能将它等同于一般条件下正常的军事训练，但它确实是一种标志，是对林彪“军事取消主义”的一次坚决否定；其次，野营训练在不同程度上检验了部队行军、作战的综合水平，提高了部队走、打、住、藏的能力。考虑到“文化大革命”开展4年，人民解放军中从未接受过正规训练的新成分多这一事实，那么，这些能力的提高甚至可以说是从有到有的飞跃，因而是极具价值的；再次，野营训练对部队作风的养成影响重大。不论是组织纪律性、吃苦耐劳精神还是

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等都在野营训练中得到了考验。正如毛泽东对这一训练方法的评语，“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也许毛泽东提倡这种训练方法的主要考虑是偏重于从思想作风上给人民解放军一次推动（因此这种方法对地方机关、工厂、学校同样适用），而不是期望军事技术水平的飞跃。那么，这个目的可以认为是达到了。在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史上，野营训练是值得写上一笔的。

第三节 1972年的练兵热潮

应该说明，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同时身兼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毛泽东虽然不能集中主要精力于军队建设，但他的意见对人民解放军各方面的工作始终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林彪当然看到了这一点，同时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他一方面竭力颂扬毛泽东，提出许多堂而皇之的口号，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和允诺，一方面窥测毛泽东的心理，或投其所好，或抓住毛泽东谈话中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引申，夸大，借以推行自己的主张。1965年3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时，谈到军事学校问题，他说：“军事学校我不反对，可以办，但不要学得太长了，一、二、三年，太长了，几个月就行了。”“有些现代科学需要长一些时间学，例如导弹、原子弹，这是讲研究和制造。单单武器的使用和训练士兵不需要很长时间。训练炮兵一个月就行，训练驾驶员、飞行员，几个月就够了，最多一年。主要是在战场上训练。”“有少数人读书是必要的，懂得点军事知识，懂得点社会科学，懂得点自然科学。”毛泽东强调实际应用，但忽视理论的重要意义，这个讲话的片面性显而易见。正因为如此，林彪立即布置传达学习，并以这个讲话为根据，推行“少而精”的原则，要求各部队据

此压缩训练时间，调整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同年7月29日，林彪在听取总参谋部汇报院校教学改革工作情况时提出：“苏军的东西一概没收，外国的东西也一概没收，来个‘收书’。”林彪说：“‘收书’，是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的一个重要战役……外国的东西并不是不要，而是大量的要，但要放在高级领导机关和科研机关进行研究、批判和吸收。如果放在院校里，学员学习的时间短、任务重，就会把学员搞糊涂了。”表面上看，“少而精”确乎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因为学得少，基础薄弱，只能满足单一的简单条件下的应用，根本无法应付复杂局面，更不能适应战争状态下千变万化的情况。“少”是林彪这一主张的实质，没有一定的训练时间作保证，“精”只能流于空谈。以后，林彪更以这个讲话为依据，大幅度削减了军队院校的数量。

毛泽东对和平时期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有其独到的见解，他多次指出，过去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不打仗了，就要通过军事训练这个途径学习战争。当然，同指导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失误一样，毛泽东对军队建设的许多方针原则性意见未必俱臻完美，如上述关于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时间的看法。但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是毛泽东的迫切愿望之一，他不能接受林彪改变军队“武装集团”性质的任何企图。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之后，毛泽东以较多的精力关注外部世界，认为战争日益成为迫在眉睫的危险，要求全党都要学习军事，注重战争，准备打仗。1970年，在他的倡导下，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野营拉练，逐渐恢复了军事训练。然而，“抓政治保险，抓军事危险”的阴影仍然笼罩在许多军事指挥员的头上，1971年，人民解放军的全训部队仍然不多，训练计划很少落实。全军战略预备队13个军、17个特种兵师和各军区的战备值班师，没有一个师真正搞全训。空军歼击机飞行员1965年平均每人飞行78小时，

1966年以后每人每年平均只飞38小时。如此少的训练，即使简单地维持原有水平，也是远远不够的。1971年7月，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全军作战部长会议，提出全训部队除坚持冬季野营拉练和天天练外，每年军事训练时间步兵不少于60天，技术兵不少于80天，航空兵训练时间不少于50小时。周恩来认为这个标准仍然偏低，提出步兵训练90天，技术兵训练120天。黄永胜坚持60天、80天的主张，仅将周恩来的批示附在正文之后同时上报。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将会议的《报告》转发全军。在林彪一伙取消军事训练的情况下，这是一次重大的胜利。8月，毛泽东赴外地巡视，在同沿途党政军负责干部的谈话中批评了林彪的“突出政治”，“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课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

“九·一三事件”之后，阻碍军事训练的禁钢被打破。“批林整风”激发了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练兵热情。1972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在冬季野营训练结束后，各部队普遍投入军事训练。各军区规定的军事训练时间，一般要求全训部队的步兵训练90天，技术兵训练120天（有的军区规定冬季野营训练时间除外）；战备值勤和海、边防部队，步兵训练50—60天，技术兵训练60—80天；生产、施工部队训练30—40天。

投入训练的部队多，训练时间落实是这一时期军事训练的两个显著特点。仅从这一年的第一季度看，沈阳军区全训部队占58%，为上一年的3倍。广州军区的全训师，3月份步兵训练了9—13天，技术兵训练了12—15天。福州军区部队也完成了13—18个训练日。海军大部分单位有计划地组织了港岸和海上训

练，北海舰队有 88% 的战斗舰艇出海进行训练。空军飞行部队第一季度平均每个飞行员飞了 15 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 1.5 倍。这一年，陆军野战部队 25% 的师（每师 2/3 至 3/4 的兵力）、空海军 80% 以上的作战部队进行全训。截至 11 月底，全训部队的步兵一般训练了 90 天左右，技术兵一般训练了 120 天左右。空军每个飞行员平均飞了 60 小时 54 分，比 1971 年增加 59%，是 1960 年以后每人平均飞得最多的一年。海军有的舰队舰艇出海训练的艘次，比 1971 年增加 29%。

这一时期突出了连队的技术、战术基础训练，步兵重点进行以射击为主的五大技术和班以下战术训练；炮兵、坦克兵主要进行单炮、单车和连的射击训练；舰艇部队抓了专业技术和战术训练，有的进行了扫雷训练；航空兵部队加强了飞行理论和技术基础训练，恢复了战斗课目的演练。同时，普遍重视了制式教练，恢复了军事体育训练。通过训练，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有了一定起色，据统计，1972 年步兵连队射击，平均及格率一般在 80—90%；高炮师实弹射击，在标准比过去提高的情况下，平均有效弹迹为 54%，比 1971 年提高 6.3%；空军歼击、强击、轰炸机部队达到两种气象战斗值班水平的大队比 1971 年增加 15%；海军具有独立操纵能力的舰艇长所占比例比 1971 年也有提高。

1973 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陆军野战部队以师为单位统计，全训的约占 34%，比上一年增加 10%，有的军区达到 71%，海军舰艇部队和空军航空兵部队全部进行全训。截止 6 月底，全训的步兵分队一般训练了 50 天左右，技术兵一般训练了 60 天左右，训练内容同 1972 年相近。据 9 个军区统计，步兵武器射击，及格以上的连队均达 95% 以上。南京军区单炮射击，沈阳军区坦克教练射击，完成练习都在 90% 以上，比上年分别

提高 17% 和 27%。海军舰艇部队出海训练艘次比上年同期增加 12%。空军飞行员每人平均飞了 25 小时，歼击机飞行员 32% 达到两种气象作战水平，比 1971 年增长约 1 倍，过去基本不飞的空战、双机复杂特技等课目，也逐渐恢复。

蓬勃兴起的军事训练热潮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带来新的转机，军队象个军队了。但是，长期以来，林彪散布的“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等观点不可能迅即肃清，“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也还在军队的各项工作中起着作用，有些干部对加强军事训练持观望态度，认为“教条主义经过，大比武干过”，担心“现在积极干，将来挨批判”，重新戴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有些部队对军事训练、政治教育、生产劳动的矛盾不能很好解决，有的全训师、全训团实际参训的兵力较少，个别的仅占 50—60%。有个全训师种了 6 万亩地，还有煤矿、糖厂，生产用兵占全师的 20%，说是全训，但连队到课率很低。有些部队训练中存在着一些形式主义、锦标主义、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拼凑尖子，降低标准，谎报成绩。有些部队训练不讲科学，指标定得很高，盲目蛮干，开训半个月，就提出“四个百分之百”，要求第一次射击、投弹、队列、射击学理考核都要百分之百的人达到及格。有的要求练投弹把手臂练得“发红、发肿、发紫”，三肿三消，才算过关。另外，由于训练间断较长，难以迅速恢复，训练事故比较严重，空军 1972 年发生严重飞行事故 48 起，亡 75 人，损失飞机 48 架，其中由于技术、指挥原因造成的占 62%。

1972 年起，人民解放军在抓基础训练的同时，普遍举办教导队，轮训基层干部；开展以打坦克为重点的“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和以防原子为重点的“三防”训练；恢复和建立训练规章制度，组织修改、编写各种条令、条例、教材。1973 年底，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和新建 41 所院校，重点培训营以

上军事、政治、后勤指挥干部和技术干部，并适当加强部队训练机构。能够体现这一时期练兵特点的是办教导队轮训基层干部和打坦克训练。

一、办教导队轮训基层干部

1972年2月6日，叶剑英在听取有关军区汇报作战设想和战备工作时说：“再是训练问题，看来一般的方法不行，一般方法扭转不过来这个局面……建议你们以师为单位，办好教导队，师长或副师长任队长，把打过仗的团、营长都集中起来，编成一个连的架子，把下边的没有打过仗的从单兵学起，进行示范，传、帮、带，把经验传给新一代。两年之内要把连、排长轮训完，平时会组织训练，战时会组织打仗。”28日，徐向前也表示：“我看有的军区提出恢复军政干校和军、师恢复教导队，担负干部培养和技术骨干的培训的建议就很好。”4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部队基层干部的指示》，要求党委加强领导，首长亲自抓，统筹安排，做出规划，在两年内把基层干部轮训完。

教导队一般编成连的架子，由打过仗的有经验的军、师、团领导干部任教：军集中轮训时，军的领导干部当队长，师的领导干部当排长，团的领导干部当班长，营以下干部当兵；师集中轮训时，师的领导干部当队长，团的领导干部当排长，营的干部当班长，连以下干部当兵。

教导队训练从基础开始，重点解决教兵的本领，步兵重点学习单兵、班的战术和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五大技术，特种兵突出本身的专业。队列从立正、稍息做起，射击从兵器常识学起，专业技术从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基本动作要领讲起，战术从利用地形地物讲起，教导队同时学习本级战术的组织

指挥，进行制式教练和军事体育训练。

教导队按连队编组，过战士生活，学习带兵本领。集训的干部编成连、排、班，建立党支部、革命军人委员会和俱乐部。学员扎腰带，扛步枪，同战士一样进行训练，从站岗、查哨，到点名、出操，都严格按照连队的生活制度要求。

教导队训练与连队训练相结合，促进了部队训练。不少教导队带了示范连、先行连，把部队训练中的难点拿到教导队解决，把教导队的教学经验拿到部队推广。学员毕业后，许多单位采取汇报表演、亲自任教、培养骨干等方法，推广训练和管理教育经验，促进连队建设。

教导队一般每期进行3至4个月，使受训干部达到会讲，会做，会教，平时能组织训练，战时能指挥打仗的要求。到1972年底，全军各级教导队共办了1800多期，已训和在训的基层干部占应训人数的44%。1973年9月，全军849个教导队已轮训基层干部31万人，占应训人数的75%以上。到年底，大多数单位可以将基层干部轮训一遍。两年中，全军有18800名团以上干部到教导队任职任教，其中野战军有60%的军、师军政第一把手当连、排长。

基层干部经过教导队轮训，提高了教兵、带兵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连队“干部想教不会教，战士想学没人教”的状况；军、师、团领导干部到教导队任职任教，与学员一起摸爬滚打，传授练兵经验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促进了新干部的成长，密切了新老干部之间的关系；参训干部按连队编组，同战士一样训练，遵守连队生活制度，培养了作风，学会了管理教育。

教导队主要抓了连队基础训练，连、排战术一般只组织了示范参观，练指挥普遍没有进行，基层干部的本级组织指挥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在技术、战术训练中，一般都是练步兵打敌步兵的

技术和战术，合成训练很少；教导队要求领导干部任职任教，以传、帮、带作为主要的训练方法，偏重于实用性。即使这一点，也因为一些领导干部挂名不在位，或者在位也没有深入教学而不能很好落实。

二. 打坦克训练

珍宝岛事件之后，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坦克是现代战争的主要突击力量，未来战争第一阶段，中国将承受敌方使用坦克、装甲车辆实施的大规模战略突袭。如果能够有效地对付敌人的坦克，就可以基本解决地面作战问题——人民解放军将打坦克作为部队训练的主要内容之一。

毛泽东在总结珍宝岛作战经验时说，对方有空军、有飞机、有坦克、装甲车、指挥车，跟他们比数目，比他们不赢。但我们打仗，主要靠人的勇敢，不怕他们的飞机、坦克。叶剑英提出，“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1972年下半年，毛泽东批准举办的全军反坦克训练班结束后，先后又有9个军区举办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反坦克集训，连队一般以7—15天进行反坦克技术、战术训练，有的部队还结合作战任务和预定战场，组织打敌集群坦克的试验性演习。

打坦克训练实行远近结合，以近为主，近战歼敌的原则，运用打、炸、阻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改造地形（改造梯田、设置反坦克壕、设置路障等），限制敌坦克活动，创造打击敌坦克的机会。另一方面，动员民兵和群众，实行军民结合，运用各种方式打击敌坦克。步兵学习使用40火箭筒、爆破筒、磁性手雷、炸药包、反坦克地雷打坦克的技能和反坦克障碍物的构筑方法。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和空、海军，结合各自的特点，开展反坦克训练。

1973年7月，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地区组织了首次诸军（兵）种协同打敌集群坦克的研究性实兵演习，参加演习的部队和民兵2万余人，飞机55架次，坦克、装甲车371辆，火炮385门，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和军委直属单位1万余人参观了演习。

演习以一个坦克师模拟“蓝军”坦克师进攻特点，实施高速度、大纵深进攻。“红军”组织以连反坦克支撑点为基础的纵深、梯次、环形防御体系，抗击“蓝军”集群坦克进攻。演习分阶段演练了连支撑点、步兵团阵地防御、步兵营夜间进攻、师预备队反冲击以及航空兵、炮兵、工程兵、民兵等多种反坦克课目。演习以实兵实弹进行，历时15天。

打坦克训练突出的困难是缺乏器材，许多部队没有坦克，战士只能模拟攻击沙土堆成的“坦克”，缺少实战气氛。训练中强调勇敢，不怕死，演习偏重于单兵动作，利用简陋的手段，新型有效的反坦克武器尚不多见，训练效果也不甚理想。

第四节 1975年的练兵热潮

1974年底、1975年初，邓小平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后，针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军队建设的破坏，提出，军事训练“这个问题很重要。兵要训练，更重要的是干部要训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开始全面恢复，并确定1975年的训练重点是抓好干部训练，抓好联合兵种的演练，争取在2—3年内解决营、团、师、军组织指挥问题。总参谋部提出，多搞结合拉练的检验性演习，适当组织一些研究性演习，结合现代战争特点，从难从严设置情况，具体解决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组织指挥与战术手段，搞好陆空、步

坦、步炮以及友邻之间协同的研究。

总参谋部要求，陆军军一般不少于两个师全训，施工、营建任务重的一般也应有 $1/3$ 的兵力全训。特种兵师（团），除自建营房和施工外，原则上都要全训。全训部队除拉练外，必须落实步兵 90 天、技术兵 120 天的训练时间。全训师的生产兵力不超过 10%，全训连队应占 80—85%，舰艇部队和航空兵部队都要全训，水面舰艇部队军事训练 120 天，潜艇部队 100 天，其中海上训练时间不少于 $1/2$ 。航空兵部队军事训练 170 天，歼击、强击机飞行员平均飞 60 小时，轰炸机空勤组平均飞 60—80 小时。施工、营建、生产部队的军事训练不能少于 30 天。

1975 年，在专业技术训练的基础上，各军（兵）种加强了战斗技术、战术合练和使用新式武器装备的训练。海军舰艇部队加强了锚泊、转移海区、远航和实际使用武器的训练，舰炮射击、导弹发射和施放鱼雷的命中率均较往年有提高。空军歼击机空战训练比 1974 年增加了 30%，截击训练增加 20%，空靶射击训练增加 5 倍，有 50% 的歼击机飞行员达到两种气象条件下的作战水平。战略导弹部队加强了实装综合操作和点火训练，组织了导弹发射演习。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都结合各自的特点组织了训练。

到 11 月底，人民解放军已集训师以上干部 2000 余名，营团干部和参谋人员近 3 万名，野战部队基层干部的指挥训练已轮训了 85%，已经进行或正在准备进行的师、团规模的演习共 90 次（1974 年，人民解放军组织营以上规模的实兵战术演习 65 次）。3 月至 6 月，工程兵组织沈阳、济南、南京、广州、武汉军区 5 个舟桥团在湖北鄂城进行首次架设长江浮桥的合练演习。演习中，使用国产 62 式舟桥器材，在 1100 米的江面成功地架设 62 式 50 吨加强性浮桥、 2×50 吨双行道浮桥和 62、74 式混合 50

吨浮桥 15 次，安全通过各种兵器、车辆 2100 余台次。同时进行的漕渡训练渡送坦克、火炮、车辆 3000 余台次，1 万余人观看了架桥作业表演。通过这次演练，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克服大江大河障碍的能力，积累了工程兵部队与步兵、炮兵、装甲兵等兵种协同训练和遂行战斗任务的经验。1974 年底，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全军都要加强“三防”训练，重视研究原子条件下的作战行动。1975 年 5 月底，总参谋部在河南商丘召开全军“三防”训练经验交流会，参观“三防”训练基础课目表演和在核、化学条件下加强步兵连阵地防御研究性实兵战术演习。会后，各军区分别召开本单位的“三防”训练现场会，推动了“三防”训练的进一步开展。10 月底，武汉军区组织进行了加强陆军师运动战检验性实兵战术演习，着重演练了疏散隐蔽与开进、打运动之敌、夜间打立足未稳之敌、打空降之敌和撤离战场等课题，参加演习的部队 1 万余人，坦克 50 余辆，汽车近千台。

为了指导全军进行管理教育，建立良好的内外关系和内务制度，养成优良作风，维护纪律，正确实施奖励和处分，提高和巩固军事训练的成果，1975 年 11 月，中共中央军委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颁发全军试行。新的《内务条令》共分 12 章 71 条，分别规定了人民解放军管理教育工作的总则以及军人相互关系；军人职责；军容风纪；日常制度和规则；伙食管理；武器装备、车辆和军马管理；值班；警卫；紧急集合；野营勤务和安全工作。新的《纪律条令》共分 5 章 17 条，除总则外，规定了奖励；处分；控告和申诉以及特殊问题的处理等内容。这两个新《条令》取代了 60 年代颁布的同类《条令》，使部队进行管理教育和实施奖励处分有据可依。

1975 年底，中共中央军委转发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

—276—

勤部《一九七六年战备训练指示》，就1976年全军军事训练的指导思想、重点、主要内容、训练时间、参训人员及训练保障等问题作出规定，部署各军区、海军、空军组织合成军队协同训练。1976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在1975年的基础上又有新发展，海军南海舰队组织驱逐舰、护卫舰等，首次航行中沙群岛，在复杂的珊瑚岛礁区历时8天，航行1500海里，带动机关和部队，多次进行对抗性战术演练，提高了作战能力。空军过去由于不能正确判断和处置失速螺旋的特殊情况，多次造成严重事故。1976年2月开始，空军组织失速螺旋试飞成功，解决了多年的技术难点。然而，迅速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这些设想大部分未能付诸实现。

综观这一时期的军事训练，可以看出这样一些明显的特点：一是水平较低，较长时间中仅仅围绕着基础课目反复练习。尽管训练方法和训练手段做过一些调整，但总脱不开单兵、单车、单炮和简单战术的窠套，适应战争需要的较高层次的合成训练虽然做了要求，但落实不够。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部队长期不搞军事训练，干部战士的军事素质普遍较低，不得不从头学起。二是随意性较大，军事训练不是按照其特有的规律循序渐进，而是必须符合当时的“运动”的意志，和每一次“大批判”挂起钩来。军事训练的主管部门无法有效地掌握训练的时间和内容，难以作出比较长期的规划，部队训练呈现一种松散状态。同时，由于主要作战对象、主要作战方向和作战方式变化，相应的上升到科学高度的理论研究没有跟上去，训练的盲目性较大，部队只得能练多少练多少，想练什么练什么，靠热情和自觉性组织训练。三是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的关系始终没有理顺。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林彪明确提出“突出政治”，反对正规的军事训练，江青也主张“大批判开路”，蔑视

军事训练。许多军队干部对组织军事训练总觉得理不直，气不壮，怕戴“单军帽”（指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不象抓政治教育那样觉得保险，因而限制了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对林彪的批判使这个问题有所好转，但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仍旧束缚着许多人的思想，他们担心“走老路”，“偏了方向”，再吃二遍苦。这个问题的存在，是形成上面两个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十章 武器装备建设

武器装备是战争最直接的物质基础，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是衡量军队现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志。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建设走过了一条由战场缴获到进口，由仿制到自行研制生产的道路，逐步形成科研、试验、生产、装备部队的完整体系，由 30—40 年代的“小米加步枪”，50 年代的“步枪加了点飞机大炮”发展到 60 年代的“常规武器加特种武器”阶段。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应该有较大的发展，现代化水平应该有更大的提高。

第一节 发展情况

新中国成立之前，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来自战场，取之于敌，用之于敌。同时，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各解放区相继建立了一些兵工厂，修理或生产了一些枪炮弹药。新中国成立之时，人民解放军拥有各种枪 200 万支（挺），炮 3 万门，坦克 400 余辆，飞机 100 余架，舰船 100 余艘，无线电机和有线电机 5 万余部。这些武器装备，不仅轻型的多，重型的少；步兵的多，特种兵的少，而且品种繁杂，陈旧落后。人们曾戏谑地称缴获的飞机“出身不好（产于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不清（缺少履历书等技术资料）”。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国人

民志愿军使用的杂式枪炮仍有 100 多种，弹药 270 多种，产自 24 个国家，近百家工厂。

当解放战争接近全面胜利，夺取全国政权指日可待时，中共中央即开始筹划建设一支保卫人民民主政权的强大军队。1949 年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访问苏联，向斯大林提出购买苏联飞机和委派苏联顾问协助训练中国空军人员的请求。10 月中旬，第一批苏式雅克-18 飞机 20 架进口。以后，中国同苏联签订了一系列协定，陆续进口了大量武器装备。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为支持巨大的战争消耗，中国加快了进口苏式武器装备的速度。

利用苏式飞机和舰艇，人民解放军迅速建立起能够用于作战的空军和海军，并且在 1951 年 8 月到 1954 年 10 月间，以进口的苏式武器装备先后换装了 60 个步兵师。到 1955 年底，人民解放军共进口和接收苏联各种枪 80 余万支（挺），火炮 1.1 万门，坦克、装甲车 3000 余辆，飞机约 5000 架，舰艇约 200 艘（含转让制造部分），雷达和探照灯 1400 余部，无线电机和有线电机 1.2 万余部，主要工程机械 500 余部，以及各种弹药和配套装备。在短时期内，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在进口武器装备的同时，中国积极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组织仿制旧杂式和苏式武器装备。根据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1955—1959 年）计划，中国新建和扩建了一批大中型军工厂，作为发展国防工业的骨干力量。这些工厂的建成和投产，使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开始立足于国内生产和国内供应。1956 年以后，大规模的进口已经停止，仿制的苏式武器装备相继服役，原有的旧杂式武器装备逐步淘汰。60 年代初，国产枪械、火炮以及通信、工程、防化器材等已可以满足人民解放军新增装备的需要。

1956年，国务院批准通过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确定军事工业初步的奋斗目标有：准备开展各种防御性战术导弹研究；原子能作为军用动力堆的研究；电子学方面进行提高雷达探测距离、武器装备自动化和通信装备小型化等的研究；喷气飞机提高速度、高度和其他性能的研究；舰艇提高速度、续航力和装备系统自动控制的研究；坦克、火炮减轻重量、改善越野性能和自行火炮的研究；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研究。据此，1958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总参谋部制订的全军《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十年（一九五八—一九六七年）规划纲要》，提出以两弹（导弹和原子弹）为中心，同时根据中国的地形、气候特点，开展陆、海、空军常规兵器研究的国防科学技术研究方针。10月16日，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军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工作，聂荣臻任主任。火箭、原子能、飞机、舰艇、电子设备、各种常规武器等研究院以及军队各大单位独立的研究所相继建立，组织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1959年12月，国防工业委员会成立，贺龙任主任。到60年代中期，一批新武器、新装备陆续研制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这一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大跃进”年代急于求成的错误形成过高过急的要求，在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许多项目盲目上马，结果半途而废，浪费了时间和财力物力。

“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建设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尽管人民解放军的许多有识之士努力阻止“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波及国防科研和生产部门，但林彪、江青不允许他们“横扫一切”的革命有任何吹不到的死角，国防科研和生产部门同全国一样，迅速受到猛烈冲击，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科研骨干和领导干部遭受迫害，科研和生产秩序被打乱，工厂停工，设

备遭破坏，已经开始实施的科研和生产规划被迫中断，武器装备研制和生产的规模 and 水平远远不能适应军队的需要。这一时期生产的装备数量少，质量低，直接影响部队训练和作战，一些飞机一出厂就不能使用，远程火炮观测手段落后，抗干扰能力差，协同通讯长期未能解决，步枪缺精度，炮弹打不响，步兵单兵负荷20—30公斤。一些装备不配套，缺少关键设备，火炮缺炮弹、牵引车，飞机缺雷达，舰艇缺火炮，无法正常使用。

同时，林彪盲目增加军队编制，使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一度突破1951年抗美援朝时的611万，达到建国以后的最高峰。造成武器的生产与使用脱节，部队装备严重缺编。截止1973年，第二炮兵所属导弹团，70%没有装备。有的组建10年仍是徒手；大口径火炮即使按4门制的编配标准，也未全部按编制配齐；1/3的坦克团只有40至50辆坦克，全军缺编坦克1280辆；空军航空兵按1个中队2架飞机的最低标准，尚缺飞机400多架。有的飞行团改装新机种4年多，只装备了3架飞机。与此同时，许多性能相当落后的装备不能淘汰，一些火炮、坦克还是苏联30年代的产品，团以下部队大量以骡马为运输工具。1972年，空军仍有旧杂式歼击机和轰炸机345架。另一方面，林彪宣扬“精神万能论”，否认掌握技术和技能的必要性，部队装备使用混乱，管理不力，失修严重。据1975年的统计，海军能够用于作战的舰艇只占全部舰艇的40%，空军能够作战的飞机也只占到60%。1973年到1975年6月，全军因违章操作和使用不当而发生的各类事故达到1·3万起，不仅伤亡不少人，还报废了大量装备，其中，飞机128架，机械、车辆440余台（部）。同时，严重失修的飞机、舰艇、坦克、火炮、车辆占现役装备相当大的比例。储备的装备品种长短不齐，遇有紧急情况不能配套装备部队。

与上述现象同时存在的另一种情况是，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在这一时期有所发展，某些方面甚至取得长足的进步。到1975年底，人民解放军拥有的国产装甲车辆、飞机、战斗舰艇、工程机械、火炮等已分别占全部装备的75—97%。各种枪械、通信、防化装备和舟桥、渡河器材则全部是国产的。形成这一矛盾的原因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国际环境造成的战争压力而外，还在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已经具备的军事工业基础和已经取得的国防科技成果继续发挥着作用。在于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极其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坚守岗位，坚持武器装备的科研、试验和生产，为人民解放军装备的进步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尤其重要的，还由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对军事工业的高度关注。毛泽东批准实施重要的工程项目并对许多问题有过具体批示；周恩来亲自组织领导，保证重大试验任务的正常进行；聂荣臻在林彪主张“大闹三个月”时，坚持国防科委的试验基地不搞“四大”，并亲自到现场主持核试验；徐向前提出，没有毛泽东、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试验基地的科研任务和人员“不能动”；叶剑英提出“精密地设计，精密地制作，少量地生产，少量地试用”的军工生产原则，强调发展打坦克武器；邓小平领导了1975年国防科技工业的整顿，把“抓装备”列为中共中央军委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中共中央军委曾于1967年8月下达《特别公函》，使正在进行的核潜艇研制工作免于中断。

遗憾的是，这些努力不能完全阻止“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人民解放军失去了利用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有利时机迅速提高装备技术水平的宝贵机会。相反，原有的差距拉大了。新旧矛盾重叠的结果，使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步伐异常沉

第二节 陆 军 装 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单一的陆军。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海军、空军、战略导弹部队等军、兵种相继建立并得到迅速发展，但是陆军仍然是遂行地面作战任务的主力军种。中国陆军的数量及其装备拥有量在世界诸多国家中位居前列。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人民解放军后备力量存在并且数量远远超过正规部队的民兵所持有的几乎清一色是步兵武器。无疑，这是影响人民解放军装备清单的举足轻重的法码。

一、枪械

同世界上任何军队一样，人民解放军装备最多的武器是枪械。1950年10月2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批准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关于将东北军工局仿制的苏式7.62毫米口径冲锋枪命名为“50式冲锋枪”的建议，从此揭开人民解放军轻武器生产和统一全军枪械系列的崭新一页。到1954年，国产手枪（51式、54式）、步枪（53式）、冲锋枪（50式、54式）、轻机枪（53式）、重机枪（53式）、高射机枪（54式）已成批装备部队，换下了美、日、德、意等国制造的旧杂式枪械，改变了人民解放军长期使用“万国”枪械的局面。

1956年，参照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 and 样品，中国生产出56式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和班用机枪，并大量装备部队。56式枪械的战术技术性能普遍优于53式和54式，主要表现在重量减轻、射速提高、容弹量增加。这次换装，在人民解放军步兵装备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6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步兵营以下枪械已形成以我为主，有效射程为400米、800米、1000米的完整配系，且全部实现了自动（半自动）化。

1967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讨论同意并报经毛泽东批准，正式将63式自动步枪列入军队装备体制，随后投入大批量生产。然而，在工厂技术、设备等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主持军委办事组工作的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强令年产60万支，超出实际生产能力5倍。迫于压力，厂方以简化工艺流程应付产量，粗制滥造。到1975年，63式自动步枪共生产了210万支，已装备了60个步兵师。可是，63式自动步枪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质量和技术标准，部队普遍反映其精度差，故障多，射击时向后喷火，并多次发生炸壳现象。要求“还我半自动（指56式半自动步枪）”。如果说，5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两次换装成功地改善了人民解放军步兵轻武器的性能，那么，60年代中期的这次换装却是失败的。它明显地受到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的结果以枪械之间否定——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次反复，不是新事物否定旧事物，而是对畸形时代的畸形儿的否定，它深刻地反映出“文化大革命”对人民解放军装备建设的消极作用。1978年，63式自动步枪被迫全部淘汰（参见表10—1）。

与上述情况相仿佛的现象同样表现在新式机枪的定型生产上。1958年，北京工业学院和军械研究所提出以减轻重量为主，把轻、重机枪合二为一的方案，并造出样枪。这种枪1967年定型后被命名为“67式轻重两用机枪”。同53式重机枪相比，67式轻重两用机枪重量减轻40%，并从设计上解决了子弹入膛容易掉弹头的问题。定型后两个月，毛泽东批准生产装备部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种枪到1970年才投入批量

表 10—1 56 式半自动步枪、56 式冲锋枪、63 式自动步枪性能对照

枪 型	枪重 (公斤)	射程(米)		射速(发/秒)	点射	初速 (米/秒)	弹仓容量 (发)	200 米处穿甲厚度 (毫米)	装备部队时间
		最大	有效						
56 式半自动步枪	3.85	2,000	400	35—40	40	735	10	7	1956 年
56 式冲锋枪	3.7	2,000	400	40	90—100	710	30	7	1956 年
63 式自动步枪	3.92	2,000	400	40	90—100	735	70	7	1970 年

表 10—2 轻重机枪性能对照

枪 型	枪重 (公斤)	射程(米)		射速 (发/分)	初速 (米/秒)	射界(度)		容弹量 (发)	200 米处穿甲厚度 (毫米)	装备部队时间
		最大	有效			方向	高低			
56—1 式班用机枪	8.1	2,000	800	150	735			100	7	1965 年
74 式班用机枪	6.2	2,000	800	99	710			99	7	1974 年定型
53 式(轮架)重机枪	44.5	3,000	1,000	300—350	865	左右各 37.5	-22—+15	250	10	1953 年
57 式(三脚架)重机枪	28.5	3,000	1,000	300—350	865	左右各 52	-43—+18	250	10	1978 年
67—1 式重机枪	25.4	3,000	1,000	300—350	840	左右各 50	-30—+13	250	10	1978 年

生产，1974年起装备部队试用。试用期间发现不少质量问题，不得不重新设计。改进后的67—1式重机枪1978年定型并装备部队。1974年设计定型的74式班用机枪同样存在待解决的质量问题，不能按计划取代56式班用机枪（参见表10—2）。

二. 火炮

火炮是陆军实施火力突袭的主要装备，按其作战性能可分为反坦克火炮、压制火炮和高射火炮。7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火炮的数量较之60年代初增加了1倍，性能也有改进。

1.反坦克火炮

相对于其他武器，反坦克武器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得到较大发展。这不仅基于人民解放军对未来战争模式的基本认识，基于“珍宝岛事件”中苏军大量使用坦克、装甲车辆的事实，而且得力于叶剑英等人多次呼吁加强打坦克训练和加强反坦克武器的研制和生产。1967年，叶剑英提出，步兵连、营、团三级装备的反坦克武器的直射距离要分别提高到300米、500米和800米，并要提高威力，解决夜视夜瞄问题。1972年，叶剑英指示总参谋部组织全军反坦克武器汇报展览和试验，制订反坦克武器装备体制，推广新型火箭筒和无后座力炮等反坦克武器。反坦克武器成为人民解放军常规武器发展的重点。

1950年下半年，为了抗美援朝作战的需要，中国仿制生产了一批90毫米反坦克火箭筒和57毫米、75毫米无后座力炮，同时从苏联进口了一批反坦克炮，以此淘汰过去缴获的大部分旧杂式武器。1954年至1956年期间，中国相继仿制成功苏式76.2毫米、57毫米、85毫米加农炮和40毫米反坦克火箭筒，提高了部队的反坦克作战能力。但是，除85毫米加农炮稍好外，其他几种武器的性能比较落后，57毫米、76.2毫米加农炮射距1000

米时，穿甲深度仅分别为 89 毫米和 61 毫米，40 毫米火箭筒的直射距离只有 100 米。

1958 年后，中国开始自行研制反坦克武器。越南战争扩大特别是“珍宝岛事件”之后，研制步伐大大加快。1967 年 11 月，1968 年 8 月和 1972 年 7 月，总参谋部三次组织全军规模的反坦克武器汇报表演和试验，有力地推动了反坦克武器的发展。1969 年，65 式 82 毫米无后座力炮和 69 式 40 毫米火箭筒开始装备部队。与 56 式 75 毫米无后座力炮相比，65 式 82 毫米无后座力炮的重量减轻 72%，破甲深度提高 58%，更便于部队携运。到 1970 年，65 式 82 毫米无后座力炮已大量装备部队。69 式 40 毫米火箭筒比 56 式 40 毫米火箭筒射程增加 350 米，直射距离增加 200 米，射击精度也有提高。这种火箭筒先后三次进行定型试验，证明性能稳定，质量可靠，但当时担任常规兵器工业领导小组组长的邱会作却另行组织生产一种性能较差，并且未经定型试验的火箭筒，结果在使用中连续发生炸膛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才被迫将其撤装。65 式 82 毫米无后座力炮、69 式 40 毫米火箭筒和 56 式 85 毫米加农炮是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主要的反坦克武器。

另外，根据装备体制要求，在此期间设计定型的反坦克武器还有 70—1 式 62 毫米单兵火箭、73 式 100 毫米滑膛炮以及 75 式 105 毫米无后座力炮等。人民解放军的反坦克武器逐渐得到加强（参见表 10—3）。

2. 压制火炮

人民解放军在建国初期拥有各种型号的压制火炮 1.7 万门，其中绝大多数是 100 毫米口径以下的迫击炮。榴弹炮、加农炮数量很少，性能较好的美制 155 毫米榴弹炮全军只有 35 门。1950 年下半年到 1956 年，中国陆续从苏联进口各种加农炮、榴弹

表 10-3 主要反坦克武器性能

炮 型	重量 (公斤)	射程(米)	直射	射速 (发/分)	初速 (米/秒)	破甲厚度 (毫米/度)	定型 时间	装备部队 时间
56式85加农炮	1,725	15,650	974	15-20	845	100/65	1963年	1965年
65式82无座力炮	29	1,000	440	5-6	247	120/65	1967年	1969年
69式40火箭筒	6.82	500	300	4-6	120	110/65	1969年	1969年
70-1式单兵火箭	3.11	250	150	4-6	123.5	100/65	1974年	1978年
73式100滑膛炮	3,500	13,500	1,744	8-10	1,500	120/65	1973年	

表 10-4 主要压制武器性能

炮 型	重量 (公斤)	射程(米)	高低	射界(度)	射速 (发/分)	初速 (米/秒)	弹重 (公斤)	运行方式	装备部队 时间
63式60迫击炮	12.5	1,470	+45~-180	13.5	30-35	134	1.33	人背	1964年
67式82迫击炮	35	3,040	+45~-185	42	15-25	211	3.22	马驮、车载	1971年
71式100迫击炮	74.5	4,700	+45~-180	30	15-20	250	8.09	马驮、车载	1972年
54式122榴弹炮	2,500	11,800	-3~-+63	49	5-6	515	27.37	牵引车	1955年
60式122加农炮	5,620	23,900	-5~-+45	58	8-10	885	48.2	牵引车	1962年
59-1式130加农炮	6,300	27,490	-2.5~-+45	58	8-10	930	59.1	牵引车	1971年
66式152加农炮	5,720	17,230	-5~-145	58	6-8	655	59.5	牵引车	1968年
63式107火箭炮	611	8,300	0~-160	30	12发/7-8秒	最大 377.3	18.91	牵引车	1964年
63式130自行火箭炮	4,463	10,115	0~-150	180	19发/9.5-11.5秒	最大 434	32.99	越野车	1964年

炮、火箭炮、山炮和迫击炮共 4000 余门，不仅逐步统一了全军火炮的品种、型号，而且大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步兵师火炮一次齐射弹丸总重量由建国初期的 594 公斤增加到 1070 公斤，平均射程提高了 1.4 倍。1954 年到 1956 年，仿制的 82、120、160 毫米三种迫击炮和 122、152 毫米两种榴弹炮陆续装备部队。到 1962 年，国产火炮已达到火炮总数的 79%，师以上炮兵部队实现了摩托化。1962 年后，122、130、152 毫米三种加农炮和 152 毫米加榴炮先后装备部队，进一步提高了部队压制火炮的威力。1971 年，炮兵部队装备的 82 毫米以上口径压制火炮数量比建国时增加近 4 倍。步兵师装备的压制火炮一次齐射弹丸总重量和有效杀伤面积分别比 1956 年增加 3.2 倍和 1.95 倍。

1958 年起，中国开始自行研制发展炮兵武器，首先推出的是 107、130 毫米两种火箭炮。这两种炮 1964 年投产，1972 年已装备部队 1500 余门。1962 年以后，中国自行研制火炮的重点由发展新型大口径、远射程火炮为主，转为改进提高现有装备性能，重点是在保持武器原有威力的前提下，尽量减轻重量。火炮的轻型化取得了明显效果，1971 年装备部队的 67 式 82 毫米迫击炮比仿苏的 53 式 82 毫米迫击炮减轻重量 17.5 公斤，二者弹道性能相同，弹药可以通用。同年装备部队的 59—1 式 130 毫米加农炮，炮重由仿苏 59 式 130 毫米加农炮的 8450 公斤减至 6300 公斤，射速由每分钟 7 至 8 发提高到 8 至 10 发，弹道性能不变，弹药亦可通用。同年研制成功的 71 式 100 毫米迫击炮，重量只有 74.5 公斤，比 64 式 120 毫米迫击炮减轻约 100 公斤，机动性大大增强。此间，苏式 100、122 毫米加农炮和 152 毫米加榴炮大部换装为国产 122、130、152 毫米加农炮和 152 毫米加榴炮，国产 107、130 火箭炮淘汰了苏式 132 毫米火箭炮（参见表 10—4）。

重视轻型化，有利于提高火炮的使用效能，但过分强调轻型化，以“轻”为主，必然产生忽视火炮本身性能和轻视弹药、炮用仪器以及配套装备研制生产的倾向。人民解放军炮兵的侦察、测距、指挥仪器不能与武器同步发展，缺少大吨位牵引车，又阻碍了火炮性能的充分发挥。1971年以后，人民解放军确定压制火炮的发展要重视精度、威力、射程的提高，并重新安排了新型火炮的研制工作。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发展新型火炮的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没有大的进展，加上武器装备发展管理方面的问题，新型火炮的发展进展不大，同时，这一时期生产出来的大口径火炮相当多数支援了越南，也是影响人民解放军压制火炮装备的重要因素之一。

3.高射火炮

1949年11月，中国从苏联进口37毫米和85毫米两种高炮，抗美援朝战争中，这两种高炮击落击伤大量敌机。1955年，55式37毫米高炮仿制成功，成为50年代人民解放军野战防空的主要兵器。1965年，这种高炮由单管改型为双管，命名为65式双37毫米高炮。仅这一变化，就使部队火力增加一倍。同时，可配备炮瞄雷达进行全天候全自动作战的仿苏59式57毫米、100毫米高炮装备部队，取代苏式76、85毫米高炮。这三种高炮在援越抗美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1967年6月下旬，总参谋部召开赴越作战部队座谈会，专门研究改进高炮装备问题。7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接见会议代表。当谈到高射武器要成龙配套发展时，毛泽东提出：“要狠抓一下雷达、光学仪器、指挥仪，要减轻重量，提高质量，增加数量。”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一批新型高炮和仪器在短时间内研制成功。1971年设计定型了20毫

米高射机关炮，少量生产支援越南。1972年，全天候全自动新型85毫米高炮设计定型。1974年，65式双37毫米高炮配装雷达指挥仪的改进工作完成，这种74式双管37毫米高射炮系统实现了全天候全自动作战，在发射速度、跟踪瞄准速度、弹丸威力等方面都较65式双37毫米高炮有了提高，在相同条件下，毁歼概率提高10倍以上（参见表10—5）。

1967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总参谋部制定的要地防空和野战防空高射武器建设计划，国产高射火炮得到了大量发展。到1972年，全军拥有各型高炮1万余门，其中国产炮占绝大多数。由于炮瞄雷达、指挥仪等有了相应发展，高炮部队的全天候作战能力大大加强。

三、坦克、装甲车辆

50年代初期，中国从苏联购买坦克和自行火炮3000辆，其中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使用过的T—34中型坦克。

1959年，根据苏式T—54A中型坦克仿制的59式中型坦克开始装备部队。10月1日，首批59式坦克33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庆祝国庆10周年的阅兵。59式坦克战斗全重36吨，公路最大时速48—50公里、最大行程420—440公里，火炮最大射程16000米，1500米处穿甲厚度130—170毫米。1971年，人民解放军已有59式坦克2300余辆，超过了苏式T—34坦克的数量。59式坦克成为人民解放军新一代主战坦克，并在以后一个长时期中在人民解放军坦克部队中占据重要地位。80年代中，针对59式坦克的某些不足，对其作了改进，分别定名为59—1式和59—2式坦克。

1974年，装有100毫米滑膛炮和双向火炮稳定器的69式中型坦克设计定型。这种坦克的射击精度、夜视性能和机动性等都

表 10—5 主要高射武器性能

型 号	重量 (公斤)	射程 (米) 最大 有效	初速 (米/秒)	战斗射速 (发/分)	射界 (度) 方向 高低	装备部队 时间
54 式 12.7 高机枪	134	7,000 1,600	820	80	360 -34~+78	1954 年
58 式双联 14.5 高机枪	660	12,000 2,000	945	300	360 -15~+90	1961 年
56 式四联 14.5 高机枪	2,100	12,000 2,000	945	600	360 -10~+90	1957 年
65 式双 37 高炮	2,650	8,500 3,500	868	160-180	360 -10~+85	1966 年
59 式 57 高炮	4,780	12,000 6,000	1,000	50-60	360 -2~+87	1960 年
59 式 100 高炮	9,600	21,000 12,600	900	12-15	360 -3~+85	1959 年
72 式 85 高炮	6,100	21,400	1,000	30-35	360 -3~+87	1973 年(定型)

表 10-6 主要作战坦克性能

型 号	重量 (吨)	乘员 (人)	坦克炮类型	射程 (米)		发动机功率 (马力)	公路最大时速 (公里)	爬坡度 (度)	装甲厚度 (毫米)	车体侧部 炮塔前部	装备部队 时间
T-34 中型坦克	32	5	85 线膛炮	14,000	1,050	500	55	30	45 / 40	90 / 70	1950 年
59 式中型坦克	36	4	100 线膛炮	16,000		520	48-50	30	80 / 90	200 / 弧	1960 年
69 式中型坦克	36.5	4	100 滑膛炮	12,000		580	50	32	80 / 90	200 / 弧	1974 年 (定型)
62 式轻型坦克	21	4	85 线膛炮	12,100	1,050	430	55-60	35	25 / 90	45 / 弧	1963 年
63 式水陆坦克	18.5	4	85 线膛炮	12,800	1,050	400	64.2	38	10 / 90	20 / 弧	1964 年

比 59 式中型坦克有改进（参见表 10—6）。

比 59 式坦克稍晚定型和装备部队的是 62 式轻型坦克和 63 式水陆坦克。62 式轻型坦克战斗全重 21 吨，公路时速 55—60 公里，主要用于南方地区，既可直接担负作战任务，也可用于侦察等战斗保障任务。63 式水陆坦克战斗全重 18.5 吨，公路时速可达到 64.2 公里，水上时速 12 公里，可抗 3—4 级风浪，主要用于江河和近海登陆作战，也可在水网稻田地行动。

在发展坦克的同时，63 式履带装甲输送车也于 1964 年装备部队。这种装甲输送车战斗全重 12.8 吨，乘员 2 人，可运载步兵 13 人或物资 1.5 吨，公路最大时速 60 公里，水上最大时速 6 公里。

在此基础上，1968 年至 1973 年，一批与坦克配套使用的战斗保障车辆和技术保障车辆研制定型，包括坦克牵引车、坦克抢救车、坦克修理工程车等。这些配套装备提高了部队的保障能力和装甲车辆的战场再生能力。

70 年代初，人民解放军拥有的坦克数量仅次于苏联和美国，居世界第三位。

第三节 空军装备

20 多年的战争环境中，尽管人民解放军可以同地面的对手进行殊死搏斗，却对来自空中的敌人无可奈何，饱受了缺少制空权的困扰。当着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顺利发展，解放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时，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对于建设空军倾注较多的注意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何况，对于疆域辽阔，内陆面积广大的中国而言，不可忽视建设一支具有一定规模和作战能力的空军的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初，它

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多次起草文电致苏联领导人，为人民解放军空军订购飞机。1952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准备建设海军的贷款大部分拨给空军用于购置飞机。同时，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中国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捐献活动，共计捐献出可购买3000多架飞机的人民币。

1949年到1955年，短短的6年中，中国空军的飞机迅速发展到了4000余架，并且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空军相抗衡，取得辉煌的战绩。此时，中国空军作战飞机的性能大体上可以与美国飞机相匹敌。

1951年，中国着手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走上一条修理——装配——制造的道路。1954年6月，雅克—18型初级教练机仿制成功。1956年，米格—17型喷气式歼击机仿制成功，被命名为歼5型歼击机。到1959年停产时，该型飞机共生产760余架。

自1959年仿制苏式米格—19型的歼6型超音速喷气式歼击机问世以后，由于苏联政府中断对中国的航空技术援助，中国航空工业出现了一段低潮。到60年代中期，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依靠自己的力量，中国航空工业走出低谷，开始了复苏。显著的标志之一是1966年6月19日，毛泽东批准歼7、轰5、歼教5型飞机生产定型，随后大量生产装备部队。以后，歼6（仿苏杜—16型）型中型轰炸机于1968年底试飞成功。1969年，强5型强击机装备部队。这些飞机的相继服役，大大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作战能力。

不仅如此，航空导弹、航空炸弹、通讯导航设备以及其他地面辅助设备也有相应发展，有效地保证了航空兵在各种复杂条件下升空作战，顺利完成战斗任务。

一· 歼击机

50年代，人民解放军歼击航空兵的主要装备是米格-15比斯、歼5等亚音速飞机。这些飞机开始装备部队之时，与世界水平没有明显差距。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大量新技术新装备进入航空领域，世界各主要国家军用飞机的发展异常迅速，相比之下，人民解放军的作战飞机就显得落后了。60年代初装备部队的歼6飞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差距。

进入70年代，歼6飞机已成为人民解放军空军歼击部队的主力机种。歼6飞机最大平飞速度达到1454公里，实现了由亚音速向超音速的跨越。另外，歼6飞机在升限、活动半径、上升率、加速时间、武器配置等方面的性能都明显优于歼5飞机。到1972年，人民解放军装备的歼6飞机占全部歼（强）击机的47%。

1966年，歼7飞机开始装备部队。这种飞机由三角型机翼取代歼6、歼5型飞机的后掠式机翼，改善了空气性能。歼7飞机最大平飞速度2180公里，升限19000米，战斗活动半径360公里，平飞加速时间135秒，以后歼7飞机经过多次改进，先后在原机型基础上，增装航炮、改变进气调节系统和救生装置、换装发动机和副油箱、改善着陆性能、改进火控系统和飞行控制系统，使其成为人民解放军空军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主要作战飞机。

1969年，借鉴美、苏飞机特点，由中国自行研制生产的强5型超音速强击机开始装备部队。强5飞机具有较好的低空性能，配备有航炮、火箭发射器、航空炸弹，可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强5飞机的大列服役，完善了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机种配系。这时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已开始试飞。

“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同样在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建设史上留下

深刻痕迹，以上述几种飞机为例，歼 6 飞机 1963 年已完成生产定型，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加上吴法宪等人的瞎指挥，使出厂飞机不仅缺少重要设备，而且质量不过关，多次因机械问题造成严重飞行事故，有些援外飞机因质量问题被迫退回。歼 7 飞机服役 6 年，到 1972 年仍只有 30 余架，工厂生产的少，因各种事故坠毁的多。强 5 飞机在使用中发现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影响作战使用，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从 1975 年底开始全部返修，并进行改装，改装后的飞机 1984 年重新装备部队。

二、轰炸机

歼击机主要用于截击入侵的敌方飞机，是一种防御性武器。强 5 飞机虽可支援地面部队作战，但其航程短、载弹量少，攻击力量有限。对敌地面目标实施空中攻击的任务主要由轰炸机完成。

仿苏伊尔—28 型的轰 5 飞机此时仍是主力機種，该机最大平飞速度 902 公里，航程 2080 公里，战斗活动半径 530 公里，是一种亚音速短程战术轰炸机。轰 5 飞机正常载弹量 1000 公斤，最大载弹量 3000 公斤，可同时悬挂 50—100 公斤炸弹 12 枚或 250 公斤炸弹 8 枚或 500 公斤炸弹 4 枚，也可悬挂 1000—3000 公斤炸弹 1 枚。1967 年，国产轰 5 飞机装备部队，与老型号飞机相比，国产轰 5 的轰炸雷达、炮塔、轰炸瞄准具和自动驾驶仪等设备有改进，因而又称“新轰 5”。

高亚音速中程轰炸机轰 6 于 1969 年开始装备部队。轰 6 飞机最大平飞速度 1014 公里，最大航程 5760 公里，战斗活动半径 2190 公里，可装备多种电子作战设备。轰 6 飞机最大载弹量 9000 公斤，可悬挂 100—250 公斤炸弹 24 枚或 500 公斤炸弹 18 枚或 1000 公斤炸弹 6 枚，也可悬挂 1500 公斤炸弹 4 枚或 3000

公斤炸弹 2 枚。加装特种设备后，轰 6 飞机可装挂原子武器。轰 6 飞机的活动范围大，攻击距离远，使人民解放军的空中打击力量延伸至内陆和领海的大部分区域。不过，“文化大革命”使飞机制造厂开工不足，长期处于一种半瘫痪状态，轰 6 飞机的年产量只有几架到十几架，远不能满足部队换装的需要，造成许多早已过时的螺旋桨飞机仍在服役。到 1972 年，人民解放军装备的轰 6 飞机不足所有轰炸机的 10%，同时，仍在服役的旧杂式轰炸机尚有 130 余架。

三、导弹

标志空军战斗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空空导弹的使用，导弹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空战模式，扩大了空战的时间和空间概念。

继雷达波束制导的霹雳 1 号空空导弹装备部队后，1970 年，国产霹雳 2 号空空导弹开始装备部队。霹雳 2 号导弹采用被动式红外线制导，最大发射距离 7.6 公里，最大平飞速度每秒 550 米，可装备歼 6、歼 7 飞机上，用于攻击空中目标。发射后，由弹上的红外线制导系统接收目标辐射出的红外线，自动追击目标。导弹上装有两种引信，当直接命中目标时，触发引信起爆战斗部；当飞经目标附近时，光学引信起爆战斗部，以爆炸的破片击毁目标；当未命中目标时，飞行 21 秒后自炸。霹雳 2 号的毁歼概率高于霹雳 1 号，霹雳 2 号装备部队后，霹雳 1 号随即停止生产。

红旗 2 号地空导弹也于 1966 年装备部队。该型导弹采用无线电指令制导方式，能抗部分回答式干扰和杂波干扰，最大飞行速度每秒 1150 米，射高 3—24.5 公里，有效射程（斜距）12—32 公里，可击毁飞行速度小于每秒 420 米的目标，一次发射 3

发的杀伤概率不小于 94%，导弹上的无线电能够适时引爆战斗部，若未适时引爆，发射后 60 秒自爆。

第四节 海军装备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解放军海军仅有缴获和起义的国民党海军舰艇 100 余艘，这些舰艇性能落后，失修严重，有些甚至是清末海军的遗物，许多已无法使用。加之，国民党飞机连续轰炸起义军舰和上海江南造船所，迫使人民解放军将《重庆号》巡洋舰及其他许多起义军舰自沉于海面和长江江底。可以说，这时的人民海军几乎等于零。

为了在短时间内实现从无到有的转变，人民解放军接收、征用商船改装为军舰，接收渔轮改装为巡逻艇，修复了一些旧船旧舰，并以这些简陋的装备打破了国民党军队针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而实行的海上封锁。在此基础上，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修船造船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修复旧船，改造民船不能满足海军长远建设的需要。1950 年初，人民解放军曾经通过香港向西方国家购买了少量舰船，但这条渠道很快就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政策而被堵死，唯一有能力长期向中国提供海军舰船的国家是苏联。

不过，向外国购买装备既受出售国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受国内财政条件的限制。1952 年，苏联同意将部分舰艇的制造权有偿地转让给中国，1953 年，中国向苏联购买护卫舰、潜艇、扫雷舰、大型猎潜艇、鱼雷艇等 5 种型号舰艇的全部技术资料和部分材料、设备，在国内装配制造。这种转让制造的舰艇是人民解放军海军初期战斗舰艇的重要来源，通过这种方法，促使国内造船工业进行了全面改造。

50年代末，人民解放军海军在转让制造的基础上过渡到引进技术进行仿制改进。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执行已经签订的合同，给刚刚开始仿制工作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即使如此，到60年代中期，仿制装备的生产已占当时正在生产中的舰用装备、材料、设备的66%。

50年代，人民解放军海军先后设计制造出50吨级的53甲型巡逻艇和75吨级的55甲型巡逻艇。1962年，排水量为125吨的62型巡逻艇（后改名为护卫艇）定型生产，1965年正式装备部队。该型护卫艇共生产300余艘，在保卫海防的战斗中作出重要贡献。1965年，海军编制了海军装备科研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研制具有比较先进水平的中型水面舰艇、中型潜艇以及核潜艇的重要目标。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海军装备的发展速度被迫放慢，但是并没有停止，经过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艰苦努力已经逐渐蕴育成熟的海军装备发展蓝图开始变为现实。“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冲破重重阻碍，海军装备在导弹化和潜艇化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70年代初与60年代初相比，舰艇数量和吨位分别增长了63%和71%。人民解放军的海上战斗能力大大提高。

一、水面舰艇

1961年，人民解放军共有驱逐舰、护卫舰（艇）、猎潜艇、扫雷舰（艇）、快艇等水面作战舰艇近6万余吨，其中大部分是排水量500吨以下的护卫艇和快艇，这与当时强调以轻小型战斗舰艇为主形成舰艇系列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1971年，上述数字发展到10万余吨。

1966年，1000吨级的65型护卫舰开始服役，标志着中国海军水面舰艇的研制由小型向中型的过渡。1967年4月，中共中

中央军委批准了海军装备科研第三个五年计划，新型护卫舰和驱逐舰的研制工作加快了步伐。1968年底，由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艘051型中型导弹驱逐舰开工建造，1971年12月编入海军建制序列。051型驱逐舰满载排水量3500余吨，最大航速每小时36节^①，最大航程4000海里^②。舰上材料和设备全部立足于国内，装有高参数大功率蒸气动力装置、导弹武器系统、自动舰炮、舰用雷达、搜索攻击声纳以及电子指挥仪等新设备，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代中型水面舰艇。它的航速高、航程远、对海火力强，主要性能相当于苏、美60年代生产的某些军舰，是一种比较现代化的舰艇。1972年，海军成立定型工作组，组织对051型驱逐舰的试验、鉴定和定型，为该型驱逐舰的持续生产打下了基础。

由于海军装备技术复杂，建设周期长，导弹护卫舰的研制工作采取了过渡性的办法，一方面不放弃新型军舰的研究，一方面利用旧舰的各种设备，加装导弹，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战斗力。利用旧舰改装的第一艘053H型导弹护卫舰（配备上游1号舰舰导弹）1975年6月下水，很快，陆续制造出的这种护卫舰成为中国海军水面舰艇部队的主力兵器之一。装备有双联舰空导弹发射架的053K型导弹护卫舰也于1974年开始装备部队。

快艇作为近海防御的重要兵器，始终是人民解放军海军装备建设的重点之一。1965年到1966年，仿制生产和自行研制生产的21型、24型导弹快艇和26型鱼雷快艇先后装备部队。到1972年，人民解放军拥有的快艇中近1/4是导弹快艇。

猎潜艇、登陆舰（艇）及其他辅助舰艇同时期也有一定发展。

① 节是国际通用的航海速度单位，1节=1海里/时

② 1海里=1852米。

二、潜艇

1950年，海军第一次建军会议上即提出发展潜艇的目标，以后又多次重申这一原则，但到6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海军仅有旧式鱼雷潜艇10余艘，不足2万吨。1965年，仿苏33型鱼雷潜艇装备部队，1969年起，该型潜艇全部采用国产材料和设备，以后经过不断改进，逐步增加生产数量，33型潜艇下潜深度300米，水上最大航速15节，水下最大航速13节，可在水下逗留600小时，成为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部队的主力。在此前后，31型鱼雷导弹潜艇和035型鱼雷潜艇也开始装备部队。

这一时期中，人民解放军海军建设史上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件是核动力潜艇的装备使用。1958年6月27日，主管国防科研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呈送关于研制核动力潜艇的报告，获得批准。7月下旬，海军和第二机械工业部联合组成核潜艇设计组。毛泽东指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60年代初，由于国家经济困难，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难以继续，仅留下少数人员维持必要的工作。1965年，研制工作重新上马，初步拟定在1972年下水试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生产和科研秩序混乱，刚刚起步的研制工作面临夭折的危险。尽管多次召开协调会，但成效甚微，涉及27个省、市和上千个单位的这项工作困难重重。1967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建国以后第一个《特别公函》，要求承担核潜艇研制任务的所有单位和人员群策群力，密切协同，排除万难，完成任务。反复宣传这是毛泽东亲自批准，对国家安全有重要意义的工程，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冲击生产或借口停产。《特别公函》取得了明显效果，在武斗严重，人员流散的当时，保证了科研生产工作的继续进行。

1968年11月，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建造，1970年12月下水，开始码头安装。经过20多次，6000多海里的海上试验后，1974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这艘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并举行了军旗授予仪式。

这种091型核动力鱼雷潜艇水下最大航速26节，续航力18万海里，可长期在水下执行战斗任务。核潜艇装备部队，标志着中国海军的综合作战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三、导弹

1967年，上游1号舰舰导弹定型生产并开始装备部队，为海军舰艇的导弹化准备了必要条件。这种导弹采用自控+自导的制导方式，有效射程8—35公里，单发对单舰的命中概率约为70%。1970年，海鹰1号舰舰导弹装备部队，这种导弹的最大动力航程比上游1号增加了1倍，有效射程达到15—50公里。由自导雷达、自动驾驶仪和操纵系统组成的控制系统能够自动控制导弹按预定弹道飞行；“自控飞行”阶段结束后，自导雷达自动开机，将导弹自动导向目标。

海鹰1号也可用作岸舰导弹。同时装备部队的岸舰导弹还有海鹰2号，这种导弹最大动力航程105公里，有效射程20—95公里。

四、作战飞机

海军的作战飞机大部分与空军通用。根据海军的特殊需要，先后进口或生产了一些适合海军使用的机种，如别6水上飞机、杜2水鱼雷机等。1967年，在轰5飞机基础上改型的国产轰5水鱼雷机装备部队。这种飞机既可按照轰5飞机的挂弹方案装挂炸弹，也可装挂2条鱼雷或2枚水雷在海上投放。为了不影

程，机身内增加了 2 个副油箱。

第五节 主要保障装备

在陆、海、空军武器系列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同时，工程、通信、雷达、电子对抗和防化等主要保障装备的战术技术水平也有明显进步，从而保证了作战、训练等任务的完成。

一. 工程装备

1969 年珍宝岛战斗中击毁苏军 T—62 坦克的经验促使人民解放军加强地雷爆破器材的研制工作。以后的几年中，69 式磁性定时雷、69 式防坦克地雷、72 式防坦克地雷、74 式火箭布雷车等地雷爆破器材先后研制成功。周恩来、叶剑英等称赞研制单位“为反坦克增添了锐利武器”。72 式防坦克地雷分钢壳和塑料外壳两种，用其布设防坦克地雷场，可以炸断中型坦克的履带，破坏其负重轮，达到阻止、迟滞、炸毁敌集群坦克和装甲车辆的目的。74 式火箭布雷车用火箭布雷弹载运、抛撒带有降落伞的防坦克地雷，单车一次齐射，可布放防坦克地雷 100 枚，构成正面、纵深均为 100—200 米的雷场。73 式火箭爆破器用火箭弹拖曳爆炸带，以控制绳定距，使爆炸带在敌方障碍物中爆炸，为步兵开辟通路。这些布雷、排雷器材批量生产后，大大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工程保障能力。

舟桥渡河器材作为军队克服江河障碍的主要技术装备，得到人民解放军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鉴于进口的苏式舟桥不适应中国江河流速较大的特点，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人民解放军积极仿制和研制性能较好的舟桥，逐步淘汰进口舟桥。62 式重型舟桥、63 式轻型舟桥、69 式机械化桥、74 式重型舟桥和特种舟桥

这一时期陆续装备部队。74 式舟桥可用于架设浮桥或结构门桥，保障部队和坦克、火炮、车辆等装备通过大、中江河障碍。舟桥的舟体与桥面合为一体，结构简单，操作方便，作业速度快，劳动强度低，240 人作业 60 分钟，可架设成长 548 米，载重 25 吨的浮桥。1975 年，74 式舟桥与 62 式舟桥参加了在湖北鄂城进行的架设长江浮桥演习，在征服长江中经受了考验，取得了在宽水域、深水区架桥的经验。69 式机械化桥用于架设车辙式桥，保障部队和火炮、车辆等装备通过较小的河川以及弹坑、壕沟等障碍，具有架设迅速、撤收方便的特点。

在较长时间中，人民解放军实施工程保障作业使用民用机械，这些机械或者性能落后，或者不适应部队野战施工的特殊要求。60 年代中期以后，64 式履带式挖壕机、74 式轮式挖掘机、74 式轮式推土机、74 式轮式装载机等工程装备陆续仿制或研制成功。这些机械，不仅作业效率高，而且具有较好的越野性能和机动性能。它们的成批装备部队，提高了部队野战筑城作业的机械化程度，代替了过去相当繁重的手工劳动。如 74 式轮式推土机不仅每小时可推土 60 立方米（运距 50 米），而且行驶速度快（最大时速 52 公里），适于伴随部队机动使用。

二、通信装备

1963 年，总参谋部拟制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通信装备体制》，确定步兵保留 50 年代国产通信机的主要品种，增加短波单边带通信机和其他新装备，炮兵、坦克、舰艇、飞机的专用通信装备主要仿制苏式通信机。从此，基本形成了人民解放军通信装备体制。

60 年代初，人民解放军师以下部队的通信装备开始向半导体轻小型化发展，半导体 884 型超短波调频电台，1965 年开始

小批量生产，1969年装备部队，受到普遍欢迎。这种电台全重5.9公斤，可由1人携带运行，通信距离2.5—5公里，主要用于营连间通信。接着，705型、708型、709型超短波调频电台，15瓦短波调幅电台，150瓦短波调幅电台等轻小型通信装备先后研制成功。和老式装备相比，新装备的体积缩小1/2，重量减轻一半左右。到1975年，全军师以下战斗部队通信装备实现了半导体轻小型化。

军以上通信装备，着重增加通信手段，扩大通信容量，改进通信方式。由于单边带电台的广泛使用，人民解放军的无线电短波通信由一次只能通一路人工手键报（或一路话）发展为可同时通两路印字报和一路话，从而提高了时效，增大了有效通信距离。

接力机、载波机等通信装备的发展，在此期间也取得明显成效。载波电话设备不仅大大增加了野战部队和国防通信网的通信容量，而且使野战通信系统和固定通信系统相衔接。

三、电子对抗装备

1958年之前，人民解放军没有专门的电子对抗部队。1958年组建第一个电子对抗营时从苏联进口了少量电子对抗装备。“文化大革命”使这一起步不久的工作停顿下来，电子对抗装备的发展非常缓慢。

通信对抗装备除了1970年为配合合成军通信对抗演习赶制了1600瓦短波干扰车、1600瓦单边带干扰车和400瓦超短波干扰车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雷达对抗装备与通信对抗装备的情况相似，60年代初期设计生产的901型、902型雷达侦察机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半导体小型化改造而成的903型雷达侦察机仍在使用的。这些侦察机属于粗测雷达侦察设备，完全靠手工操作，比较落后。但是，903型

侦察机在援越抗美期间为高炮部队提供远方空情，起到了一定作用，受到好评。

70年代起，中国自行研制生产出各种波段的机载电子干扰机，并用它们改装成轰5电子干扰飞机和杜-4电子干扰飞机，轰5电子干扰飞机装有9种15部电子对抗设备，杜-4电子干扰飞机装有14种46部电子对抗设备，可遂行战斗保障任务，杜-4电子对抗侦察机此时也已服役。

四、雷达装备

人民解放军60年代防空雷达的骨干装备是具有两个频率，可进行变频反干扰的407雷达，407雷达与406雷达、513雷达组成了探测距离远、中—近程衔接的米波雷达系列。60年代中期，408型米波远程警戒雷达、514型米波中远程警戒雷达、571型分米波近程低空警戒雷达先后问世，形成比较严密的对空警戒雷达网。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雷达装备的技术水平停滞不前，进一步拉大了与国际水平的差距。直到70年代中期，经过一系列调整整顿，才取得一些成果，如572型低空警戒雷达、586型引导雷达、589型低空警戒雷达和405型对海警戒雷达等。

五、防化装备

基于对未来战争中，可能遭受原子、化学、生物武器袭击的设想，防化装备的研制和生产得到了必要的重视。1964年，符合中国人头型，重量轻，防毒性能好，佩戴舒适，能通话的64型防毒面具研制成功，1966年装备防化部（分）队。64型防毒面具重1.4公斤，可以保护人员的呼吸器官、眼睛及面部皮肤免受毒剂、放射性微粒及细菌的直接伤害。1971年和1975年，65

型防毒面具和 69 型防毒面具先后装备部队。65 型防毒面具重量轻，仅为 64 型的 43%。69 型防毒面具比 65 型略重，但吸气阻力小，可以更换滤毒罐，有自己的长处。这两种防毒面具作为合成军防化装备使用。

用于工事内进行滤尘、滤毒、生氧的集体防护器材主要为 60 年代初装备部队的仿苏产品。70 年代初，中国自行研制生产的 73 型 1000 滤毒器和 75 型 2000 滤尘器以及 65—1 型生氧器开始装备部队或已经设计定型。

1964 年以后，中国核试验的进行为防原子侦察器材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1968 年的防化装备系列中，增加了核爆炸观测器材，1975 年定型了第一代可自动测量核爆炸的当量、距离，记录核爆炸时间，并能自动报警的 75 型核爆炸观测仪，用以装备防化部（分）队。防化侦察车、70 型辐射仪、74 型丙种射线报警器以及 75 型射线指示仪、62 型个人剂量检查仪先后设计定型，陆续装备部队。

由于装备数量的增加，防化工作已经突破了专业分队防护的域限，逐步实现了群体防护。合成军战斗连队 4 种防化器材（轻便防毒面具、个人剂量检查仪、射线指示仪、毒剂报警器）正式列编，普遍配发部队。海、空军和第二炮兵开始有了专用防化装备。

第六节 战略武器研制

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实现以核武器限制核武器的目的，50 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中心的尖端武器。

1956 年 4 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领导人民解放军导弹和飞机研究工作的航空工业委员会，聂荣臻任主任。1957 年 9 月，

聂荣臻率代表团同苏联政府代表团谈判，达成“十月十五日协定”。苏联同意在火箭和航空等技术领域援助中国。以后几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样品和技术资料，派遣专家帮助中国仿制。1958年，中国开始仿制苏式 P-2 型近程地地导弹，1960年11月发射成功，从此开始了中国拥有自己的战略武器的历史。这种命名为“1059型”（后改称 DF-1 型）的导弹，射程仅有 600 公里，命中精度不高，试验成功后，只少量装备部队和院校，供教学和训练使用。

1964 年，中国战略武器的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6 月 29 日，主要由中国自行研制的 DF-2 型中程导弹经过 4 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试飞成功。10 月 16 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文化大革命”中，国防战略武器的研制工作在极其艰难复杂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1966 年 10 月 27 日，中国首次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经过提高性能设计的 DF-2A 型导弹正常飞行约 900 公里，准确命中目标，实现了核爆炸。1966 年 12 月，全部由中国自行研制的 DF-3 型导弹发射成功。这种导弹 1958 年已开始研制，其间几经周折。改进后的 DF-3A 导弹射程可达 3000 公里。1967 年 6 月 17 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本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1969 年 9 月 23 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到 1976 年底，中国已成功地进行了约 20 次核试验。性能更为先进的 DF-4 型、DF-5 型导弹先后试验成功投入生产。1971 年，战略导弹部队开始装备中程导弹核武器，中国的国防力量迅速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中国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导弹部队，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和威慑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中国政府多次声明，中国发展有限的核力量的目的是最终彻底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1970年4月24日，中国首次发射成功人造地球卫星^①。卫星重173公斤，绕地球一周需时114分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紧接着，用于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的卫星开始全面研制工作。1975年11月26日，该型卫星发射成功，卫星运行3天后按计划返回地面，中国成为世界上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少数国家之一。

从“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到这样几个问题：一是缺乏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和设计规划，主观随意性多，造成武器装备发展不平衡，主战坦克、飞机、军舰等的发展速度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二是忽视配套装备和辅助器具的研制生产，形成有主机无附件的状况，难以保证战斗效能的充分发挥；三是质量问题相当普遍，达不到装备预期的性能指标，战斗中往往贻误战机，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四是生产与使用脱节，有些装备已投产多年，部队却没有装备或装备很少，不得不使用代用装备或代用方法。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部队仍大量使用简易的音响通信，不仅效果差，而且极易暴露行动意图；五是武器装备的轻型化、小型化、自动化还有不小的差距，个人防护用品改进不大，限制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和战场生存能力。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军委对全军武器装备建设进行全面整顿，逐步解决了遗留多年的问题，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① 1968年初，中国已完成人造地球卫星的全部发射准备，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借故拖延，推迟了发射时间。

第十一章 保卫国家安全

从 1962 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之后，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六、七年间，人民解放军除派出部分地面支援部队援越抗美以外，再未经受战争的考验。

按照国际法的一般解释，战争是导致交战国之间外交关系和条约关系断绝的，具有相当规模和范围，并持续一定期间的武装冲突。但是，按照更加广义的理解，战争也可以包括国家之间偶然发生的、地区性的、短暂的边界冲突。在现代国际政治生活中，战争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具有巨大破坏性的“恶魔”，任何国家都不会公开表示企望战争，当然更不愿引导自己进入战争。马克思主义并不一概地反对战争，它认为应当把战争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主张以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以反侵略战争对付侵略战争。当着战争横加于爱好和平，主张正义的国家之时，这些国家的人民为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用武力抗御外敌入侵的行动是无可非议的。这时的战争是不以这些国家人民的意志为转移的。

战争的存在决定了军队存在的必要性，不希望战争又不得不准备战争是人类社会自出现私有制以后产生的社会现象之一。一方面，军队支持着战争，另一方面，战争培养着军队。在战争条件下，军队的首要职能——打仗——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战争可以最大限度地暴露军队本身存在的一切不适应其要求的弊病。全面衡量军队教育训练、编制体制、武器装备、组织指挥能力，

并且造成一种紧迫态势，促使这些问题的迅速解决。战争成为军队发展的最有效的激索。相反，经历长时期和平环境的军队容易懈怠、松散，变得不那么敏感，变得对突如其来的战争缺乏有效的抵御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在中国北部边境的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和发生在南海海域的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以及多次对空防御作战在不同程度上呼唤着陷入“文化大革命”泥淖的人民解放军，提醒它及时反省自身，正视肩负的责任和自己现有能力与水平之间的差距。

“文化大革命”使“抵抗侵略，保卫祖国”这一职能的执行变得异常困难。尽管如此，人民解放军仍然高度警惕着并且英勇抗击了来自外部的侵略和挑衅，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这期间的几次作战行动，规模不大，时间也不长，但在国际国内反响巨大，特别是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使中苏两党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在这些战斗中，参战部队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政治、外交方针，执行中央军委、总部的作战命令，英勇顽强，胜利地保卫了祖国领土、领海和领空的安全。参战部队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记下了重要一页，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推崇和爱戴，大大地恢复了被“文化大革命”损害的人民解放军的形象。

第一节 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

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基本理论是“反修防修”。6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坚信修正主义具有同帝国主义一样的扩张性和掠夺性，并且，较之帝国主义的公开剥削，修正主义又多了一层欺骗性。由于地理位置的毗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长期争论，中国逐渐感到苏联是最现实最危险的敌人，是新的战争策源地。

1969年3月，中苏两国军队在中国东北边境的珍宝岛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肯定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作了注解，人们不得不接受修正主义不仅国内有，国外也有；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是现实的存在这样一种论说。同时，珍宝岛事件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这也使珍宝岛事件的意义远非一般武装冲突的影响所能比拟，它更多地蒙上了一层政治的色彩，被当作一种象征，相比之下，它的军事上的意义反而成了第二位的了。

一、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领土

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珍宝岛原来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乌苏里江中国江岸的一部分，后因江水冲刷，20世纪初才成为岛屿，至今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连，人们可徒步上岛。岛西边的江叉从来没有成为航道。该岛两头尖，中间宽，状似中国古代的元宝，故名珍宝岛。

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689年9月8日《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边界东段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均为中国领土。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当时还是中国的内河。1858年5月，沙俄帝国主义乘英法帝国主义联军侵略中国，进攻天津，威胁北京之时，迫使清朝当局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璦琿条约》，割去了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两国共管。1860年11月，沙俄帝国主义再次借助英法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军事压力，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全部中国领土划归俄国。1861年，按照

沙俄事先标绘的地图，双方签订了关于交换乌苏里江边区边界地图和记文的议定书，作为条约的组成部分。

即使根据《中俄北京条约》，珍宝岛也是中国领土。该条约规定：“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凡通航界河如无明确规定，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以此划分岛屿归属。珍宝岛及其附近的卡脖子岛和七里沁岛均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历来属中国管辖，一直有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一直有中国居民在岛上生产和生活。苏联政府的有关文件也承认应以主航道中心线划分边界线。

中苏双方 1926 年曾举行会谈，商议重新划界，订立新约。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双方在边界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两国边界没有重新划定，也没有签订平等新约。

1964 年，中苏两国政府举行边界谈判，中国方面提出：《中俄璦琿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都是沙俄帝国主义在中俄两国人民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方面从加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愿望出发，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线的全部走向，解决边界上存在的一切问题；任何一方违反条约占据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全部无条件地退还给对方，但是，不排除双方在条约的基础上，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上的个别地方作必要的调整。然而，苏联方面拒绝了中国方面的这些建议。

长期以来，中苏两国之间在边界问题上的争议没有合理解决，但这些争议并不影响珍宝岛是中国领土这个事实。

二、珍宝岛争端由来已久

《中俄北京条约》附图中，沿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画了一条

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这张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附图上的红线，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当然无法决定岛屿的归属。但是，苏联坚持这条分界线在珍宝岛地区“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以此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1947年，珍宝岛被苏联划入其警戒线内。

60年代开始，中苏两党的争论不断升级，两国间的边界冲突也逐渐加剧。1964年以后，苏联政府在中苏边界大量增兵，继续恶化边界形势，造成一系列流血事件。据统计，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期间，两国间的边界事件达到4189起，比1960年到1964年期间增加了1.5倍。

珍宝岛地区是双方边界斗争的焦点之一。1967年1月23日到1969年3月2日的封冻季节里，苏军即侵入珍宝岛地区16次。1967年11月底到1968年1月5日，苏军侵入珍宝岛以北的七里沁岛18次。在这些事件中，苏军推拥、殴打以至开枪射击和用装甲车挤压中国巡逻人员和边境群众，多次打伤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人，抢走枪支弹药。1968年12月27日，苏联边防军出动装甲车和汽车7台，运送75名士兵越过乌苏里江冰面，侵入珍宝岛，拦截并殴打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17名中国边防军人，当场打伤8人，抢走冲锋枪2支。1969年1月4日，30多名苏联边防军士兵对中国边防巡逻人员又推又打，迫令中国边防分队返回。1月6日，苏联边防军在珍宝岛抓走两名捕鱼的中国边民。1月23日，76名苏联边防军人在直升飞机掩护下，分乘4台军车，携带军犬，突然袭击正在珍宝岛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分队。他们将中国边防战士抛掷到冰面上，并放出军犬扑咬中国边防战士。这次事件中，中国边防分队28人受伤，被抢走冲锋枪6支、半自动步枪3支和数百发子弹。2月7日，中国边防分队在珍宝岛再次遭到来自苏联库列比

亚克依内和下米海洛夫卡哨所的苏联边防军的干涉。据统计，仅1967年11月22日到1968年1月5日，苏联边防军就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和边民122人（其中重伤21人），打死轧死中国边民5人。中国边防人员在还击中打伤苏联边防军人10余名。

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中国针对苏联方面变本加厉的挑衅，陆续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力量，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196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电报指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要求加强中苏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做好军事上配合政治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中共中央军委要求边防部队在反挑衅斗争中，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同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如遭到苏方殴打，我可还手自卫，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苏方用装甲车等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可相应还击，如炸毁其车辆，棒击其人员，但不准开枪射击；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鸣枪警告。当我两次警告无效，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可开枪实行自卫还击；采取上述任何一种自卫措施，都要掌握“先礼后兵”的精神，并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境内。“指示”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指示”认为，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如果从纯粹第三者的立场看，中国方面在中苏边界斗争中未免显得软弱，过于拘谨，过于被动。斗争的时间、地点、方式和规模完全由苏联方面掌握，中国方面仅仅能够在苏联挑起的一系

列争端中做出有限的反应。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恰恰体现了中国一贯奉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立场，体现了在中苏两国关系中中国以忍让和克制态度谋求事态妥善解决的愿望。这一“指示”，成为以后一段时期人民解放军处理中苏边界事件的基本依据。

1969年初，珍宝岛地区的形势更趋紧张。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根据苏联方面加强对珍宝岛地区干涉挑衅的形势，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方案。“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珍宝岛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如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潜伏分队视情况予以支援。为此，在珍宝岛附近的公司边防检查站设立由合江军分区参谋长王子良等5人组成的指挥所。沈阳军区基本同意黑龙江省军区的方案，但认为岛上气候寒冷，不宜潜伏，并要求合江军分区主要首长亲自组织这一斗争。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方案”，总参谋部在给沈阳军区、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重申，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既不示弱，又不主动惹事。在具体斗争中，要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中共中央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对苏进行自卫还击的重点。总参谋部要求驻珍宝岛地区的边防部队以不少于一个加强排的兵力组成2—3个巡逻组，按既定的巡逻线，坚持不固定时间的正常巡逻；自卫还击行动，必须严格控制在航道我侧，力求行动突然，动作迅速，不要纠缠，不要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至有利地域；注意获取可靠的证据，如缴获其武器、器材，拍摄有关重要照片等；部队不要上岛潜伏，可隐蔽集结于适当地域，视情况乘汽车向现场机动进行支

援；切实搞好通信联络，注意保密。2月23日，沈阳军区就珍宝岛斗争中几项具体政策如何执行和掌握的问题报告总参谋部，总参谋部提出，苏军使用冷兵器（如木棒等）棒击我人员，或使用车辆向我冲撞，我应坚决自卫回击，棒击其人员，炸毁（炸药包）其车辆，但不准开枪射击；苏军向我开枪射击，我可鸣枪警告，当警告无效，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应坚决自卫还击。敌在其境内向我射击时，我应立即采取隐蔽措施并将时间、地点和射向等记下并尽可能获得证据；如苏人员越入我境纵深，可抓捕其少数人员，缴获其武器；如苏直升飞机临空指挥时，不准开枪射击，但必须获取证据。

以上文件清楚地说明，中国方面的军事准备完全是建立在自卫基础之上的。如果不是苏联方面继续挑起事端，珍宝岛武装冲突本来是不会发生的。

三. 自卫反击作战

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中国公司边防站派出两个巡逻组执行珍宝岛巡逻任务。当公司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的第1巡逻组沿中国境内的冰道抵近珍宝岛时，遭到来自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苏联边防站的70余名苏联边防军的阻拦。苏军一反常态，没有携带木棒，大打出手，而是荷枪实弹，步步紧逼。为避免事态扩大，中国边防巡逻组主动向岛内后撤，苏联边防军则摆开战斗队形，从两面向中国边防巡逻组进逼，另以一部向中国边防巡逻组侧翼穿插，企图造成合围态势。这时，中国边防部队的第二巡逻组突然出现，拦住了苏联边防军上尉小队队长伊万率领的迂回分队。苏联边防军见中国方面已有准备，仓促开枪，当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6人。中国边防分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立即开火还击，将伊万及其7人指挥小组消

灭。苏联边防军利用装甲车的火力压制中国巡逻分队，其中1辆进入岛北端的中国江叉，从侧后攻击岛上的中国分队。中国边防部队的岸上掩护分队组织火力支援岛上战斗，击退了苏军装甲车，并登岛反击。经过1小时战斗，中国边防部队给入侵之敌以歼灭性打击，共打死打伤苏联边防军60余人（其中击毙38人），击毁装甲车、指挥车、卡车各1辆，击伤装甲车1辆。中国边防部队牺牲17人，重伤11人，轻伤24人，另有1名通信员失踪。

苏联边防军不甘心3月2日的失败，迅速增调坦克、装甲车和步兵进入珍宝岛地区，频繁进行军事挑衅。3月4日晨，中国边防巡逻分队上岛巡逻搜索，苏军发现后，立即从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出动装甲车12辆、卡车4辆、指挥车2辆进入珍宝岛对面的树林，将炮口对向珍宝岛。其中3辆从岛北端登岛。此时，中国巡逻分队已返回，双方未接触。以后，3月5日、7日、10日、11日、12日，苏联边防军的装甲车和武装人员多次侵入珍宝岛以及岛西侧的中国河道。

为了应付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中共中央军委3月7日复电沈阳军区，明确在化冻前（3月20日）仍把珍宝岛、七里沁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抽调步兵、炮兵以及高炮和反坦克分队部署在饶河西南地区集结待命。接到命令后，分散在各个支农点上的部队迅速收拢，在4天内进至指定地域。尔后，边组织战斗，边进行战前思想政治动员和临战训练。13日，工程兵分队在苏联边防军车辆经常通过的珍宝岛西南侧江叉地区设置了小面积反坦克地雷场，反坦克炮兵隐蔽地进入前沿和纵深的阵地。

3月15日凌晨，苏联边防军10余辆装甲车集结于珍宝岛对岸。4时许，其装甲车掩护步兵从岛北端侵入珍宝岛。中国边防分队1个加强排立即抢占了珍宝岛东南的天然棱坎，与登岛苏军

形成对峙。8时02分，苏联边防军首先开火，并以6辆装甲车配合步兵发起第1次冲击。中国边防分队随即还击。阵地指挥员、营长冷鹏飞命令步兵分队消灭敌装甲车上的步兵，同时带领火箭筒组由阵地前出，待敌装甲车进至几十米距离时才突然开火，一举击毁2辆。战斗至9时16分，剩下的苏联边防军装甲车撤回对岸，登岛步兵被中国边防部队炮兵压制于岛中间的凹部，苏联边防军的第1次进攻被击退。

10时10分，苏联边防军坦克、装甲车11辆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向珍宝岛进攻。其中4辆坦克由岛南端进入中国江叉，迂回到中国守岛分队侧后，其余坦克、装甲车由岛北端侵入，向中国守岛分队发起正面攻击。苏联江岸上的火炮和机枪封锁中国江叉，阻拦中国岸上部队上岛支援。中国守岛分队以少量兵力监视迂回的苏联边防军坦克，集中主力和反坦克武器，重点打击正面之敌，同时命令岸上的无后座力炮分队攻击迂回的苏联边防军坦克。苏联边防军坦克遭打击后，改变行动路线，其中1辆闯入雷区，履带被炸断，随后被中国边防部队炮兵击毁。战斗中，阵地指挥员冷鹏飞中弹负伤，由孙玉国接替指挥。12时25分，苏联边防军第2次进攻被击退。中国边防部队共击毁苏联边防军坦克1辆、装甲车2辆，击伤坦克、装甲车各1辆，并给其步兵以很大杀伤。

12时50分，苏联边防军纵深大口径火炮、岸边坦克火炮和其他火炮在炮兵校正飞机指引下，对中国边防部队一线防御阵地、边境地区和公司边防站进行长时间炮火袭击，炮击正面达10公里，纵深7公里，持续2小时。15时13分，苏联边防军100余人在20多辆坦克、装甲车支援下，向珍宝岛发起第3次进攻。苏联边防军部分坦克、装甲车正面展开，担任火力掩护，其他坦克、装甲车和步兵分成两个梯队向中国边防部队防御阵地

轮番冲击，企图以优势兵力将中国守岛分队挤走。中国边防部队以几个战斗小组围打 1 辆坦克或装甲车，同时组织岸上步兵火力分割敌坦克与步兵，打乱其战术协同。15 时 30 分许，中国边防部队炮兵加入战斗，猛烈打击岛上的苏军坦克和装甲车，击毁击伤 6 辆。同时以一部炮火压制苏联江岸局部地区。17 时 15 分，苏联边防军撤出珍宝岛，中国边防部队粉碎了苏联边防军的第 3 次进攻。

在 3 月 15 日的战斗中，中国边防部队与苏联边防军 50 余辆坦克、装甲车以及大量步兵激战 9 个多小时，顶住了苏联边防军的 6 次炮火袭击和 3 次进攻，击毙苏联边防军上校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以下 60 余人，打伤 80 余人，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 13 辆，缴获军事装备一部。此次战斗，中国边防部队阵亡 12 人，负伤 27 人。

3 月 16 日，苏联边防军登岛收尸，中国边防部队未予出击。

3 月 17 日，苏联边防军再次侵入珍宝岛，在岛上敷设大量地雷，并企图拖走在 15 日战斗中被击毁于中国江叉的 T-62 型坦克。苏联境内的炮兵同时袭击中国边防部队前沿阵地和纵深地区。中国边防部队以炮火还击侵入珍宝岛的苏联边防军，击毁击伤其坦克 2 辆，打死打伤其步兵 30 余人。

3 月 21 日晚，苏联边防军 20 余人潜入中国岸边，企图破坏被击毁的那辆坦克，中国边防部队组织火力将其击退。以后，苏联边防军连续向这辆坦克附近实施炮击，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接近。由于冰层被炸开，坦克沉入江中。5 月 2 日，中国边防部队将这辆坦克打捞上岸，送往北京公开展览。

在 3 月 2 日、15 日和 17 日的战斗中，中国边防部队共击毁击伤苏联边防军坦克、装甲车 17 辆，击毁卡车、指挥车各 1 辆，打死打伤 250 余人，缴获 T-62 型坦克 1 辆、各种枪 31 支

(挺)、弹药和军用物资一部。3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通令表扬参加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的全体指战员。

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始终是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进行的，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作了必要准备；不同建制的数十个单位齐心协力，互相配合；战区群众以大量人力物力支援参战部队；守岛分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顽强作战。这些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同时，战斗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打的准备仍然不足。3月2日，在对峙中，苏联边防军突然开火，造成巡逻分队多人伤亡，在抢救伤员时，由于队形密集，遭敌装甲车火力扫射，伤亡较多；组织指挥生疏，对突发事件反应迟缓，处置情况不果断、不灵活；组织战场通信联络不熟练，不善于选择线路，造成通信不顺畅。战前为了保密，未动用地方线路，发生情况后，临时动用来不及；对坦克、装甲车缺乏有效的打击和防护手段，常遭其压制，吃亏较大。

四. 珍宝岛战斗10位战斗英雄

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中，参战部队37个单位、376人立了战功，其中17个单位、24人立了一等功。7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孙玉国、杜永春、华玉杰、周登国、冷鹏飞、孙征民、杨林、陈绍光、王庆容、于庆阳10人“战斗英雄”称号，这是继1966年3月国防部授予海军战士麦贤得“战斗英雄”称号之后，又一次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孙玉国，黑龙江省军区合江军分区公司边防站站长。1967年以后，孙玉国在珍宝岛地区直接参加了20多次边界斗争。3月2日，他带领巡逻组与苏联边防军对峙，随之进行自卫还击。15日，阵地指挥员负伤后，他指挥守岛分队击退了苏联边防军第2、第3次冲击。

杜永春，陆军第 133 师政治部干事。3 月 15 日，他带领 11 人的小分队坚守侧翼阵地。在与战场主要指挥员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他主动指挥小分队与友邻分队协同作战，守住了阵地。

华玉杰，陆军第 73 师 217 团 3 连火箭筒班战士。3 月 15 日，他在几十米的距离上先后用 40 火箭筒击中 4 辆装甲车，对保证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周登国，陆军第 133 师 398 团特务连班长。3 月 2 日，当正面之敌首先开枪后，周登国迅速开火，打死了苏联边防军上尉小队长伊万，并同全班一起消灭了敌指挥组。负伤后，他又提前出院，参加了 15 日的战斗。

冷鹏飞，陆军第 73 师 217 团 1 营营长。3 月 15 日战斗中，他作为指挥员，组织守岛分队抵近射击，击退了苏联边防军的第 1 次冲击。敌发起第 2 次冲击时，他左臂中弹，骨头被打碎，仍继续指挥战斗，直到被抢救离开战场。

孙征民，沈阳军区工程兵 2 工区司令部军务科副科长。到珍宝岛后，他率领小分队先后 4 次登岛埋雷、2 次排雷。3 月 15 日的战斗中，他们埋设的地雷炸毁入侵坦克 1 辆。3 月 20 日，在帮助其他小组排雷时，因他人引发地雷，不幸牺牲。

杨林，陆军第 67 师 201 团 3 炮连班长。3 月 15 日战斗中，他和两名战士在毫无隐蔽的冰道上，用无后座力炮击伤敌坦克 1 辆。这时，他左手 3 个指头被打断，右手掌被打穿，仍坚持射击，又击中 1 辆装甲车。在向另 1 辆装甲车射击时，壮烈牺牲。

陈绍光，陆军第 133 师侦察连副连长，沈阳军区标兵之一。3 月 2 日战斗中，他率领尖刀班隐蔽在零下 20 多度的阵地上。打响后，他冲锋在前，接连打倒几个敌人。左臂负伤后，他毫不在意。腹部负了重伤，他仍然率领部队冲锋。第 3 次中弹后又消灭了几个敌人。临牺牲前，他还激励战友们继续战斗。

王庆容，陆军第 73 师 217 团 1 连副连长。3 月 2 日战斗中，他冲在最前面，为抢救负伤的新战士而身负重伤后，他一面指定他人代替自己指挥，一面嘱咐陷入困境的战士们坚持战斗。牺牲前，他手中的枪仍指向敌人。

于庆阳，陆军第 133 师 397 团特务连战士。3 月 2 日战斗中，在突击队被敌机枪压制时，他首先跃出阵地，消灭了敌火力点，为突击队开辟了道路。头部负伤后，他昏倒了又爬起来，继续射击。冲出五、六步后，再次昏迷，醒来后仍惦记着战斗，直至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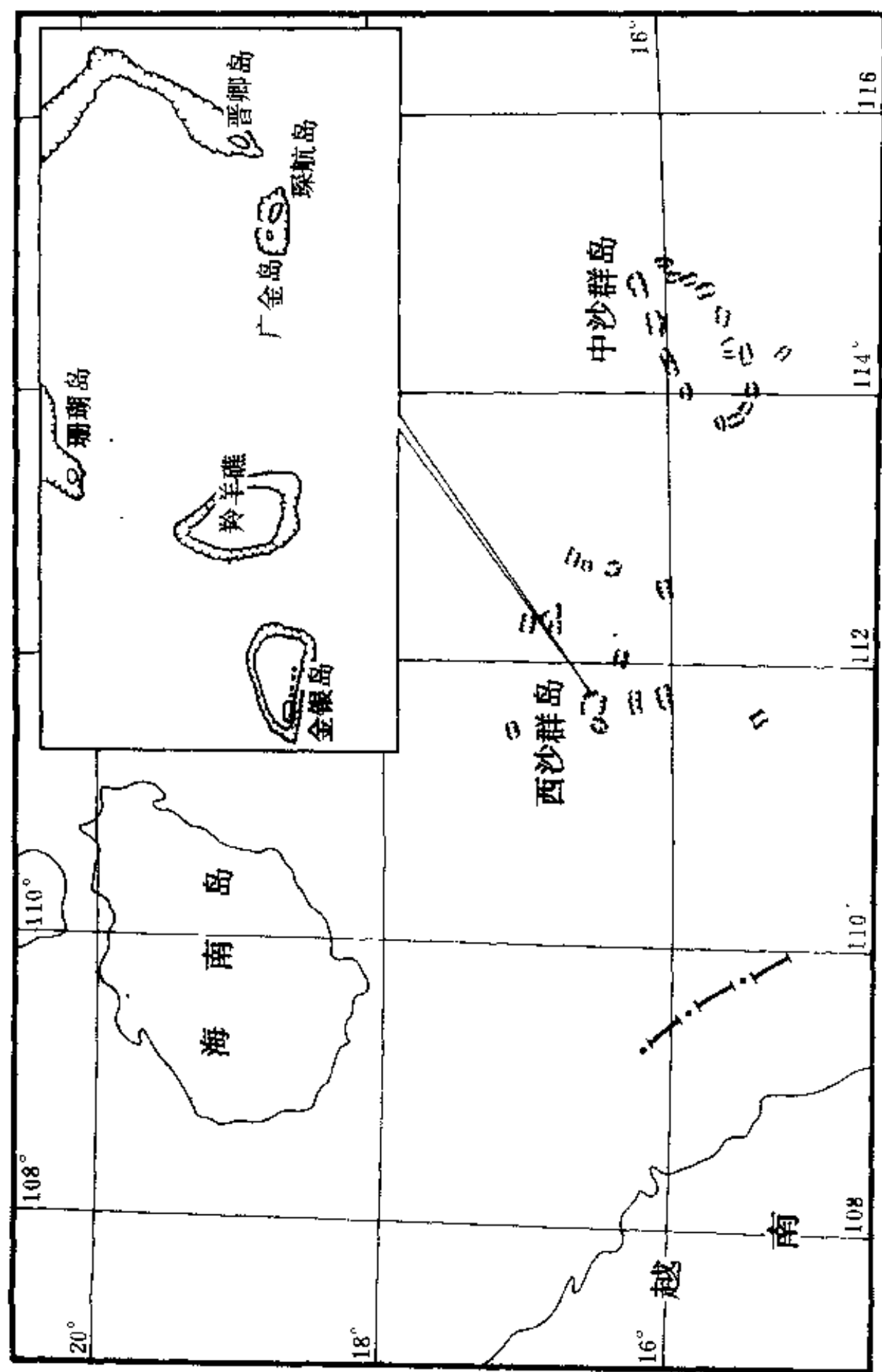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中所表现出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精神，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此后，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要求，为加强战备，准备打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二节 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

1974 年 1 月 17 日至 20 日，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一部在陆军、空军和民兵、渔民协同下，对入侵中国西沙永乐群岛的南越军队进行自卫反击，英勇地保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次在远离大陆的条件下同外国海军作战，不仅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也为人民解放军开展军事训练，遂行战斗任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一、战前情况

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约 330 公里处，由宣德群岛、永乐群岛及其他岛礁组成，总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是中国南海诸岛中陆地面积最大的一个群岛。其中永乐群岛由甘泉、珊瑚、金



西沙海战海区示意图

银、琛航、晋卿等岛屿组成。西沙群岛地处印度洋与西太平洋间的海上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海上交通的必经之路，也是通往非洲、欧洲和大洋洲的航海要津。这里自然资源丰富，石油和其他矿产储量充沛，又是优良的渔场。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西沙群岛都具有重要地位。

西沙群岛同东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已开始在南海航行。唐代以后，中国人民越来越多地在这一带海域从事捕捞活动，中国历代政府随之对这些岛屿进行了管辖。明代航海家郑和下西洋途中，多次在南海诸岛锚泊休整，“宣德”、“永乐”即是纪念郑和航海的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一度被法国占领，以后又被日本占据。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沙群岛同南海诸岛一起，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正式接收。1951年8月15日，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中指出：“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以后，中国政府多次重申这一立场。世界许多国家包括苏联和越南的教科书和地图中，都明确标示西沙群岛以及整个南海诸岛是中国领土。

1956年，印度支那停战以后，法国无理地将它侵占的珊瑚岛移交南越政府，南越政府则声称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并派兵占领了西沙永乐群岛的一些岛屿。1958年8月，南越当局派武装部队增防甘泉岛，进而侵占了琛航岛。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规定中国领海的声明，重申西沙群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14日，越南总理范文同照会周恩来总理，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承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关于规定中国领海的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尊重这一决定”。迫

于世界舆论的压力，南越当局一度将驻甘泉、琛航、金银岛上的军队全部撤走，只在珊瑚岛上留驻一个排的兵力。1961年初，南越海军在西沙群岛海面劫持中国渔船1艘，渔民20人。

1973年8月底，南越军队已占领中国南沙、西沙群岛的6个岛屿。9月又宣布，将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划归其福绥省管辖。11月，南越军舰野蛮地撞毁在西沙海域作业的中国渔船，将中国渔民劫持到岬港。1974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同时指出，这些岛屿附近海域的资源也属于中国所有，中国政府绝不容许西贡当局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任何侵犯。

南越当局不顾中国政府一再严正警告，于1月15日派出驱逐舰16号（李常杰号）侵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对在该海区从事正常捕捞生产的中国南海水产公司402、407号渔轮进行袭扰，并炮击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甘泉岛。17日，南越驱逐舰4号（陈庆瑜号）到达甘泉岛海域，南越军队随之侵占了金银、甘泉二岛。中国渔民和民兵同入侵的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18日，南越驱逐舰5号（陈平重号）、护航舰10号（怒涛号）相继到达永乐群岛海区，企图试探中国方面的态度，固守已占岛屿，相机侵占其他岛屿。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保护渔业生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立即派出军舰赴西沙永乐群岛巡逻，并命令海南军区派出民兵，随海军舰艇进驻永乐群岛的晋卿、琛航、广金三岛，监视敌之行动。同时要求在永乐群岛海域生产的渔轮在原处继续作业，不要撤回。中央军委要求：在同敌人斗争中，我应始终坚持说理斗争的原则。我舰艇、飞机和民兵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先打第一枪，如敌人首先向我攻击，我应坚决自卫还击。应当教

有参加这一斗争的全体同志，明确认识这一斗争的复杂性，严密掌握情况，随时注意敌人的动向，掌握好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加强请示报告，更好完成任务。命令提醒坚持生产的民兵和渔民提高警惕，做好应急准备，防止吃亏。要求海南军区视情况协助地方加派渔轮去永乐群岛坚持生产。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审阅并批准了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

二、海上对峙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猎潜艇 73 大队所属 271（指挥艇）、274 两艇于 1974 年 1 月 16 日 20 时由海南岛的榆林港启航，执行西沙巡逻任务，17 日经永兴岛时载运一个民兵排，当日 18 时抵达永乐群岛海区。18 时 20 分，该两艇在琛航岛与珊瑚岛之间海域与正向我渔轮挑衅的敌 16 号舰相遇，当即发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舰艇，你立即离开我领海”的警告信号。经多次警告后，敌舰向珊瑚岛后撤。我编队在琛航岛以北海域抛锚，一面监视敌舰，一面掩护和运送民兵登上晋卿岛。此间，南海舰队航空兵起飞双机至永乐群岛上空巡逻。

18 日，敌舰更加猖狂，在羚羊礁北侧 8 次冲撞中国渔轮，将我 407 号渔轮驾驶台撞毁。我舰艇再次发出警告，敌舰挂起“操纵失灵”的信号旗推卸罪责，随即逸去。当日下午，南越驱逐舰 3 艘成楔形队形由珊瑚岛驶出，向我 271、274 艇锚地逼近。我艇发现后，当即起锚，以单纵队接敌，并发出警告信号，敌舰未回答。我艇迫近至敌舰 600 米时，再次用扩大器喊话：“你们破坏我渔轮生产是海盗行为。”敌舰见我已有戒备，即返回珊瑚岛海区，并以 16 号舰在附近海域游弋。我编队亦返归琛航岛海区。

18 日 12 时，我猎潜艇 74 大队 281、282 艇抵永兴岛，因 282 艇主机故障，在永兴岛抢修待命。当晚，我扫雷舰 10 大队

396、389 舰驶抵琛航岛锚地，与 271、274 艇会合。为便于掌握事态发展，以海军榆林基地副司令员魏鸣森为指挥员组成了海上指挥所。

中国派遣轻型舰艇赴西沙永乐群岛巡逻，显然不准备诉诸武力，更不准备首先使用武力。

三、海上自卫反击战

1 月 19 日晨，南海舰队指示海上指挥所：敌可能准备打，企图吃掉我，应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如敌进攻我占岛屿，编队要坚决还击，支援岛上战斗。

19 日 5 时 15 分，敌舰分两路企图包围我编队。南面敌 4 号、5 号舰由金银岛、羚羊礁以南向琛航、广金岛接近；北面敌 10 号、16 号舰由广金岛西北方向向我接近。我编队发现后，紧急起锚，以 396、389 两舰进至广金岛西北海面拦阻敌 10 号、16 号舰；271、274 两艇至广金岛东南海面与敌 4 号、5 号舰对峙。我舰艇与敌编队同航向航行，迫使敌舰不能靠近我岛屿。7 时 40 分许，敌 4 号、5 号舰各放下一条舢板，每条舢板拖带两只橡皮舟，运送 40 多名士兵，强行登上琛航、广金两岛。登琛航岛之敌经我民兵说理斗争后被迫撤退，登广金岛之敌不理睬我之劝阻，仍继续前进，并向我民兵开枪。我民兵被迫还击，打死南越士兵 1 人，打伤 3 人。8 时 40 分，登岛之敌撤回军舰。

与此同时，敌舰依仗其吨位大，多次向我舰艇挤压。8 时 25 分许，敌 16 号舰拦截我 389 舰。389 舰不减速，不转向，继续前进。敌 16 号舰匆忙转向，撞坏了 389 舰左舷栏杆，我向敌发出警告。9 时 4 分，敌 4 号舰小口径火炮射击两发，我连续 3 次发出“你首先射击，我向你提出严重警告”的信号，敌舰始终不予回答。

10时19分，敌舰向外机动，与我编队拉大距离。此时，我方271、274艇位于广金岛以南2海里处，396、389舰位于广金岛西北1海里处。10时22分，4艘敌舰同时向我开火，389舰、274艇相继中弹受损。我海上指挥所命令各舰艇坚决自卫还击。271、274艇各对一艘敌舰还击，396、389舰集中火力打敌16号舰。

南越的4艘军舰大的有1800吨，小的也有650吨，总吨位约6000吨，装备有127毫米口径以下火炮约50门。我海军的4艘舰艇，总吨位1600吨，火炮少，口径也小。对比之下，敌装备上占优势。但是，我舰艇充分利用灵活机动的长处，高速接近敌舰，紧紧咬住不放，发挥小口径火炮射速快的威力，很快压住了敌人火力，改变了不利态势。

敌火力被压制后，271、274艇主要打敌4号舰，牵制敌5号舰。396、389舰因敌16号舰中弹起火后远离，即转移火力攻击敌10号舰。389舰带着浓烟烈火冲向敌舰，直打到距敌10号舰10余米处，指战员们用轻重武器向敌人扫射，向敌舰投掷手榴弹。敌10号舰被打得失去操纵，撞坏了389舰后住舱。389舰给养员郭玉东身负重伤，他见海水从弹洞进入弹药仓，流向主机仓，奋不顾身地脱下衣服，堵住漏洞，直至牺牲。

271艇在战斗中，主炮发生故障，受敌4号舰威胁，274艇主动掩护，二艇配合，将敌指挥舰4号舰主炮击毁，并击中它的驾驶台和报房，使其通讯中断。敌4号舰企图脱离阵位，274艇紧追不舍。在距离敌4号舰10余米时，274艇电舵传动系统失灵，如继续前进，势必冲入敌4号、5号舰之间，陷于两面受敌的被动地位。该艇艇长李福祥当即命令转换人力舵，并亲自指挥轮机兵由高速前进转为全速后退，摆脱了敌舰夹击，重新占领了有利阵位。

10时42分，396舰转而向敌4号、5号舰射击，支援271、274艇编队。10时59分，敌16号舰见受伤严重的389舰舰身倾斜，行驶缓慢，乘机掉转头来袭击，396舰见状，迅速转向，迎击敌16号舰，掩护389舰撤出战斗。

经一小时激战，敌4号、5号、16号舰被我击伤，分别向东南和西北方向后撤。敌10号舰基本丧失机动和抵抗能力，缓慢地向羚羊礁方向行驶。

11时50分，受伤严重的389舰带着大火在琛航岛西北抢滩。始终没有离开战区的402、407号渔轮不顾自身安危，不顾389舰弹药库可能爆炸，舰身也有沉没的可能，要求在两边把该舰架住，舰员不让渔轮靠近。389舰抢滩成功后，渔民们冒着危险登舰协助灭火和抢运伤员。

11时49分，从永兴岛到达作战海区的281、282艇奉命追歼敌10号舰。海上指挥所要求集火近战，速战速决。12时12分，两艇开火，经3次火力猛袭，敌10号舰起火爆炸。14时52分，敌10号舰沉没于羚羊礁以南2.5海里处。

此时，我参战的4艘舰艇，389舰重伤已抢滩，274艇舵机失灵，271艇主炮故障，396舰中弹50余发，包括281艇和282艇在内的6艘舰艇弹药消耗已过半。同时考虑到敌人可能反扑，因此在击沉敌10号舰后，我集中兵力，调整部署，以备再战，未能继续扩大战果。为防止敌机空袭，南海舰队航空兵出动飞机至战区上空掩护我舰艇行动。

20日上午，被我击伤的敌3艘舰艇在接应军舰的掩护下继续向西撤退。

在保卫西沙群岛的海战中，我共击沉敌护卫舰1艘，击伤敌驱逐舰3艘，毙、伤敌100余人。我扫雷舰389号受重伤，猎潜艇274号受轻伤，牺牲274艇政治委员冯松柏以下18人，伤67

人，消耗各种炮弹 16940 发，机枪弹 17270 发，手榴弹 26 枚。

四. 收复被占岛屿

19 日海战后，南海舰队为输送陆军收复敌占岛屿和准备打击受伤与增援的敌舰，组织后续部队向战区开进。鱼雷艇 21 大队 5 艘鱼雷艇于 19 日 22 时抵永兴岛，因随行的 502 号运油船触礁，鱼雷艇得不到油料补充，遂将 5 艇的剩余油料集中到 3 艇上，20 日 8 时 3 艇驶抵永乐群岛海区；8 艘护卫艇及 232 护卫舰、275 猎潜艇以及南海水产公司渔轮搭运广州军区榆林要塞区派出的守备第 10 团 3 个连，1 个两栖侦察队和部分加强分队，500 余人，于 20 日 4 时至 8 时先后抵达永乐群岛海区。

广州军区的作战部署是：首先集中兵力攻占位于珊瑚岛、金银岛之间的没有坚固工事的甘泉岛。得手后，再攻占工事坚固、兵力较多的珊瑚岛。最后进攻金银岛。同时，组织力量打击南越军队增援永乐群岛的舰艇。

20 日拂晓，海上指挥所命令 281、282 艇前出至甘泉、金银岛以西海区搜索来援敌舰，未发现目标。9 时 35 分，我输送船队第一梯队 4 艘护卫艇掩护载运步兵的 402、407 号渔轮抵达甘泉岛。经火力准备后，9 时 50 分，步兵换乘橡皮舟和舢板在甘泉岛东南滩头登岛，将南越军队从滩头阵地压缩至岛的中部。10 时 10 分，岛上的南越军队全部缴枪当了俘虏，甘泉岛收复。

10 时 35 分，输送船队第二梯队 4 艘护卫艇及 396 号扫雷舰对珊瑚岛实施火力准备。10 时 46 分，换乘橡皮舟和舢板的步兵连及两栖侦察队分别从岛的西南、正南、东南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指战员们为了争取时间，在海水中泅渡徒涉数百米，迅速登岛，严密搜索钻进碉堡里，藏在树丛中的南越官兵。11 时 25 分，珊瑚岛收复，南越官兵范文红少校以下 30 余人全部被俘获。

12时35分，输送船队第三梯队275号猎潜艇对金银岛进行火力准备，后发现岛上守军已随军舰全部撤离，13时45分，金银岛收复。至此，我全部收复永乐群岛，俘虏南越官兵48人，美国联络官1人。

20日下午，南越当局派军舰运载1个营的兵力，企图增援珊瑚岛。我南海舰队和广州军区空军立即派出军舰和飞机迎击。敌舰进至距西沙永乐群岛40多海里的海域后返回岬港。

针对南越当局调动兵力，准备扩大战争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月20日再次发表声明，警告南越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一切军事挑衅和侵略活动。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驻守南海海疆的陆、海、空军和民兵，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1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国务院颁发嘉奖令，表彰参加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的全体军民。

1月29日，新华社受权公布，中国政府决定，将分批遣返在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中俘获的南越军队官兵48名，美国人1名。1月31日，第一批南越军队伤病俘5名，美国病俘1名在广东省深圳遣返。2月27日，范文红等43名南越军队官兵在深圳遣返。至此，遣返工作全部结束。

五、主要经验教训

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是一次远离大陆以海战为主的陆、海、空军和渔民、民兵参加的协同作战，战斗规模不大，但持续时间较长，且战斗形式复杂多样。我舰艇在敌舰突然开火前，主要是支援配合渔民同敌人进行说理斗争，打的准备不足。加之装备上敌强我弱，敌在外我在内，打与不打敌占主动。但战斗打响后，我很快压住敌人，控制了战场主动权，赢得了战斗胜利。

西沙之战中，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自始至终亲自研究作战方

针、原则，及时定下决心。在南越军舰侵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并向我渔轮挑衅后，我确定以政治斗争为主，与敌周旋的方针；当敌企图以优势兵力吃掉我巡逻舰艇时，我在军事上采取了相应措施。参战部队认真执行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既不主动惹事，也不示弱，始终坚持不打第一枪，政治上掌握了主动。收复三岛之后，我舰艇和航空兵的活动严格控制在规定范围以内，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

西沙作战，情况突然，变化很快，参战部队和民兵一切行动听指挥，英勇顽强，机动灵活。海战中，有的舰艇从几百米打到十几米。有的舰艇炮管打红，操纵失灵，仍猛打猛冲。有的舰艇中弹起火，仍勇猛冲向敌舰。登岛作战的陆军部队在海上航渡20小时，95%以上人员呕吐，战斗开始后，人人奋不顾身，勇猛冲击。西沙之战是以劣胜优的战斗，人民解放军胜在精神上，胜在气势上，胜在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灵活战法上。战后，南越当局为了掩盖其失败，宣称中国在战斗中出动了包括“科马尔级驱逐舰”在内的14艘舰只，并使用了“冥河式导弹”。

西沙作战之前，最先到达作战海区的是渔轮。海战打响后，渔轮一直在战区观察，及时上报战斗情况，并协助389舰抢滩成功。收复三岛时，渔民连续用小艇运送登岛部队和作战物资，岛边水浅浪大，划桨困难，渔民就下水推船。战斗过程中，陆、海、空军之间，都能主动支援，密切配合。

尽管西沙之战取得重大胜利，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教训相当深刻。

（一）对西沙斗争形势估计不足，军事上的准备不够充分，认为敌人的活动只是政治上、外交上的需要。对派往西沙巡逻的舰艇交代任务时，强调准备打仗不够。舰艇抵西沙后，与敌形成对峙，海上指挥所没有及时研究布置作战方案。在敌舰突然开火

的情况下，一度处于被动。19日拂晓，敌舰向我接近，一小时后，我才发现，险遭偷袭；敌舰炮口对准我舰时，我虽采取了同样对策，但有的舰艇怕走火，主炮炮弹未敢上膛；当敌舰调整队形，准备向我攻击时，有的指挥员还认为敌人要离开，放松了警惕，直到敌舰突然开火，我才仓促还击。

（二）组织指挥比较乱，层次较多，分工不够明确。海上指挥所无法指挥本编队全部兵力行动。海战过程中，情况通报少，影响及时指挥。三军协同组织存在许多问题，如通报不及时，舰艇和守岛部队常将飞临战区的我机当作敌机，险些出现误击事故；舰艇输送陆军装载过多，物资放置不合理，有的舰艇增大吃水4—6厘米，并产生纵倾，影响了战斗和航渡安全。

通信联络问题较多，舰艇内部没有开通短波网路，海上指挥员主要靠报话机和视觉通信实施指挥，十几海里以外就联络不上。在永兴岛待命的两艘猎潜艇，因艇上电台关闭，岸上指挥所又未采取迂回通信措施，以致晚到战区两小时，影响了战果。

后勤保障跟不上，送到战区的物资虽然不少，但参战部队战后急需的油、水、弹药得不到及时补充。伤员后送转运9次，历时60小时，大部分伤势加重。

（三）部队战术、技术水平低。有的舰艇不会占领有利阵位，不能充分发扬火力，不会组织堵漏和灭火。舰员技术不熟练，不会装定射击诸元，不会排除故障。陆军部队缺乏登陆作战训练，不会使用换乘工具，登岛队形混乱。

（四）武器装备技术状况差，舰艇在航率低。战前南海舰队所属300吨以上的作战舰艇70%不在航，参战的6艘舰艇都有故障，有的主机不好，有的雷达坏了，有的电台不能用。389舰刚从修理厂出来，人力舵、消防泵等多处没修好，战斗中电舵受损，人力舵一度转换不上，操纵失灵，险吃大亏；中弹起火后，

消防泵不好用，无法灭火，舰用炮弹失效率高，有的艇 37 炮弹 9% 打不响，影响战斗。通信器材陈旧，性能差，有线电话加密后就无法听清。

应该看到，1974 年初，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之中，林彪集团虽然被粉碎，人民解放军还不可能摆脱林彪在政治上、军事上造成的恶劣影响，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以及综合反映这种建设水平的作战能力仍在低谷中徘徊。同时，江青集团继续和发展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政治上、思想上的迷惘使军队工作发生动荡甚至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西沙之战的胜利是得之不易的，它不仅再次证明人民解放军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证明这支军队的英勇顽强和敢于牺牲，即是它的教训，也为和平时期的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财富。

六、江青利用西沙之战沽名钓誉

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对于正在遭受“文化大革命”磨难的中国人民是个很大的鼓舞，在世界上也产生重要影响。本来对自卫反击作战毫无兴趣的江青，见有利可图，便抓住这一机会大肆宣扬自己，既突出了她所煽动起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又使人误以为她是真正关怀西沙作战军民的领导人。

1 月 28 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国务院已经颁发嘉奖令的 5 天后，以个人名义给广州军区领导人和西沙军民写贺信，硬把自己与西沙之战的胜利拉在一起，吹嘘自己“身在北京，心逐南海，汹涌澎湃”，“我们是心连心的”。不仅如此，她还指派一个诗人、一个作家“代表”她到西沙“看望”前线军民。临行前，江青特意交代他们回来后要写作品，并要他们给海南一个摄影工作者带去 20 卷彩色胶卷，要其多拍些照片。江青希望以此把自己塑造为西沙作战胜利的组织和鼓舞者。

3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诗报告《西沙之战》,16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西沙之战》不仅把西沙的胜利与“文化大革命”、与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紧紧联系在一起,称老船长阿沙“文化革命的暴风雨,使他象战刀又淬火,锋利加了钢”,人民解放军战士决心“批林批孔当闯将”,而且以象征的手法喻示江青对参战部队的影响。海军舰长钟海赶赴战区时,“舰长的视线投向挂历,挂历上一幅壮丽的画卷:飞渡的乱云,从容的劲松,无限的风光,巍峨的庐山、……海风过时,仿佛听见,一个响亮的声音,又回响耳边:‘把入侵者从西沙赶出去!革命军人,共产党员,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斗打响后,舰长下决心“冲上去!以劲松的意志,劲松的勇敢!”谁都清楚,那幅庐山松树的照片是江青所摄。以一幅画面概括勇气和力量的源泉,无异于说,西沙的胜利体现的是江青的“意志”,江青的“勇敢”。

8月,小说《西沙儿女》出笼。小说无视中共中央军委、国务院嘉奖令中关于“这次作战的胜利,是军民团结、战斗的胜利,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的论说,再一次重复了一幅江青拍摄的照片《庐山仙人洞》引导西沙军民取得胜利的神话。小说的女主人公阿宝将江青拍的照片挂在家里,“每一日都要看上几遍,……从那屹立于乱云中的青松的雄姿受到启发,汲取精神力量”。她教育群众,“我们要象青松那样生活和战斗”。准备迎击敌舰之前,“她抬起头,两眼立刻被悬在仓壁上的那幅‘庐山劲松’的照片吸引住了,……她的浑身立刻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前文在论及西沙之战的经验教训时已提到,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和参战民兵所表现出的勇敢无畏精神无疑是战斗胜利的重要因素,这种精神来源于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来源于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信念,而不可能凭借一幅照片就创造出战争史上的奇迹。

1974年10月,《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摄影展览》在北京和广州开幕。江青一方面称影展“事关全局”,对影展的指导思想,照片的选择,都要亲自过问,要求“从现实斗争需要出发”,展出“深批克己复礼”、“研究儒法斗争史”一类的照片,利用西沙海战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一方面却又抓住海军的服装问题大作文章,发泄心中的怨毒,发泄对人民解放军的不满。她扣发了穿着制式服装(戴大沿帽)的海军指战员的照片,并对人民军队的形象肆意加以诬蔑。1974年10月16日,有关方面就《影展》的有关问题给江青写报告,10月18日,江青在报告上批道:“拟同意发廿五张。第十三、第廿五两张摄影艺术甚佳,可是士兵头上戴着国民党、北洋军阀、沙俄苏修的大盖帽,有失我军的革命传统,似不宜登载,妥否?请洪文、春桥、文元同志批示。”王洪文随即附合:“同意江青同志意见。”10月20日,张春桥批道:“这两张抽掉以后,就没有海军舰艇了,可能使海军同志不高兴,是否还是登载为好,或者找两张没有大盖帽的海军照片,请江青同志酌定。”姚文元也批道:“同欸江青、春桥同志意见。可否换一至二张没有大盖帽的。”江青最后同意:“照春桥、文元同志的意见办。”结果,《影展》中涉及海军的照片,不仅数量少,而且人们见到的在舰艇上值勤和训练的海军官兵都是头戴钢盔的。相反,有关“批林批孔”的内容,倒是相当突出、充实。

第三节 对空防御作战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作战次数较多,持续时间较长的是对空防御作战。

新中国成立之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始终没有停止对大陆的空中袭扰,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派遣军用飞机对大陆进行轰

炸、扫射、空投、空降等活动。60年代后，这种活动主要表现为空中侦察。另外，随着美国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美机不断侵入中国领空进行袭扰侦察。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同美国军用飞机以及国民党空军飞机进行了长期斗争。

针对上述情况，196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发《沿海地区海、空情况处置守则》，作为沿海部队平时处置海上和空中情况的基本依据。《守则》要求有关领导机关和部队在处理一切涉外问题时，必须从全局考虑，政治上着眼，慎重从事。宁可在军事上暂时失掉某些战机，也不要要在政治上和外交上陷于被动。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之后，人民解放军全面加强了中南和西南地区的防空作战指挥和兵力部署。1965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发《南海地区对美舰、美机斗争的六项规定》，要求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采取克制态度，对入侵美机可起飞监视，但一般不予攻击，尽可能避免中美之间直接的军事冲突。1965年4月8日，美机侵入海南岛榆林港上空。9日，美机两批再次侵入海南岛上空，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4架飞机起飞监视。中国飞行员几次处于有利位置，均未攻击。而美机却向中国飞机发射导弹，幸未击中。当日，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将情况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报告，建议对入侵敌机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同日，周恩来指示：“请成武同志将此事报告主席，说明常委已予同意，看主席有无新的意见；如无，应立即由总参下达命令。”9日上午，杨成武向毛泽东报告了美机侵入海南岛上空的情况，并请示两个问题：（1）撤销《六项规定》，按1963年的《守则》执行；（2）海南岛的海军航空兵由空军指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汪东兴电话向杨成武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点：两个问题都同意。恢复1963年守则，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海军应该调强的部队去海南岛，不够

就由空军调强的部队去。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海军航空兵和空军应该统一指挥，海军和空军应该很好配合起来打。1965年4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重新颁发《沿海地区海、空情况处置守则》。从此，人民解放军对入侵美机的政策，由原来的一般不予攻击，转变为坚决打击。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仍高度警惕着来自美国空军和国民党空军的袭扰，尤其加强了广西、云南、海南岛等地区的防空作战准备，在对空防御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

美国飞机在空袭越南北方靠近中越边境地区时，经常突然改变航向，以小批量飞机侵入中国领空侦察挑衅，然后迅速退出。这种特殊的“打擦边”战斗，情况突然，战机短暂，稍纵即逝。拦截飞机既要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准确抓住战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空不受侵犯，又要严格遵守政治、外交、作战政策和纪律，将入侵敌机歼灭在国境线以内。空战中，任何一点疏忽都会贻误战机，导致战斗失利，或者为敌所乘，遭受损失。针对这种情况，担任防空作战任务的航空兵部队不断探索，掌握空战规律，采取空域隐蔽待敌、直线出击和大速度、大角度截击的方法，做到引导接敌快、发现快、攻击快、脱离快和进入截击准、瞄准射击准。在歼击机不便于作战的地域，则以高射炮部队设伏，采用空、炮协同的方式打击入侵敌机。

1967年，美国对越南北方实施全面轰炸，美国飞机入侵中国领空的次数显著增加。4月24日到5月1日，美机入侵中国广西地区达11次，人民解放军空军在8天中三战三捷，取得击落美机5架的胜利。4月24日下午，美国海军舰载机40余架空袭越南克夫至谅山段铁路线。为防备美机乘机入侵中国领空，驻广西南宁明机场的空军航空兵第26师4架歼—5型飞机飞至宁明

东南的预定空域巡逻监视。17 时许，美国两架 F—4B 型（鬼怪式）战斗机突然向中国边境靠近，地面指挥员判断美机可能入侵中国领空，立即引导在空中巡逻的歼—5 型飞机内侧跟踪、监视美机。美国的鬼怪式飞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最大飞行速度是音速的 2 倍多，实用升限 1.85 万米，装备有先进的电子设备和火控系统，可携带 4—6 枚空对空导弹，能对目标实施多方向攻击。而歼—5 型飞机是一种比较老旧的亚音速飞机，武器系统也较落后。从飞机的战术性能看，二者差距甚大。17 时 9 分，美机逼近中国边境，地面领航员根据指挥员命令，指挥拦截飞机投掉副油箱，准确切向美机前置点，形成有利态势。17 时 10 分，美机从广西南部的板兴侵入中国领空，正好进入空军高射炮部队的火力范围。高炮各连同时向美机猛烈开火，当即击中 1 架，另 1 架见势急忙增速逃跑，刚飞出高炮火力区，即被早已跟踪而至的 4 架歼—5 型飞机截住。美机发现遭到拦截，竭力摆脱，时而小角度蛇行机动，时而急剧跃升或下降，时而加速，时而减速，但始终改变不了被动局面。歼—5 编队 1 号机、中队长宋义民连续开炮 3 次，最后一个长射，将美机击落。这次战斗，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称赞，周恩来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作战有功人员。4 月 29 日，空军航空兵第 18 师中队长张金堂驾驶歼—6 型飞机，从距敌机 300 米打到 60 米，将 1 架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打得空中开花。5 月 1 日，空军高射炮第 10 师第 30 团在广西东兴以西地区再次击落美国 A—4B 型舰载攻击机 2 架。三战三捷，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反对美机侵略挑衅的信心和勇气。

继三战三捷之后，8 月 21 日，空军航空兵第 18 师在广西南部全歼入侵的美国 A—6 型攻击机 2 架。当日下午 13 时许，美国海军两架 A—6 型飞机从广西隘店侵入中国领空，空军航空兵

第18师中队长康振生等驾驶4架歼—6型飞机起飞拦截。2号机韩瑞阶在云隙中咬住1架美机，迫近至600米处开炮3次，将其击落。3号机陈丰霞紧紧咬住另1架美机，从5000米高空追到800米低空，在高山峡谷中与美机展开激战。在1000米到700米的距离上，陈丰霞连续开炮，终于将美机击落。

进驻海南岛的海军航空兵第6师接替第4师后，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1967年6月26日下午14时50分许，美国F—4C型战斗机1架飞近海南岛上空，指挥员命令第16团副大队长王柱书和飞行员吕纪良驾歼—6型飞机出战。双机迅速起飞，升高到1万米，赶赴战区。美机不待我机攻击，几次进入中国领空，又几次退出。王柱书和吕纪良奉命沿海岸线巡逻待机。当美机在距陵水55公里处再次侵入中国领空时，王柱书立即转弯逼近，在200多米的距离上三炮齐射，打掉了美机的右水平尾翼。吕纪良接着补射几炮，美机爆炸坠毁。1968年2月14日，美国A—1H型舰载攻击机2架飞临中国领空，指挥员命令18团副大队长陈武禄和飞行员王顺义驾歼—5型飞机起飞拦截。地面领航员将陈武禄双机引导到与美机航线成60到90度交角处，背向阳光占据内侧有利位置。陈武禄在距离15公里处发现目标，第1次出击未掌握好时机。尔后迅速向左急转弯进入攻击，连续3次开炮，将美僚机击落。王顺义向美长机两次开炮，从300多米打到不足100米，将其击伤。

据统计，1964年到1968年11月，美国有人驾驶作战飞机入侵中国领空155批，383架次。在此期间，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共击落入侵的美国有人驾驶作战飞机12架，击伤4架。

美国在派遣有人驾驶军用飞机袭扰挑衅的同时，利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自1964年8月至1971年12月，先后97架次入侵中国领空。人民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使用歼—6、歼—7

型飞机和地空导弹击落其 20 架。1967 年 6 月 12 日下午，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1 架继上午侦察了广东遂溪地区以后，又侵入广西田阳地区。14 时许，空军航空兵第 3 师中队长刘光才驾驶歼—7 型飞机起飞拦截。他一面转弯接近目标，一面修正方向和高低误差，在导弹发生故障，无法发射的情况下，改用火炮攻击，仅 13 发炮弹即将该机击落。1968 年 1 月 20 日，空军航空兵第 3 师副大队长韩永武驾驶歼—7 型飞机第 1 次在 2 万米的高空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在以主要力量同美国飞机进行斗争的同时，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继续严密监视着并且坚决打击窜入大陆进行侦察活动的台湾国民党空军飞机。1967 年 1 月 13 日，国民党空军 RF—104G 型侦察机 1 架在 4 架战斗机掩护下，飞临福建漳州地区，企图侦察晋江机场。空军航空兵第 24 师起飞 8 架歼—6 型飞机迎击，飞行员胡寿根击落担任掩护的 F—104 型战斗机 1 架。1967 年 9 月 8 日，国民党空军 U—2 型高空侦察机 1 架侦察浙江嘉兴地区，并对地面施放干扰。空军地空导弹第 14 营采取反干扰措施，用国产红旗 2 号地空导弹将其击落。这是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击落的第 5 架国民党空军 U—2 型高空侦察机。

1971 年以后，美国和国民党空军飞机对中国大陆的侦察挑衅活动明显减少，并趋于停止。

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几次作战活动，直接参战部队一般只有几十人，几百人，战斗持续几天，交火时间仅以小时计，远不如 50 年代的抗美援朝、60 年代初的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和 70 年代末的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那样规模大，时间长。同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战斗中暴露出许多问题。然而，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估价，“在国家动乱的情况

表 11

1966—1970 年对空防御作战情况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参 战 部 队 (飞 行 员)	战 果
1966. 1. 3	云 南	空军航空兵第 3 师 (鲁祥孝)	击落美国无人驾驶 高空侦察机 1 架
1966. 1. 9	华 东	空军航空兵第 24 师 (李纯光、胡英法)	击落国民党军 HU— 16 型水上飞机 1 架
1966. 2. 7	云 南	空军航空兵第 3 师 (冯全民)	击落美国无人驾驶 高空侦察机 1 架
1966. 3. 5	广 西	空军航空兵第 9 师 (孙孝庆)	击落美国无人驾驶 高空侦察机 1 架
1966. 3. 23	云 南	空军航空兵第 9 师 (朱以龙)	击落美国无人驾驶 高空侦察机 1 架
1966. 4. 12	广 东	空军航空兵第 26 师 (李来喜、杨健全)	击落美国 A—3B 型 攻击机 1 架
1966. 9. 9	广 西	空军	击伤美国 F—105 型 战斗机 1 架
1966. 9. 17	广 西	空军航空兵第 18 师 (高长吉等)	击伤美国 F—105 型 战斗机 1 架
1967. 1. 13	福 建	空军航空兵第 24 师 (胡寿根等)	击落国民党军 F— 104 型战斗机 1 架
1967. 3. 2	广 东	空军独立第 4 师第 2 营	击落美国无人驾驶 高空侦察机 1 架
1967. 4. 24	广 西	空军高射炮第 10 师 第 30 团	击落美国 F—4B 战 斗机 1 架
		空军航空兵第 26 师 (宋义民等)	击落美国 F—4B 战 斗机 1 架
1967. 4. 29	广 西	空军航空兵第 18 师 (张金堂)	击落美国无人驾驶 高空侦察机 1 架

1967. 5. 1	广 西	空军高射炮第 10 师第 30 团	击落美国 A-4B 型舰载攻击机 2 架
1967. 6. 12	广 西	空军航空兵第 3 师 (刘光才)	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1 架
1967. 6. 26	海 南 岛	海军航空兵第 6 师 (王柱书、吕纪良)	击落美国 F-4C 型战斗机 1 架
1967. 8. 21	广 西	空军航空兵第 18 师 (康振牛等)	击落美国 A-6 型舰载攻击机 2 架
1967. 9. 8	浙 江	空军地空导弹第 14 营	击落国民党军 U-2 型高空侦察机 1 架
1967. 9. 17	广 西	空军地空导弹第 3 营	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1 架
1968. 1. 20	云 南	空军航空兵第 3 师 (韩永武)	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1 架
1968. 2. 14	海 南 岛	海军航空兵第 6 师 (陈武禄、王顺义)	击落美国 A-1H 型舰载攻击机 1 架 击伤美国 A-1H 型舰载攻击机 1 架
1968. 3. 7	云 南	空军航空兵第 3 师 (江文兴、王志跃)	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1 架
1968. 3. 15	云 南	空军航空兵第 3 师 (张恩华、王志信)	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1 架
1968. 3. 22	广 西	空军地空导弹第 2 营	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1 架
1969. 10. 28	广 西	空军地空导弹第 6 营	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1 架
1970. 2. 10	海 南 岛	海军航空兵第 8 师 (周新成、祁德起)	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1 架

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在人所共知的那个时代环境中，能有一支军队起而保卫国家安全，并获取胜利，难能可贵。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每一次战斗中表现出的英勇献身精神。珍宝岛战斗中迎面抗击苏军坦克的火箭筒手，西沙群岛战斗中用手榴弹和冲锋枪同南越军胆敢上的海军官兵，为保卫国家领空空战也要把敌机撞下来的飞行员们，将人民解放军“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气概和意志体现得淋漓尽致。没有这一点，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每一次战斗，参战部队都严格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坚持不打第一枪，政治上不示弱，军事上以不吃亏为原则。事后回想起来，这样的规定难以恰到好处地执行，“不打第一枪”，就不能保证军事上“不吃亏”。况且，在自己的领土、领空、领海范围内，打不打第一枪，权力在自己，完全不必由对方是否开枪所左右。然而，参战部队宁愿“吃亏”，宁愿冒流血牺牲的危险，面对面地同入侵敌人作斗争，维护国家和军队的尊严，也为国家的政治、外交活动争取了主动。这是需要更大的勇气的。

最后，这些战斗检验了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水平和作战能力，从正面或反面提供了极好的借鉴，有力地促进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发展步伐。

第十二章 组织编制调整

人民解放军的组织编制是组织体制和具体编制的统称，包括军队的领导指挥机关、作战部队系统、院校与科研系统、后勤系统的设置、编组、任务区分、相互关系等制度。它是国家实施军事管理的重要制度，也是保证军队各级各类组织科学有机地编成，人和武器装备协调有效地结合，形成强大战斗力的重要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继承和发扬行之有效的传统制度和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由单一的陆军逐渐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相继组建了空军、海军、防空军、战略导弹部队，发展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基建工程兵等特种兵，创办了各级各类院校，建立了军事科学研究机构，完善了各级领导指挥体系。60年代中期，人民解放军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比较科学的组织编制体系。

“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同样表现在军队的组织编制上。“九·一三事件”之前，林彪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期间，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无视军队建设的实际需要和国家负担的可能，盲目扩编部队，增加编制定额。1971年，全军总人数比1965年增长20%，比1958年增长1.5倍，并且，机关和部队、保障部队和战斗部队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同时，林彪以

“突出政治”代替系统正规的军事训练和专业训练，裁减了大多数军事院校。在此期间，军队接收或者合并了属于国家机关的安全、邮电、气象、测绘、国防科研、国防工业、民用航空、海洋、文化体育等部门的数十万人，使军队编制更加庞杂臃肿。

1966年至1976年，人民解放军的组织编制经过多次调整。这些调整，有些是适宜的，促进了军队的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完成；有些则随着国家政治形势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变化，经历了建立——撤销或者撤销——重建的反复过程。

第一节 总部机关

人民解放军的总部机关既是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战略意图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执行机构，又是领导全军军事、政治、后勤工作的统率机关，包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三总部：总参谋部（总参谋长徐向前）、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总后方勤务部（后改称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1950年至1955年，先后增设了总干部管理部（后改称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总军械部（部长王树声）、训练总监部（部长刘伯承）、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叶剑英）和总财务部（部长余秋里）。三总部发展为八总部。

1956年以后，为了节约经费，集中财力用于国家经济建设，军队数量大幅度裁减，总部机关也作了较大调整。1957年6月至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先后撤销了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总干部部、武装力量监察部和训练总监部，将训练、军械、军事监察工作划归总参谋部管理；干部、政治监察工作划归总政治部管理；财务、后勤监察工作划归总后方勤务部管理。调整

后，恢复为三总部。以后，虽然三总部之间及其内部的工作关系、职能区分，业务部门的隶属作过一些调整，但基本的体制始终未变。

“文化大革命”期间，三总部的格局没有变化，但领导职能大大削弱。总政治部被“砸烂”，名存实亡，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分别为黄永胜、邱会作把持。醉心于政治权力角逐的林彪一伙当然无暇顾及总部机关的建设，相反，总部机关的编制被搞得越来越乱，指挥体系越来越不明确，工作效率大大降低。

1969年6月，军委办事组公布了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机关精减整编方案。11月，公布了总政治部机关精简整编方案。总参谋部原编15个部、局，将装备计划部拨归总后勤部，与军械部合并；将军事交通部拨归总后勤部，与运输部合并；将动员部与军务部合并为一个部，称军务动员部；将防化兵部改为总参谋部的一个部，称防化学部。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调查部与总参谋部情报部合并，中央气象局与总参谋部气象局合并，国家测绘总局与总参谋部测绘局合并。这样，总参谋部共编13个部、厅、局，即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兼）、作战部、情报部、三部、军训部、军务动员部、防化学部、政治部、机要局、测绘局、外事局、气象局、管理局。

总政治部原编13个部、院，除干部部不变外，将秘书处、政治工作研究处、管理局与直属政治部合并，称总政治部办公室；将组织部、青年部合并，称组织部；将宣传部、文化部合并，称宣传部；将保卫部、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合并，称保卫部；群众工作部、联络部合并，称群众工作部。按此编制，总政治部共设1室5部。

总后勤部原编13个部、局，将财务部、军需部、物资部、运输部的油料业务部分合并，称供应部；将运输部的运输业务部

分与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合并，称军事运输部；将军械部及运输部的汽车、陆军船舶的装备管理与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合并，称装备部；将工厂管理部、军马部的军马生产部分合并，称企业部；将军马部的兽医、药材部分合并于卫生部，仍称卫生部。按此编制合并后，总后勤部保留 8 个部、1 个局，即司令部、政治部、供应部、卫生部、装备部、军事运输部、企业部、营房部、管理局，另设 6 个地区性的物资工厂管理局。

这次调整撤并了装备、动员、财务、军需等职能部门，变更了综合、计划、供应等的管理体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次较大的编制体制变动。由于强调减少职能部门，一些必不可少的综合工作和专业工作被取消或者削弱。同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影响，如领导班子的多次变动，人员的大出大进，“支左”干部的返回，机关人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继续膨胀，越来越不适应作战和军队建设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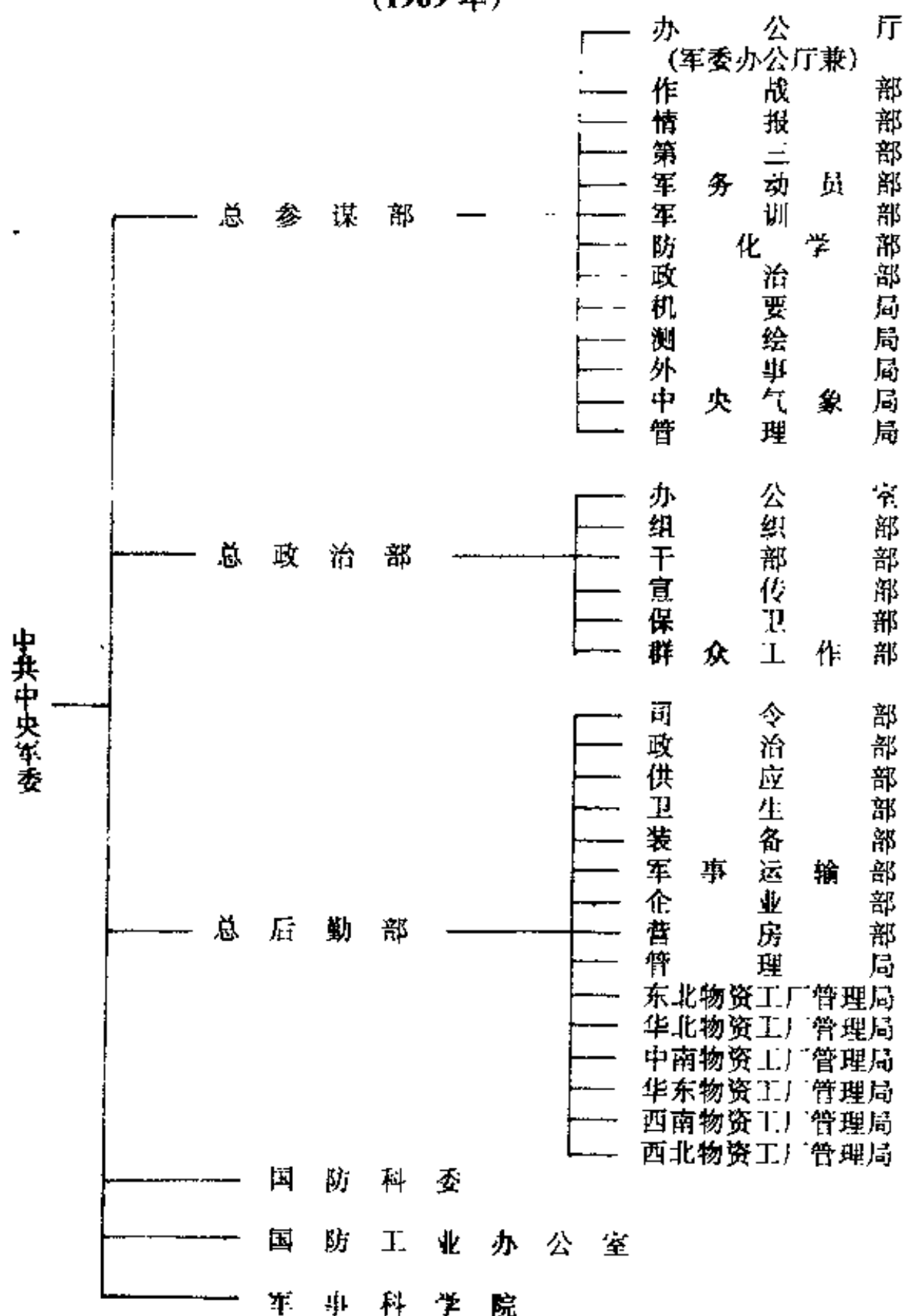
1971 年 10 月以后，中共中央军委着手整顿军队的组织机构，至 1975 年，相继将合并于军队系统的那部分国家机关重新划归政府系统，恢复了总部机关中一些职能部门。但是，由于江青集团的干扰，有些工作被迫中断，直到 1977 年以后才陆续完成。

表 12—1 1965 年—1976 年三总部领导人任职情况

时 间	总参谋长	总政治部主任	总后勤部部长
1965 年	罗瑞卿	肖 华	邱会作
1966 年	杨成武(代)	肖 华	邱会作
1971 年	黄永胜	李德生	邱会作
1975 年	邓小平(兼)	张春桥	张宗逊

表 12—2 军委总部机关组织序列

(1969 年)



第二节 军 区

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区是根据国家的行政区划、地理条件、战略战役方向、作战任务设置的，是战略区域内合成军队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其主要职责是，负责辖区内陆、海、空军部队的作战指挥和所属部队的教育训练、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后勤保障，领导辖区内的民兵、兵役、动员工作和战场建设。大军区一般下辖数个省军区或相当省军区的军区以及一定数量的部队。省军区是依照国家省、自治区的设立而建立的一级军事机构。

建国之初，全国共设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一级军区，领导18个二级军区、24个三级军区。

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大军区调整划分方案。1955年2月，国务院根据军委扩大会议议案，作出《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将6个大军区改划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和西藏等12个大军区。原一、二、三级军区的名称取消，全军实行三级军区（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体制。

1956年4月，为解决华东战区防御正面过宽的问题和加强对福建前线斗争的领导，国务院决定将原属南京军区建制的福建、江西两个省军区划出，组建福州军区。到1967年，全国共设13个大军区，22个省军区。

1967年5月，为统一对华北战场的作战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内蒙古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1968年12月，为便于对西南边防的支援，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将西藏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划归成都军区建制。1969年1月，四川省军区成立。至此，全国共有大军区11个，省军区25个，

表 12-4 1966 年—1975 年人民解放军大军区领导人任职情况

单 位	1966 年 5 月 司令员 政治委员	1971 年 9 月 司令员 政治委员	1975 年 10 月 司令员 政治委员
沈阳军区	陈锡联 曾绍山	陈锡联 曾绍山	李德生 曾绍山 毛远新(兼)
北京军区	杨 勇 李雪峰 廖汉生(第二)	李德生 谢富治(第一) 纪登奎(第二) 陈先瑞 解学恭	陈锡联 纪登奎(第一) 秦基伟(第二)
济南军区	杨得志 谭启龙(第一) 袁升平(第二)	杨得志 袁升平(第二)	曾思玉 白如冰(第一) 肖望东
南京军区	许世友 江渭清(第三) 江 华(第五) 李葆华(第六) 杜 平(第七)	许世友 张春桥(第一) 杜 平	丁 盛 张春桥(第一) 彭 冲(第二) 廖汉生
福州军区	韩先楚 叶 飞 刘培善(第二) 杨尚奎(第三)	韩先楚 周赤萍	皮定均 李志民 廖志高(兼) 江渭清(兼)
广州军区	黄永胜 陶 铸(第一) 刘兴元(第二)	丁 盛 韦国清(第一) 刘兴元(第二) 孔石泉(第三) 任思忠 韦祖珍	许世友 韦国清(第一) 张平化(兼) 孔石泉
武汉军区	陈再道 王任重(兼) 钟汉华(第二)	曾思玉 刘 丰 肖思明	杨得志 王 平 刘建勋(兼) 赵辛初(兼)
昆明军区	秦基伟 阎红彦(第一) 李成芳(第二)	王必成 谭甫仁 周 兴	王必成 贾启允(兼) 刘志坚
成都军区	黄新廷 李井泉(第一) 廖志高(第二) 郭林祥(第三) 甘渭汉(第四)	梁兴初 张国华 陈仁麒(第二) 郭林祥(第三) 谢家祥(第四)	刘兴元 赵紫阳(第一) 李人章(兼) 严 政 陈先瑞
兰州军区	张达志 刘澜涛(第一) 冼恒汉	皮定均 冼恒汉 李瑞山(兼)	韩先楚 冼恒汉(兼) 李瑞山(兼)
新疆军区	王恩茂 王恩茂(兼)	龙书金 曹思明	杨 勇 赛福鼎(第一) 郭林祥 司马义·艾买提 (兼)
西藏军区	张国华 张经武(第一) 谭冠三		
内蒙军区	乌兰夫 乌兰夫(兼)		

省属军级军区 3 个，军（兵团）级警备（卫戍）区 6 个（详见表 12—3）。

第三节 军（兵）种建设

革命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是单一的陆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49 年 11 月 11 日，以第 14 兵团为基础，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在北京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空军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1950 年 4 月 14 日，以第 12 兵团机关为基础，海军领导机构成立，肖劲光任司令员。10 月 23 日，防空部队（后改称防空军）领导机构成立，周士第任司令员，钟赤兵任政治委员。11 月 8 日，以第 20 兵团机关为基础，公安部队（后改称公安军）领导机构成立，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此，人民解放军有陆军、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 5 个军种（陆军未建立单独的领导机构，由总部机关直接领导）。1957 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实行空、防合一体制，将防空军纳入空军序列，撤销防空军司令部番号。同年，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公安军番号，原公安军所属部队一部分交公安部门领导，一部分改为城市内卫部队，划归省军区建制领导。以后一个时期内，人民解放军保持陆、海、空三军体制。

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已建立起一定数量的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工兵部（分）队。建国以后，为了适应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从 50 年代初开始，各兵种领导机关相继建立。1950 年 8 月 1 日，以第 4 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为基础，成立了炮兵领导机构，陈锡联任司令员。9 月 1 日，以第 2 兵团机关为基础，装甲兵领导机构成立，许光达任司令员。1951 年 3 月 1 日，以中南军区工程兵司令部为基础，工兵领导机构成立，

1952年9月，陈士榘任司令员。根据军委1953年10月10日命令，以军委直属铁道兵团为基础，铁道兵领导机构1954年3月5日成立，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6年4月13日，总参谋部通信部改称通信兵部，履行兵种领导机关职责，王诤任主任，朱明任政治委员。1956年1月，军委防化学部成立（1957年改称防化学兵部），张迺更任部长，肖学林任政治委员。1959年4月，通信兵部、防化学兵部曾改属总参谋部建制，1961年又改为兵种。

“文化大革命”之前，军委直属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学兵6个兵种。

一、成立第二炮兵领导机构

1957年，中国开始组建战略导弹部队。1957年底，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炮兵、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建“炮兵教导大队”，隶属炮兵建制，培训导弹部队的指挥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1959年7月，教导大队撤销，其第1教导营由炮兵整编为1个导弹战斗营，称“炮兵第802营”，这是组建最早的导弹部队。1960年3月，“炮兵第801营”在西安成立，以后，沈阳、北京、济南3个军区各组建了1个导弹营。1963年10月25日，导弹部队第一次发射成功“东风1号”导弹。1964年1月，导弹营扩编为导弹团。到1966年初，炮兵导弹部队已有2个基地，5个导弹团和5个工程团。

随着中国导弹核武器的发展，导弹部队的发展已成必然之势，炮兵机关的领导与导弹部队的体制和任务已不适应。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和炮兵司令员吴克华先后提出组建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构的方案和建议。1966年6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原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与炮兵管理导弹部队的机构和人员

合并，成立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①。周恩来主持了筹建工作，并为这个新建立的兵种命名“第二炮兵”。7月1日，第二炮兵领导机构正式成立。1967年，向守志任司令员（未到职），李天焕任政治委员，吴烈任第二政治委员。第二炮兵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1975年增设科技部）。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第二炮兵基本任务和领导关系的规定，第二炮兵是中国实现积极防御战略任务的重要核打击力量，它的基本任务是协同其他军（兵）种或独立地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它的建设、部署、调动，特别是作战，都必须在中共中央军委集中领导下，极端严格、极端准确地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执行。

到1972年，第二炮兵已有6个基地，14个导弹团，16个工程团，11万余人。随着中国国防力量的不断增长，第二炮兵逐渐发展为具有一定核打击力量的战略导弹部队。

二. 组建基本建设工程兵

196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关于中央各部直属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的汇报时表示，“这个办法我赞成”。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建委党组关于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试点意见的报告。国家建委认为，施工队伍实行军事化，走工程兵的道路是一个方向，这样能够从根本上改善队伍的素质，促进队伍的革命化；能够适应比较艰苦复杂的环境，行动方便，利于南征北战；能够适应经济建设和作战的需要；不会增加城市人口，又能节省开支。7月，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并转发了国家建委

^① 公安部队领导机关撤销后，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1967年7月开始，各地公安部队36万余人先后改编为所在省区的独立师（团）或警备师。

党组《关于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试点中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决定，基本建设工程兵8月1日开始正式组建，当年整编5个支队（相当于师）、4个大队（相当于团）。整编所需的军事、政治、后勤干部由军委从各军区、各兵种选调，其他干部由各部选派。

基本建设工程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除不计算军事实力，经费由财政部从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直接划拨外，其余同其他兵种一样待遇。基本建设工程兵受中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双重领导，各项工作由国家建委负责抓总。平时主要担负基本建设施工任务，除承担战勤任务或在边疆地区进行军事工程建设的部分归军委直接指挥外，日常调度指挥由国家建委和各主管部负责。基本建设工程兵的政治工作，在军委总政治部的统一部署下，由中共中央基本建设政治部和各主管部政治部负责。军事工作和后勤工作由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统一安排，国家建委设立相应的机构，负责同总参谋部、总后勤部联系。地区性的党政工作由所在军区负责。部队建设的具体方针的制订、施工生产指挥、机械装备由国家建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国家建委设立基本建设工程兵办公室，各有关部、委设立相应的机构，负责基本建设工程兵的日常调度指挥。基本建设工程兵担负国家基本建设重点工程和国防工程的施工任务以及水文、铀矿、黄金地质普查勘探、生产等任务，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1978年1月，基本建设工程兵领导机构成立，李人林任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兼任政治委员。基本建设工程兵已发展到21个支队，102个大队，34万余人。

三、发展电子对抗部队

电子对抗部队是利用电子设备或器材进行电磁斗争的部队。

50年代初，鉴于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土防空作战中，屡遭敌人的电子干扰，人民解放军开始酝酿建立电子对抗部队。1958年9月，人民解放军第一支电子对抗部队——无线电技术勤务营组建。1960年，该营扩编为团。1962年，该团与无线电技术侦察站合并为侦察干扰团。1970年，组建了1个雷达对抗营。总的说来，到70年代中期，人民解放军电子对抗部队的发展速度相当缓慢。

1975年6月21日，炮兵副司令员孔从周就加强电子对抗问题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我军电子对抗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如不及早采取措施，战争一来，将使我指挥失灵，兵器失控，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孔从周建议，组建电子对抗领导小组和专门机构，统筹负责全军进行电子对抗的战略方针和战术手段，拟订发展规划和组织协调，收集、研究外军情报并确定对策，“使敌不能制我，而我可以制敌”。

6月23日，毛泽东将孔从周的信转给邓小平、叶剑英、杨成武，责成叶剑英同孔从周等人商议几次。6月25日，叶剑英批示，请陈锡联、杨成武、王诤共同参加与孔从周的商谈。同年12月，毛泽东批准了叶剑英《关于加强我军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据此，在以后的几年内相继建立起若干电子对抗团（营）和反雷达伪装团，人民解放军的电子对抗部队迅速发展起来。

人民解放军电子对抗部队长期属总参谋部建制领导（1976年2月20日，总参谋部成立第四部即电子对抗雷达部），未成立单独的兵种领导机构。

四、铁道部所属基建队伍与铁道兵合并

1966年2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委员吕正操、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提出关于

铁道工程部队建设的意见。他们认为，铁道部的队伍技术力量较强，但政治思想工作弱，家属拖累大，调动不灵；铁道兵则技术上不过硬。最突出的问题是，两家干的是同一件事，用的却是两种办法，两套人马，两套组织，两套指挥。他们建议，把铁道兵和铁道部的基建队伍统一起来，保持解放军的组织形式和传统，属军委建制，在兵的共性的基础上，突出铁道工程技术兵种的特性，由军委和国务院责成铁道部统一领导铁道兵的建设 and 全国铁路的修建任务。毛泽东认为，“这样好，是和铁道兵合并，建制还是解放军，交铁道部使用”，周恩来、邓小平也对这一作法表示赞同，提出铁道兵在“三五”计划期间需要保持 60 万人的员额，业务上由铁道部调动，组织上仿照铁道兵的形式。6 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铁道部所属基建队伍合编为铁道兵，并从原铁道兵拨出 8 万定额的部队给工程兵。

60 年代末，铁道兵总兵力比 60 年代初期增加近 3 倍，承担了铁路建设、林区建设、国防施工、地铁施工以及援越抗美交通保障等任务。

1969 年，全军机关精简，防化学兵部改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门，称总参谋部防化学部。1975 年，通信兵部划归总参谋部建制领导，称总参谋部通信部。至此，人民解放军共设陆军、海军、空军 3 个军种和炮兵、第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 5 个兵种（详见表 12—5）。

第四节 部 队

人民解放军的部队，指直接遂行作战任务和担负战斗保障、后勤保障任务的建制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解放

表 12—5 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领导人任职情况

	1966 年 5 月 司令员 政治委员	1971 年 9 月 司令员 政治委员	1975 年 10 月 司令员 政治委员
空 军	吴法宪 余立金	吴法宪 王辉球	马 宁 张廷发 余立金(第二)
海 军	肖劲光 苏振华 王宏坤(第二)	肖劲光 李作鹏(第一) 王宏坤(第二)	肖劲光 苏振华(第一) 王宏坤(第二)
炮 兵	吴克华 陈仁麒	张达志 兰文兆	张达志 张池明
第二炮兵	(1966 年 7 月成立)	张翼翔 陈发洪	向守志 陈鹤桥
装 甲 兵	许光达 黄志勇	陈 宏 姚国民	黄新廷 莫文晔
工 程 兵	陈士榘 谭甫仁	陈士榘 李 真	谭善和 王六生
铁 道 兵	李寿轩 吕正操(兼) 崔田民(第二)	刘贤权 宋维斌	吴克华 吕正操
防化学兵	张迺更 李 真 (主任)	(1969 年划归总参谋部建制)	
通 信 兵	江 文 陈鹤桥 (主任)	周世忠 陈鹤桥	(1975 年划归总参谋部建制)

军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海军、空军、战略导弹部队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等特种兵部队。部队的编制体制随之进行了多次调整，逐步趋于合理和完善，合同作战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1971 年，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人数占全军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步兵 40.8%，炮兵 3.7%，第二炮兵 1.9%，装甲兵 2%，工程兵 5.5%，铁道兵 6.6%，通信兵 1.3%，防化兵 0.2%，海军 6.4%，空军 12.5%，各级军区和军委直属单位、国防科委 19.1%。而 1958 年，上述数字分别为：步兵 47.8%，炮兵 4.0%，装甲兵 2.3%，工程兵 2.5%，铁道兵 3.2%，通信兵 0.9%，防化学兵 0.3%，海军 5.8%，空军 12.2%，各级军区和

军委直属单位、国防科委 20.3%，可见，海军、空军以及陆军中特种兵部队的比例提高，步兵所占比重降低，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合成程度进一步增强。

这些比例数只能反映各军（兵）种（包括部队和机关）在全军所占份额。“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编制体制遭受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本章开始时已经提到，一方面是编制扩充、定员增加（在 1959 年到 1971 年的 12 年中，全军总人数增加 360 多万，翻了一番还多）造成的臃肿，另一方面更为突出的是战斗部队与保障部队、机关直属单位比例失调。据 1972 年 9 月的统计，全军军以下战斗部队 306 万人，仅占全军总人数的 51.4%。其中能实施机动作战的步兵、炮兵、坦克部队只有 195 万人，占 32.8%；各种保障部队近 162 万人，占 27.2%（内工程兵和铁道兵部队 103 万人，占 17.3%）；机关（包括军兵种）及直属单位和学校、仓库、医院、科研单位 127.3 万人，占 21.4%。这种现象带来的后果是，编制扩大了，人员增加了，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相应提高。相反，重叠交叉的机构、多层次的指挥系统、庞杂的后勤保障体系反而造成指挥不灵、调度失当、机动不便的弊病。

一、陆军

陆军长期以来是人民解放军的主体，主要由步兵、炮兵、装甲兵等作战部队以及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等保障部（分）队组成。战争年代，陆军的基本组成是步兵，主要武器是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小口径火炮，到解放战争后期，已建立起 242 个步兵师，同时编组了少量炮兵师、战车（坦克）师和工程团。建国以后，随着部队装备技术水平的提高，人民解放军逐步压缩步兵定额，充实特种兵部队。到 1965 年，全军共编步兵师 96 个，守

备、边防、独立、内卫师 27 个，炮兵师 29 个，坦克师 3 个（另 9 个团），工程建筑师 6 个（另 97 个团），铁道师 14 个，通信团（含通信工程团）20 个，防化团 6 个（另 5 个独立防化营）。

1962 年 2 月，中共中央军委召开的编制装备会议确定，将步兵师编组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师占 55%，中师占 27%，小师占 18%。1962 年以后，由于东南沿海战备、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准备援越抗美以及“珍宝岛事件”后的战备，机动步兵部队几次扩编，仅 1969 年即新组建 3 个军部，18 个步兵师，总人数较 1962 年增加了 20.9%，建制步兵师增加 28.3%，并取消了步兵小师，统编为大师和中师。到 1973 年，机动步兵部队人数比 1962 年增加了 50.5%。1975 年 6 月，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 6 个步兵师，保留的机动步兵部队编为满员师和简编师，满员师占 42%，简编师占 58%。简编师的人数只有满员师的 61%。按此编制，步兵机动部队共精简 47.6 万人。

军队的编制体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和配备程度。60 年代初期，各种自动武器、坦克、汽车以及国产大口径火炮已大量装备部队，过去曾经十分有效的骡马运载已经失去了发展前途。但是，“团以下部队骡马化”的观念并没有及时摒除——尽管实际上骡马已大量淘汰，代之以汽车运输。1975 年 11 月，中共中央军委颁发的陆军编制表规定，军增编坦克团；军高炮营扩编为高炮团；师炮兵团增编火箭炮营；步兵团换装并充实新式迫击炮和无后座力炮。步兵师在减少人员的情况下，增编了机枪、高射机枪、40 火箭筒和各型汽车，减少了骡马，与 1962 年的编制比较，步兵师装备的自动火器增加 1 倍，反坦克火器增加 6 倍，火炮和迫击炮增加了 1.3 倍，汽车增加 1.7 倍，骡马则减少 40.3%。

1967 年，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华北地区组编 1 个摩托化

军，作为快速战备值班部队。摩托化军的编制根据进攻时能突击，防御时能顶住，迂回时能切断敌人退路的原则确定。摩托化军应具有高度的机动能力，较强的突击能力和独立作战能力；适当加强防空、防坦克火力和必要的保障分队；建立精干、轻便、灵活的各级指挥机构。摩托化军辖3个摩托化师和1个炮兵团，1个火箭炮团，1个高射炮团和相应的保障分队。摩托化师辖3个摩托化团，1个坦克团，1个炮兵团，1个高射炮团和相应的保障分队。全军编4.6万人左右，坦克240辆，汽车3600辆左右。摩托化军、师的出现，反映了人民解放军步兵已开始质的变化，它的发展顺应了现代军事科学的要求和作战使用的特点。

以坦克装甲部队作为地面突击的主要力量是现代战争的特点之一。50年代，随着进口苏式坦克的增加，人民解放军建立起独立坦克部队（指编入军委装甲兵、军区序列的坦克部队）和队属坦克部队（编入军、师序列的坦克部队）并存的体制。但此时装备数量少，突击力不足。另外，战斗支援分队较少，尤其是反坦克火力弱。60年代初期，国产坦克开始装备部队，按装备性质，独立坦克团统一整编为中型坦克团、重型坦克团、重型自行火炮团。1969年，大部分步兵师属坦克团撤销，集中编组为坦克师或军区独立坦克团。坦克师充实装备后，坦克数量达到发达国家军队中等规模师、团的水平。问题是，坦克师的装甲步兵少，满足不了步、坦协同作战的要求；压制火器、反坦克火器和防空火器数量少，质量不高，不能有效地保障坦克的机动；通信、侦察、工程、后勤等保障力量不足，限制了坦克师的独立作战能力。并且，坦克部队与步兵部队分编，既不利于平时的军事训练，战时也不能很好地协同起来。1976年，独立坦克团再次改归陆军军建制，坦克部队体制改为坦克师、军（或师）属坦克团。坦克师实行甲、乙两种编制并减少了坦克，增编了装甲车

辆，炮兵团改编为自行火炮团，使步、坦、炮合同程度提高。80年代以后，坦克师（旅）划归陆军集团军建制，进一步提高了陆军部队的装甲突击能力和合同作战能力。

· 炮兵是陆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火力突击力量，按隶属关系分为预备炮兵（隶属于军委炮兵或军区）和队属炮兵（隶属于陆军军或师）。50年代初期，炮兵部队得到迅速发展，由建国时的4个师、77个团发展到1953年底的预备炮兵23个师，88个团，22个独立营；队属炮兵107个团，214个独立营。全军火炮总数增加1倍多，射程更远，口径更大，步兵师属火炮一次发射弹丸重量增加5倍。抗美援朝战争之后，炮兵按统一的编制进行调整，同时接收苏军撤离旅大地区时移交的装备成立了3个加农炮师，撤销了2个火箭炮师。1956年，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组建军属炮兵部队的规定》，配齐了陆军军属炮兵团，军属高炮团（营）、防坦克炮营也有增加。1965年以后，由于战备形势的变化和援越抗美作战的需要，陆续组建了一批新的炮兵师。1970年，全军炮兵师的数量达到34个，军、师按编制配齐了炮兵团和高炮营，有机动防空作战任务的军建立了高炮团。1976年，炮兵部队整编，撤销防坦克炮兵师师部，将防坦克炮兵团划归军区建制；加农炮兵师与榴弹炮兵师统一调整为加榴炮兵师，每师均编加农炮、榴弹炮和火箭炮；高射炮兵师所辖团按两种口径高炮实行混编。军属高炮营改为高炮团；师属炮兵团的迫击炮营改为火箭炮营，增强了队属炮兵的防空火力和压制火力。经过这次调整，预备炮兵由原来的4种炮兵师改编为加榴炮兵师和高射炮兵师2种。

为适应援越抗美和国内战备工程建设的需要，工程兵、铁道兵分别由1963年的4个建筑师，16个建筑团和11个铁道师发展为1970年的10个建筑师，34个建筑团和14个铁道师。通信

兵、防化兵也有相应的发展。

二、海军

海军是以舰艇部队为主体以海洋为战场的军种，主要由水面舰艇、潜艇、航空兵、岸防兵、海军陆战队等部队和侦察、通信、工程等保障部（分）队组成。

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乡成立，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11月，华东军区海军第1、第2舰艇大队组建（后改编为护卫舰支队），成为人民解放军最早的舰队兵力。1950年8月，海军召开第1次建军会议，确定“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能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首先组织利用和发挥现有力量，在现有力量的基础上，发展鱼雷艇、潜水艇和海空军等新的力量，以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1950年12月，中南军区海军成立，方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5年10月，华东军区海军、中南军区海军分别更名为海军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1960年8月，海军北海舰队在青岛基地（1950年组建）的基础上成立，司令员刘昌毅，政治委员丁秋生，舰队下辖支队、大队。

从1950年初开始，海军水面舰艇部队在最早成立的护卫舰部队基础上，陆续建立起驱逐舰部队、猎潜艇部队、潜艇部队和鱼雷艇部队。60年代中期以后，海军主要战斗舰艇基本实现国产化，舰艇部队，尤其是快艇部队的发展十分迅速。1966年后，水翼快艇入列，新的快艇大队和支队组建。1969年，海军已有3个舰队，7个基地，12个支队，73个大队。1972年以后，随着国产舰用导弹装备部队，海军恢复和新建了一批导弹快艇大队、支队和快艇基地，快艇部队成为近海防御作战的重要突击力量。1976年，南海舰队建立了驱逐舰支队。

1954年6月，利用从苏联购进的4艘旧潜艇，海军第1支潜艇部队——独立潜艇大队成立（以后扩编为潜艇支队）。1965年，国产潜艇装备部队后，当年即组建1个潜艇支队。1976年，国产潜艇全部取代进口的苏式中小型潜艇，东海、南海舰队相继组建了潜艇支队。1975年，核潜艇支队正式成立，中国海军潜艇部队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最早的海军航空兵部队——海军航空兵第1师成立于1952年6月。到50年代中期，海军航空兵已编有水鱼雷轰炸机师、歼击机师、混合机师和独立侦察团、水上飞机大队等，基本形成了以岸基航空兵为主的组织领导体制和作战指挥体系。60年代中期，根据作战需要，海军航空兵组建了夜航作战大队和直升机独立大队。1968年，海军航空兵部队进行调整，北海舰队新建歼击机师，南海、东海舰队组建直升机独立大队，海军航空兵共辖3个轰炸机师和6个歼击机师。1971年，海军航空兵组建了第1支强击机部队——航空兵独立大队。1976年，海军航空兵部队整编，撤销师属训练大队，组建扩建航空兵团，增编运输机中队。

50年代初，中国海上作战部队短时间内难以迅速发展，建设海岸炮兵成为当务之急。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形势和海防任务的变化，小口径岸炮营陆续撤销。60年代后期，国产大口径岸炮装备部队，岸防兵部队作战能力显著提高。1965年，海军第1个岸舰导弹团编入战斗序列，70年代又陆续组建了一批岸舰导弹团、营，海军岸防兵部队由以岸炮为主过渡到以岸舰导弹为主，成为比较现代化的海防力量。

三、空军

空军担负国土防空和协同陆、海军作战的任务。新中国成立

前，人民解放军空军仅有 1 个飞行中队和 8 个野战高炮团。50 年代初，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大量进口苏联飞机，到 1957 年实行空、防合一之时，空军已有 19 个歼击机师，5 个轰炸机师，4 个强击机师，1 个运输机师，1 个空降师，11 个高射炮师，25 个雷达团。60 年代以后，国产飞机入列服役，空军的飞机种类初步配套，同时组建了地空导弹部队，空军的作战能力显著提高。

航空兵部队是空军的主要组成部分。航空兵部队以师为基本的训练和作战单位。1950 年 6 月 19 日，空军第 4 混成旅（后改称航空兵第 1 师）成立，这是人民解放军第 1 支航空兵部队。1954 年 6 月，空军航空兵师编制表颁布：歼击机师、轰炸机师、运输机师各辖 2 个团，1 个基地场站；喷气轰炸机师辖 3 个团，1 个基地场站。60 年代初，航空兵师一般分驻 2—3 个机场，不便于领导指挥，机场的利用率也不高。并且，工程保障机构随飞行部队转移，既造成人力、物力浪费，也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1961 年下半年开始，空军实行全面基地化，由师领导基地。1964 年，航空兵师由辖团改为辖大队，驻 1 个机场，以简化指挥层次，精简机关，减少人员。1970 年，航空兵部队编制体制进一步调整，将基地改为场站，师属飞行大队改为团，师辖团和场站；团辖飞行大队和机务大队，平时以团为单位组织训练，战时便于单独执行任务。1966 年以后，根据准备早打、大打的指导思想和战备形势需要，新建和改建了一批歼击机师和轰炸机师。到 1971 年底，空军航空兵共有 36 个歼击机师，8 个轰炸机师，4 个强击机师，2 个运输机师。1976 年，为加强强击航空兵力量，更有效地支援地面部队作战，1 个歼击机师和 1 个轰炸机师改编为强击机师。

1958 年 10 月，空军开始建立地空导弹部队。到次年初，首

先组建了3个营。1964年，空军第3训练基地改编为空军高射炮兵独立师，这是空军的第1个地空导弹师。1965年以后，国产地空导弹系统装备部队，加快了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速度，随之新建了几个地空导弹师。到1971年，空军已有4个地空导弹师，55个地空导弹营。为了解决几个导弹营驻同一地区的指挥协调问题，地空导弹部队增设了团一级机构，实行师、团、营三级体制。

1965年和1969年，为满足国内要地防空的需要和入越参加对空防御作战，空军新组建了9个高射炮师。随着高射炮兵部队的任务逐渐由地空导弹部队取代，高射炮兵部队开始压缩。1975年全军精简整编中，空军淘汰了苏式高射炮，同时撤销了6个高射炮师和1个独立高射炮团。

空军探照灯部队曾在对空作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现代飞机航速的增大和高射炮、地空导弹自动火控系统的不断进步，探照灯的作用日益减弱。1974年至1975年，探照灯部队全部撤销。

第五节 军队院校

军队院校通常包括指挥院校、政治院校、后勤院校、专业技术院校等。60年代以前，人民解放军曾建立了一些预备学校、文化学校和士兵学校。军队院校是选拔和培养军队建设所需的指挥、管理、专业技术人才，开展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部门。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进入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时期，全军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正规院校的建设。1951年1月，军事学院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1952年5月，后勤学院成立，李聚奎任院长。1953年1月，总高级步兵学校

成立，宋时轮任校长兼政治委员。1956年3月，政治学院成立，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兼任院长。同时，1952年全军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中心的训练任务，以期迅速改变指战员文化程度低，难以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状况。当年底，全军已有各类院校233所（其中文化学校99所），院校总人数29.2万人。1955年，全军院校增加到建国以后最多的253所（指挥院校26所，政治院校6所，技术院校72所，预备学校35所，文化学校98所，士兵学校16所），总人数达到38.8万人。

1956年以后，文化学校和预备学校逐步减少。1959年，全军院校调整为129所，25.3万人。1960年以后，人民解放军重点加强工程技术院校的建设，有计划地将一部分指挥院校和文化学校调整为工程技术院校。1962年，全军院校119所，其中工程技术院校74所，占62%。到60年代中期，全军已建立起比较完整、比较合理的院校体系。

1968年，人民解放军共有各级各类院校125所，其中指挥院校24所，政治院校5所，技术院校87所，预备学校3所，士兵学校6所，总人数16.8万人。1969年，林彪以调整院校体制为名，大规模裁减军队院校。按照调整原则，指挥、政治、体育、艺术学校一律撤销；技术学校，凡在部队能够学到技术的，一律在部队培养；撤销各军区的步兵学校，陆、海、空军的军、师建立小型教导队（机构很小，编10人左右）轮训部队干部。全军共减少院校82所，占原有院校的65.6%。保留学校43所（军政大学^①1所，工程技术学校20所，医务学校6所，兽医学校1所，飞行学校15所）。大军区所属的指挥学校全部撤销，仅

^① 1970年8月，军政大学在原高等军事学院基础上成立，黄永胜任校长，张秀川任政治委员。

表 12—6 1969 年全军院校调整情况

单 位	调整前(所)	调整后(所)
高等军事学院	1	1
军事学院	1	
高级步兵学校	1	
体育学院	1	
总参谋部	5	2
总政治部	3	
总后勤部	14	6
炮 兵	5	1
第二炮兵	2	1
装 甲 兵	6	1
工 程 兵	5	1
铁 道 兵	2	1
通 信 兵	7	1
防 化 兵	2	1
空 军	32	20
海 军	13	5
军 区	25	2
合 计	125	43

表 12—7 1966—1975 年军队院校发展变化情况

	指挥院校	政治院校	技术院校	预备学校	士兵学校	合 计
1966 年	27	5	84	3	7	126
1969 年	1		42			43
1975 年	20		62	2		84

北京、广州军区各保留 1 所卫生学校，每个兵种也只剩下 1 所技术学校。院校教员有的整建制地使用，如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办“五七”劳动学校，有的分配到部队工作，有的下放农村。

院校数量大幅度裁减，教员改行或离队，教材资料散失，院校训练处于停滞状态，最直接的后果是大大降低了干部的军政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部队基层干部的指示》，以教导队作为训练干部的过渡形式。1973 年 12 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军院校调整领导小组《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四十一所院校的报告》，决定恢复和增建 41 所军队院校，其中指挥学校（军政干部学校）19 所，医务学校 12 所，专业技术学校 10 所。到 1975 年，这些院校相继建成，全军院校达到 84 所。

1975 年，中共中央军委转发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院校编制若干问题的报告》，规定各类院校的训练分工、学员定额及抽调比例；院校机关和学员队的设置。同时规定了各类院校工教人员与学员的编配比例：大专院校和军政干部学校工教人员与学员的比例分别为 1：1.9 和 1：2，教员与学员比例分别为 1：5 和 1：6；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和军医学校工教人员与学员的比例分别为 1：2.3 和 1：2.5，教员与学员比例均为 1：6。指挥院校实行三级训练体制：军政大学培训师以上干部和少数优秀的团职干部，军政干部学校培训营团干部和部分优秀的连职干部，教导队轮训连排干部。工程技术院校和专业训练队分别训练高等和中等技术人员。

第六节 其他调整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曾经组建了为数众多的生产建设兵团，并在一个时期内将国家机关某些部门纳入军队序列。

一、生产建设兵团

1968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大规模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54年）。当年6月，农垦部所属东北农垦总局建制划归沈阳军区，由沈阳军区委托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领导，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农场、黑龙江某些省属农场、黑河农建师、合江农建第2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共有职工20余万人，耕地1000余万亩。兵团领导干部由黑龙江省军区领导干部兼任。

生产建设兵团是人民解放军直接领导的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力量，它的主要任务是：屯垦戍边，配合边防部队和边境群众，共同建设边防，保卫国家安全；培养和造就亦兵亦农的社会主义建设队伍；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农业。适应边防斗争需要，生产建设兵团可以组织一定数量的战备值班分队，平时从事生产，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配合部队和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战时配合部队作战或独立作战，坚持就地斗争或机动执行任务。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了现役部队。

1969年至1970年，安徽、兰州、内蒙古、广州、云南、福建、江西、浙江、山东、湖北等生产建设兵团相继成立。

生产建设兵团对当地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已发展为拥有220万人口，包括工

业、农业、牧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综合性企业，其工农业总产值约占新疆全区的 1/3。

但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军事系统垂直领导的组织形式不能完全适应国家地区性的经济建设规划。1972 年开始，各军区所属生产建设兵团陆续撤销或改变领导体制。兵团的党、政工作和生产建设交由地方党和政府实行一元化领导；军事工作以及现役部队归所在军区领导。

二、部分国家部门与军事系统的合并

“文化大革命”中，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许多部门陷于混乱。为保持和恢复这些部门的生产、工作、科研秩序，使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免于全面崩溃。同时，出于加强战备，使国家体制由平时向战时转变的考虑，在组建基本建设工程兵、扩编铁道兵的同时，人民解放军陆续接管了原属政府系统的邮电、气象、测绘、国防科研、国防工业、民用航空、海洋等部门。

1967 年 3 月，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国务院所属国防工业部的研究院及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由国防科委进行军事接管，并进行调整改组。当年 10 月，聂荣臻提出《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建议把国防科研方面的力量进一步组织起来，成立 18 个研究院，使科研力量集中，并使科研工作和科技人员得到必要的保护。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聂荣臻的《报告》。1969 年 12 月，在军委办事组之下，成立了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第二年 6 月，中共中央决定，第 2、3、4、5、6、7 机械工业部划归军队系统，分别由国防科委、空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总后勤部、海军管辖。1969 年底，国家测绘总局和总参谋部测绘局合并，总参谋部气象局和中央气象局合并，划归总参谋部领导。撤销国家测绘总局和总参谋部气象局。邮电部撤销

后，电信总局划归总参谋部通信兵部领导。地方各级气象、电信部门实行以军事部门为主的双重领导。1970年9月，国家体委改为国家体育总局，调归总参谋部领导，对外仍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名称。国家海洋局、民航局分别由海军、空军领导。

划入军队序列的这些部门，在极度动乱的时期中维持了相对完整的组织机构和基本的工作秩序，使中共中央、国务院能够对国家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控制和指导，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许多直接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部门由军事系统领导，不利于这些部门充分发挥其职能，也给地方工作带来许多不便。同时，军队指挥机构更加臃肿庞杂，军队自身的建设也受到影响。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中共中央军委整顿被林彪搞乱了的组织机构，逐步建立起比较科学合理的编制体制，相继调整了上述部门的领导关系，将这些机构重新纳入政府系统。

第十三章 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国民经济活动陷于严重混乱，生产下降，基本生活用品短缺。毛泽东一方面派人民解放军“支左”，借助军队的力量贯彻“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要求人民解放军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减轻“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危害。由此构成一对十分复杂的矛盾。

“支工”、“支农”与“支左”在总体上属于同一范畴，在实践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支工”和“支农”往往服从于“支左”、服务于“支左”，在“支左”的大前提下进行。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支工”、“支农”与“支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人民解放军数十年中形成的“为人民服务”、“做群众工作”、“工作队和生产队”传统的延续和在“文化大革命”条件下的特殊表现，有着与“支左”完全不同的内容。实际上，“支工”、“支农”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左”的束缚，甚至成为“左”倾方针的对立物。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民解放军仍然保持着崇高声誉，仍然为中国人民所景仰，与它在国家经济生活遭受严重困难的时期，以相当的力量参加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积极支援工农业生产，努力减轻国家和人民负担，在自然灾害发生时奋力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是分不开的。

第一节 支援工农业生产

人民解放军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而且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为国家创财富，为人民造福利，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作贡献。

一、参加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人民解放军从各个方面，参加国家和地方各项重点经济项目的建设。1965年底，人民解放军工程、铁道部队发展到90多万人，第二年，基本建设工程兵成立。这些部队作为骨干力量或者配合或者单独承担了大量重点工程建设任务。

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3、6、9师1964年夏季进入东北大兴安岭林区，担负了修建林区铁路，开发大兴安岭的任务。嫩林铁路南起嫩江，北至古莲，全长676.7公里，连同呼中（林海至碧水）铁路支线115.4公里、塔（河）十（八站）铁路支线58公里，共长850.1公里。施工部队总结出—系列在严寒地区施工的有效方法，于1972年8月15日将铁轨铺到古莲，打破了严寒造成的禁区，使铁路沿线很快建立起新的林场和采伐点，巩固了大兴安岭林业生产基地。

1966年3月，铁道兵参加会战的贵（阳）昆（明）铁路接轨通车。随后，中共中央军委调集铁道兵第1、5、7、8、10师以及其他专业施工队伍和沿线民工共44万人，展开全长1083公里的艰巨的成（都）昆（明）铁路大会战。铁道兵担负了吴场至昆明段（667.5公里）的施工任务。成昆铁路沿线地形复杂，山高坡陡，平均每1.7公里要修1座大桥或中桥，每2.5公里要开

挖 1 座隧道，全线桥梁隧道长 433.7 公里，占该线总长的 40%。开工之初，大型机械一时运不进来，为争取时间，指战员们依靠手工打眼，人力出碴，基本上打通了近千米长的黑井隧道。1967 年初，“文化大革命”使工程指挥系统遭到破坏，原定通车计划落空。1969 年 5 月，西南铁路建设改由铁道兵统一指挥，经过突击抢建，成昆铁路于 1970 年 6 月 29 日接轨，7 月 1 日通车。

1971 年初，襄（樊）渝（重庆）铁路施工全线展开。襄渝铁路全长 915.6 公里，共有隧道 405 座，桥梁 716 座，工程量和工程的难度均超过成昆线。铁道兵部队担负的长 5333 米的大巴山隧道是制约全线工期的关键。在公路未修通前，指战员们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每次往返 40 余公里，人力搬运物资 1800 多吨，使隧道进口在公路通车前 4 个月就开了工。经过 34 个月的艰苦奋战，这座横亘川陕边界的大隧道终于打通。1973 年，襄渝铁路接轨通车。

与此同时，铁道兵继续完成北京地下铁道和（北）京原（平）铁路建设任务，开始修建沙（河）通（辽）铁路。

1974 年，铁道兵 4 个师进入西北地区，修筑南疆铁路吐鲁番至库尔勒段（476.5 公里）、青藏铁路哈尔盖至南山口段（683 公里）。关角隧道海拔标高 3680 米，多处断层切割，岩石破碎，一昼夜地下水涌出量可达 1000 吨，部队进入后曾发生大小塌方 130 多次。经过 34 个月的努力，这座当时中国海拔最高的隧道终于建成。

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克服极其险恶的自然条件和极其复杂的地质条件造成的困难，使铁路线跨过曾经人迹罕至的山岭、高原、沼泽、沙漠、草原、戈壁。

1966 年至 1975 年，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了武汉钢铁公司、

第二汽车制造厂、辽阳化工厂、上海金山化工厂、云南天然气化工厂、大庆油田、葛洲坝水利枢纽、南京长江大桥、广西柳江大桥、桑树坪煤矿、平顶山煤矿、天山公路等重点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

为支援大庆油田建设，人民解放军几进凡出。60年代初，沈阳军区抽调2个步兵师、1个步兵团和1个炮兵营共3万余人参加油田会战，挖输油管道沟和供水管道沟153.6公里，修储油池416个，修筑公路42公里。接着，基建工程兵第82支队开进油田，完成119项工程任务。1972年8月，陆军第137师参加大庆油田“三八”输油管道工程建设，在人迹稀少的荒原上奋战了1年。从1970年到1975年，沈阳军区共派出8个步兵师、3个工兵团、2个舟桥营、2个架线连，协助大庆油田修建了总长2471公里的大小8条输油管道，形成从大庆到秦皇岛和从大庆到大连的年输油能力为4000万吨的两条输油大动脉。

辽阳石油化学纤维工业总公司是生产塑料、化纤原料和化学纤维的国家重点大型联合企业。1973年9月，“辽化”开工兴建，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和沈阳军区部队共3万多人参加会战，承担了全厂一半以上的土建工程，40%左右的设备安装。部队进入施工现场时，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路，吃住都在山坡上，生活相当艰苦。施工需用的机器设备和材料，全靠人工搬运。经过1年多的努力，实现了通水、通电、通路。“辽化”1982年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为国家增加13万吨合成纤维原料和7万吨塑料原料的生产能力。

1967年4月，地处湖北省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动工兴建。武汉军区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组织1000多人的施工队伍，会同民工，接受了担任“二汽”建设的开路先锋，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证实现通路、通电、通水的任务。筑路部队苦战

3个多月，把老河口到十堰市黄龙段160公里长的公路由4米拓宽为8米，新建16座桥梁，对坡大弯急的地段进行了改造，使这条砂石公路达到干线标准。接着，施工部队组织数万民工，在85公里长的线路上架起270座输电铁塔，把丹江水电站的电力输到“二汽”。在黄龙引水工程建设中，部队遇到淤泥挡路，推土机用不上，只好人工开挖。淤泥太稀，下不去脚，战士们把睡觉的铺板搬来，踩在上而干，挖一段，挡一段，下一段管道，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

1968年3月，南京军区陆军第60军536团2营参加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任务。施工中，干部战士们向建桥工人学习，努力掌握施工技术，保质保量地完成了第一期工程。9月，军区工兵2团应地方要求，紧急投入大桥施工。他们风雨无阻日夜苦干，7天完成土方作业47200立方米。在桥头堡的修建中，他们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18天完成原计划2个月才能完成的任务，为保证大桥国庆节前通车作出了贡献。

在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中，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突击力量。它能打硬仗，能吃苦，令行禁止，具有一般施工队伍所不具备的使用方便，机动迅速，拖累小，负担轻的优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许许多多成就，凝聚着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辛勤汗水。

二、积极支援工农业生产

人民解放军参加国家经济建设，更多地表现在对工农业生产的经常性的支援上。

“文化大革命”打乱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组织和生产秩序。人民解放军随时派出部队支援工业交通生产，努力缓解生产下降的趋势。1974年11月，兰州军区派出近万人

和数百台车辆，协助兰州铁路局等单位突击搬运物资 2 万余吨，解决物资积压问题。1975 年 2 月，济南军区 7000 多人到山东坊子煤矿和朱留庄煤矿下井采煤，支援春节期间的煤炭工人。

人民解放军同驻地人民公社定点挂钩，农忙时节派出人员、车辆和机械，支援群众播种、收割。同时以工作队（组）的形式，与农村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协助边远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发展生产，组织各方面的工作。各军区、各军（兵）种部队经常派出大批人员机械，帮助农村生产队不误农时地完成生产任务。

人民解放军在完成训练和工作任务的情况下，抽出一定的力量参加驻地附近工矿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的劳动，不仅以劳务的形式支援了这些单位的生产，而且密切了部队和群众的关系，使部队指战员，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年轻战士更广泛地接触社会，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和才干，有利于他们的成长。

人民解放军坚持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自觉地牺牲自己的利益服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需要。1968 年 7 月，长江、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灾，建成仅 1 年的南京军区域西湖农场奉命破堤蓄洪 33 亿立方米，减轻了淮河下游的压力，确保了淮南、淮北平原 7 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津浦铁路的畅通。农场因蓄洪而损失 254 万元。

三、节约开支，上缴节余经费

“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克服国民经济困难，人民解放军勤俭节约，紧缩开支，先后上缴国家节余经费 88.28 亿元。

1972 年 1 月，总后勤部请示叶剑英并经周恩来批准，一次上缴节余经费 32 亿元（其中装备购置费节余 21 亿元，余项收入 11 亿元）。

1974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给叶剑英等人写信，建议从当年国防费中节余15亿元上缴财政部，以平衡国家财政预算。叶剑英表示同意。11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总后勤部《关于增收节支减少今年国防费拨款的报告》，决定把当年开支不出去和可用可不用的13.85亿元（其中装备购置费10亿元，基本建设费2亿元，被装物资购置费1.1亿元，战备物资储备、马匹购置和预备费0.75亿元）减下来，另外，动用一部分结余经费，做到减少15亿元。

1974年，国家批准国防费拨款145亿元，比1973年少5亿元，再次减少后，仅为130亿元。

12月1日，为贯彻国务院消灭财政赤字，力争收支基本平衡和军队还有节余存款，可以多收一点的精神，总后勤部再次作出《关于进一步压缩今年国防费拨款的报告》，提出国防费拨款再减少3亿元，同时上缴结余经费7亿元，共10亿元，连同11月份的报告，这一年实际减少国防费拨款25亿元。

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一方面，军队的经费有限，限制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进程；另一方面，军费在国家财政开支中占有很大比重，反过来又影响着经济建设的速度。军队在短时期内节余上缴大量经费虽然是必要的，但是，作为军队本身，又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它不仅要精打细算，长时间过苦日子，还不得不压缩许多本来必不可少的建设项目。

第二节 开展农副业生产

在完成战备、训练和其他各项中心任务的前提下，人民解放军积极开展农、林、牧、副、渔业和农副产品加工等生产活动。

从事生产，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也是这支军队的三大

任务（指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内种菜、种粮、养鸡、养猪，除自食外还可供应前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部队响应中共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签署军委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出，“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而其重点，则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 and 国家的财富”。建国初期，人民解放军除执行作战和执勤任务的部队外，大部分投入生产。1950年，全军垦种水旱田305万亩。50年代中期，由于学习外军实行给养实物供应，人民解放军的农副业生产规模大大压缩。50年代末，以养猪、种菜为主要内容的农副业生产重新得到重视。1959年1月，总政治部指示全军“逐步实现肉类、蔬菜的全部或大部自给，保证供应，改善生活。”当年，全军生产蔬菜4.5亿公斤，肉类1848万公斤，均比1957年增加3倍。60年代初，响应中共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人民解放军建立起一批生产基地。1962、1963两年，全军每年开荒生产的部队达50万人，土地面积扩大到600万亩（以后压缩到390万亩）。陆续办起各种类型的农牧场（生产点）1220个，多数部队有了自己的生产基地。60年代中期以后，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为标志，人民解放军建立起一批稳定的、大型的生产基地，以此为骨干，农副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文化大革命”中，部队的生产活动与全国范围的“反修防修”联系在一起，受到高度重视，生产任务逐年加重，甚至超过了力所能及的程度。

一、《五·七指示》

1961年到1965年，人民解放军生产粮食12亿多公斤，其中1965年生产粮食3.5亿公斤，比1959年增长11.8倍。蔬菜大部分做到了自给，基本上保持每3.5个人养1头猪。连队的业余生产也有很大发展。几年中，交售国家生产粮1亿公斤，出口粮食7000多万公斤。

1965年5月2日，总后勤部总结过去几年部队从事农副业生产的经验，向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报告》提出，军队搞生产是一件大好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1.恢复了军队的老传统，既执行了毛泽东制定的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三大任务，又执行了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同时带动了当地的生产；2.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军队经营的土地，多数是自己开垦的荒地，这些荒地，多在边疆、海滩、湖泊，或是盐碱地；3.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部队适当增开点荒地，亩产提高到150公斤以上，可望每年收获10亿公斤粮食；4.生产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如果战争发生，这些部队也能很快集中起来参加战斗；5.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更具有特殊意义。《报告》设想，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一些生产，在3—5年内为国家提供20—25亿公斤粮食，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700—800万人1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林彪将总后勤部的这个《报告》转给毛泽东。5月7日，毛泽东复信林彪，指出：“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这个

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毛泽东还提出，工人“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学生“以学为主”，同时“兼学别样”。

5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的信和总后勤部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按语”提出，毛泽东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不仅对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可能的进攻，加强国防、贯彻人民战争思想方面，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人民解放军认真地学习、研究，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贯彻执行这个《指示》。6月6日，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指示全军，办好军队这个大学校，必须领会毛泽东的指示，跟上毛泽东的思想；参加国内外的阶级斗争，随时批判资产阶级；分期分批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调整军政训练时间比例；作出搞好农副业生产和开办中小工厂的规划；搞好民兵工作。

《五·七指示》的基本精神与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致的，中共中央的“按语”和总政治部的“指示”反映了这一思想。同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

会议进一步提出、“生产中一定要突出政治，要注意算政治账，不要只注意算经济账。军队生产不仅要出经济成果，更主要的是出政治成果，促进思想革命化”。作为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之一，军队农副业生产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偏差。

另一方面，毛泽东肯定、支持并且批准了进一步搞好部队生产的计划，推动部队农副业生产继续发展。1966年以后，人民解放军垦荒造田，建农场，办工厂，生产规模和生产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 发展状况

1966年初，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规划当年农副业生产任务时提出，要在稳定生产规模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具体目标是，全军耕地面积保持350—400万亩，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平均提高10%，粮食总产量达到3.25亿公斤。生产建设的重点是：抓好农田基本建设，扩大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加强经营管理，做到以农为主、以粮为主、以副养农、综合经营。生产管理体制仍分为三种类型：部队生产（担任生产任务部队的生产）、机关（院校）生产和业余生产。值班部队担负生产任务的建制单位每师不超过1个营，业余生产由伙食单位自行组织，一般每4—5人养1头猪，每人种5厘左右菜地。

《五·七指示》发布后，1966年8月13日，总后勤部提出调整全军生产建设发展规划，计划在“三五”期间（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再开荒100万亩左右，使全军耕地1970年达到400

万亩左右。粮食亩产量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①，年产粮食 6—7.5 亿公斤。同时，全军农场设立专职管理机构，步兵师、团后勤部门成立专门的生产管理机构。按照每个劳力种稻田 6 亩、水浇地 15 亩、旱田 40 亩计算，全军需生产部队 30 万人，农场干部 1 万人以及相应的专业职工。

1970 年，人民解放军实际种粮 580 万亩，远远超出 1966 年的设想。产粮 8.5 亿公斤，比 1965 年增加 1.4 倍。平均亩产 150 公斤。1971 年，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用兵将近 60 万，产粮 9.8 亿公斤，油料 1850 万公斤，蔬菜 8.2 亿公斤，肉食 5106 万公斤，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与 1965 年相比，粮食增长 1.7 倍，油料增长 50%，蔬菜、肉食各增长了 40%。粮食平均亩产达到 166 公斤。

这几年，全军垦荒造田 237 万亩，加上原有的 390 万亩土地和借用国营农场、集体农民的部分土地，全军耕地总面积达到 742 万亩；新建各种农牧场 878 个，农牧场总数达到 2098 个。其中万亩以上的大农场 103 个，比 1965 年增加 1 倍。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人民解放军组建了 6 个生产师，专门执行生产任务。北京军区的柏各庄农场、南京军区的城西湖农场、武汉军区的沉湖农场、广州军区的牛田洋农场都是大型的农业生产基地。

沉湖是汉江平原的“锅底”，枯水季节，烂泥淤积，杂草丛生；一到雨季，湖水泛滥，灾害不断。1966 年 6 月，在湖北水利工程指挥部的统一规划和组织下，武汉军区先后派出 4 个师同数万民工一起对沉湖进行围垦治理。到 1971 年，共完成土方

^①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到 1967 年粮食平均亩产量达到：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 400 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 500 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 800 斤。

1180 万立方米，开挖大中型渠道 100 余公里，筑堤 48 公里，围垦土地 9.8 万亩，其中可耕地 7 万亩。同时建成的还有每秒排水量 120 立方米的大型泵站以及 110 千伏和 35 千伏变电站各 1 座，在日降雨 160 毫米的情况下，可使沉湖周围 380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渍水 3 天内排入汉江。不仅农场本身实现了旱涝保收，而且使湖区天门、汉川两县近 60 万亩土地受益。

广州军区某师 1962 年在潮汕地区牛田洋奋战 4 个月，运取土、石、砂 120 万立方米，筑起总长 15 公里、平均高度 4 米的围海大堤，造田万亩，建起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海田农场。1966 年，他们又围海造田万亩，使农场面积扩大 1 倍。

与此同时，业余生产也有较大发展。1971 年年终，猪的存栏数达到 177 万头，比 1965 年增加 100 万头。北京军区装甲兵某部战士叶洪海在学习民间“黑曲霉”发酵饲料的基础上，试验成功具有酸、甜、软、熟、香、略带酒味特点的“中曲发酵饲料”。这种饲料猪爱吃，易长肉，能增强抗病力，节约粮食，在全军和全国推广后，促进了养猪业的发展。中共中央军委授予叶洪海“模范饲养员”称号。

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对补助军队供应，改善官兵生活，减轻国家和人民负担，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明显作用。(1)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国家每年拨给军队的经费十分有限，主要用于改善装备和其他各项战备建设上，不可能大量用于提高生活标准，尤其在一些边远地区，即使有钱也难以买到东西。军队通过农副业生产，每年自行解决粮食 5 亿公斤左右，肉食 5000 万公斤左右，蔬菜 6 亿公斤左右，弥补了国家供应之不足。生产搞得好的单位，生产收益还可用于基本建设，补充正常经费的差额。(2) 建国以后，军队累计垦荒 1300 多万亩，先后移交地方 900 多万亩，继 50 年代一大批军垦农场移交农垦战线

以后，60、70年代又移交地方一批农场，如全军唯一的热带作物生产基地，拥有32.5万亩土地的海南岛八一农场；围海造田建设起来的，拥有2万亩土地的广东中山市白藤农场；全军最大的现代化生产基地之一，拥有12.5万亩土地的安徽城西湖农场等。军队每年向国家交售大量粮食作为国家储备，军队生产的粮食、肉食、蔬菜等经常支援灾区，支援地方。(3)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水平十分落后。人民解放军海边防部队垦荒生产，不仅解决了交通不便，运输困难造成的供应紧张，改善了守备部队的生活条件，而且带动边疆群众学习生产技术，拓展生产领域，促进了边疆经济的发展。(4)中国的农业生产手段比较落后，军队农副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虽然较之农村人民公社为高，但仍需投入大量体力劳动，长时间作业。艰苦的环境有助于锻炼部队思想，培养部队作风，建立和发展新型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从而推动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40年代曾指出，军队搞生产，违背了分工的原则，形式上是落后的，但在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商品经济还不十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毛泽东这一论断仍有积极意义，只要遵守国家的政策法规，服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统一规划，坚持调配适当、有主有从的原则，军队从事一定规模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仍是可能的和必须的。

三、农副业生产的整顿

1966年到1975年，人民解放军垦荒造田400多万亩，建成大中型农场200多个，生产粮食63.5亿公斤，交售国家粮食16亿公斤。同时办了2000多个中小工厂，累计产值26亿元，收益7亿元。

在取得上述成绩的同时，军队农副业生产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有的部队脱离补助需要，改善生活的目的，追求粮、油、肉、菜、煤、马等的自给，摊子越铺越大，生产用兵过多，劳动强度很大，部队很难得到休整，挤掉了军事训练的时间；有些单位经营管理不善，单位面积产量低，多年上不了“纲要”；强调以粮为纲，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忽视多种经营和自然生态平衡，甚至占用地方土地，损害了群众利益；在产品的分配和收益的使用方面，缺乏统一规定，基本上归生产单位所有，造成挥霍浪费，助长了某些不正之风。这种状况背离了毛泽东军队要生产，但不能过多，军队可以军工、军农，但首先是军的思想。

“九·一三事件”之后，人民解放军在批判林彪路线，清除林彪对军队的影响的同时，开始客观地评价前些年农副业生产的得失，端正农副业生产的方向。1972年，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先后表示了对军队开展农副业生产的意见。徐向前说：“部队要搞点生产，一点不搞不行，但不要搞得太多。部队搞生产只能起补助作用，帮助改善部队生活，不能提倡几个自给。”聂荣臻说：“部队的生产不能搞得太多，可以种点蔬菜，养点猪，帮助部队改善生活，不能提倡部队搞粮食自给。”1972年9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在全军军训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是军队，可以军工、军农，但首先是军。军队以军为主，工人以工为主，是有主有从的。军队也要生产一点，但不能光搞生产，主席讲是军农，不能农军，专去搞农业，这也是歪风，对生产很有兴趣，对训练没有兴趣，这是什么意思？邪气！苹果园占了一大片，结果军队不会打炮，干部不会带兵，不会练兵，不会用兵。”1972年底起，中共中央军委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整顿军队生产。1972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关于1973年加强军事训练、调整压缩生产用兵比例的建议；1974年5月，总后勤

部上报关于调整部队生产任务的报告；同年，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组织联合调查组，对部队经费开支和军工军农生产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并于12月批转了联合调查组的报告；1975年12月，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整顿部队生产的意见》，决定调整部队农副业生产的规模和体制：（1）按照“调配适当、有主有从”的原则，按陆军军和独立师10%、海、空军（海、空勤人员除外）和特种兵部队5%的比例安排生产用兵。（2）结合当地的生产条件和部队担负的任务，具体确定生产规模。生产任务重的，要适当压缩；生产基础差的，应当加强。部队办的大型农场，有条件的，可保留下来，继续经营；无力经营的，可移交当地省、市、自治区。（3）军队农场、工厂，原则上由师以上单位办；团主要组织连队业余生产和家属生产；独立团和相当一级的海、边防部队可以办为连队服务的农副业生产点；连队和机关、医院、学校、仓库等基层伙食单位进行业余生产，搞好养猪、种菜。（4）部队生产用地，主要是开垦国有荒地和利用营区土地。退还过去接收的国营农牧场土地、劳改农场土地以及借用的社队土地。

表 13 人民解放军农副业生产情况

时间	生产用兵 (万人)	粮食 (亿公斤)	蔬菜 (亿公斤)	肉食 (亿公斤)
1950年		1.07		
1959年		0.27	4.5	0.18
1965年	29.2	3.5	5.8	0.36
1971年	59.6	9.8	8.2	0.51
1975年	29.3	7.8	7.8	0.5
1976年	2.4	6.6	7	0.43

1972年以后，军队农副业生产逐年压缩。1975年生产用兵29.3万人，比1971年减少30.3万人，比1974年减少9万人。当年生产粮食7.8亿公斤（亩产213.5公斤），蔬菜7.8亿公斤，肉食0.5亿公斤。1976年，全军农业生产用兵压缩到24万人，种植粮食作物346万亩，产粮6.6亿公斤，蔬菜7亿公斤，肉食0.43亿公斤。

第三节 抢险救灾

如果说，军队以自己的力量用于国家经济建设仍不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话，那么，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时，人民解放军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地抢救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以及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鱼水关系，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的崇高精神，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风格，则使每一个当事人难以忘怀。

不管是河南驻马店地区发生水灾，还是唐山发生地震，或者其他地区发生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自然灾害，人们在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人民解放军。濒临死亡，人们把红领章、红帽徽看作希望；陷入绝境，人们从子弟兵身上汲取勇气和力量。人民解放军通常最早到达灾区，担负着抢险救灾主力军的任务，无私无畏地把温暖送往灾区——宁愿自己忍饥、受冻、流血、牺牲。

一、河南驻马店地区抗洪救灾

1975年8月5日至8日，受当年3号台风影响，河南省淇河、汝河、沙河、颍河、唐河、白河流域连降暴雨，3天内降水量达到创纪录的1400至1500毫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

洪水泛滥。驻马店、许昌、南阳、周口地区 32 个县（市）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水灾。部分地区水深 2.5 米，大片农田被淹，倒塌房屋 570 万间，受灾群众 1200 万人。洪水冲毁京广铁路 102 公里及多处公路、桥梁，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严重。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立即出动 7 万余人，上百架飞机，近 3000 辆汽车，组织起 89 个医疗队，在武汉军区、中共河南省委和河南省军区的统一领导下，迅速投入抗洪斗争。8 月 15 日，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王六生等领导干部视察了遂平、西平、镇平、汝南、平舆等灾区，召开了救灾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要求救灾部队发扬为人民不怕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奋勇战斗，战胜洪灾。

救灾部队不怕疲劳，连续作战，与洪水顽强斗争，抢救出大批受灾群众。陆军第 20 军 173 团 2 连的 28 名干部战士跳入激流，用肩膀扛起木板竹筏，架起一座 50 多米长的人桥，保护 400 多名群众安全上岸。社旗县护城堤 3 处决口，1 万多名群众和上百个机关、工厂、仓库受到严重威胁，陆军第 129 师 385 团 3 个连队迅速赶到现场，在激流中组人墙、打木桩、垒草袋，堵暗洞。团党委提出，“宁可部队受损失，不让人民有危险”，把团里的 200 麻袋稻谷拉来堵决口。经过 17 小时紧张战斗，部队和群众一起，堵住了决口，保护了县城。当沙河出现有史以来的最大洪峰时，陆军第 59 师和周口地区 10 余万群众一夜之间把 100 多华里长的沙河南堤加高 1 米。炮兵第 2 师 30 团 3 营在遂平县城周围，从房顶上、树上、草垛上、洪水中抢救出大批群众。特大洪峰把该营冲散，分隔成 16 摊，多则几十人，少则几人。他们被水冲到哪里，就在哪里重新组织起来，带领群众继续战斗。该营 7 连抢救前江庄遇险群众时，把从泥沙中扒出的电线缠在身上，送往急流对岸，架起安全索，使 200 多名群众顺着电线安全

转移。由于环境污染，劳累过度，全营 80% 的人员患结膜炎，一半人患肠胃病，但没有一个人离开救灾现场。在睡不上觉，吃不上饭的情况下，全营连续战斗 27 小时，救出 4 个人民公社 7 个生产大队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1600 多人，转移群众 8000 多人。群众说，“乡亲们一个个被救出水，你们却一个个往水里跳；俺们受灾，叫你们吃苦啦”。1976 年 8 月 5 日，中共中央军委授予该营“抗洪救灾爱民模范营”称号。

洪灾使数十万灾民无处栖身，连续几天吃不上东西。救灾部队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紧张地投入运送干粮的工作。空军先后空投食品 229 万公斤。坦克 11 师的 80 多名干部战士，用头顶着 4000 多公斤干粮，涉水 10 余华里，送到受灾最重的文城公社。该师工兵 2 连 7 名战士，把自己的干粮全部送给群众，而他们在抢救群众的 30 多小时中，7 个人仅吃了从水中捞起的半个冬瓜。许多部队把营房让给群众住，饭让给群众吃，水让给群众喝，衣服送给群众穿。仅陆军第 129 师 386 团等 3 个单位就接待安置灾民 2.7 万名。武汉军区陆军学校等 4 个单位日夜为灾民赶制熟食 10 万余公斤。

洪灾使灾区疫病流行，部分地区发病率高达 50%，各部队医疗队努力净化水源，控制传染病流行，抢救危重病人。131 医院第 2 医疗队到宿鸭湖水库区巡诊，第一天就跑遍 10 多公里范围内的每个村落，为 2000 多名群众进行治疗。

铁道兵、基建工程兵等部队同筑路民工一起，在当年国庆节前夕全部修好被洪水冲垮的 102 公里京广铁路路段及其他险段，实现了提前通车。铁道兵 1 师 2 团 15 连平均每人每天挑上 400 多担，行程 60 公里。许多战士跑肿了双脚，磨烂了双肩，仍坚持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授予该连“抗洪抢修模范连”称号。

据不完全统计，救灾部队共抢救和转移群众 34.8 万人，抢

救粮食 1000 余万公斤，抢救牲畜 3800 多头，运送各种物资 2500 多吨，出动飞机 3500 多架次，空投食品、药品等物资 5400 余吨及橡皮舟近 2 万个，为群众治病 5.1 万人次，盖房搭棚 31 万余间，安置近 70 万群众住宿。部队支援灾区粮食 60 多万公斤，干部战士捐款 4 万余元，捐助衣物 28 万多件。河南、湖北两个省军区以及其他部队帮助灾区群众耕种秋季作物 4 万余亩，收获残粮、蔬菜 430 余万公斤。兰州军区派骑兵护送，千里迢迢，从青海给灾区送来 800 匹军马。

人民解放军舍生忘死，英勇搏斗，使大批群众绝处逢生，指战员们送医、送药、送粮、送衣，帮助灾区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受到灾区群众和全国人民的普遍赞扬。

二、河北唐山地区抗震救灾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北京和天津市，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尤其唐山市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

地震发生后，唐山周围 370 平方公里内，地面建筑几乎全部坍塌，道路、桥梁严重破坏，水、电、通信全部中断，造成 24 万余人死亡，16 万余人重伤，数十万人陷于危难，情况十分紧急。同时，天津 35% 的房屋倒塌或严重破坏，2.4 万余人死亡，2 万余人重伤。北京死亡近千人，重伤 1000 余人。

人民解放军驻唐山各部队，置自身遭到的重大损失于不顾，迅速投入抗震救灾。驻在唐山市郊的某部 10 连，震后不到 7 分钟即赶到 1 公里外的碑子院大队，同脱险群众一起将遇险群众全部抢救出来。接着又赶到唐山师范学院，抢救遇险师生。空军唐山场站从倒塌的报房中扒出电台联络资料，抢出发报机，于地震后 2 小时向北京发出第 1 份电报，向中共中央报告灾情。同时引

导在该机场执行任务的1架飞机很快飞往北京，与开滦煤矿赴京人员汇合，一起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唐山灾情。

中共中央立即作出救灾部署后，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海军、空军、铁道兵、工程兵、装甲兵、基建工程兵、总后勤部所属11个师、4个团、8个营、近200个医疗队，共10余万人，冒着强烈的余震，迅速从四面八方奔赴灾区，投入抗震救灾。北京军区以副司令员肖选进，副政治委员万海峰及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组成前线指挥组，地震发生的当天赶到唐山。陆军第40军120师360团1连28日上午接到赴灾区抗震救灾的命令后，15分钟做好准备，急行军9公里，从训练场赶回营房。开进途中，他们冒着滂沱大雨涉过5条洪水奔腾的河流，闯过4座被震裂的险桥，昼夜兼程300多公里，于29日凌晨赶到唐山。陆军第38军接到抢险救灾命令后，命令分散在17个县、市执行任务的部队从不同位置向唐山进发，边行进，边动员，边收拢、边调整部队，经过12小时急行军，先头部队于28日22时30分抵达唐山。驻北京的基建工程兵6支队、7支队接到命令后，3个小时组成吊车抢险队，冒雨赶赴唐山。北京军区工程兵舟桥85团1营奋战8个小时，在芦台蓟运河上架起1座150米长的浮桥，保证了救灾部队顺利通过，提前到达灾区。

进入灾区后，各部队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在余震频繁，砖石飞落的情况下，奋勇抢救遇险群众。为使遇险群众早日获救，指战员们从纵横交错的水泥预制板中钻进倒塌的大楼，用双手扒开一堆堆砖头、瓦块、钢筋、玻璃。余震发生时，许多解放军指战员用身体挡住塌落的砖石，保护遇险群众。陆军第24军炮团4名战士，连续28小时没有吃饭、喝水，救出田秀芬母女3人。陆军第66军某部1排得知煤矿医学院被埋在楼底的儿童白海明还活着的消息后，立即赶到现场，紧张搏斗近1小时，终于

用双手把埋压 147 小时的白海明救了出来。

人民解放军 6000 余人组成的近 200 个医疗队，克服灾区缺水、断电的重重困难，开设救护所、医疗站，收治和抢救伤病员。陆军第 24 军炮 5 师 50 团卫生队只有 28 人，地震使他们的营房和医疗器械受到破坏，脱险后的干部战士立即自觉地组织起来，抢出药品和救护器材，开设简易手术室，担当起抢救伤员的后方医院的任务，在震后极其困难的 8 昼夜中，他们收治伤员 8000 余人，抢救危重伤员 490 人，施行脾摘除、肝破裂缝补、截肢等急救手术 160 例。

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抢险救灾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共救出被埋压的群众 6 万余人，救治伤员 100 余万人次，协助地方转运伤员 7 万余人。

强烈的地震给唐山人民带来严重困难，救灾部队把解决群众生活的急需当作重要任务。地震后，空军唐山机场处于抗震救灾第一线，全国 50 多个单位的 5000 多名工作人员在这里建立了办事机构，3 万余名受灾群众涌进机场，吃饭、用水、医疗成了大问题。场站党委紧急动员，组织汽车为群众送水，每天供水量达 2500 余吨。同时，组织起 26 个伙食单位在露天架起锅灶，日夜为伤员和受灾群众烧水做饭，仅煮稀饭即用粮 2 万余公斤。震后，灾区粮食紧缺，救灾部队省下自己的口粮让给受灾群众。陆军第 120 师 358 团 1 连连续十几天喝稀饭，把节省下来的几百公斤粮食做成干饭，送给群众。有的指战员把水送给群众，自己却因干渴而晕倒。为解决震后群众居住问题，救灾部队就地取材，昼夜突击，帮助群众搭盖简易房屋 40 余万间。

在抢救受灾群众的同时，救灾部队奋力抢修铁路、公路、桥梁，抢运救灾物资，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铁道兵部队在震后 10 天内修复了遭受严重破坏的京山铁路，使伤病员

得到及时转移，救灾物资源源运抵唐山。唐山机场航行调度室在5人中1人牺牲、2人受伤的情况下，14天里指挥调度了13个机种的2400多架次救灾飞机的起飞和降落，最紧张时2架飞机起降间隔的时间只有26秒，创造了中国航行调度史上的奇迹。基建工程兵某部2支队同工人一起，奋战17昼夜，修复了唐山钢铁厂的变电站和炼钢厂，使该厂提前6天炼出震后的第一炉钢。以后，这个支队参加了唐山钢铁厂的铸造厂、小型厂、中型厂、炼钢厂等十几项工程的修复和改造任务。开滦煤矿因地震而停产，直接影响京、津、唐地区的工业和生活用煤，以及精煤出口任务。基建工程兵出动2.3万余人担负了开滦所属5个矿的恢复抢建工作。林西矿洗煤厂97%的建筑遭到破坏，仅需要排除的废墟杂物就有2万余吨，指战员们组成突击队，用40天的时间完成预计3个月才能完成的任务。陆军第46师炮团10连帮助市食品厂在震后第10天生产出第1炉糕点，成为唐山市食品系统第一个恢复生产的单位。陆军第120师358团以5个连的兵力同工人们一起大干10昼夜，恢复了新华纺织厂的厂房和生产线，使该厂500台织布机开机织布。

参加唐山抗震救灾的部队指战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国家、为人民作出重大贡献。救灾部队发扬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一心为国家，一心为人民，前赴后继，舍己救人。地震后，空军第6军机关和直属分队的营房全部倒塌，数百人遇难，他们在自救的同时，出动人员、车辆，救出群众近2000人，收转伤员4万多人。地震发生时，入伍仅4个多月的陆军第72师215团直属炮兵连战士王彦修，恰在唐山火车站候车。他与其他人一起，救出30多名群众。为抢救1个小孩，断砖砸破了他的头颅；为抢救派出所的女民警，他的双腿又被水泥板砸断。最后，终因伤势过重，流血过

多，壮烈牺牲。救灾部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往无前，人定胜天的硬骨头作风，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们吃大苦，耐大劳，冒着酷暑，废寝忘食，昼夜奋战。入伍 30 多年的空军航空兵第 24 师副师长李虎坡主动请战，带领第一批救灾部队来到唐山。他不顾个人安危，带头抢救伤员，连续工作三天三夜。铁道兵 11 师 53 团 12 连担负抢修通坨上行联络线 1 座中桥、2 座小桥的任务，因地震破坏严重，仅挖桥基就比原计划增加土方量 3300 方，任务十分艰巨。指战员们在 22 天的抢修中，平均每天施工 12 小时以上，终于提前 8 天完成了任务。救灾部队坚决执行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表现了人民解放军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地震发生后，空军第 6 军司令部机要处 7 名干部和密码全部被埋压，2 人牺牲，5 人受伤。受伤人员被救脱险后，不顾自己的伤痛，也不顾遇难的亲属，首先想到国家和军队的机密，及时将密码、密码机和重要文件转移到安全地方，连夜清点。空军唐山机场电话员高东丽在地震发生时，坚守岗位，迅速接通最后几个电话，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许多部队宁愿自己忍饥受渴，坚持不吃不喝群众送来的食物、饮料。挖出来的物品总是一点不动，如数上交。陆军第 114 师某部 1 排负责挖掘新华中路银行办事处的金库和营业室，如数清理出全部现金 51 万余元。救灾部队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精心医治护理伤病员，尽心尽力安排群众生活，使受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感受到人民子弟兵的情谊，坚定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唐山抗震救灾，为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抗震救灾斗争中，涌现出大批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1977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陆军第 38 军 334 团 2 连“唐山抗震救灾模范红二连”称号；授予陆军第 40 军 360 团 1 连

“唐山抗震救灾模范连”称号；授予空军雷达 16 团 10 连“唐山抗震救灾模范雷达连”称号；授予铁道兵 11 师 53 团 12 连“唐山抗震救灾抢修突击连”称号；授予铁道兵 14 师 68 团 7 连“唐山抗震救灾抢修先锋连”称号；授予基建工程兵第 2 支队 12 大队 11 中队“唐山抗震救灾先锋中队”称号；授予炮兵第 5 师 50 团卫生队“唐山抗震救灾模范卫生队”称号；授予空军唐山场站“抗震救灾模范场站”称号；授予陆军第 24 军 215 团直属炮兵连战士王彦修“雷锋式的战士”称号。给予炮兵第 5 师 50 团、空军唐山场站航行调度室记集体一等功；给予陆军第 38 军 334 团、陆军第 66 军 589 团、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武装部、天津市宁河县人民武装部、第 121 野战医院、空军第 6 军司令部机要处记集体二等功；给予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航行处调度室、空军第 6 军司令部通信处记集体三等功；给予空军航空兵第 24 师副师长李虎坡记三等功。命令同时授予陆军第 50 军 450 团 7 连“松潘抗震救灾模范连”称号。并号召全军指战员和广大民兵，向抗震救灾的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学习。

河南抗洪救灾和唐山抗震救灾仅仅是这个期间人民解放军较大规模的两次抢险救灾活动。此外，云南昭通、龙陵，四川甘孜、松潘，辽宁海城等地遭受地震灾害，广东汕头、海南岛等地遭受强台风袭击，福建部分地区遭受冰雹和暴雨袭击时，人民解放军都及时派出部队抢险救灾。

1968 年 1 月 26 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生产民用炸药的化工厂发生严重火灾，驻在附近的黑龙江省独立 2 师 7 团 1 连的 17 名干部战士闻讯迅速赶赴火场与烈火搏斗。装有炸药的球磨机爆炸使在场的所有人员负伤，何文宝、徐亚光、王德斌 3 名战士牺牲。爆炸后，1 连的指战员们和工人、消防队员一起，一面继续扑火，一面抢救伤员和国家财产。1968 年 12 月 6 日，中共

中央军委授予该连“为人民战胜烈火的英雄连”称号，并给何文宝等3名烈士和其他4人记一等功。

1966年10月10日凌晨，守卫钱塘江大桥的浙江省军区某团警卫战士蔡永祥发现铁轨上横放着一根大木头，威胁着已驶近大桥的764次旅客列车的安全。他奋身抱出木头，使列车安全通过，自己却因被火车碰撞而牺牲。10月30日，南京军区党委作出《关于宣传和学习蔡永祥同志的决定》。11月18日，总政治部号召全军和广大民兵向蔡永祥学习。全国总工会等单位也分别发出宣传和学习蔡永祥的通知。

1967年8月19日，南京军区某团6连4排排长李文忠与战士们在赣江叶楼渡口乘坐渡船。渡船被风浪打翻后，李文忠指挥战士们奋勇抢救落水的50多名群众。李文忠在救起第5名群众后牺牲。1967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授予李文忠“爱民模范”称号，授予其生前所在排“爱民模范排”称号。

人民解放军组成医疗队，深入边远落后地区，控制传染病、流行病的发生。1967年，新疆、河北、山西、四川等地先后出现流行性脑炎，数十万人发病。人民解放军2000多名医务人员组成的300多个医疗队、防疫队进入疫区，抢救病人，同时进行防疫工作。

1967年1月，江西井冈山地区连降大雪，封锁了上山道路。人民解放军为困在山上的“红卫兵”紧急空投食品6万公斤，同时送去大量药品，解除了山上的险情。

抢险救灾，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桎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得不让位于紧迫的灾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把群众的危难当作命令，哪里危险往哪里冲，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只要有一点可能，就不放过抢救遇险群众的希望。人民解放军为

人民服务的“全心全意”，在灾区表现得异常鲜明。“文化大革命”使人民解放军遭受严重破坏，“三支两军”又使人民解放军的形象蒙上一层阴霾，抢险救灾却拂去灰尘，深刻地体现出这支军队的性质、宗旨，重现出它的夺人光彩。

第十四章 援越抗美

也许是历史的安排，“文化大革命”的10年，几乎与越南抗美救国斗争最激烈的10年（1965—1975年）重合。中国人民在蒙受严重磨难的同时，仍一如既往，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以巨大的勇气和牺牲承担了援越抗美的历史重任和义务。人们不会忘记，中国总理周恩来为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工作，确保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需要，付出了无数心血。为使援越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他呕心沥血地做工作，熬过许多不眠之夜。他曾下令不准揪斗执行援越任务的有关部门负责干部，制止红卫兵、造反派拦截运送援越物资的火车，以保障铁路运输畅通。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关心和推动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曾发出布告，申明援越抗美的要义，严厉警告“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的行为，将这些定为“破坏援越抗美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虐，无政府主义猖獗，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那个年代，中国人民以极大的热忱倾注于援越抗美斗争，给予当时条件下可能的最充分的精神支持和物质保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承担了提供军事物资装备援助，派出支援部队入越配合越军作战的任务，为此作出重大牺牲和卓越贡献。

第一节 中越友谊源远流长

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始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在越南抗关斗争期间达到高峰。简要地回顾一下中越关系发展的历史，了解一些未曾公诸于世、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有助于理解中国人民忘我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为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有助于澄清越南当局在这个问题上制造的各种混乱。

越南是中国的近邻，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上，两国封建王朝之间虽然发生过一些战争，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从未中断，移居越南的中国侨民对越南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互相同情、互相影响，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大都是经过中国而后传入越南。”（胡志明：《中国革命与越南革命——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四十周年而作》，1961年7月1日）广州、昆明、柳州、桂林、香港、澳门以及广西、云南两省的许多地方都曾是越南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为越南“八月革命”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率先承认越南，使越南获得强固的国际地位。越南政府把中越建交的日子（1950年1月18日）定为“外交胜利纪念日”。胡志明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对越南人民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胡志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贺词》，1959年9月28日）。

胜利后的中国是越南抗法斗争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1950年1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接受了胡志明提出的援助越南的请求，决定派出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建设军队，协助组织指

挥作战。1950年8月至1953年，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先后计划和组织了边界战役、红河中游战役、东北（18号公路）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上寮战役，解放了广大地区。

1953年夏，法军制订新的作战计划，企图在18个月内取得“决定性”胜利。军事顾问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建议越军在按原计划攻取莱州的同时，增调兵力发起奠边府战役。经过较长时间的战役准备，1954年5月1日，越军对奠边府发起总攻。7日，战役结束，共歼敌1.6万人。

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迫使法国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1954年7月，法军撤出整个印度支那，北纬17度线以北的越南北方全部解放。

抗法战争时期，中国是唯一给予越南援助的国家，越南首任驻中国大使黄文欢说：“在奠边府战役中，如果没有从中国送来的大炮，就不能摧毁法军的集团据点，如果没有韦国清同志在前线直接参加指挥，这个战役就难以取得完全胜利。”（黄文欢：《越中战斗友谊的事实不容歪曲》，1979年11月）就是后来策动反华排华的黎笋当时也承认：“没有中国的帮助，我们是不可能战胜法国的。”（同上）

第二节 巨大而无私的军事物资援助

日内瓦协议签定后，美国蛮横地宣布不受其约束，并且在越南南方积极培植亲美势力，排挤和取代法国。1961年，美国在越南南方发动了“用越南人打越南人”的所谓“特种战争”。

1964年8月2日，美国军舰“马多克斯”号侵入北部湾，越南进行了自卫还击。5日，美国借口两艘军舰前一天再次在北部湾遭到越南鱼雷艇的攻击，突然出动大批飞机，连续轰炸越南的

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北部湾事件”。事件发生的当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即致电越南主席胡志明、总理范文同和总参谋长文进勇，建议“查清情况，议好对策，以利行动”。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表示了对越南人民的坚决声援。8月7日至11日的5天中，中国各地2000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痛斥美国对越南的侵略罪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1965年3月，美国在扩大对越南北方海空袭击的同时，出动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发动了局部战争。中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战争冒险，重申侵犯越南就是侵犯中国，表示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3月29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宣布：“中国人民坚决响应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最近发表的声明和呼吁，给南越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援，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战物资。我们还准备在南越人民需要的时候，派遣自己的人员，同南越人民共同战斗。”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保持高度警惕，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如前所述，中国对越南北方的军事援助始于1950年。1956年之前，由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薄弱，主要提供旧杂式装备，未计数，也未计值。1956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和国防工业的迅速发展，对越南的援助不仅数量成倍增加，而且逐步提

供新型武器装备和其他军用物资。1956年到1963年，中国对越南北方军援价值3.2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各种枪27万支（挺）、炮1万余门，枪弹近2亿发，炮弹202万发，有线电机1.5万部，无线电机约5000部，汽车1000余辆，飞机15架，舰船28艘，单军服118万套。从1962年开始，中国向越南南方提供无偿军援，根据越方要求，1962年至1964年主要提供各种旧杂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三年间共提供枪9万余支（挺）、炮446门，枪弹2103万发，炮弹7.64万发。1965年以后，中国援助越南的武器装备，不仅数量明显增加，质量性能也有提高。同1964年相比，1965年援助北方的枪支增加1倍多，火炮增加1/3，枪弹增加1.6倍，炮弹增加3.5倍，无线电机和有线电机增加2.5倍。援助南方的枪炮弹药成10倍地增加，且全部提供新制式装备。据统计，1950年至1974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注：协议数，执行中略有出入）有：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440万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运输车320辆，飞机170余架，汽车1.6万辆，炸药18240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3.5万部，军服1117万套，以及大量油料、被装、药品、卫生器材和食品等。这些物资可以装备200万人，约合人民币42.6亿元。

中国人民把援助越南人民的斗争当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竭力满足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要求：“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们有可能办到，就一定满足。有些我们有的，也能办到，越方没有想到，我们要主动提出，如蚊帐、雨具、医药、救急包、压缩干粮也可以。南方生活苦，肉松也可以。”1965年底，他在离京赴外地之前，交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援助越南南方的物资中，增加压缩干粮、肉松、猪肉罐头，咸

鱼、蛋粉、雨衣、蚊帐和医疗器械。周恩来提出：“援助越南是我们的头等任务。对越南提出的要求都要严肃、认真、积极的对待。”“由于南方的情况变化很快，有机会要尽量多运点进去，多准备些东西，以后情况可能更严重，可能会被敌四面封锁，多给点东西总是有利的。”他要求：“给南方的装备，要便于使用，便于携带、便于隐蔽和便于运送。”他要求每件援越物资的重量一般不要超过 30 公斤，以便担负搬运任务的越南妇女头顶肩扛。

毛泽东、周恩来的话语中洋溢着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深情厚意，体现了对越南人民革命事业的殷殷关注。正如胡志明对中越两党和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评价：“恩深、义重、情长。友谊之光、万世辉煌。”

众所周知，在十年动乱中，中国的工农业生产下降，商品匮乏，供应不足，很多生活必需品难以买到或实行定量供应。但是，只要越南提出要求，中国总是想方设法予以满足。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看 1967 年 6 月 1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代表（昆明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廖开芬）和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代表（西北军区后勤局副局长陈卦）签订的《关于中国对越南驻上寮地区部队 1967 年物资供应问题的会谈纪要》。这个《纪要》，大到军事物资，小至办公用品、日常生活必需品，几乎无所不包。《纪要》规定，中国在 1967 年内向越南驻上寮部队提供军械物资 34 项，通信器材 23 项，士兵器材 17 项，军训器材 8 项，油料、自行车、修理物资 15 项，主副食品（实物）21 项，军需被装物资 28 项，炊事物资 29 项，主副食折换商品物资 61 项，日用品、办公用品及其他物品 106 项，药品器材 229 项，兽医医药材 116 项。以上共计 687 项，而接受这些援助的越南部队按越南提供的数字仅为 1890 人（考虑到作战需要，增加 310 人的机动数，实际按 2200 人供应）。这里，主副食品、军需、被装按

越方提供的标准计算：衣服每人每年3套，鞋子每人每年3双；每人每日大米800克，食盐30克，肉80克，鱼30克，芝麻、花生30克，豆类30克，猪油30克，酱油（鱼露）10克，味精0.1克，白糖30克。且不说这一标准远远超出一般中国人当时的生活水准，即是越南方面也并不要求以实物提供全部主副食品，而要求将其中的大部分折价供应布疋、日用百货。因此，在两军总参谋部代表签订的会谈纪要中，就出现了珠子项链、镀银手镯、小孩穿的凉鞋、妇女用的花边等项目。在“日用品、办公用品及其他物品”一栏中，载有：牙刷8000把，留兰香牙膏11100瓶，长条肥皂24700条，香皂10600块，金沙江牌香烟74000包，存城牌香烟35000包，以及乒乓球、排球、口琴、扑克、大头针、钢笔水、缝衣针、青菜萝卜种籽等内容。时过境迁，尽管人们现在可以批评那时的援助不胜其繁，不厌其详，有些是根本不必要的，但不可否认，中国的援助是巨大的，又是入微的，中国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承受着巨大的民族牺牲、任劳任怨地为越南的解放事业默默地做着贡献。长期以来，中国把这些当作自己的责任，从不对外夸耀，并且始终认为援助是相互的，不愿多讲自己的支援。

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供应了越南，人民解放军换装需要的坦克和一部分大口径火炮很少得到补充，储备数量也很少。中国共向越南提供122毫米榴弹炮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37门，而1961年到1972年的11年间，人民解放军以上几种装备仅分别增加了约200门、2000余门和1.7万门。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人民解放军尚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以保证越南抗美救国之急需。1968年之前，中国生产63式电台3000余部，其中绝大多数支援越南南方，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试用。人民解

放军 1965 年开始建立战略储备，到 1972 年底，储备各种枪 150 余万支，炮 2 万余门，车辆 3000 余台，工程机械 260 部。与此形成对照，仅 1972 年一年中，中国即援助越南枪 18.9 万支，炮 9166 门，车辆 8558 台，工程机械 380 部。

非但如此，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人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1971 年到 1972 年的一年多时间中，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武器装备有：飞机 14 架，红旗 2 号地空导弹 3 个营的地面设备及导弹 180 枚，警戒雷达 2 部，水陆坦克 20 辆，舟桥 2 套，大口径加农炮 204 门，炮弹 4.5 万发。1968 年 6 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与越南副总理范雄会谈 1969 年援助问题时，越方提出急需 107 毫米火箭炮，当时中国已停止生产老型号的这种火箭炮，为了满足越南要求，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决定无保留地将库存的该型火箭炮全部给了越南。

当然，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满足越南提出的一切要求。中国在充分考虑越南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坚持凡是越南斗争需要，中国能够办得到的，就一定满足；当时办不到的，积极设法创造条件，争取尽快解决；坚持需要与可能相结合，一切有利于双方的共同事业为前提的原则，合理地安排援助项目和援助数量。如果某些要求暂时无法满足，就耐心解释，求得对方的谅解。1965 年 10 月的一次会谈中，越方提出要 1.4 亿发弹药，罗瑞卿总参谋长当即询问越军总参谋长文进勇：“要这么多弹药，现在是否运得去？”建议越方提出合理的数量。事实也是如此，中国以及苏联和其他国家援助的武器装备，越南既用不完，也运不进去，每年都有大量装备物资积压在中国边境的车站和仓库中。在越南国内，许多尚能使用的武器装备被弃置不用。以 1965 年为例，中国无偿为越南储存军事物资 1.75 万吨，一般物资 11.2

万吨。尤其令人气愤和不能容忍的是，越南有计划地囤积大批武器装备，用于日后反华排华的需要，这是中国始料不及的，不能不说是越南当局对中国无私援助的亵渎。1979 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在清理缴获的大批装备和日常生活用品。（包括武器、弹药、粮食、压缩饼干等）时，发现很多都是中国过去无偿提供的，并明显地标有“中国”的印记。

为了将援越物资安全迅速地运往越南，1965 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援越运输工作领导小组，由总参谋长罗瑞卿任组长，主要成员有李先念、薄一波、杨成武、李天佑、方毅、李强、刘晓等（以后人员有变动）。自 1967 年开始，中国动用 500 余辆汽车将经铁路运抵边境城市的物资运往越南。1972 年 6 月至 1973 年 12 月，根据越方要求和中越两国政府《关于中国派汽车把中国援越物资运到越南境内》的正式换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抽调 3 个汽车团，2100 余辆汽车分 5 路运入越南各种物资 62.3 万吨，总行程 3545 万公里，运输费用全部由中国承担。1972 年 9 月，中越双方商定改建广西凭祥到中越边境 7 号界碑至越境公路，增辟新的汽车运输线。这本来是有利于越南的事情，越方却提出了深入中国境内的接头地点。为了不影响公路修建，中国建议将接头地点定在 7 号界碑延伸线上，将边界走向问题留待以后协商解决。李先念副总理就此批示：“领土是一个严格的问题，不能让。但鉴于中越友好，他们正在打仗。谈判时，还是要谈支持抗美援朝。”周恩来总理也批示：“修路照修，边界不改不谈。”在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已经出现明显矛盾的情况下，中国仍以抗美援朝为重，不纠缠具体问题，表现出高度的克制和宽容。

1965 年以后，苏联开始向越南提供援助。到 1966 年 4 月，中国免费转运的苏联等国家援越军事物资已达 8.5 万吨。在转运过程中，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花费了相当大的人力和物

力，仅为保证3个地空导弹团的运输，即动员1.5万人直接参加此项工作，并在沿途先后派出警卫人员16.3万人次，使列车运行时间较一般列车的11天缩短了4天。这些作法，不仅越南满意，苏联驻北京的运输代表和过境人员也承认中国的转运工作是“认真的，搞得好，搞得快”。在越南抗美战争的十年中，中国转运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军事物资63万吨，免收过境运费8300万元。在转运苏联等国援越物资问题上，西方通讯社曾散布过不少谣言。对此，1966年6月19日，越南政府授权越南通讯社发表声明：“苏联和其他东欧兄弟国家的援助物资，都得到中国尽力帮助，按照计划转运过境。”以此驳斥某些西方国家通讯社“过境援越物资受阻”的捏造。

为了适应越南南方抗美斗争的需要，中国通过海上、陆地开辟了多条运输线。在海上，中国开辟了一条沿海的秘密航线，把援助物资及时送到越南中部的几个小岛，以便于越南继续运入南方。中国在海南岛提供港口作为越南运送物资到南方的中转站。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中国使用大量外汇开辟了一条通过柬埔寨到达越南南部的交通线（通称胡志明小道），把中国援助的武器、弹药、粮食、医药等物资直接运给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这条交通线成为越南战争中敌对双方斗争的焦点之一。

1973年1月，《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在巴黎签订，宣告美军撤出越南南方。1975年5月1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鉴于形势的这种变化，中国逐步压缩对越军援规模，至1976年，停止了无偿军事援助，尽管如此，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枪厂、高射机枪厂以及枪厂扩建、枪弹厂扩建等工程仍在继续进行。

中国人民真心实意地把越南人民当作同志加兄弟，把援助越南当作极其神圣和光荣的事业。“想越南人民之所想，急越南人民

之所急，帮越南人民之所需”的口号曾风靡中国城乡。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又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中国当然不可能拿出自己所没有的高技术武器装备供给越南，但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奉献精神使任何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无不由衷地为之赞叹。胡志明主席曾用“慷慨的”、“无私的”、“极其巨大的”和“有效的”这些词汇形容中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越共中央党史研究委员会1976年出版的《越南劳动党的四十五年活动》一书在总结抗美救国战争胜利的原因时指出：“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援助是极其重要的。”1977年11月20日，黎笋在北京时也承认：“越南人民的胜利是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强有力的支持和巨大援助分不开的。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这种慷慨的支援。”

第三节 派出支援部队协助越南作战

1965年4月初，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国防部长武元甲率领越南代表团到北京，要求中国政府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配合越南部队作战。在会谈中，黎笋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说：“我们想要一些志愿的飞行人员，志愿的战士……其他方面的必要人员，包括公路、桥梁等方面的人员在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会谈中表示：“我们的方针就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们。”“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去，我们哪一部分去。这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越南希望中国志愿飞行员起到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把美国的轰炸限制在20度线或19度线以南；二是保卫首都河内的安全；三是保卫几条主要交通干线；四是鼓舞民心士气。

表 14 援越部分主要武器装备物资情况 (协议数)

名称	单位	1964 年	1965 年	1966 年	1967 年	1968 年	1969 年	1970 年	1971 年	1972 年	1973 年	1974 年	1975 年
各种枪	支、挺	80,500	220,767	141,531	146,600	219,899	139,909	101,800	143,100	189,000	233,500	166,500	141,800
各种炮	门、具	1,205	4,439	3,362	3,984	7,087	3,906	2,212	7,898	9,238	9,912	6,406	4,880
各种炮弹	万发	2,524	11,401	17,812	14,700	24,792	11,917	2,901	5,719	4,000	4,000	3,000	2,006
各种炮弹	万发	33.5	180	106.6	136.3	208.2	135.7	39.7	189.9	221	221	139	96.5
无线电机	部	426	2,779	1,568	2,464	1,854	2,210	950	2,464	4,370	4,335	5,148	2,240
有线电机	部	2,941	9,502	2,235	2,289	3,313	3,453	1,600	4,424	5,909	6,447	4,633	2,150
各种坦克	辆	16			26	18			80	220	120	80	
各种舰艇	艘		7	14	25				24	71	5	0	
飞机	架	18	2		70				4	14	36		20
各种汽车	辆	25	114	96	435	454	162		4,011	8,758	1,210	506	
军服	万套			40	80	100	120	120	120	140	140	140	

根据越南的要求，中越两国政府和军队签订了有关协定。1965年6月初，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同越军总参谋长文进勇在北京会谈，具体商定人民解放军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方式和时机。越方提出，如果战争保持当前状况，越方单独把担子挑起来，中国以各种方式予以支援；如果美国以海空军支援其仆从国军队向越南北方进攻，中国也以海空军支援越南作战；如果美国地面部队直接参战，中国以地面部队作为越南的战略预备队，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关于空军的协同方式：一是派遣志愿飞行员，使用越南飞机；二是中国既出人又出飞机，进驻越南机场；三是从中国空军基地起飞到越南作战，或临时降落越南机场加油，即“安东式”^①。关于陆军协同方式：一种是中国军队以一部兵力加强越军以巩固防御态势，为转入进攻创造条件；另一种也是主要的方式是以中国军队的大部或全部发起攻势，打乱敌人部署，争取战略主动。罗瑞卿向文进勇表示：“我们已经作了准备，听你们的，什么时候要我们去，我们就去。”“由你们指挥，我们派人协助。”

按照中越协议，中国从1965年6月开始，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达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中国援越部队把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看作自己应尽的神圣义务，紧紧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越南北方的领空，保证越南北方运输线的畅通，并使越南人民军得以解除后顾之忧，放胆地抽调大批部队到南方作战。

^①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曾利用位于辽宁省安市市附近的机场，起飞飞机赴朝鲜作战。

一、构筑国防工程

越南战争爆发后，越南南方傀儡政权多次派出军队袭扰越南北方沿海地区，美国也派出军舰不断进入北部湾游弋，阻拦越南北方对南方解放阵线的支援。1963年底，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就曾建议越南加强东北地区的防御工事，越方当即提出请中国协助完成设防工程建设，人民解放军表示原则同意：凡越方本身不能解决的都准备承担下来，尽可能予以解决。1965年4月17日，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要求中国工程部队紧急进入越南东北群岛施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立即抽调3个工程团1.2万余人组成工程2支队，于6月9日至29日，陆续到达施工地域的15个岛屿，构筑永备工事、码头、道路，敷设海底电缆和通信线路。完成预定任务后，应越南方面的多次要求，该部队推迟了归国时间，又承担了越南东北军区8处陆上设防工程施工任务。

越南东北群岛的不少岛屿，地形复杂，有些坑道口就选定在悬崖上，增加了施工难度。有些地方运输船只不能靠岸，只能靠人力肩扛手抬，淌涉数百米宽、齐腰深的泥泞滩涂将物资和装备运送上岛。人民解放军工程部队进入施工地域后，不顾疲劳，不分昼夜，突击抢运物资装备，抢修简易码头和道路，使上万吨物资，数百台机械、车辆和火炮迅速运入施工现场。1965年6月21日，首批部队入越后的第12天，即开始了紧张施工。指战员们冒着炎热酷暑、因多雨而潮湿的空气，在条件十分艰苦，劳动强度大，受伤和患病者相当普遍的情况下，顽强工作。加之，东北群岛砂石资源不足，淡水缺乏，部队为找砂找石找水，耗费了许多力量。为解决姑苏岛施工用石，部队跋山涉水，找到3处符合质量要求的落潮石场，他们落潮时采石料，涨潮时砸碎石，及时解决了工程所需的全部石料。

1966年7月至10月，工程2支队分批回国。为表彰该支队的突出贡献，越南民主共和国授予支队所属单位越南民主共和国一级勋章3枚，授予5人越南民主共和国一级勋章，授予12人越南民主共和国二级勋章。全支队个人荣立一等功11人，二等功34人，三等功3041人。

1966年12月至1968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7支队3个团进入越南红河三角洲地区，构筑设防工程。这里地质状况更为恶劣，塌方不断，在400多天的施工中，共发生5立方米以上的塌方754次，全支队因塌方而牺牲12人。

第2、第7支队均超额完成援越施工任务。完成的主要工程有：坑道239条，总长2.5万米；坑道口露天炮阵地138个；掘开式水备工事123个；观察所26个；海底通信电缆15条（103公里）；永久道路和施工用道路171公里（含桥梁14座，涵洞21个）；永久和临时码头9座。以上工程，共完成土石方84.76万立方米，相当于沿越南北方海岸线堆筑一道高宽各一米的护墙。越方对工程的评价是：“工程抗力均超过越方要求，工程质量高，坚固、适用，伪装好。”（《中国援助越南建设东北岛屿及沿海陆地设防工程、水底电缆工程、通信线路工程总交接书》，1966年10月2日）“完全符合战术、技术要求和工程设计标准，质量优良。”（《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建设红河三角洲地区设防工程、通信线路工程总交接书》，1968年10月16日）

1961年4月到1965年10月，中国工程部队帮助越南修建了内排机场。该机场位于河内西北约20公里处，是越南的首都机场，也是越南北方最大的空军基地，可以容纳2个歼击机团和1个轰炸机团。机场跑道长2800米，宽60米，并修有滑行道、联络道、停机坪和疏散区，以及保证作战、训练所需要的特种营房，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机场。1968年9月至1969年11月，

中国工程部队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努力，又圆满完成了该机场的飞机洞库施工任务。越方验收后认为，工程完全符合战术、技术要求和设计标准。

1965年，越南又要求中国在越南安沛援建一个空军机场。中国政府 and 军队无条件地满足了越南的要求。安沛是越南西北部的战略要地，濒临红河，群山环抱，场区内沟壑纵横，到处积水，最大的烂泥塘有6万平方米，最深处达5米，汛期经常受到洪水威胁。中国工程部队到达之前，安沛市区已遭美机多次轰炸。施工开始后，美机空袭更加剧烈。中国工程3支队在关机频繁轰炸的情况下，紧张施工，先后平掉44座山包，削掉15座山头，削山高度最多达31米，填土深度厚达8.5米，终于抢在雨季到来之前打好了跑道基础，取得了施工主动权。为了加快施工进度，部队的干部战士经常连续作业达16小时，既要克服阴雨和酷暑造成的困难，又要与空袭作斗争，每年都争取到220~240个工作日。经过三年半的紧张施工，安沛机场于1969年5月底全部竣工，整个工程开挖土石方637万立方米（相当于国内一般机场的3倍），灌注混凝土5.2万立方米，各项工程均达到了设计标准，质量优良。该机场洞库工程1968年9月开工，1969年10月完工。

为了加强越南的通信设施，1965年7月，经中越双方商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一个通信工程大队，帮助越南在莱州、山萝和奠边府等地区修建通信设施。10月，中国援越通信工程大队入越施工，至1966年7月，共架设通信线路330杆公里，拉线894对公里，安装4个载波电话站以及由其中一个电话站至越南西北军区驻地的中继线。这些通信设施，有效地改善了越南西北地区的通信状况。

二、修建铁路、公路

在抗美斗争中，越南北方的铁路、公路是美机轰炸的重点，为了打破美国对越南北方交通线的封锁，改善其运输条件，应越方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以铁道兵、工程兵为主的支援部队4个支队10余万人，担负了改善和保障河内以北铁路运输与修建7条重要公路的繁重任务。

抗美战争之前，越南北方的铁路以河内为中心呈辐射状，均为窄轨。路旱，桥涵标准低，质量差，易受洪水威胁，且大桥大站集中，易炸难修。特别是因力缺乏迂回线路，联不成网，很难保证战时运输需要。美机开始轰炸后不久，越南北方的铁路运输就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实际日平均运输量不到100吨，远不能满足日运输3000吨的要求。1965年4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关于中国帮助越南修建铁路和提供运输设备器材的议定书，以后又陆续达成其他协议。协议规定，中国帮助越南在河内以北修建铁路工程项目100余个，包括改建北线（河内至中国友谊关）和中线（河内至太原），增建车站、隧道等保障设施，改善原有线路；新建克太至太原线，形成北、南两线大迂回以及克太、安员等枢纽站的小迂回，使各线铁路联络成网，修建铁路战备工程，抢建便线、便桥、渡口以及迂回线，架设通信线路，敷设水底通信电缆；为铁路桥进行防洪加固。1965年6月，从中国各铁路建设工地紧急抽调的铁道兵部队组成工程第1支队赴越，经过艰苦奋战，至1970年6月，提前完成了各项任务，共计新建铁路正线117公里，改建铁路正线362公里，抢建铁路战备工程正线98公里，新建铁路桥梁30座，隧道14座，新建和扩建各种铁路站、段20个，架设通信线路1023对公里，敷设水底通信电缆8公里。共开挖土石方和采砂石958万立方米。这些工程的相继竣工，大大提高了河内以北的铁路运输能力，有力地保障了

越南抗美战争的运输需要

与此同时，第1支队承担了河内以北铁路干线的维修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65年6月至1968年10月，美机对第1支队区域内铁路线投弹28.8万枚，其中1967年6月空袭高峰时，平均每公里路段落弹9.6吨，主要桥梁每米落弹2.5—6.3吨。根据这种情况，第1支队适时调整工作重点，制订出确保北线畅通、保证中线迂回、力争西线通车的抢修方案，同美机轰炸作斗争。1965年8月至1969年2月，1支队抢修被炸坏的铁路设施1178处（次），排除定时炸弹3100余枚，修复铁路线路157公里，通信线路1420对公里。1967年8月11日，1680米的龙边桥被炸断，1支队2个营奋战18天，使大桥通车。以后，龙边桥多次遭美机轮番轰炸破坏，大桥一度中断186天，但第1支队在此增设了2套轮渡和1座月桥，铁路运输实际只中断了4天。

1965年5月，胡志明主席访华，在长沙向毛泽东主席提出：请中国同志帮助我们修路，……由中国包，我们就调动人力南下。毛泽东表示同意，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工程部队承建。1965年5月30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援助越南修建公路的协定》和议定书，确定由中国帮助越南修建总长1782公里的12条公路，其中新建772公里，改建1010公里。公路的修建费用，除由越南政府负责就地筹措供应的部分材料、辅助劳动力以及为修建公路所需的征用土地和拆迁等费用外，全部由中国无偿援助。所有公路，力争于1966年底粗通，以后按标准逐步改善。后来，根据越方要求，原定12条公路改为先修7条，预计总长1211公里，其中新建664公里，改建547公里。

1965年9月底，担负援越筑路任务的工程第4、第5、第6支队共16个团以及测量、钻探分队和配属的高炮分队共8万人

在修路指挥部率领下相继入越。至 1968 年 6 月下旬，修路部队全部完成了协议规定的筑路任务，提前或按时建成了 7 条干线公路及其附属防护设施，共计新建、改建公路 1206 公里，桥梁 305 座（总长 6854 米），涵洞 4441 座（总长 46938 米），完成土石方 3050 万立方米。越方代表验收时认为：“所建路线和所有构造物的技术标准，不仅完全符合协议的各项规定，而且有些项目还高于规定的标准，工程质量优良、美观。”（《中国筑路指挥部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路管理局关于友谊（1）、（3）、（7）、（8）、（10）、（11）、（12）号公路建成的交接证明书》）

三、防空作战

1965 年 6 月，越军总参谋长文进勇在会谈时向罗瑞卿总参谋长提出，如果美国飞机轰炸河内和河内以北地区的铁路线，请中国派 2 个高射炮兵师入越担任防空掩护任务。罗瑞卿表示，待勘察确定后，所需具体数量和进入时机由越方确定，“你们提出要求，我们就可以去”。7 月 24 日，越军总参谋部致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正式提出：“请你们速派两个已领有准备的防空师入越，越早越好，如果来得及，请于八月一日入越。”7 月 25 日，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复电，接受了越军总参谋部的请求，决定立即派遣 2 个高炮师和 1 个高炮团入越，分别担任河内——友谊关铁路线北宁至谅山段、河内——老街铁路线安沛至老街段的防空作战任务。

8 月 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炮 61 支队抵达安沛后，随即开始紧张的战前准备。9 日午前，美机 2 架沿红河由西北向东南进入射击区域，61 支队当即开火 40 秒，1 架敌机被击中起火，后坠落在安沛西南 35 公里处。次日，罗瑞卿在 61 支队的战报上批示：“首战告捷，优异的成绩，但要好好总结，发扬成绩，克服缺

点，每打一仗，前进一步，这是我军老传统，也是好传统，务必坚持，不可丢掉。”8月23日，进驻克夫地区的高炮63支队击落击伤敌机各1架。到10月17日，入越高炮部队和配属工程部队的高炮分队共击落敌机66架，击伤52架，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祝贺和赞扬。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他们：“千方百计打好仗为国争光。”

美国飞机遭到连续打击后，进一步加强对援越部队的空中袭击。1966年5月31日，美机109架分批对安沛地区实施空袭，高炮67支队2个团采取集火近战的方式与美机反复搏斗。当时气温高达40℃，部队伤亡和中暑人员不断增加。但指战员们毫不畏惧，顽强地进行战斗。副班长陈永林被打穿腹腔后，一只手捂住伤口，跪在炮盘上用单手排除火炮故障，还接着40公斤重的炮弹箱，在20多米的距离上往返4次，并抢救出2名重伤员，最后壮烈牺牲在阵地上。连长桑家贵头部负重伤，血流满面，仍坚持指挥战斗直至牺牲。这次战斗持续3个多小时，共击落美机16架，击伤10架，俘虏美国飞行员4名。中共中央军委通令嘉奖参战部队取得的胜利。1967年3月10日和11日，美机107架首次连续集中轰炸太原钢铁基地。高炮62支队发扬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在2天的激烈战斗中击落美机18架，击伤5架，俘虏美国飞行员10名，保卫的目标完好无损。

为了有效地打击美机，援越高炮部队及时调整战术，采取重点设防和机动作战相结合、集火近战等打法，并总结出一套对付美制“百舌鸟”导弹的有效措施。

中国高炮部队在实施重点掩护的同时，根据美机航线的变化，即打即离，适时向美机往返的必经之路和可能偷袭之地机动兵力，寻机伏击。据9个支队统计，机动伏击作战共击落美机125架。

集火近战是援越高炮部队大量歼灭敌机的基本战法之一。所谓集火，就是在一定时间内集中一定范围内的火力打击来犯美机的一部甚至一架，以密集猛烈的火力增大命中率；所谓近战，就是适当压缩开火距离，把敌机放到高炮最有利的射击距离上打。集火近战的好处很多：火力密度大，开炮距离近，敌机机动余地小，便于隐蔽我方意图，以突然行动，出其不意地杀伤敌机。

“百舌鸟”导弹曾给援越高炮部队带来许多麻烦。这种导弹可以追踪地面雷达发射的高压辐射波，自动导向雷达阵地，摧毁雷达。入越之初，由于缺乏经验，雷达往往远距离开机，过早地暴露了自己，致使炮瞄雷达被“百舌鸟”导弹击中。总结初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后，援越高炮部队普遍采用早开机、近升压、断高压、摇摆天线、断续开机等方法对付“百舌鸟”。早开机以作好捕捉目标的准备，但严格掌握升高压的时机。美机接近我高炮射击距离后，根据统一命令，各雷达同时升高压，在几秒钟内迅速抓住目标。当发现美机准备发射导弹时，雷达操纵手或操纵雷达天线上、下、左、右摇摆，或暂时切断高压，使敌机无法瞄准，发射后的导弹难以跟踪目标。采用这些方法，大大降低了“百舌鸟”的命中率。美国后来承认：北越不久就找到了“怎样对付‘百舌鸟’导弹的手段”，“减少了‘百舌鸟’导弹以前……所造成的威胁”（〔美〕杰克·拉伐尔中校主编：《越南空中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院研究部 1981 年 12 月版）。

在 20 世纪的 60 年代，中国援越高炮部队使用 30 年代的 37 毫米和 85 毫米高射炮，同拥有现代装备的美国空军进行了长达 3 年的殊死搏斗，先后作战 2153 次，击落美机 1707 架，击伤 1608 架，俘虏美国飞行员 42 名，创造了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优良战绩，受到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越南军民的高度赞扬。1966 年 11 月 27 日，高炮 61 支队击落了越南北方累计

击落的第 800 架美国飞机，胡志明主席、越军总部和防空空军发函祝贺，授予该支队一级国旗勋章和锦旗。

1968 年 3 月，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和国际压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逐步降级”。5 月，越、关两国在巴黎开始举行和平谈判。从 11 月起，美国停止轰炸和炮击越南北方。有鉴于此，经中越双方商定，中国援越高炮部队于 1969 年 3 月中旬前陆续撤离越南回国。

除此以外，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帮助越南在中国境内组建歼击机团，通过办学校、轮训班或由军队院校代训等形式为越南培训包括部分高级干部在内的军事、政治和技术人员 6000 余人，培训汽车司机和修理工 3800 余人，为迁至柳州、祥云等地的越军航空学校提供长达 10 年的教学和生活保障。1972 年 5 月，美国恢复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在越南北方沿海主要港口及内河航道布设水雷，实施全面的海上封锁，企图切断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进入越南的通道，逼迫越南在和平谈判中让步。5 月 28 日起，由 12 艘扫雷艇和 4 艘保障艇组成的中国海军扫雷工作队进入越南，担负海防港至东北群岛海区各航道的扫雷任务。1973 年 8 月，扫雷工作队回国。在一年多的时间中，扫雷工作队扫雷 526 艇次，扫除各种水雷 42 枚，另与越方共同扫除 5 枚，相继疏通了海防、鸿基、锦普等港口至东北群岛的各条航道，总清扫面积 201 平方公里。越南海军检查后认为，扫雷队任务完成得很好，达到了清扫的目的。1972 年 5 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有关协议，先后抽调部队、民兵 8000 余人次，在中国凭祥至友谊关、防城港至滩散铺设了总长 159 公里的 5 条援越野战输油管，向越南输送汽油、柴油近 130 万吨。在抗美救国战争中，越南的许多伤病员转送到中国境内治疗和休养，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医疗、生活环境。

中国援越部队以中越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抗美大局为重，尊重越南政府，尊重越南人民军的领导，尊重越南的风俗民情，模范执行军事政治纪律，爱护越南的一草一木，关心越南人民的疾苦，努力减轻越方的负担。他们开荒种地，为群众送药看病，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为越南人民做了大量好事，不少战士为抢救越南人民的生命财产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1967年6月15日，高炮62支队战士朱魁元在太原市求河渡口为抢救落水的越南老人焦文碑英勇牺牲，被越南军民誉为“国际主义战士”。为了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4200余名中国战士在越南身负重伤，1100名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壮烈牺牲并被安葬在越南土地上，成为中国援越抗美历史和中国援越部队功绩的永恒见证。在完成援越任务后，中国援越部队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撤回国内。越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曾当着周恩来、邓小平的面赞扬中国援越部队，他说：“我们一直认为，中国跟我们是最近的，中国给我们的援助最大，而且是最充分的。”“要是你们不给我们热心支援的话，我们恐怕要多牺牲二、三百万人才能取得胜利。”尽管黎笋说这番话时可能言不由衷，但他起码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慷慨无私的支援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的援助，对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在于规模巨大的数十亿军援，100多亿经援为越南提供了支持长期战争的相当充分的物质基础，不仅在于数十万中国支援部队直接加入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行列，成为建设和保卫越南北方的骨干力量的一部分，而且在于中国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广大领土为越南提供了最可靠的战略后方。凭借着这一坚强的依托，越南得到了广阔的回旋余地，得以摆脱后顾之忧，集中兵力

和精力于前线，再现小国打败大国，弱国打败强国的历史画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越南抗美战争之初，尤其是苏联同意向越南提供援助之后，中越两党和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十分微妙的变化，中国是在一种一般人很难理解的情况下向越南提供上述援助的。1960年接替长征正式担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黎笋对中国并不友好，在中苏两党之间发生的原则争论中，黎笋始终偏袒苏联，反对中国的政策，暗地里同胡志明的主张相对抗。1965年，胡志明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需要长期治疗休养，黎笋实际上主持了越南的党政工作。同年，苏联开始向越南提供援助，黎笋更加明显地倒向苏联，加紧反对中国的活动。1969年9月3日，胡志明逝世，黎笋的反华论调在越南劳动党内逐渐公开。只是因为还要抗美，还需要中国的巨大援助，他才不敢过分明目张胆地反华。中国不是看不到黎笋的这种变化，而是首先考虑反对最主要的敌人的斗争，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通过多做工作，维护和改善两党两国关系。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援助越南时所处的环境，那就是“忍辱负重”。所谓“忍辱”，就是中国援助的是一个越来越貌合神离的“朋友”，以黎笋为首的越南当局，一方面一次次地提出数额巨大的援助要求，给中国出难题；一方面自60年代中期以来，加强对中国的封锁，再未向中国提供其军队的内部情况和确切兵力。同时，越南当局竭力限制中国的支援在越南人民中产生的影响，禁止中国援越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同越南人民群众接触，帮助群众生产，为群众做好事，认为这是中国在“争取民心”。所谓“负重”，就是中国人口的相当一部分还没有彻底解决温饱问题，却将最好的装备、最好的物资源源不绝地运往越南，中国把保卫自己重要战略目标的高炮部队派往越南，从国内正在施工的战备工程中抽调部队为越南修路修工事。所有这些，目的只有一个——援助越南

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简单的价值尺度无法概括中国对越南援助的全部意义，何况，许多援助是难以用价值衡量的。

在中国人民大力支持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有力支援下，1975年，越南实现了祖国统一。此时，黎笋集团认为不再需要中国了，开始公开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1975年4月，越南当局在向西贡进军的同时，派出军队占领了属于中国南沙群岛的6个岛屿。同时，越南当局在国内加紧打击、驱赶华侨，在中越边境制造纠纷，蚕食中国领土。在与中国毗邻的省份搞所谓“净化边境地区”，有计划地驱赶边民。驻守中越边境的越军，竟回中国境内开枪开炮，残害无辜的中国边民。中国从维护两国人民友谊和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出发，采取忍让和克制的态度。但是，越南当局视中国的忍让为软弱，视中国的克制为可欺，其反华排华气焰不仅毫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步步升级，直至派出武装部队挑起大规模的边境事端。1979年2月，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必要的、有限的自卫还击，有力地打击了越南当局的气焰。

在现代国际社会中，以黎笋为代表的越南当局的堕落是惊人的。它背信弃义，造谣诽谤，言而无信。然而，中国援越抗美的立场，举世皆知，中国支援部队赴越，以大批武器装备和物资援越，也不是什么秘密。对众所周知的史实肆意篡改，诋毁诽谤，不仅无损于中国的光明磊落，恰恰证明了黎笋及其一伙的愚蠢、虚伪和背叛。

应该肯定的是，回顾援越抗美的历史，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可以发现许多遗憾，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为自己的牺牲和奉献感到由衷的自豪。中国的援越抗美，将作为20世纪后半叶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事件，永远彪炳青史，为后人所景仰。

结 束 语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壤中生成、发展，肆虐 10 年，中国社会历经颠簸，险致倾覆。但是，“文化大革命”不能概括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全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继续推动着已经开始 17 年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并因此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同样，人民解放军带着严重创伤进行了许多必要的工作，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英勇地保卫着国家的安全、统一和主权完整。当然，这一切不能归功于“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人民解放军会取得更加辉煌伟大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给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予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也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提出许多深刻的启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性质决定了人民解放军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军队的严密组织、严格纪律及其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地位使其在一切涉及军队的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林彪曾以为军权在手而觊觎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江青凭借林彪的支持抛出了她的文艺“军”；又因为控制不了军队而对其

极力诅咒。一方面，军队的介入是影响“文化大革命”进程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恰恰因为无论是林彪，还是江青都无法完全控制人民解放军，才使他们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行动，加速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利用和支配军队，首先在取代和混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作了不少文章。“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在中共中央内占居高位，可以代表中共中央发号施令，而且假借毛泽东的意志贯彻自己的意图，使根本背离中国共产党方针原则的东西，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人民必须遵守、照办的神圣使命。他们的一些阴谋因此得逞，造成的后果难以估算。人民解放军既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要防止某些野心家借口党的领导以营私；既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改革，又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建军的一项基本原则，认真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防止曲解或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的某些设想或论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是统一的，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既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中国共产党一定时期内的中心任务；又有可能把党的领导同个人专断区别开来，及时发现和抵制形形色色的政治投机者和阴谋家，防止“文化大革命”以及类似的悲剧重演。

在中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

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办法，把属于人民内部的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分歧或者争论升格为“阶级斗争”，人为地制造政治上的恐怖和专制。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历了长时期武装斗争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弥足珍贵。然而，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之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军队的基本任务以及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必然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对外职能的基本点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对内则是“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那种以“对内防复辟”与“对外反侵略”相对应，使人民解放军的对内职能明显地带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色彩的说法，反映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上的困惑和长期失误。对于国内可能发生的任何危及人民民主政权、危及国家统一和完整、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反革命事件和其他突发事件，军队当然需要迅速作出反应，必要时采取武装行动。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之后，在中国的人口和地域中，上述可能只能演变为局部的偶然事件，决不会成为普遍规律。由于对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状况的错误分析得出的结论，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政治运动中，不可能恰如其分地把握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不可能正确划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导致实践中以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方法对待众多的人民内部问题，不仅不能求得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而且使军队本身应该发挥的作用，也受到极大限制。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口中的武装成分和积极成员，它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自己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评价人民解放军功过是非的最具权威性的尺度是中国人民的利益及其需要。“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分裂为不同的派别，这一价值尺度随之模糊甚至被弃置不用。军队支持一派群众

的同时将自己置于另一派群众的对立面上，不少地区出现军队与群众组织的直接武装对抗，军民关系疏远，军队的声誉降到建国以后的最低点。人民解放军的形象是在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事业中建立的，人民的信赖和支持始终是人民解放军得以发展壮大的根本，“群众是基础，人民是靠山”这一原则的任何动摇都将导致军队工作的失误。“文化大革命”严重冲击了军民关系，从反面深刻说明，军队和人民，如鱼如水，须臾不可分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17 年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and 经济基础，人民解放军初步发展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文化大革命”破坏了这个环境和基础，使人民解放军的正常发展受到极大的干扰和挫折。军队的进步是同整个社会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军队的强大有助于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是现代化、正规化军队建设的必要条件。军队参与国家政治生活，首先应该致力于维护国家的完整、团结和统一，维护国家机构的权威、效能和正常运转，维护必要的工作、生产、生活和教学科研秩序。作为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前提和保障，政治进步、社会安定是必不可少的。军队的现代化水平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而提高，不能设想，在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情况下，国家可能拿出足够的财力、物力用于军队建设。服从国家大局，积极参加和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是军队的光荣传统，又是军队自身建设的需要。正确估计军队建设的政治、经济条件，有助于摆正人民解放军的位置，求得军队建设与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协调发展。

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国地位要求相应的国防实力，要求人民解放军迅速提高现代化、正规化水平，应付战争和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国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力量的增

长反映了国家整体实力的增长。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人民解放军全面开展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显著的成就。“文化大革命”中断了这一过程，并对此全盘否定，推行一条截然不同的建军路线，以“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代替“武装集团”的职能，军队建设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这一时期的几次自卫还击作战，一方面表现出人民解放军固有的献身精神，一方面反映出人民解放军在教育训练、武器装备、人员素质、战斗保障等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弥合这些差距，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一个时期中，人民解放军异常艰巨的任务。现代化、正规化既是人民解放军的奋斗目标，又是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正确方针和方法，这一目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已确立。尽管会有挫折和失误，人民解放军在这条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决心是不容动摇的。

“文化大革命”的巨痛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教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后 记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研究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及其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不仅有助于我们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教训，而且对于当前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伟大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禁区逐步打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更为这一特殊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十几年来，有关“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比较系统地从正反两个方面记录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建设和工作全貌的著述尚不多见。为使读者比较客观全面地了解这10年中人民解放军的经历，我们撰写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一书。

本书撰写过程中，曾得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有关单位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同时参考借鉴了军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聂荣臻元帅欣然为本书题词，著名书法家李铎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较低，研究不够，掌握资料又欠充分，错误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得到批评指正。

作 者

1989年6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 文化大革命 ” 中的人民解放军

作者 =

页数 = 4 3 5

S S 号 = 1 0 9 9 4 3 5 1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